

臺灣史研究

第 31 卷 第 4 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編輯委員會

《臺灣史研究》第 31 卷第 4 期

主 編：鍾淑敏

助理編輯：顧雅文、莊勝全

編輯委員：吳叡人、李力庸、林文凱、康培德、許佩賢
陳宗仁、陳翠蓮、陳鴻圖、曾文亮、曾品滄

編輯助理：劉鴻德、林彥佑

編輯顧問：杜正勝、李壬癸、劉翠溶、賴澤涵、莊英章
黃富三、施添福、溫振華、林修澈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Editorial Board

<i>Editor-in-chief</i>	Shu-min Chung		
<i>Assistant Editors</i>	Ya-wen Ku	Sheng-chuan Chuang	
<i>Editors</i>	Rwei-ren Wu	Li-yung Lee	Wen-kai Lin
	Peter Kang	Pei-hsien Hsu	Tsung-jen Chen
	Tsui-lien Chen	Hung-tu Chen	Wen-liang Tseng
	Pin-tsang Tseng		
<i>Editorial Assistants</i>	Feng-ted Liu	Yen-yu Lin	
<i>Advisors</i>	Cheng-sheng Tu	Jen-kuei Li	Ts'ui-jung Liu
	Jeh-hang Lai	Ying-chang Chuang	Fu-san Huang
	Teng-fu Shih	Chen-hua Wen	Siu-theh Lim

目 錄

《臺灣史研究》第 31 卷第 4 期

研究論著

「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史事考訂與補充／方真真	1
霧社事件後清流部落之土地取得與生計變遷： 兼論周遭族群關係（1931-1980）／陳慧先	41
Left Behind: Untold Stories of Former Korean Sex Workers in Post-WWII Taiwan／Yoshihisa Amai	91
蔣經國在臺軍事權力的建立： 以與王叔銘交往為中心的探討（1950-1965）／蘇聖雄	129
《臺灣史研究》第 31 卷總索引	175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史事考訂與補充*

方真真**

摘 要

本文主要透過西班牙新史料的發掘，重新討論鄭氏三代招諭呂宋。1662 年鄭成功派利勝神父攜招諭書出使馬尼拉，該書由利勝譯成西班牙文，其抵達馬尼拉日期以同年 5 月 10 日或 12 日較為可信。馬尼拉官方對鄭成功的威脅有四項因應措施：撤除菲島南部駐軍回馬尼拉、驅逐華人、招募騎兵及派軍船前往臺灣。其中為防止菲島華人協助國姓爺，決議只留 2,500 名華人（不包含教徒），其餘得離開，此驅逐菲島華人的消息傳出後，造成同年 5 月 25 日馬尼拉華人動亂。

7 月初馬尼拉華人反抗事件平息後，利勝攜帶答覆國姓爺的回函返航。鄭經方面商討此問題，由他的兩位官吏首長（應指鄭泰和洪旭）於 1663 年 4 月 2 日以其名義寫信，讓利勝攜往馬尼拉，所搭船舶於同月 21 日停靠馬尼拉港口報關。馬尼拉官方討論鄭經方面所提要求，最後雙方簽訂和平條約，交給利勝兩封公函，一封為給鄭經的兩位官吏首長的答覆函，另一封是致鄭經的信函。於是國姓爺威脅馬尼拉之事終於落幕。

相較於鄭成功的征菲企圖，馬尼拉官方對鄭經和鄭克塽的征菲意圖較不關注。因鄭成功打敗荷蘭人後，馬尼拉官方知其武力不可輕視，須小心應付，而鄭經和鄭克塽的征菲意圖，有的只是謠傳，有的未傳到馬尼拉官方耳中就已終止，有的該官方就當時情勢認為不會發生。鄭經有 6 次的征菲企圖，西班牙史料只有 4 次紀錄，即 1671、1672、1673 及 1680 年，馬尼拉官方最在意的是 1672 和 1680 年。1672 年曾派船遣使前往臺南與鄭經交涉，因船難抵澳門而未果；1680 年曾特別部署相關軍備抗敵入侵。鄭克塽時期的征菲意圖僅有鄭氏將滅亡之際的 1683 年 7 月 16 日之後，馬尼拉當局不知此消息，因此不見此次西班牙文記載。

關鍵詞：招諭呂宋、國姓爺、鄭經、鄭克塽、臺灣

* 本文曾於 2023 年 11 月 28 日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倫敦政經學院協辦的「2023 年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航海、漂流與異域見聞」宣讀，會中感謝評論人鄭永常教授提供寶貴意見，並感謝本文匿名審查人提供重要的修改意見。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部分成果之一，計畫編號：NSTC 109-2410-H-152-024-MY3。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來稿日期：2024 年 1 月 12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5 月 2 日。

- 一、前言
 - 二、來自鄭成功的挑戰
 - 三、鄭經的企圖征菲
 - 四、鄭克塽的企圖征菲
 - 五、結論
-

一、前言

漢籍文獻中對鄭氏三代企圖招降呂宋的記載，主要可見於約成書在 1704（康熙 43）年的江日昇《臺灣外記》，書中除了對鄭克塽在位時黃良驥等人曾提議攻取呂宋有較多的描述之外，對鄭成功和鄭經欲征討呂宋則寫得極為簡短。¹ 另在夏琳的《海紀輯要》和《閩海紀要》中皆對黃良驥等人提議攻取呂宋有相同的概略敘述。²

1904 年 11 月，由東京清國留學生會館發行單行本的匪石〈鄭成功傳〉，在其「附鄭成功經營呂宋事略」中，引用勤敷阿仰氏所著《非利賓島誌》（即 John Foreman 的《菲律賓島志》），³ 敘述鄭成功招諭呂宋之經過。⁴ 寫於 1918 年的連橫《臺灣通史》中也可見鄭氏三代企圖招降呂宋的敘述，其中對鄭成功的部分著墨較多。⁵ 不過，此議題較具學術性的專文則是曾任臺北帝國大學第一任校長

¹ 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60 種，1960；1704 年原刊），頁 424-427。

² 夏琳，《海紀輯要》（文叢第 22 種，1958），頁 77-78；夏琳，《閩海紀要》（文叢第 11 種，1958），頁 77。

³ 指的是 John Foreman 的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Ethnographical, Social and Commercial Sketch of the Philippine Archipelago and Its Political Dependencies*，此書最早發行年代為 1890 年，另亦有 1892 年及 1899 年的版本。

⁴ 匪石，〈鄭成功傳〉，收於鄭亦鄒，《鄭成功傳》（文叢第 67 種，1960），頁 102。

⁵ 連橫，《臺灣通史》（文叢第 128 種，1962；1921 年原刊），卷二〈建國紀〉，頁 35-36；同前書，卷七〈戶役志〉，頁 151；同前書，卷十四〈外交志·呂宋經略〉，頁 395-397；同前書，卷二十二〈宗教志·景教〉，頁 581。

的幣原坦（1870-1953）在 1931 年所發表的〈國姓爺の呂宋招諭〉，⁶ 此文提到不少書籍皆以 John Foreman 的《菲律賓島志》為依據來敘述，然其內容存在一些疑問，不如 1885 年 G. Phillips 所發表的〈國姓爺傳（The life of Koxinga）〉，而 E. H. Blair 和 J. A. Robertson 的《菲律賓群島（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第 36 冊所譯的「1662-1663 年間馬尼拉事件（Events in Manila, 1662-1663）」，由當時耶穌會教士所寫，準確性較高。作者運用前述三種資料詳細論述國姓爺派遣道明會利勝（Victorio Riccio, 1621-1685）⁷ 神父招諭呂宋之始末及其引發的華人被殺事件，以及利勝再度赴馬尼拉的經過，並提及西班牙傳教士 Francisco Combés 編寫的《民答那峨島、霍洛島和附近諸島的歷史》第八篇中收錄了馬尼拉總督給國姓爺的回信。⁸ 之後，石原道博（1910-2010）在 1941 年寫了〈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始末〉，⁹ 因幣原坦對鄭成功的招諭呂宋已有完整討論，該文主要透過江日昇《臺灣外記》的資料，著重於鄭經及鄭克塽征討呂宋的企圖。

戰後，1954 年賴永祥也以鄭氏三代企圖征討菲律賓為題發表專文，運用的漢籍文獻也是江日昇的《臺灣外記》，另有夏琳的《海紀輯要》，內容相較之前幣原坦和石原道博的文章並無新意，惟文中翻譯 Francisco Combés、Casimiro Díaz、¹⁰ Murillo Velarde¹¹ 所寫書中關於鄭成功致菲律賓總督之國書及菲律賓總督致鄭成功之國書，且列出 John Foreman 書中關於 1662-1663 年間馬尼拉事件的英文摘錄，前書引用 Juan de la Concepción 之言。賴氏認為 John Foreman 的書雖非根本

⁶ 幣原坦，〈國姓爺の呂宋招諭〉，《歷史地理》（東京）57: 5（1931 年 5 月），頁 571-579；幣原坦，〈國姓爺の呂宋招諭再說〉，《歷史地理》58: 4（1931 年 10 月），頁 285-295。前面二文收於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1938），頁 226-253。

⁷ 連橫的《臺灣通史》將 Victorio Riccio 的名字譯為李科羅，但他真正的中文名字則是利勝。

⁸ Libro Octavo, "Copia de la carta, que en respuesta de la del Coseng embió, y remitió a la Isla Hermosa el Gobernador de Manila Don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in Francisco Combés, *Historia de las Islas de Mindanao, Iolo y sus Adyacentes* (Madrid: Por los herederos de Pablo de Val, 1667), pp. 545-547. 另此書也收入了國姓爺致菲律賓總督的信函，參見"Orden de amigable amonestacion de el Coseng, Capitan General del Reyno de China, para el Gobernador de Manila, D.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in Francisco Combés, *Historia de las Islas de Mindanao, Iolo y sus Adyacentes*, pp. 543-544.

⁹ 石原道博著、鄭瑞明譯，〈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始末〉，《臺北文獻（直字）》（臺北）61/62（1983 年 3 月），頁 221-236；原文參見石原道博，〈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始末〉，收於加藤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東洋史集說：加藤博士還曆記念》（東京：富山房，1941），頁 93-110。

¹⁰ Casimiro Díaz, *Conquista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Valladolid: Luis N. de Gaviria, 1890).

¹¹ Pedro Murillo Velarde,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 Philipinas de la Compañia de Iesus* (Manila: En la Imprenta de la Compañia de Iesus, por D. Nicolas de la Cruz Bagay, 1749).

史料,但值得參考。¹² 1970年,Charles J. McCarthy也運用E. H. Blair和J. A. Robertson所編的“Events in Manila, 1662-1663”,討論1662年國姓爺對呂宋的威脅。¹³

上述所提著作所運用的外文文獻多為十八、十九世紀西文資料。之後,衛思韓(J. E. Wills)在1977年主要根據道明會¹⁴利勝神父的手稿,談他與鄭氏家族的關係,內文雖非以鄭氏招諭呂宋為主,但所簡述國姓爺派利勝赴馬尼拉招降西班牙人及所引發的事件,其運用的材料卻是前人所未提及。¹⁵ 利勝的手稿《道明會在中華帝國之業績》(*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撰寫於1667年,張先清在2008年曾說該手稿記錄鄭成功派遣利勝出使馬尼拉招諭菲律賓的經過,並認為囿於史料,迄今為止,關於鄭氏家族試圖征服菲島的這一段插曲尚未得到比較深入的研究。¹⁶ 1996年,鮑曉鷗(J. E. Borao Mateo)曾依據利勝的書來談鄭成功的形象,文中亦涉及鄭成功派他赴菲律賓招諭及引發華人被屠殺的經過。¹⁷

1998年,在李毓中發表的鄭氏家族與菲律賓關係中,也敘述了鄭氏三代的征菲企圖,關於鄭成功和鄭克塽方面並無新論述,惟談到最早記載鄭經意圖攻打菲律賓的史料來自1670年及167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書信,他在西班牙文史料找到六份文件涉及鄭經欲攻打菲律賓的消息。¹⁸ 隔年,他翻譯了此六份隸屬於Filipinas, 331, L.7卷宗內的文件,從這批文件中,他提出兩處與招諭呂宋有關的

¹² 賴永祥,〈明鄭征菲企圖〉,《臺灣風物》(臺北)4:1(1954年1月),頁17-33。John Foreman引用的是Juan de la Concepción, *Historia General de Philipinas* (Manila: en la Impr. del Seminar, Conciliar, y Real de S. Carlos: por Agustín de la Rosa, y Balagtas, 1788-1792)。

¹³ Charles J. McCarthy, “On The Koxinga Threat of 1662,” *Philippine Studies* (Quezon City) 18:1 (January 1970), pp. 187-196.

¹⁴ 中國大陸出版的著作多譯為「多明我會」。

¹⁵ John E. Wills, “The Hazardous Missions of a Dominican: Victorio Riccio, O.P., in Amoy, Taiwan and Manila,” in Jean-Robert Armogathe, *Actes du 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au temps des Lumieres* (Chantilly, 16-18 septembre 1977)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Cathasia, 1980), pp. 231-243 (French), 243-257 (English); 中譯參見J.E.威爾斯(John Elliot Wills)著、耿升摘譯,〈多明我會士李科羅與台灣鄭氏政權〉,《中國史研究動態》(北京)1982:5(1982年5月),頁14-20。

¹⁶ 張先清,〈17世紀歐洲天主教文獻中的鄭成功家族故事〉,《學術月刊》(上海)40:3(2008年3月),頁135。

¹⁷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Consideraciones en torno a la imagen de Koxinga vertida por Victorio Ricci en Occidente,” *Encuentros en Catay* (Taipei) 10 (1996), pp. 48-77.

¹⁸ 李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菲律賓關係初探〉,《漢學研究》(臺北)16:2(1998年12月),頁40-42、51-55、56。

疑點：一是以往認為只有利勝曾任菲律賓總督答覆鄭成功招諭的使節前往中國，然 Alberto Collares 神父¹⁹ 也曾為此事被菲律賓總督任命為使節派往中國，故當時答覆鄭成功招諭的使節團究竟是一個或兩個？二是菲律賓總督派遣使節至臺灣，遊說鄭經與菲島西班牙人保持和平的使節是誰？李毓中以為 Francsico Enrique de Losada 神父的可能性較大，此人曾於 1674 年擔任和平使節前往臺灣。²⁰ 前述第二個疑點，筆者近年來在西班牙所找到的新史料可以解答這個問題。六份與鄭經有關的史料也可見於 2002 年鮑曉鷗所編的史料彙編 *Spaniards in Taiwan* 第二冊，²¹ 此史料彙編亦收入利勝書中部分資料，以及與利勝有關的荷蘭史料。²²

張先清除了在 2008 年介紹利勝書中內容之外，同時也提到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8-1686）於 1676 年所著的《中華帝國的歷史、政治、倫理及宗教論集（*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中，對鄭成功宣諭馬尼拉的經過與利勝的記載雷同，不同的是利勝書中並沒有收錄 1662 年 4 月鄭成功致菲律賓總督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的函件內容，而閔明我則記錄了這封信件的全文，以及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於 1662 年 7 月 10 日致鄭成功的回信全文。儘管這兩封信函在其他西方文獻中也屢有轉引，但大多出自十八、十九世紀的書籍。閔明我的書距離上述書信撰寫時間不過間隔十餘年，可以說是最為接近該事件的史料之一，有一定參考價值。²³

¹⁹ 道明會修士 Alberto Collares 神父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亞人，1628 年成為修士，後抵達菲島，曾擔任 Binondo 代牧、San Gabriel 醫院院長和潤內代牧，在那待很長時間，向華人傳教 40 年後，歿於 1673 年馬尼拉修院。參見 Hilario Maria Ocio,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desde su Fundación hasta Nuestros Días, Parte Primera, Comprende desde 1587 a 1650* (Manila: Establecimiento Tipográfico del Real Colegio de Santo Tomás, 1891), pp. 391-392. 筆者查了一些道明會的紀錄，似乎都不見 Alberto Collares 神父被菲律賓總督任命為使節派往中國的記載。

²⁰ 李毓中，〈塞維亞印度總檔案館中有關鄭經的西班牙文史料譯述〉，《臺灣風物》49: 1（1999 年 3 月），頁 137-145。前文作者從 J. S. Cummins 的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8-1686* 一書及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所編《菲律賓群島》第 42 冊中之記載，認為當時派往臺灣遊說鄭經的是 Francsico Enrique de Losada 神父，但仍需進一步驗證。

²¹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2), pp. 654-655, 658-662.

²²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pp. 586-653.

²³ 張先清，〈17 世紀歐洲天主教文獻中的鄭成功家族故事〉，頁 137-138。閔明我所記錄的鄭成功致菲律賓總督信函和菲律賓總督致鄭成功的回信參見 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ht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en la Imprenta Real por Iuan Garcia Infançon, 1676), pp. 416-419.

實際上，前述 Francisco Combés 的書收入的這兩封信函又比閔明我早了 9 年。隔年，李毓中在「臺灣與海洋亞洲」網站寫了兩篇短文，談論 1662 年鄭成功派使利勝企圖征菲，該文運用利勝所寫的書，另文中否認國姓爺曾派遣一艘小型艦隊偷襲馬尼拉，認為此謠傳乃出自荷蘭人的情報，而荷蘭人的情報則由馬尼拉華人所傳播出去。荷蘭人的情報來自兩份資料：一是 1662 年 12 月 26 日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總督寫回荷蘭的報告；另一是西班牙國王致馬尼拉大主教的信中，提到西班牙駐荷蘭外交使臣 Esteban de Gamarra，於 1663 年 7 月 24 日自荷蘭的來信內容，此信來自印地安斯檔案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Sevilla, 簡稱 AGI）編號 AGI, Filipinas, 4, N.46，並不見於以往的著作。²⁴ 這兩篇短文後來合併刊於 2012 年《原住民族文獻》第六期。²⁵

此外，Anna Busquets Alemany 在 2013 年及 2019 年各發表一篇利勝與鄭成功有關的文章。第一篇討論 1662 年鄭成功派利勝招諭呂宋所引發華人被殺事件的後續結果，文中運用利勝的書和一份 1677 年應馬尼拉法院聽訟官 Diego Calderón y Serrano 的要求所編關於華人不宜居住在菲島的報告，此報告裡有六項提議是由利勝所建構支持將華人驅逐出菲島的必要性。²⁶ 第二篇同樣透過利勝的書來說明鄭成功派他出使招諭呂宋之始末，內容也是無新意，但文中提到兩份來自印地安斯檔案館編號 AGI, Filipinas, 201, N.1 卷宗內的文件：一是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所組委員會於 1662 年 7 月 10 日提到關於國姓爺寫給他的信；

²⁴ 李毓中，〈「殲滅」或「空穴來風」的艦隊？：1662 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一）〉（2009 年 7 月 14 日），「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下載日期：2023 年 5 月 24 日，網址：<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09/07/14/「殲滅」或「空穴來風」的艦隊？——1662 年鄭成功/>；李毓中，〈「殲滅」或「空穴來風」的艦隊？：1662 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二）〉（2009 年 8 月 7 日），「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下載日期：2023 年 5 月 24 日，網址：<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09/08/07/「殲滅」或「空穴來風」的艦隊？——1662 年鄭成功/>。

²⁵ 李毓中，〈國姓爺與菲律賓總督的「戰爭」：1662 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原住民族文獻》（臺北）6（2012 年 12 月），頁 21-28。

²⁶ Anna Busquets Alemany, “Koxinga, los españoles de Manila y el alzamiento de los chinos de 1662: el testimonio de Victorio Riccio,” *Revista Iberoamericana de Estudios de Asia Oriental* (Madrid) 6 (June 2013), pp. 7-43. 作者也發表與前述論文類似的英文文章，該文同樣運用利勝的書和 1677 年的報告，參見 Anna Busquets Alemany, “Victorio Riccio: An Entangled Voice in the 1662 Chinese Uprising in Manila,” in Jos Gommans and Ariel Lopez, eds., *Philippines Confluence: Iberian, Chinese and Islamic Currents, c. 1500-1800*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69-189. 1677 年的報告原文為 *Discurso y parecer en que se demuestra que no conviene que la nacion de china (que llaman sangleyes) habite ni viva de asiento en las Islas Philipinas*。

二是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於 1662 年 7 月 10 日致鄭成功的回覆。²⁷ 前述信函乃目前可見最早的文件，針對這兩封國書，以往學者多節錄自十八、十九世紀的書籍。不過，AGI, Filipinas, 201, N.1 卷宗約有 64 份手稿，直接談及鄭成功企圖征討呂宋，及鄭經派利勝再度前往馬尼拉的手稿約有 37 份，而 Anna Busquets Alemany 僅簡介兩份為人所熟悉的信函。

總之，目前只有幣原坦、石原道博、賴永祥、Charles J. McCarthy 和李毓中，以鄭氏招諭呂宋為專文，實際上，此議題少有人關注。筆者因為多年來常赴西班牙的檔案館收集史料，意外發現一些與臺灣鄭氏曾企圖招討呂宋有關的西班牙文史料，至今這些史料仍有不少不為人所注意，卻可以增補我們對鄭氏家族企圖征菲的認識，尤其是記載了更多當時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面對鄭氏招討的回應。

二、來自鄭成功的挑戰

（一）遣使招降

1661 年 4 月，鄭成功率領艦隊渡海攻打在臺灣的荷蘭人。不久，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已掌握相關訊息，在一封 1661 年 7 月 20 日署名菲島統治者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任期 1653-1663 年）的信函有此紀錄。²⁸ 隔年 2 月 1 日，荷蘭人開城投降。接著鄭成功將目標指向呂宋，派人宣召在廈門的利勝神父赴大員（Tayvan，指臺南安平），神父不知原因，以為召他賜死，許多教徒為神父的啟航哭泣，3 日後神父抵達福爾摩沙島，國姓爺宴請神父兩次，但他並未親自出席，8 天後國姓爺交給神父公開信函（指致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的信），命令神父沒有完成任務就永遠不要回來。神父踏上旅程，經過 17 天的航行，於 5 月

²⁷ Anna Busquets Alemany, "Por Dios, por el rey y por Koxinga: las negociaciones de Vittorio Riccio," in Javier Martín Ríos, ed., *Estudios Lingüísticos y Culturales sobre China*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2019), pp. 169-183.

²⁸ 原文如下：「El tartaro que daua prebiniendo gruesa armada y exercitos para benir sobre el Cogsnya a quien llama a Ruesin, este hizo demoler la fuerza principal y embió a hacer opugnación para ymbadir y subprender la ysla de tayguan por otro nombre Hermosa que posee el olandes,... Manila y julio 20 de 1661.」參見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Sevilla（以下簡稱 AGI），Filipinas, 9, R.2, N.34, fols. 37v-39v.

10日抵達馬尼拉灣。²⁹ 鮑曉鷗認為鄭成功的信函寫於4月21日，神父應於同月23日從安平出發。³⁰ 從安平到馬尼拉順風不超過一個星期即可到達，但途中所經過的呂宋西北端 Bojeador 岬角是危險之地，海面波濤瞬息萬變，船隻轉入此地易遭難；其次，在船舶進入馬尼拉灣前，會先在 Mariveles 停泊等待檢查，檢驗後才可駛入馬尼拉灣。³¹ 經歷海浪波濤變化與 Mariveles 海灣的等待檢驗，於是利勝神父所搭船隻經過兩個多星期終於抵達馬尼拉灣。

在印地安斯檔案館所藏檔案編號 AGI, Filipinas, 201, N.1 卷宗中可見鄭成功致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信函之最早的西班牙文譯本，信函的最後註明日期為「永曆 16 年 3 月 7 日，歐洲的 1662 年 4 月 21 日」，緊接著的文句說明此信是由利勝神父在 1662 年 5 月 7 日按照中文原件所翻譯而成。³² 在前述的西班牙古籍，諸如 Francisco Combés、閔明我等人的書中，都沒有提到此信函是由利勝所翻譯。按日期，利勝當時是在航向馬尼拉的途中翻譯的。

此外，關於抵達馬尼拉的日期，除了前述利勝所寫的 5 月 10 日之外，不同的資料也有不同說法：（1）Ventura del Arco 的書，以及 E. H. Blair 和 J. A. Robertson 的史料彙編皆記載抵達日為 5 月 5 日；³³ （2）一份在 1664 年 3 月 21 日由道明

²⁹ 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libro tercero, capítulo XVI, “el padre fray Jaime Verge, llega a China, conquista la Isla Hermosa el Cuesing y envía con embajada a Manila al padre Riccio, fúndase ibelesia en Foning”, sin página. 在西班牙 Ávila 道明會檔案館（Archivo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簡稱 APSR）藏有 Victorio Riccio 的抄本三冊，因破損嚴重，現已不能調閱，但也藏有兩份不同版本的打字稿：一份以舊式打字機完成，傳抄者不具名；另一份由 Bonifacio Soli 修士在 2004 年香港所傳抄的 Victorio Riccio 手稿之打字稿，本文來自此版本的打字稿。

³⁰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Consideraciones en torno a la imagen de Koxinga vertida por Victorio Ricci en Occidente,” pp. 53, 55.

³¹ 方真真，〈從西班牙史料考察十七世紀末期環臺灣海域的暴風雨紀錄〉，《臺灣文獻》（南投）58: 4（2007 年 12 月），頁 136-137；方真真，〈埋骨於基隆和平島：十七世紀來臺灣傳教的道明會神父 Mateo de Cobisa〉，《國史館館刊》（臺北）74（2022 年 12 月），頁 19。

³² 原文如下：「Carta del Cogsegn- Orden de amigable amonestación del Cogsengya, capitan general del reino de China, para el gouernador de Manila, Don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 en el diez y seis año del Rey englec, en siete de la tercera luna, el qual año y día de luna, según la quenta de evropa es año de mill seiscientos y sesenta y dos en veintte y vno de abril en la Ysla Hermossa. [Hasta aquí la carta]. Traducido por frai Victorio Ricc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siete de mayo de mil seiscientos y sesenta y dos años concuerda con su original en letra china de que yo dicho fray Vitorio Riccio doi fee, frai Victorio Riccio, mano propia orden predicador.」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82r-83r.

³³ 鮑曉鷗提到 Ventura del Arco 的 *Documentos datos y relaciones para la historia de Filipinas*, I (Madrid: 1859) 所載內容也出現在英譯本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會神父 Juan de Polanco³⁴ 所寫的手稿中，提到利勝抵達馬尼拉的時間是 5 月 12 日；³⁵ (3) 另一份 1664 年 6 月 19 日 Juan de Polanco 神父所寫的手稿則說利勝於 5 月 18 日抵達馬尼拉。³⁶ 若從利勝譯成西班牙文的時間和下船後緊湊的行程來看，5 月 5 日抵達馬尼拉似乎不太可能。而 5 月 18 日抵達之說也有誤，因為西班牙手稿提到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在 5 月 16 日耶穌會所屬的 San Ygnacio 學校 (colegio)³⁷ 召開會議，商討利勝神父所攜來國姓爺信函中的威脅，會中述及國姓爺已佔領福爾摩沙島 (又名大員)，奪走了荷蘭人的堡壘和要塞，該地與呂宋島接壤不遠，國姓爺以其武力和大量的人員及船艦戰勝荷蘭人，國姓爺寫給大人 (指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的要點及所談的後果，大人須看情況來行動，根據現況來防止及預備抵抗其入侵。³⁸ 故 5 月 10 日或 12 日的可能性較大。

Vol. 36 (Cleveland, Ohio: A.H.Clark, 1906), p. 218. 參見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Consideraciones en torno a la imagen de Koxinga vertida por Victorio Ricci en Occiente," pp. 73-74. 實際上，兩者的史料來源皆為耶穌會教士所寫的 1662-1663 年間馬尼拉事件。

³⁴ Juan de Polanco 也寫成 Juan Polanco，為西班牙 Burgos 山區的人，1639 年 7 月 13 日在 Valladolid 的 San Pablo 修院成為道明會修士，1658 年抵達菲律賓傳教，學習漢語，後被派往中國傳教兩年，在那受迫害、入獄遭酷刑。後來被任命為其修會在馬德里和羅馬的總代理人，並於 1666 年派遣代表團前往菲律賓傳教，且由 Baltasar de Santa Cruz 神父來主導。1671 年 12 月 2 日歿於 Sevilla 的修院。參見 Hilario Maria Ocio,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desde su Fundación hasta Nuestros Días, Parte Segunda, Comprende desde 1658 a 1700* (Manila: Establecimiento Tipográfico del Real Colegio de Santo Tomás, 1891), pp. 1-2, 17.

³⁵ 原文如下：「a 12 de maio llegó a Manila el padre fray Victorio Riçio religioso de Santo Domingo y missionario antiguo en el Reyno de China, el qual mandó llamar el Cogsen desde isla hermosa...」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62r.

³⁶ 原文如下：「que en 18 de mayo llegó a Manila vn religioso dominico llamado fray Vitorio Ricio, embiado al gouernador de Philipinas por embaxador del Cogsen para que le dijese el fin de sus intentos...」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69r.

³⁷ Colegio 在西班牙文有教會學校或修院之意，有的修院設有教育神職人員之機構。

³⁸ 原文如下：「En la ciudad de Manila en diez y seis de mayo de mill seiscientos y sesenta y dos años, estando en el colegio de San Ygnaci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su sseñoría el señor Don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caullero del orden de Calatraua del consejo de su Magestad, su gouernador y cappitan general de estas yslas Philipinas y pressidente de la Audiencia y Chancillería Real, que en ellas reside conbocó junta general a que concurrieron con su sseñoría, ..., y estando así juntos y congregados su sseñoría dicho señor gouernador y capitan general propuso como el padre frai Vitorio Riccio, del orden de predicadores, le dió un tanto trasuntado y firmado de su mano en que testifica serlo de la carta original, que trae como embajador del Cosenya, tirano de las costas de China que dominó la Ysla Hermossa alias Taiguan quitandole al olandez las fuerzas y pressidio que en ella tenía confinantes a esta ysla de Luzon en poca distancia con fuersa de armas y multitud de gente y vaxeles con que lo sujetó y rindió escrita para su sseñoría con los terminos y para el efecto que contiene y para que se vea y determine lo que se debe obrar, según el estado del tiempo pressente

利勝抵達馬尼拉灣時身穿明朝官服。之後，他搭乘一艘小船從河道進入馬尼拉城，從那到達聖道明修院，受到了修院神父們的歡迎。隨後，他在省會長神父（Padre Provincial）³⁹ 的陪同下拜會了菲島統治者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與他商議該怎麼處理這外交事務，才不會在城裡引起當地居民的騷動。雙方決定只公開討論貿易問題，並秘密協議如何應對鄭成功的威脅。隨後依照接待外國使節的慣例，馬尼拉當局舉行了正式的歡迎儀式。⁴⁰ 此時利勝神父應已將鄭成功的信函交給了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⁴¹ 而在歡迎儀式之前，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曾召開會議，有超過 120 人參與，會中同意對利勝神父舉行盛大接待儀式。⁴²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得知鄭成功的威脅之後，立即秘密召集皇家法庭（*real audiencia*）成員、大主教、世俗和教會分會（*cabildos secular y eclesiástico*）、皇家官員、軍營訓練長（*maestro de campo*）⁴³ 及軍隊班長。當政府秘書拆開國姓爺信函，讀了此信，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看見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很震驚，他讓在座的人發表意見，他們都認為應該回覆國姓爺。⁴⁴ 國姓爺信函的內容，以討伐荷蘭人的原因、經過及其下場為例，要讓呂宋的西班牙人稱臣納貢，並非要

y las circunstancias que se deuen prebenir con el conocimiento y prebención de los reparos que ay para poderle resistir, mandó leer dicho trasunto de dicha carta referida en esta junta como se hizo por mí el escribano que su thenor es como se sigue.」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81r-82r.

³⁹ 省會長指的是道明會在菲律賓聖玫瑰省教區的傳教會長，掌管該省區所有教堂和修院，此時的省會長是 Ygnacio Zapata 神父，他也參與了 1662 年 5 月 17 日商討解決鄭成功威脅的會議，並對會中驅逐菲島華人的提案提出個人看法。

⁴⁰ 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libro tercero, capítulo XVI, “el padre fray Jaime Verge, llega a China, conquista la Isla Hermosa el Cuesing y envía con embajada a Manila al padre Riccio, fúndase ibelesia en Foning”, sin página.

⁴¹ 李毓中，〈國姓爺與菲律賓總督的「戰爭」：1662 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頁 21。

⁴² 原文如下：「que dicho religioso fue reciuido con mucha ostentación por acuerdo de vna junta que para esto formó el gouernador en que concurrieron más de 120 personas.」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69r.

⁴³ 按奧古斯丁修會 Casimiro Díaz 修士書中描述，可知 *maestro de campo* 是軍營訓練長，在軍中有其地位，許多菲島的統治者皆曾擔任過此職位。參見 Casimiro Díaz, *Conquista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p. 645.

⁴⁴ 原文如下：「... que fue el padre fray Victorio Ricc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que se hallaua en aquella ocaçión en la predicación del santo euangelio en aquellos reinos, llegó este a Manila con la carta y melancólica embaxada, hablele en secreto y informeme del poder de aquel tirano, acreditando todo quanto me escriuía; procure con el mayor secreto que pude, el que se juntasen los sseñores de la real audiencia, arzobispo, cauildos secular y eclesiastico, oficiales rreales, maestro de campo y cauos militares, abrió el secretario de gouierno la carta, leyola y que daron todos pasmados (digo lo que vi) dixeles que diesen sus pareceres sobre la determinación de esto y todos lo fueron de que se le respondiese al barbaro, el que no auía lugar lo que pedía.」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7r.

立即出兵征討，但信中寫道荷蘭人的下場和鄭氏的軍力確實會令西班牙人心生恐懼，諸如荷蘭人被捕殺不計其數、無處可逃、脫衣乞降、城池庫藏全數奉上，以及鄭成功擁有精兵數十萬及戰艦數千艘。⁴⁵ 無立即出兵的原因也可見《臺灣外記》卷十：「先王在日（指成功也），每欲征之，以雪我中國人之恨，因開創無暇。」⁴⁶ 於是，針對此事馬尼拉當局商討相關對策。

（二）菲律賓西班牙政府的回應

一如前述，這群政府和教會的要員及軍事將領除了在 1662 年 5 月 16 日召開議會商討對策之外，也在隔日皇家法庭大廳召開會議來解決國姓爺的威脅。⁴⁷ 另在同月 20 日的會議中，決定以武力抵抗國姓爺的入侵，不向其納貢，並下令停在馬尼拉河口處 12 艘或 13 艘國姓爺的或私人的舢舨（champanes）⁴⁸ 撤出到甲米地（Cavite）⁴⁹ 港，以防止華人事先向敵人通風報信馬尼拉的防守不足，而且在馬尼拉城外的市場和其他地方有超過 170 名的中國人可以幫助國姓爺。⁵⁰ 針對

⁴⁵ 此信函的中譯參見賴永祥，〈明鄭征菲企圖〉，頁 19-20；李毓中，〈國姓爺與菲律賓總督的「戰爭」：1662 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頁 21-22。

⁴⁶ 江日昇，《臺灣外記》，頁 425。

⁴⁷ 原文如下：「En la ciudad de Manila en diez y siete de mayo de mill seiscientos y sesenta y dos años estando en la sala de la Real Audiencia el señor Don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cauallero del orden de Calatraua del consejo de su Magestad, su gouernador y capitan general de estas Yslas Philipinas y pressidentte de la Audiencia y Chanzillería Real, de ellas conbocó Junta general en que concurrieron con su señoría,....., estando juntos y congregados su señoría propuso como en junta que se lebró con dichos señores juezes oficiales Reales y la mayor parte de los cauos militares cauildo de esta ciudad y vezinos de ella se acordó y resolvió con vista del traslado de la cartta del Cogensya.」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89r.

⁴⁸ 單數 champan，複數 champanes，其船型是雙桅中式帆船。champan 圖像參見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第一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頁 55-57。

⁴⁹ Cavite 位於今馬尼拉灣，在馬尼拉城的南方，《明史·呂宋傳》稱 Cavite 為「機易」。

⁵⁰ 相關訊息來自以下兩份手稿：(1) 「a 20 del mismo mes resolvió la junta tomar las armas y no tributar al Cogens, y que la respuesta de su carta y embajada fuesse entre agria y dulce como se executó ordenose también que doce o treçe champanes de los chinos particulares y algunos del Cogens todos de mercadería y que estauan en la voca y río de Manila se retirasen y metiessen en el puerto de Cabite. La raçon de este orden fue para que no se anticipase algún chino y en vno de aquelllos champanes fuesse a dar quenta al Cogens de las pocas fuerças de Manila, y que era buena ocasión para apresurar su venida y con facilidad haçerse señor de la tierra.」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62v.；(2) 「Dize que también se resolvió en la mesma junta no se tributase al Cogens y que se le respondiese aquí tocamente, y se mandó que doce o treçe champanes suyos y de particulares que estauan a la voca del río, se retirassen y metiesen en el puerto de Cavite, porque no se anticipase algún chino a dar noticia al enemigo de las cortas fuerzas con que se hallauan en Manila. Y

國姓爺的威脅所召開的相關會議中，其討論的主要對策有二：一是調回各地駐軍，另一是驅逐菲島華人。此外，從其他手稿我們可知馬尼拉當局還有兩項因應措施，即招募新的騎兵職缺，和派軍前往臺灣。以下將討論這四項因應的對策：

1. 調回各地駐軍

1662年5月17日的議會決議撤出伊利甘（Yligan）⁵¹ 和卡拉棉（Calamianes）⁵² 的要塞，以及特納提（Terrenate／Therrenate）⁵³ 和三寶顏（Zamboanga）⁵⁴ 等堡壘的兵力。⁵⁵（見圖1）同月23日，Don Phelipe 派出皇家物資，命令撤出特納提的士兵、多達五百門大砲、彈藥和補給品（這些都是馬尼拉所必需的），並廢除堡壘。⁵⁶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於同年7月12日寫的一封信提及：「因海盜國姓爺試圖改變及入侵菲島，此乃迫使特納提、三寶顏、伊利甘和卡拉棉要塞駐軍撤除的原因」。⁵⁷

撤出在呂宋南部各地要塞的兵力，並集中到馬尼拉以抵抗國姓爺的威脅，在同年7月13日和12月9日的信件就有這方面的記載。按7月13日的信函：「為了集中軍力，調回特納提、三寶顏、伊利甘和其他地方要塞的兵力到馬尼拉」。⁵⁸

porque en el mercado de su trato (que es junto a las murallas de aquella ciudad) y en otros lugares hauía más de 170 chinos que podían dar ayuda al Cogsen, se resolvió que todos se embarcasen en Cavite, y se fuesen a sus tierras dandoseles sus haciendas.」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69r-69v.

⁵¹ Yligan 即 Iligan，位於菲律賓西南民答那峨島（Mindanao）的北部。

⁵² Calamianes 位於菲律賓明多洛（Mindoro）島與巴拉望（Paragua）島之間的一小群島。西班牙在十七世紀初派軍駐紮當地，並有奧古斯丁會修士進入當地傳教。

⁵³ 西班牙文 Terrenate 或 Therrenate 即英文 Ternate，屬於摩鹿加群島，位於帝汶島北方的一小島。

⁵⁴ Zamboanga 位於菲律賓西南民答那峨島的西部。

⁵⁵ AGI, Filipinas, 201, N.1, 20r.

⁵⁶ 原文如下：「... se despacharon a 23 de maio provisiones reales por Don Phelipe, en que se mandó retirar los soldados de Terrenate que serían hasta quinientos la artillería, municiones y pertrechos (todo muy necesario en Manila) y que se desmantelase la fuerza.」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63r.

⁵⁷ 原文如下：「Con la flota del cargo de Don Nicolás Fernández de Cordoua que llegó a estos reynos por octubre de 663, se recuieron algunas cartas de Don Sauniano Manrique, gouernador de Filipinas, y después fueron llegando otras, entre las quales escribió vna su fecha de 12 de julio de 662, dando quenta de los motivos que hauían obligado a resolver se retirasen las guarniciones de Terrenate y las de Zamboanga, y las de los presidios de Yligan y Calamianes por las alteraciones y imbasiones que intentaua haçer en aquellas islas el pirata Cogsenya ...」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77r.

⁵⁸ 原文如下：「... se a acordado y resuelttó en junttas particulares retirar los pressidios de Therrenatte, Zamboanga, Yligan y otras partes a esta çiudad para tener las fuerzas vnidas ...」參見 AGI, Filipinas, 9, R.2, N.34b, fol. 3.



圖 1 西屬菲律賓地圖

資料來源：筆者與助理魏薪原共同繪製。

12月9日，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寫信給駐守在特納提堡壘的行政長官，信中提及經由會議的決議，已指示將領 Don Agustín de Sepada 撤出特納提的兵力，此乃為了集中軍力，抵抗國姓爺的威脅。⁵⁹ 此外，在 1666-1672 年間的馬尼拉官方公文皆提及：「前任 Sabiniano Manrique 統治最後一年，為了加強馬尼拉防禦，被迫撤除伊利甘、特納提和卡拉棉的要塞，因當時國姓爺在臺灣備有一支軍隊準備入侵，帶給馬尼拉很大的壓力」。⁶⁰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前期，西班牙人逐步派軍遠征菲律賓南部伊斯蘭地區。面對西班牙的軍事行動擴張，這些穆斯林掌握的地區與西班牙的衝突不斷，西班牙須投入人力和物資來鞏固當地要塞。然因國姓爺的威脅而將這麼多年來駐守當地的軍力撤回、要塞廢除，我們或許會問馬尼拉當局的決議是否經過深思熟慮？從下述史料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馬尼拉當局是經過評估，並非貿然決定。

按 1662 年 7 月 10 日馬尼拉大主教 Miguel Poblete 的信函，信中提到撤回特納提、三寶顏、伊利甘和卡拉棉要塞的駐軍，而且說明這些要塞只有開銷、沒有作用，調回馬尼拉可讓大部分的步兵有事可做。⁶¹ 不過，我們從事後 Sabianiano Manrique de Lara 返回馬德里，在 1666 年 10 月 8 日針對前述要塞所提供的訊息，可以更理解馬尼拉當局為何想撤回這些地區的駐軍。Sabianiano Manrique de Lara

⁵⁹ 原文如下：「... Don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gouernador y cappitan general que fue de estas Yslas escriuió al gouernador de las fuerzas de Therrenate quando se resolvió retirarlas para vnir las fuerzas, y resistir la amenssa del Cogsensya,... Al gouernador de las fuerzas de Therrenate con esta remitió orden ynclussa en el la provisión Real y el que por delante con ella dirigí al general Don Agustín de Sepada para retirar esas fuerzas de Therrenate mediante lo resuelto y acordado en las juntas generales celebradas para el efe[c]to y poder vnir las armas para resisitir las amenazas del Cogsensya ...」參見 AGI, Filipinas, 9, R.2, N.34d, fols. 1r-4r.

⁶⁰ 原文如下：「... hasta que el vlttimo año del gouierno de Don Sauiniano Manrique vuestro antecessor en essos cargos se vió obligado a retirar esta fuerza y la de Yligan en Mindanao y los demás pressidios de Therrenate en las Malucas y Calamianes, frontera de Burneys para aumentarlos de Manila que estaua amenazada del piratta china Cossen con vna armada que tenía en la Isla Hermossa se hallaua resuelto de yr sobre ella...」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162v, 203r, 207r, 214r.

⁶¹ 原文如下：「Con ocaasión de la venida que trata haçer el chino Couçen a combatir estas yslas, para poder deffender la tierra se determinó el retirar todas las fuerças que están divertidas en diversos pressidios como Terrenate, Zamboanga, Yligan, Calamianes y otros de menos importançia y que no sirven más que de gastos al Real hauer de Vuestra Magestad y de tener ocupada la maior parte de la infantería...」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103r.

提供的訊息有：特納提並沒有為西班牙帶來利益，⁶² 不僅沒有讓當地信仰伊斯蘭的住民減少，更因島嶼貧瘠，每年需金錢、士兵、軍需和物資的援助；伊利甘要塞約有 100 人，西班牙人據此 30 年，因無任何用處，前任菲島統治者多次想撤除此要塞；卡拉棉要塞依時間和需求駐有 50 至 100 名西班牙人及一些邦板牙人（pampangos），⁶³ 當地住民繳納賦稅，支付馬尼拉皇家教堂和菲島其他救濟所需，為防禦國姓爺的入侵，日後可重返駐紮。⁶⁴ 從前述訊息可見特納提和伊利甘兩要塞所花費的人力和物資，與駐紮後所獲得的利益不成正比，早已有撤除之意，但卡拉棉為菲島帶來利益，只因國姓爺招諭而撤除。

2. 驅逐菲島華人

前述 1662 年 5 月 17 日的議會除了決定調回各地駐軍到馬尼拉防守之外，也提議驅逐菲島華人。會中原決定讓島上所有華人搭乘舢舨前往中國，但已結婚的教徒除外。⁶⁵ 其次，此會議的參與者對菲島要留下多少華人也有所討論，有認為要留下 6,000 人、4,000 人、3,000 人、2,500 人、2,000 人，或僅留已婚教徒或不留任何華人等不同看法，但也有人沒有特別意見，如可依參與者所裁示、依服役國王陛下及菲島所需、依國王陛下命令。（見表 1）最後決議可留下 2,500 名華人，且不包括教徒。⁶⁶

⁶² 盛產香料的摩鹿加群島原被葡萄牙人所佔領，果阿（Goa）總督為了驅逐荷蘭人在南海的勢力，而請求馬尼拉的協助，於是 1606 年西班牙遠征軍前往摩鹿加群島收復領地，之後西班牙人就佔領了屬於摩鹿加群島的特納提，也引發了葡萄牙人的不滿情緒。參見 Rafael Valladares, *Castilla y Portugal en Asia (1580-1680): Declive Imperial y Adaptación*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5, 20-27. 為了補償葡萄牙人失去摩鹿加群島的影響力，決定將該地的政治軍事權歸屬於菲律賓統治者，但丁香貿易則持續掌握在葡屬印度之手，於是摩鹿加群島丁香的購買就由葡萄牙商人來處理，透過葡萄牙人在亞洲的港口來運送與買賣。參見 Antonio C. Campo López, “Molucas y España en el siglo XVII,” in Javier Serrano Avilés and Jorge Mojarro (eds.), *En el Archipiélago de la Especiería: España y Molucas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Madrid: AECID y Desperta Ferro Ediciones, 2020), pp. 43. 前述也是菲律賓統治者 Sabianiano Manrique de Lara 會說特納提沒有為西班牙帶來利益的原因，正是因為丁香貿易的利益歸於葡萄牙人所有，但該地駐軍等龐大開銷卻由菲島的西班牙人來負責。

⁶³ 指居住在邦板牙（Pampang）的族群，而邦板牙則位於呂宋島，靠近馬尼拉灣北部。

⁶⁴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7v-11v.

⁶⁵ 原文如下：「Proposición sobre que se continuará expulsión de los sangleies- Asimismo su señoría propuso como en junta de dies y siete de mayo del año pasado de seisçientos y sesenta y dos, se resolvió entre otros casos que en ella se trataron, que todos los sangleies que huuiese en las yslas se despachesen a China en los champanes, que entonces abia eçcepto los christianos casados, ...」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50v-51r.

⁶⁶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52v-53r.

表1 1662年5月17日的會議討論菲島留下的華人數目

人數	參與者／留下條件		
6000	Francisco Claudio 艦長	Martín Davila Manrique 將領	Christoval Romero 將領
	Miguel Fernandes Marot 指揮官	Diego Cortes 艦長	Francisco de Figueroa 將領
	Ygnacio Zapata 神父		
4000	Simon de Toro 指揮官	Raphael de Bona Fee 神父	
3000-4000	Rodrigo de la Cueva Xiron 學校老師		
3000	Francisco de Ocampo 大士官長	Manuel Suares de Olivera 發照員	Phelipe de Vgalde 將領
	Domingo de Vgarte 軍營訓練總長	Matheo de Arzeo 會計官	Lucas Ortis 神父
2500	Juan Enriques de Miranda 將領	Juan de la Madre de Dios 神父	Augustín de Santa Monica 神父
2000	Luis Rochezisneros 將領2,000人全是教徒	Francisco de Esteiuan 將領／包含已婚教徒	Joceph de Samora 將領／包含教徒
0	Françisco Solier 神父	馬尼拉大主教 Miguel	
僅已婚教徒	Francisco Alfonso de Viscarra 艦長		
依參與者的看法	Pedro Gomes de Cueuas 指揮官	Nicolas Sarmiento y Paredes 指揮官	
依服務國王陛下和菲島所需	Sevastían Rodrigues 神父	Phelipe Pardo 神父	
依國王陛下命令	經辦員 Francisco de la Rea y Mata	Diego de San Roman 神父	聽訟官 Francisco Pasqual de Panno
	聽訟官 Alvaro García de Ocampo		

資料來源：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51r-52v.

基本上，菲島的經濟生活多仰賴當地華人，華人為西班牙當局帶來豐滿的稅收，然在馬尼拉的華人眾多也讓西班牙當局警覺、害怕，從十六世紀末起便針對華人實施諸多限制及增稅，1603年張嶷事件及1639年Calamba事件，皆曾發生華人動亂被殺慘案。⁶⁷而1662年因國姓爺的威脅，於是有驅逐菲島華人的提議，如1662年7月13日的信函提到：「驅逐居住在菲島的華人，是為了不讓敵人抵達時有機會進入家裡，即便這些人帶來龐大利益，他們每年每人繳稅9比索（pesos）⁶⁸給國王陛下」。⁶⁹

⁶⁷ 華人在菲律賓所面臨的處境參見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刊，1963）；黃滋生、何思兵，《菲律賓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另1603年馬尼拉華人被殺事件在鮑曉鷗、張彬村、鄭佩宜和陳國棟的專文皆有所討論，此處不詳述。

⁶⁸ 單數 peso，複數 pesos，貨幣單位，1比索（peso）換算為8里耳。

⁶⁹ 原文如下：「... se an hechado de estas Islas los sangleyes que abitauan en ellas por no tener quando llegue la ocassion esta naçion enemiga dentro de cassa, y aunque son grandes los ynterezes que con ellos hauia

3. 招募新的騎兵職缺

菲島統治者 Don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在 1662 年 7 月 12 日寫信給國王陛下，請求批准招募新的騎兵職缺，以抵禦國姓爺的入侵，信中提及騎兵在此次時機很重要，因此他要招募很多人數，可以是西班牙人、混血兒（mestiços）、黑白混血兒（mulatos）、原住民、黑人（negros）⁷⁰ 及其他族群，並任命大士官長（sargento mayor）⁷¹ Don Francisco de Figueroa 為將領，他與其副官、指揮官及官員享有服役職位之薪資。⁷² 並訓練這些新招募的士兵。

完成前述騎兵職缺招募之後，不久這批士兵就被派駐防守菲島，這可從西班牙印地安斯檔案館所藏，隸屬於會計室（Contaduría）卷宗內的帳簿得知。按 1663 年 1 月 12 日及 4 月 5 日的付款單，菲島統治者派西班牙騎兵隊的 Don Francisco de Figueroa 將領在國姓爺入侵之際防守菲島，支付其 100 比索，這筆錢是他服役於不同軍中職位所得。⁷³ 招募騎兵和前述這兩份付款單的資訊，在前人的著作中未曾提及。

pues Vuestra Magestad tenía 9 pessos que pagaua de tributto cada vno al año ...」參見 AGI, Filipinas, 9, R.2, N.34b, fols. 3-4.

⁷⁰ 十七世紀西班牙手稿稱非洲黑人或黑奴多使用 cañes，在馬德里美洲博物館藏有一幅早期菲島插圖，圖中出現 “Negros del Monte de Manila”，指的是住在馬尼拉附近山區的黑人。參見方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第一冊）》，頁 70。而此處的 negros 應指此意。

⁷¹ 十六、十七世紀的西班牙軍隊中的「大士官長（sargento mayor）」有行政管理功能，是僅次於「軍營訓練長（maestro de campo）」的軍階。參見 “Historia de los Grados Militares,” 下載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網址：<https://www.yumpu.com/es/document/read/14613667/historia-de-los-grads-militares-soldados-digital>。在菲律賓 maestro de campo 是由菲島統治者來擔任，菲島統治者的命令則由 sargento mayor 來傳達給下級軍官。

⁷² 原文如下：「En carta que el gouernador Don Sauiniano Manrique escriuió a su Magestad en 12 de julio de 1662... que la cauallería le auía de ser de grande ymportancia en esta ocaasión, y así dispuso juntar el mayor número, que pudiesse de españoles, mestiços, mulatos, indios, negros y otras naciones, que nombró por general de ella al sargento mayor Don Francisco de Figueroa con su thenientes, capitanes y ofiziales de que les despachó ordenes, para que sirbiesen sus puestos con el sueldo que goçan los generales, thenientes y cappitanes de España y de las Indias ... Sobre las plaças nuevas que a criado el gouernador de Filipinas para el vso de la cauallería que levantó para defenderse del tirano Cogsenya, las quales supplica se aprueben.」參見 AGI, Filipinas, 9, R.2, N.36. 此信函有另一份抄本，參見 AGI, Filipinas, 9, R.2, N.36a。

⁷³ 按 1663 年 1 月 12 日的付款單：「Al general Don Francisco de Figueroa que lo fue de la caualleria española y de naciones que se condujo para la ocaasión que se esperaua del piratta sangley de China ciem pesos de oro común que por decreto del gouierno se le libraron y pagaron a quenta de lo qual se le deue por lo servido en diferentes plazas de milicia, los quales quedaron cargados fol. 199 de la lista quinta de la compañía del señor gouernador y cappitan general que vn pedimento y dicho decreto, están por rrecaudos de la libranza despachada en doze de henero de mill y seisçientos y sesenta y tres años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36, fol. 403v.；按 1663 年 4 月 5 日的付款單：「Al general Don Francisco de Figueroa que lo fue de la

4. 派軍前往臺灣

除了菲島的防守之外，筆者也從會計室卷宗找到一份 1662 年 10 月 5 日的付款單。從付款單的內容可知菲島統治者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曾派指揮官 Augustín Martínez（他也是陛下舢舨的班長），以及和他一起駐守的西班牙籍和邦板牙籍步兵隊、炮手、領航員及船員赴福爾摩沙島海岸，並支付他 264 比索的預支薪資給這批士兵。⁷⁴ 這也反映出西班牙人對鄭成功的威脅有積極的軍事行動，至於這艘軍船前往臺灣海岸的後續消息則不得而知。

（三）引發的事件

1662 年國姓爺派利勝出使招諭呂宋，馬尼拉當局為此事召開會議，欲驅逐居住菲島華人，消息傳出後，導致馬尼拉華人反抗被殺事件。前述已提及 5 月 17 日會議後，西班牙當局便有一連串防止當地華人跟國姓爺裡應外合的行動出現，加上馬尼拉和菲島各地的軍隊大規模調動，馬尼拉華人區受到監控與騷擾，華人感到戰爭一觸即發，華船攜貨來馬尼拉做生意也突然中斷，大大影響其生計，害怕生命財產隨時消失，恐懼緊張的局勢終於在 5 月 25 日爆發，先由馬尼拉城外華人揭竿而起，而後響應的人逐漸增多，直到 7 月初動亂才停息。

耶穌會教士於 1663 年 7 月所寫的「1662-1663 年間馬尼拉事件」，和利勝神父的手稿對此事件皆有諸多描述，前人的文章也根據前述資料敘述當時的情形，

caualleria que se condujo para la defensiva de estas yslas en la ymbación del tirano China çiem pesos de oro comun que se le libraron y pagaron en virtud de decreto del gouierno a quenta de lo que se le deue por lo servido en diferentes plazas de milicia, los quales quedaron cargados a fol. 129 de la lista quinta de la compañía del señor Don Diego Fajardo gouernador y capitan general que fue de estas dichas yslas que un pedimento y dicho decreto, están por rrecaudos de la libranza despachada en çinco de abril de mill y seisçientos y sesenta y tres años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36, fol. 406v.

⁷⁴ 按 1662 年 10 月 5 日的付款單：「Pasanse en data y descargo a los juezes oficiales reales, doscientos y sesenta y quatro pesos de oro comun que montó vn socorro particular que en virtud de orden de señor gouernador y capitan general se hizo al capitan Augustín Martínez, cauo de vn champan de su magestad que se ymbió a las costas de ysla hermosa, y a la ynfanteria de este terzio española y pampanga, artillero, pilotos y marineros, que fueron de guarnición en él, a quenta de sus sueldos que dicho socorro enforma ante escrivano que da fee de la paga certificación del contador de hacienda de auerse cargado los dichos doscientos y sesenta y quatro pesos a los que los rrecivieron en sus pliegos y assientos a cada vno lo que en su partida se declara tres pedimentos con tres decretos particulares y dicho decreto para hazer el dicho socorro, están por rrecaudos de la librança despachada en çinco de octubre de mill y seysçientos y sesenta y dos años, aasentada en datta en nueve de dicho mes y año.」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36, fol. 134v.

簡述如下：「馬尼拉城外華人在 5 月 25 日發起反抗西班牙人的行動，殺死原住民和兩位當時在澗內（Parián）的西班牙人，雙方衝突持續到 7 月才平息。此期間馬尼拉官方派出軍隊弭平動亂，有的華人被殺，有的逃往深山，有的乘船返回中國，道明會修士 José de Madrid⁷⁵ 神父和利勝神父曾從中調解，前者不幸遭殺害。有船隻逃回臺灣向鄭成功報告馬尼拉華人被殺事件，鄭成功大怒下令派兵征討，因突病歿（6 月 23 日）而未果。7 月馬尼拉事件平息，同月 10 日擬好答覆國姓爺的回函，由利勝神父攜回，乘船返回臺灣，途中遇難，於 8 月 31 日抵達廈門港」。⁷⁶ 關於前述 5 月 25 日馬尼拉華人發起騷亂時在澗內被殺的兩位西班牙人之身分，我們可以在 1663 年 4 月 12 日馬尼拉城聖佳蘭（Santa Clara）隱修院答覆有利於驅逐華人的提議中得知其姓名。當時馬尼拉官方從一位華人處得知，澗內華人決定在 1662 年 5 月 25 日早上 8 點拿武器起來反抗，當時在澗內被殺的西班牙人有一位是外科醫生 Francisco de Espinosa，另一位是澗內警長 Francisco de Frias 指揮官，後者屍體沒被發現。⁷⁷

在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答覆國姓爺的回函中談到：馬尼拉官方對國姓爺一直保持友善態度，所屬船隻來馬尼拉貿易受到保護、獲利大，菲島提供其糧食和軍需，而今國姓爺背信忘義，逼迫菲島稱臣納貢，使得菲島華人被驅逐、令其恐慌而起暴亂，而菲島會防禦國姓爺的征討。⁷⁸ 印地安斯檔案館所藏檔案編號 AGI, Filipinas, 201, N.1 卷宗中可見此信函之最早手稿，信函的最後提到此信的官

⁷⁵ José de Madrid 是菲律賓宿霧島人，曾是馬尼拉聖多瑪斯學院學生及老師，1646 年加入聖道明會，之後曾赴中國傳教，但怕喪命而返回馬尼拉，於 1662 年 5 月 25 日被馬尼拉華人所殺。參見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36, p. 229. 在西班牙文獻中 José de Madrid 有時也寫成 José Madrid 或 Joseph de la Madrid。

⁷⁶ 幣原坦，〈國姓爺の呂宋招諭〉，頁 234-248；賴永祥，〈明鄭征菲企圖〉，頁 18-19；張先清，〈17 世紀歐洲天主教文獻中的鄭成功家族故事〉，頁 134-135；李毓中，〈國姓爺與菲律賓總督的「戰爭」：1662 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頁 23-24。

⁷⁷ 原文如下：「... aviso del puerto de Cavite el governador por carta de el castellano el capitan Geronimo de Fuentes en que le daua aviso como de un sangley auía sabido que los del parían de esta çiudad avían determinado levantarse a las ocho de la mañana veinte y cinco de mayo de seisçientos y sesenta y dos a esta ora pues tomaron armas, y se levantaron sacando banderas a su vsansa, mataron algunos españoles, que a la sason se hallaban en el parían al sirujano Francisco de Espinosa y al alguacil mayor del parían el capitan Francisco de Frias, cuyo cuerpo no parecia, ...」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112r-112v.

⁷⁸ 中譯參見賴永祥，〈明鄭征菲企圖〉，頁 20-21；李毓中，〈國姓爺與菲律賓總督的「戰爭」：1662 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頁 24-26。

方公證人是 Joan López Perea，證人有發照員 Manuel Suares de Olivera、會計官 Matheo de Arzeo、Christoval Romero 將領、Joseph de Zamora 將領及其他更多人，在這些人臨場見證下，由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簽署，而且在 1662 年 7 月 12 日按此信另傳抄了一封回函。⁷⁹ 也就是說，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答覆國姓爺的回函是由官方公證人 Joan López Perea 所擬寫，此信的原件由利勝神父攜回給國姓爺，抄本則放在馬尼拉。

此外，筆者也找到其他描述 1662 年華人被殺事件的紀錄，記錄者是事件爆發之初剛從中國返回馬尼拉的道明會神父 Juan de Polanco，他親眼見證了這一場暴動，之後返回馬德里，在 1664 年 3 月 21 日和 6 月 19 日提供當時華人群起反抗的情形，其中又以 3 月 21 日的描述最為詳細，這兩份資料的敘述整理如下：1662 年 5 月 25 日，住在馬尼拉城外市場（指澗內）的中國人群情激憤反抗，他們猛攻大門的吊閘，沒受到任何抵抗穿過閘門，抵達城門，儘管守城的人急忙防守，但還是被突發的攻擊壓垮，馬尼拉城民難以關門，以火繩槍射擊，盡可能地讓其受傷。一位邦板牙人用鳥銃射殺一名中國人，讓其他人感到恐懼，後退城門一段距離。大士官長 Martín Sánchez 走到門上方的堡壘向澗內市場開槍，打死 3 個中國人，試圖進入城門的人看到開槍也撤退，與市場的人會合，拿起不同的武器、棍棒、標槍、矛及他們能找到的物件。之後雙方衝突，發生巨響（estruendo，應指西班牙人用炮擊轟造成的巨響）、喊叫聲，無論是誰聽到、看到、經過他們中間都因這吵雜聲而讓此城焦慮不安，有的在街上喊叫、有的不明原因地逃跑、有的呼喊迷惘，於是總督、軍人和神職人員前來保衛城市。總督派了兩位通曉其語言的道明會神父到澗內安撫這群人，有一位（國姓爺的使節利勝神父）返回帶答覆給總督，另一位留下當人質，之後被他們以棍棒和刀殺害（指 José de Madrid 神父）。中國船長被安置在聖道明修院，我（指 Juan de Polanco 神父）當時剛從中國返回，以真情慈愛對待他們，讓中國船長規勸[馬尼拉]中國人，情勢趨緩半天。但晚上又變得騷動，因殺害 José de Madrid 神父和兩名西班牙指揮官讓中國人害怕受死刑，有的逃往山上，有的充滿恐懼衝過馬尼拉河，這麼多人搭載上船，不少人沉沒，高達 400 人淹死，其他人迷失方向，在沒有指引下沿著不同小

⁷⁹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85r-87v.

路被我們的士兵殺死，剩下的人組成一支軍隊，駐紮在靠近馬尼拉附近的一座山腳下的戰壕和補充裝備，並殺死一些原住民，造成很大的危害。總督透過不同對話者呼籲和平，中國人懷疑總督的承諾，要求要有保證人，派對待中國人良善的澗內區長 Domingo Duarte 與其對話，即便這麼做仍無法結束動亂，也無法趨於和平。600 人強力抵抗，較平靜者受規勸不想戰爭，和平地返回澗內，沒返回者由 2,000 名邦板牙人沒收其店面，總督將此任務委託給這些人，讓他們與中國人相對抗，不由西班牙人出面，我們判斷僅靠邦板牙人就足以對付。據說除了下令在各省被斬首的人之外，有 4 或 5 千人被殺，逃回澗內的人移交其財產和船隻，並令其返回中國。至此，一切很平靜，西班牙人始終擔憂國姓爺的威脅。⁸⁰

相較於耶穌會教士和利勝的敘述，Juan de Polanco 神父對此事件的描繪更為鉅細靡遺，文中可見馬尼拉官方處理此事的手段高明，藉由菲島原住民之手來打擊在地華人，尤其是呂宋原住民邦板牙人所組成的軍隊，在此場華人動亂中扮演重要角色。因邦板牙人居住地鄰近馬尼拉，接受西班牙式的生活與語言，有自己的部隊，幫西班牙人防禦群島。⁸¹ 此外，就華人被殺人數比以往我們所認知的數據還多一些。⁸² 1662 年 7 月初馬尼拉華人反抗事件平息後，菲島華人陸續被驅逐，按馬尼拉大主教 Miguel Poblete 於同年 7 月 20 日和 30 日的信函：命令住在菲島達到 14,000 人的華人得離開，前往中國，就像那年有一半以上的人離開所做的那樣，由於缺乏船隻，仍有 6,000 人留下來，正等待時機前往中國。⁸³

⁸⁰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65r-66v, 70v-71v.

⁸¹ Inmaculada Alva Rodríguez, "La Centuria Desconocida: el Siglo XVII," in Leoncio Cabrero, ed., *Historia General de Filipinas* (Madrid: Ediciones de Cultura Hispánica, 2000), p. 218.

⁸² 黃滋生和何思兵認為此次大屠殺遇害的華僑人數，由近人從當時文獻敘述中推斷的數字，出入比較大，有說 2,000 人，也有說 4,000 人，而 4,000 人比較可信。參見黃滋生、何思兵，《菲律賓華僑史》，頁 170。

⁸³ 原文如下：(1) 「... mandando que todos los sangleyes que habitaban estas islas y llegarían a 14000 saliessen de ella para el reino de China ... Manila 20 de julio de 1662 años. Miguel, Arçobispo de Manila.」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107r-107v. ; (2) 「... se mandó que los sangleyes que habitaban en estas islas que serían hasta 14000 saliessen de ellas para el reino de China como se executó en más de la mitad que se fueron aquel año y quedaron hasta 6000 por falta de embarcassiones que estauan esperando para en la primera ocasión haçer viaje al dicho reino ... Manila, 30 de julio de 1663 años. Miguel, Arçobispo de Manila.」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109r-110v.

三、鄭經的企圖征菲

(一) 派利勝 (Victorio Riccio) 赴馬尼拉

馬尼拉華人動亂事件平息後，同年 7 月利勝神父攜帶菲島統治者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答覆國姓爺的回函搭船返回[安平]，途中因風力的影響被迫停泊雞籠 10 天；⁸⁴ 按利勝的手稿，8 月底該船進入廈門港，因氣候惡劣直到 9 月 2 日才能靠岸。⁸⁵ 此時鄭成功已逝世，面臨與馬尼拉的衝突，鄭經與大臣商討了與馬尼拉之間的問題，決定再派遣利勝神父出使馬尼拉，於是神父於 1663 年 4 月 4 日從廈門出發，同月 19 日抵達馬尼拉。⁸⁶ 抵達馬尼拉的日期是利勝書中所載，與下面一些資料所寫有所不同：

(1) Ventura del Arco 所編史料寫抵達馬尼拉是 8 日，Álvarez (白若瑟神父) 則寫 13 日。⁸⁷

(2) 菲島統治者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於 1663 年 8 月 4 日在甲米地所寫信函，提到利勝神父於 4 月 18 日抵達：「在等待暴君（指國姓爺）入侵和短暫防備的同時，兩位待在思明州 (Subincheo) 的官吏首長以國姓爺兒子錦舍之名，派利勝神父二度出使，錦舍取代了去年 6 月 23 日因發燒和極度憤怒而去世的父

⁸⁴ José María Á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Barcelona: Librería católica internacional, 1930), pp. 75-76. 前書雖無說明利勝搭船返回何地，但從利勝的書可知他搭最後一艘中國船要直接返回福爾摩沙島，但船隻一出航在馬尼拉灣就遇狂風，一路伴隨著暴風雨，到達 Bojeador 岬角時大海浪捲起，船隻在 Bangui 村（位於呂宋北部 Cagayán 省之北端靠海村落）短暫停靠，之後船員遭當地原住民射箭，只好起錨往海上航行，船隻被漂往很遠的北方，處於大員的反方向，大風浪令其無法往福爾摩沙島南部，之後到達雞籠，停留到 8 月 20 日才揚帆，船隻經過淡水，尋找往大員港的方向，快靠近的一個晚上狂風大作，8 月最後一天的半夜船隻進入廈門港，因氣候惡劣直到 9 月 2 日才能靠岸，總共 60 天的危險航行。參見 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libro tercero, capítulo XIX, “Vuelve al reino de China el P. Riccio peligros y trabajos notables que padeció”, sin página. 前述利勝神父所計算的 60 天航行與實際的天數約有 5 天左右的誤差。

⁸⁵ 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libro tercero, capítulo XIX, “Vuelve al reino de China el P. Riccio peligros y trabajos notables que padeció”, sin página.

⁸⁶ 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libro tercero, capítulo XXII, “Concluye el padre Riccio las paces entre los chinos y la republica de Manila”, sin página.

⁸⁷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Consideraciones en torno a la imagen de Koxinga vertida por Victorio Ricci en Occidente,” pp. 64.

親，利勝於今年 4 月 18 日抵達，……」。⁸⁸

(3) 當時馬尼拉海關的報關紀錄則寫 21 日：「為了與馬尼拉城簽訂和平條約，利勝神父搭乘 Anya (洪爺?)⁸⁹ 船主的商船，於 1663 年 4 月 21 日停靠在馬尼拉城的港灣」。⁹⁰

綜合上述，光是利勝神父抵達馬尼拉就有五種不同日期的說法。馬尼拉海關紀錄清楚說明該船於 21 日停泊馬尼拉城的港灣，亦即近 Pasig 河口之處；而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所寫的 18 日，可能是船隻剛轉入馬尼拉灣南端，靠近甲米地之處；利勝所寫的 19 日，乃是船隻靠馬尼拉城之處，尚未停靠港口。故各方所載有日期之差距，至於 8 日和 13 日明顯有誤。馬尼拉海關紀錄列出利勝神父所搭商船貨品之細目，但無貨品之價值，貨品價值可見於馬尼拉的會計室帳簿，按帳簿：利勝神父所搭乘的商船載有價值 1,462 比索 3 多幣 (tomines)⁹¹ 6 格拉諾 (granos)⁹² 的壺、鐵、麥等不同貨品，已於 1663 年 4 月 23 日交到皇家倉庫。⁹³

此外，前述兩位鄭經的官吏首長，一位是兵官 (el capitan general)，另一位是出納總長 (el thesorero general)，⁹⁴ 他們在永曆 17 年陰曆 2 月 24 日 (即 1663 年 4 月 2 日) 以鄭經名義寫了一封要求和平與繼續維持貿易的信函，讓利勝神父攜帶到馬尼拉給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利勝神父在同年 4 月 27 日的馬尼拉，將此信按原件譯成西班牙文。⁹⁵ 利勝神父抵達馬尼拉後，Sabiniano Manrique

⁸⁸ 原文如下：「Estando aguardando la inbaición del tirano y en la fuga de las prevenciones, a los 18 de abril passado de este año vino el padre frai Victorio Riccio con segunda embajada de dos mandarines gouernadores que quedaron en Subincheo en nombre de Sichu, hijo del Cogsenya, que substituió a su padre por auer muerto a los 23 de junio del passado rabiando de vna fiebre y berrinche que le sobrevino por no auer conseguido con sus mandarines, ...」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30r.

⁸⁹ 馬尼拉海關手稿 Anya 也寫成 Ania，會計室帳簿手稿則寫成 Anguia，此應是 Ania 的訛寫。

⁹⁰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147r-149r. 原稿中譯參見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 (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 (第一冊)》，頁 268-270。

⁹¹ 單數 tomín，複數 tomines。依金幣的價值，tomín 相當於 $\frac{1}{8}$ Castilla 比索。1 多幣 (tomín) 等於 12 格拉諾 (granos)。其幣值的換算與里耳一樣，1 比索 (peso) 等於 8 里耳 (reales)，也等於 8 tomines。本文以西班牙語拼音譯為「多幣」。

⁹² 單數 grano，複數 granos，錢幣單位。1 grano 約等於 48 毫克重，12 granos 等於 1 多幣 (tomín)。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Madrid: Espasa-Calpe, 1992), pp. 1055. 本文以西班牙語拼音譯為「格拉諾」。

⁹³ AGI, Contaduría, 1236, fols. 406r-406v.

⁹⁴ 兵官應指武將洪旭，出納總長應指戶官鄭泰。

⁹⁵ 原文如下：「Carta que trujo el padre embajador fray Victorio Riccio- Al señor gouernador y capitan general

de Lara 於同年 5 月 7 日在皇家法庭大廳召開會議，參與的神職人員和官員約 35 人，會中看了利勝神父所帶來的信函，討論鄭經方面所提出的 17 項要求，內含歸還菲島中國人的財產、⁹⁶ 歸還去年放在馬尼拉城聖地亞哥（Santiago）城堡內華人舢舨的大炮、殺害馬尼拉城外無辜的人應給予處罰、公告原住民和黑人士兵不得侵擾中國人、華人居留證的繳納等等事項。⁹⁷ 一些參與會議者也針對這些要求提供意見，其中聽訟官 Don Alvaro García de Ocampo 說道：「今日掌管屬於華人國姓爺叔父（tío del Cogens）的財產之人，總被證實是本島西班牙人的捍衛者，抵抗已故國姓爺及他死後他的兒子（指鄭經）的舉動，若派出船艦，應將所有屬於他的船隻和武器歸還。所有涉及的事情皆須獎勵和回應，同樣地，他所統治的其他官員的財產應歸還，而且他們干預並影響了神父大使（指利勝）前來提出的和平。」⁹⁸ 但利勝的書可能對日期有所誤記，書中寫道：「與和平條約有關的會議於 5 月 6 日召開，會中決定歸還中國人所有的武器和財產、調整中國人船隻登記數、驅逐濶內不安分的中國人及其他類似的事，由此雙方毫無困難地簽署了和平條約。7 月初利勝神父搭船返回中國」。⁹⁹

del Reyno de Luzón en nombre y por orden del Rey de Isla hermosa, príncipe de Subengchui, los mandarines gouernadores de dicho estado que son el capitan general Fiongchin Angpee y el thesorero general del reino Oionhute, juntamente escriven esta cartta nuestro vil y vajo Reyno largos tiempos a que con el noble Reyno de Vuestra sseñoría a tenido singular correspondencia afecto y afinidad, con reçiproco comercio y contrato ... fecha el año dies y siete del Rey englec en veinte y quatro de la segunda luna. Concuenda esta traducción con su original de que doy fee en Manila en veinte y siete de abril de mill seiscientos y sesenta y tres años, fray Victorio Riccio orden Predicadores.」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40r-41r.

⁹⁶ 石原道博認為鄭經之所以要求能恢復中國人的財產，和他稍後遣使交涉日本存銀事件具有同樣的意義。所謂日本存銀事件：原擔任國姓爺戶官的族人（鄭泰）存銀於日本長崎，當國姓爺死後，亦即離鄭經遣使赴菲後四個月七月，鄭經及鄭鳴駿分別致書日本，要求歸還該批存銀。參見石原道博著、鄭瑞明譯，〈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始末〉，頁 223。

⁹⁷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39r-50v.

⁹⁸ 原文如下：「El señor oydor licenciado Don Alvaro García de Ocampo dixo que la hacienda que perteneçiere al sangley, tío del Cogens, que oy gouierna que se a mostrado siempre defensor de los españoles de estas yslas, resistiendo, los ympulsos y movimientos del Cogens, difunto, y los de su hijo después de su muerte y el que imbiase armada se le buelva toda quanta fuere suia, vaxeles y armas. Y en todo lo que al tocarse se tenga toda la deuida gratificación y correspondencia y de la misma manera se buelva la hacienda que fuere de los demás mandarines que gouiernan y an ynterbenido e influido en las pazes que a venido a ofrezcer el padre embaxador.」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46v. 前述手稿寫的 Cogens 是閩南語「國姓」的拼音，指鄭成功，但按手稿所談的年代，此時鄭成功的叔父多已亡歿，而此處國姓爺叔父不知指誰？應是誤寫，可能指鄭經的叔父鄭泰，應與石原道博所提「與日本存銀事件」類似。

⁹⁹ 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libro tercero, capítulo XXII,

不過，在利勝神父返回中國前，馬尼拉政府交給他兩份公文，此紀錄可見於 1663 年 6 月 30 日的付款單：按政府之令交給大使利勝神父兩份公文。¹⁰⁰ 這兩份公文應該是：（1）5 月 7 日會議提到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給鄭經的兩位官吏首長的答覆函；¹⁰¹（2）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致國姓爺兒子錦舍的信函。¹⁰² 此兩份回函由利勝帶回廈門。其次，1663 年 6 月 30 日的付款單除了提到一艘來自中國的 Guanqua 華人船長的繳稅資料之外，內容也談到一份關於大使利勝神父的公文轉移。¹⁰³ 我們未知這份公文轉移內容，可能與前述兩份公文有關。而利勝神父在同年 7 月 27 日抵達廈門，當地正處於鄭氏內訌混亂之中，以及他親眼目睹清荷聯軍進佔廈門之悲慘狀況，¹⁰⁴ 雖然利勝的書沒有交代和平條約和回函的下文，但從他在廈門停留期間對鄭氏內部的觀察，可以知道和平條約和回函應有上呈到鄭經手中。之後他在廈門被滿清俘虜，後獲自由搭乘荷蘭人的船再度到臺灣，在雞籠住了近一年的時間並在那裡傳道，直到 1666 年才因事搭船前往菲律賓。¹⁰⁵

於是國姓爺威脅馬尼拉的事件終於告一段落，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在 1663 年 9 月 8 日卸下總督職位返回西班牙，他在 1666 年 10 月 8 日的馬德里寫了一篇關於前述事件的長篇大論，文中也寫到國姓爺的兒子向他尋求友誼和貿易，他保證當他移交政權離開菲律賓時，菲島處於平和、無戰事狀態中，從臺灣

“Concluye el padre Riccio las paces entre los chinos y la republica de Manila”, sin página.

¹⁰⁰ 原文如下：「Al Padre fray Victorio Ris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y embajador de China, ... entregaron al dicho Padre embajador por decreto del gouierno que dos memoriales, dos ynformes de los ofiçiales Reales y quatro decretos de su señoría, están por Recaudos de la libranza, despachada en diez y nueve de junio de mill y seisçientos y sesenta y tres años,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36, fols. 524r-525r.

¹⁰¹ 答覆函的原件已遺失，但當時馬尼拉在 1663 年 7 月 30 日寫有一份抄本，抄本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54r-56r.

¹⁰² 致鄭經信函的原件已遺失，但當時馬尼拉在 1663 年 7 月 31 日寫有一份抄本，抄本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57r-59v.

¹⁰³ 原文如下：「A Guanqua, sangley capitan de vn navío que vino del Reyno de China, ... vn pedimento del dicho sangley y traslado de otro del recaudo Padre embajador fray Victorio Riçio, dos ynformes de dichos offiçiales Reales fechos al señor gouernador y capitan general, y tres decretos, están por recaudos de la libranza, despachada en veinte de junio de dicho año de mill y seisçientos y sesenta y tres años,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36, fol. 460v.

¹⁰⁴ 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libro tercero, capítulo XXIII, “Trabajos grandes que padecen el P. Riccio y su compañero Fr. Jaime en la desolación de Hiamuen”, sin página.

¹⁰⁵ José María Á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pp. 76-77.

和被滿洲征服之地的船隻都前來貿易。¹⁰⁶

(二) 多次企圖征菲

從前人的研究已知鄭經在臺期間至少有 5 次意圖攻打菲律賓：

(1) 1666 年 9 月：石原道博和賴永祥皆引《臺灣外記》¹⁰⁷ 提到康熙 5 年 8 月 (1666 年 9 月) 菲律賓總督派傳教士前來臺灣設教，鄭經令依臣禮晉見，要神父轉告總督，呂宋須每年進貢，若毀約則立即遣師問罪。¹⁰⁸ 鮑曉鷗推測此人為利勝神父，但李毓中認為此假設僅具參考性質。¹⁰⁹

(2) 1670 年 10 月：李毓中認為最早記載鄭經意圖攻打菲律賓的史料來自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資料，亦即 Ellis Crispe 在 1670 年 10 月 22 日所寫「謠傳鄭經將派艦隊征服菲律賓」。¹¹⁰

(3) 1671 年：李毓中引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資料，提到 1671 年英國 Crown 號船長 Hyat 帶回鄭經揚言在本年內要進攻馬尼拉的情報。¹¹¹ Crown 號於 1671 年 7 月 1 日被派往臺灣，再由臺灣轉赴日本，故鄭經要攻打馬尼拉大概是 1671 年 7 月以後的事。

(4) 1672 年 2 月：石原道博和賴永祥皆引《臺灣外記》¹¹² 說明康熙 11 年

¹⁰⁶ 原文如下：「... Lo que puedo asegurar es que quando entregue el gouierno ni al tiempo que sali de Filipinas (con la embajada del hijo de Cogsen que se intitula Rei de isla hermosa en que me pidió amistad y trato) estauan en serenidad todas aquellas islas sin guerra ninguna viniendo champanes al trato así de isla hermosa como de algunos mandarines tartaros de la parte que tiene conquistado de la China, ...」參見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 11v.

¹⁰⁷ 按《臺灣外記》：「康熙五年丙午（附永曆二十年）……八月，呂宋國王遣巴禮僧至臺貢問。經令賓客司禮待之，以柔遠人。巴禮僧求就臺起院設教（即天主教）。陳永華曰：『巴禮原名化人，全用詐術陰謀人國，決不可許之設教』。經笑曰：『彼能化人，本藩獨能化彼』。賜以衣冠，令巴禮僧去本俗服飾，穿戴進見；如違，梟首。巴禮僧更衣入，行臣禮。經諭：『凡洋船到爾地交易，不許生端勒索。年當納船進貢，或舵或桅一。苟背約，立遣師問罪』。巴禮僧叩首唯唯，不敢提設教事。遣之歸。」參見江日昇，《臺灣外記》，頁 236-238。

¹⁰⁸ 石原道博著、鄭瑞明譯，〈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始末〉，頁 224；賴永祥，〈明鄭征菲企圖〉，頁 28-29。

¹⁰⁹ 李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菲律賓關係初探〉，頁 45-46。

¹¹⁰ 李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菲律賓關係初探〉，頁 51。

¹¹¹ 李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菲律賓關係初探〉，頁 51-52。

¹¹² 按《臺灣外記》：「康熙十一年壬子（附稱永曆二十六年）正月，統領顏望忠、楊祥會啟：『願領兵船征呂宋，以廣地方。』馮錫范曰：『呂宋乃黎國埠頭，其地並無所產；況年已納貢桅舵。今若征之，有三失焉：一、師出無名，有失遠人之心。二、殘擾地方，得之不足為吾臂指。三、欲守之，有鞭長不及之勢。況年來安守，幸爾豐熟，豈可妄興無益之兵？』遂止其議。」參見江日昇，《臺灣外記》，頁 259。

正月（1672年2月）統領顏望忠、楊祥上言鄭經，願領兵征討呂宋，但馮錫范反對，此征伐之議因此中止。¹¹³

（5）1673年4月以前：李毓中引《臺灣外記》認為鄭經征菲企圖至少有兩次，第一次即前述1672年2月間，但僅是提議，第二次在1673年至1674年間，並有實際準備行動，即《臺灣外記》所載：「至世藩，業已興師，因接耿藩之變，遂移兵過廈。」¹¹⁴ 1673年4月耿精忠在福建響應吳三桂舉兵，向鄭經請兵聲援，5月鄭經從臺灣出兵抵達廈門，故鄭經應在1673年4月以前整軍準備征菲，而且那時他已細查呂宋軍力單薄，所謂「細查呂宋，其兵眾不過千有餘人；所恃者，城上數門大煩而已」。¹¹⁵

關於前面第1次和第2次的鄭經征菲意圖，馬尼拉官方並不在意，目前不見西班牙史料之記載，惟按1672年1月15日馬尼拉聖地亞哥城堡堡主（castellano del castillo Santiago）Lorenzo de Orella y Ugalde將領的信，信中提到要注意鄭經的入侵。¹¹⁶ 可見馬尼拉方面已知1671年鄭經揚言攻打的事情。此外，馬尼拉方面曾在1672年6月10日、1673年5月19日及6月11日寫給西班牙女王王信函，信中報告鄭經準備以一強大艦隊入侵菲島，最後該軍事行動已中止。¹¹⁷ 另在1673年5月8日馬尼拉方面也曾提到鄭經想征服菲島。¹¹⁸ 前述1672年6月10日的信應是馬尼拉官方對1672年2月鄭經方面征菲提議的報告，而1673年5月8日、19日及6月11日的信件，則是對鄭經曾在1673年4月以前整軍準備征菲的報告。除了前述5次鄭經征菲意圖之外，在西班牙文史料還記載下面第6次鄭經

¹¹³ 石原道博著、鄭瑞明譯，〈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始末〉，頁224-225；賴永祥，〈明鄭征菲企圖〉，頁29。

¹¹⁴ 李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菲律賓關係初探〉，頁52。

¹¹⁵ 江日昇，〈臺灣外記〉，頁425。

¹¹⁶ 文中所謂聖地亞哥城堡堡主指的是該城堡的行政長官，而非西班牙中世紀有爵位的城堡堡主。該手稿原文如下：「...y extensión de estas sus Islas y señor sobre las aflixiões pasadas se añade el cuidado en que nos tiene Sipuan chino cosario que soueruo como podereio y fato de fee intenta poner en execución los disinios de su padre Ycoan, viniendo con poder a señorearse de estas yslas y aunque esperamos que la poderosa mano de Dios frustrará sus deseos como lo hiso con su padre ... Manila y henero 15 de 1672 años. Lorenzo de Orella y Ugalde.」參見AGI, Filipinas, 43, N.39。

¹¹⁷ 原檔案編號AGI, Filipinas, 331, L.7, fols. 141v-142r，參見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p. 658。中譯參見李毓中，〈塞維亞印度總檔案館中有關鄭經的西班牙文史料譯述〉，頁139-140。

¹¹⁸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p. 659。中譯參見李毓中，〈塞維亞印度總檔案館中有關鄭經的西班牙文史料譯述〉，頁140。

的征菲企圖。

(6) 1680年3月以後：在1681年6月11日菲島統治者 Juan de Vargas Hurtado (任期 1678-1684 年) 寫給西班牙國王的信中提到：「福爾摩沙島世藩 (Çipuan de Isla Hermosa, 指鄭經) 被清軍所擊敗而放棄廈門，退到福爾摩沙島大員港。為阻止鄭經征服菲島，我 (指 Juan de Vargas Hurtado) 部署防禦及軍事監控，將海岸艦隊聚集，在甲米地港準備一艘大帆船和一些船隻，下令讓菲島及其省分的武裝人員做好戰爭準備。即便有 4 艘舢舨從福爾摩沙島來到此地貿易，消除了這些疑慮，我還是同樣謹慎防備其入侵。」¹¹⁹ 到了隔年 10 月 21 日西班牙國王才回覆前述 Juan de Vargas Hurtado 的信函，信中也提及 1681 年 6 月 11 日信中所提到對鄭經打算佔領菲島的疑慮及採取了預防措施。¹²⁰ 此外，1683 年 6 月 10 日菲島統治者 Juan de Vargas Hurtado 的信函提到：「1680 年有消息指稱世藩 (Cipuan) 試圖佔領本群島，以逃離韃靼人 (指滿洲人) 的追捕」。¹²¹ 從上述三封信函可見 1680 年 3 月鄭經兵敗歸臺後曾企圖攻打菲律賓。不過，鄭經被清軍擊敗退守到臺灣的訊息，馬尼拉海關早在 1680 年 5 月 2 日就已經知道，這消息

¹¹⁹ 原文如下：「El gouernador de Philipinas da quenta a Vuestra Magestad de los recelos que a tenido y tiene de que el Çipuan de Isla hermosa yntenta dominar aquellas yslas y prevenciones que hizo para su defenza-Teniendo çiertas noticias de que el tartaro con poderoso exerzito dió vna rrota considerable al Sipuan chino, con que le redujo a desamparar la provincia de Emuy, donde se hallaua con los suyos y retirarse al puerto de Tayguan por otro nombre Ysla hermosa, frontera de estas yslas, y previniendo el que hallandose neçesitado de tierras con mucha gente y inclinación a ellas será muy factible, intente emplearse en su conquista como otras oçaciones lo a hecho, sin embargo detenerlas continuamente en las disposiciones defenzibas y vigilancia militar, que a podido mi aplicación al mayor seruiçio a Vuestra Magestad, hiçe juntar las armadas de estas costas aprestar vn galeón y bageles que se hallauan en el puerto de Cavite, y tener a punto de guerra toda la gente de armas de estas yslas y sus provincias de que mande haçer muestra a los alcaldes mayores de ellas ordenandoles la prevençión y que la tubiesen en disposiçión de salir, luego que yo la combocase con todas las demás de guerra, que me pareçieron combenientes y quedan en este estado, y aunque la llegada a esta barra de quatro champanes de dicha ysla hermosa al trato y comerçio an desbanesido en algo estos recelos, estoy siempre con el mismo cuidado y preveneciones,... Manila y junio 11 de 681 años. Juan de Vargas Hurtado.」參見 AGI, Filipinas, 11, R.1, N.23.

¹²⁰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p. 662. 中譯參見李毓中，〈塞維亞印度總檔案館中有關鄭經的西班牙文史料譯述〉，頁 142。

¹²¹ 原文如下：「... y el que en oçaciones y neçesidad de armas y peltrechos de guerra para proviçión de este campo an embiado mis antecesores por ellas a dicha ciudad de Macan y yo embie a comprarlas el año de ochenta teniendo noticias de que el Cipuan intentaba benir a dominar estas yslas huyendo de la persecuciòn del tartaro ... Manila y junio 10 de 1683. Juan de Vargas Hurtado.」參見 AGI, Filipinas, 24, R.4, N.27.

來自當日一艘從大員停泊馬尼拉的華人舢舨，該舢舨船長 Jayqua 特別前來向馬尼拉官方通知此事，¹²² 只是當時沒有提到鄭經意圖征菲。

（三）菲律賓西班牙政府的回應

針對前兩次（1666 年、1670 年）鄭經征菲意圖，有的是口頭說說或謠傳，西班牙方面並不在意，也無相關回應。其次，關於第 3 次（1671 年）馬尼拉方面僅提要注意，並無實際作為。至於第 4 次（1672 年）和第 5 次（1673 年）征菲企圖，馬尼拉僅關注其動向，也未採取防禦行動。只有第 6 次（1680 年）有具體的軍備行動。

但前述記載 1672 年馬尼拉方面未採取行動之說，與馬尼拉會計室帳簿所記錄有點出入。按 1672 年 9 月 5 日付款單所載：依照 1672 年 8 月 23 日所舉行的財政會議，付給 Don Francisco Henrriquez de Lossada 將軍 1,000 比索，派遣他為使節前往大員交涉。¹²³ Don Francisco Henrriquez de Lossada 大使所搭船隻有支領 200 比索的 Marcos de Andrada 正領航員¹²⁴ 和支領 50 比索的 Bartholomé de Granada 副領航員，¹²⁵ 同行的還有 Phelipe de Mendoça 和 Santiago de Vera 這兩位漢語通譯，¹²⁶ 來協助大使與鄭方溝通。從另一份 1672 年 9 月 14 日的付款單，可見當時 Don Francisco Henrriquez de Lossada 搭乘聖母薩格利歐（Nuestra Señora

¹²² 方真真、方淑如譯註，《臺灣西班牙貿易史料》（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頁 76。

¹²³ 原文如下：「Al general Don Francisco Henrriquez de Lossada que fue por embajador a la Ysla de Tayguan, a negoçios del serviçio de su magestad, vn mill pesos de oro común que se le libraron y entregaron de la Real caja en virtud de decreto del gouierno para los efectos que se resolvieron en la junta de hazienda que se celebró en veynte y tres de agosto de mill y seisçientos y setenta y dos años, ..., está por recaudo de la libranca despachada con carta de pago y assentada en datta en cinco de septiembre de mill y seisçientos y setenta y dos años.」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38, fols. 318v-319r.

¹²⁴ 原文如下：「Al capitan Marcos de Andrada que fue sirviendo la plaza de piloto mayor en el vassel de su magestad que se despachó a la Ysla de Tayguan con la embajada que llevó su cargo el general Don Francisco Enrriquez de Lossada, dosçientos pesos de oro común que se le libraron y pagaron de la Real caja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38, fol. 272r.

¹²⁵ 原文如下：「A Bartholomé de Granada que fue nombrado por ayudante de piloto en el bajel de su magestad que se despachó a la Ysla de Tayguan con la embajada del cargo del general Don Francisco Henrriques de Lossada, çinquenta pessos de oro común que se le libraron y pagaron de la Real caja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38, fol. 272r.

¹²⁶ 原文如下：「A Phelipe de Mendoça y a Santiago de Vera, interpretes de la lengua china, que fueron despachados con la embajada que llevó a su cargo el general Don Francisco Henrriquez de Lossada al Reyno de Taiguan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38, fol. 318v.

del Sagrario) 號貨船前往大員，而且在 1672 年 9 月 8 日官方付給在此船服役的大小官員、西班牙籍和邦板牙籍士兵，以及西班牙籍炮手、水手和見習水手總共 208 比索 5 多幣預支薪資。¹²⁷ 但此船途中因天候不佳而遇難抵達澳門城。¹²⁸

綜上所述，馬尼拉方面對鄭經多次征菲意圖，有具體行動的是 1672 年和 1680 年。1672 年 9 月曾派遣使節前往臺南與鄭經交涉，只是前往臺南的使節船於途中遇難，而無法達成其任務。1680 年則如前述說明，菲島統治者特別部署相關軍備以抗敵入侵。

四、鄭克塽的企圖征菲

鄭經於永曆 35 年正月 28 日（1681 年 3 月 17 日）去世，不久鄭克塽被殺，由鄭克塽繼位。關於鄭經去世及當時臺灣政局，馬尼拉當局是在 1682 年 2 月 18 日接到鄭克塽的信件才得知，此信是鄭克塽委託一位名叫 Jaunio 的華商，從大員（指安平）帶信到馬尼拉給菲島統治者。¹²⁹ 學界眾所皆知，鄭克塽時期的征菲意圖只有一次，即康熙 22 年 6 月 22 日（1683 年 7 月 16 日）施琅在澎湖海戰大勝鄭軍之後，劉國軒逃回臺灣，見鄭克塽等人陳述兵敗事情，鄭克塽召集文武官員商討對策。黃良驥向鄭克塽提議攻取呂宋，以存續鄭氏政權，獲得洪邦柱和鄭得瀟等人的贊同。馮錫范啟奏鄭克塽接納此建議，並與鎮守將領商議攻打呂宋，然此時謠言四起，劉國軒強力阻止，認為澎湖未失守前此建議可行，現大勢已去而主張降清，最後鄭克塽選擇投降，攻取呂宋未能成行。前述敘述可見江日昇《臺灣外

¹²⁷ 原文如下：「... dosçientos y ocho pessos y çinco tomines de oro común que montó el socorro ... le dieron en ocho de septiembre de mill y seisçientos y setenta y dos años a los offiziales mayores y menores, soldados españoles y pampangos, artilleros, marineros y grumetes españoles que fueron sirviendo sus plazas en el patache Nuestra Señora del Sagrario que se despachó a la Ysla de Tayguan a cargo del general Don Françisco Enriques de Lossada ..., están por Recaudos de la librança despachada en catorçe de septiembre de mill y seisçientos y setenta y dos años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38, fols. 272v-273r.

¹²⁸ 原文如下：「... el general Don Françisco Enrríquez de Lozada, vezino de esta ciudad y cauo principal que fue de la gente de guerra y mar del navío nombrado Nuestra Señora del Sagrario que el año passado de mill y seisçientos y setenta y dos yba con embajada a Isla hermosa y con ocaziòn de malos temporales arriuó a la çiudad de Macan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40, fols. 749r-749v.

¹²⁹ 方真真、方淑如譯註，《臺灣西班牙貿易史料》，頁 84-86。

記》、¹³⁰ 夏琳《海紀輯要》及《閩海紀要》，¹³¹ 但夏琳的記載不如《臺灣外記》詳細。

針對前述黃良驥等人提議的征菲意見，目前並不見於西班牙文史料。為何馬尼拉官方對此事沒有回應？從 1683 年 7 月中旬提議攻打呂宋到同年 10 月 3 日施琅入臺，緊接著鄭氏受降，這期間約兩個多月，臺海軍事情況緊張，並無船隻從臺灣和中國東南沿海開往馬尼拉，直到 1684 年 1 月或 2 月起才有船隻從這兩地前往馬尼拉。¹³² 也就是說，這段期間臺灣和中國東南沿海跟馬尼拉之間的訊息傳遞中斷。不過，鄭氏政權瓦解的訊息卻透過唐船赴日的申報傳入日本，例如：1683 年 8 月間從臺灣抵達日本的唐船，述及滿清與鄭軍在澎湖的海戰和劉國軒返回東寧；1684 年 8 月間從廣南（今越南南部）、東京（今越南北部）、廣東和廈門駛入長崎的唐船皆談及鄭克塽的受降。另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684 年 7 月 3 日給日本商館的書信中，命其將清朝占領臺灣的消息傳給長崎奉行，而日本商館也將此訊息轉達，荷蘭人是透過來到巴達維亞的廣東貿易商人得知這訊息。¹³³ 從前述例

¹³⁰ 按江日昇《臺灣外記》：「建威中鎮黃良驥曰：『今日澎湖失守，臺灣勢危，不如將大小戰船暨洋船配載眷口兵士，從此山邊直下，取呂宋為基業』。提督中鎮洪邦柱挺身向前曰：『建威中鎮所言取呂宋者，誠當！柱與良驥願領為先鋒』。塽猶豫未決。錫范曰：『以全師取呂宋亦易事；但不知人民土地如何』？中書舍人鄭德藩曰：『議取呂宋以避鋒銳，此策甚妙！有地圖在此』。並陳可取事宜，略曰：『……愚謂：今日時勢有似於此，故以議取呂宋為上策』。錫范閱其圖及其條陳，大悅曰：『公何留心之細且詳也』！即啟克塽，令鄭明同黃良驥、洪邦柱、姚玉等領前隊為先鋒；其餘船隻分配眷口，陸續待行。……閏六月初四日，馮錫范與諸鎮商議，欲往征呂宋，兵弁遂恃強橫為，訛言四起：『當大搶掠而去』。是以百姓驚惶，晝夜不安。國軒聞知，向范曰：『欲攻呂宋，雖是良策，可行於澎湖未失之前。今澎湖已失，人心懷疑，苟輜重在船，一旦兵弁利其所有而反目，尊公之前車可鑑也』（范父澄世，於甲申年在銅山欲過臺，其僕利其財，遂與諸船眾謀殺澄世，別往投誠）。范曰：『如此奈何？應分兵死守』？軒曰：『眾志瓦解，守亦實難；不如舉全地版圖以降？量清朝恩寬，必允赦宥』。范曰：『公言差矣！我二人受寄託之重，一旦請降，豈不為萬世羞』？軒曰：『公當細思，戰則難料，降則易安』。議論未定，忽琅遣國軒原副將坐營曾蜚前來招撫，許保題軒現任總兵。軒意遂決。啟克塽，命禮官鄭平英等詣澎湖軍前納款。范撓其事者再，軒攘之曰：『昔者張、卡二使至島議撫，則議不稱臣，以致兩島流離！今春黃朝用至臺再撫，則議不削髮，又致澎湖喪師。皆係公之操持不定！當此之際，尚且狐疑；倘一朝變起蕭牆，將奈何？從來識時務者為豪傑；大事已去，當速順天』！錫范無以答。時臺中諸將密納款獻臺者，不止一、二人。」參見江日昇，《臺灣外記》，頁 424-427。

¹³¹ 《海紀輯要》與《閩海紀要》所載內容一樣：「建威鎮黃良驥、水師鎮蕭武、中提督中鎮洪邦桂等謀奉公子鄭明奔呂宋，不果。邦桂等恐世孫投誠有意外之患，議奉公子鄭明等往攻呂宋，再造國家，以存鄭祀。世孫從其請，輜重已移在船；會有傳其欲大掠而去者，劉國軒止之，乃不果行。」參見夏琳，《海紀輯要》，頁 77-78；同文亦可見夏琳，《閩海紀要》，頁 77。

¹³² 方真真、方淑如譯註，《臺灣西班牙貿易史料》，頁 93-94；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第一冊）》，頁 374-375。

¹³³ 松方冬子著、杉本房代譯、劉序楓校修，《唐、蘭風書中有關鄭氏政權瓦解的訊息及其傳日經過》，《臺灣史研究》（臺北）19:1（2012 年 3 月），頁 178-180、182-184。

子來看，或許與鄭克塽有關的消息會透過日本或東南亞進入馬尼拉的商人傳遞給西班牙人，但筆者搜尋馬尼拉海關紀錄，發現 1683 年 7 月中旬到同年 10 月 3 日前並無船隻從日本和東南亞進入馬尼拉；其次，鄭氏受降後從日本和東南亞赴馬尼拉的船舶報關時，並無傳達與鄭克塽有關的訊息給西班牙人。¹³⁴ 總之，目前菲律賓的海關文件、政府或教會人士寫給馬尼拉當局的信函皆無此訊息，故馬尼拉當局對當時鄭克塽內部曾有征菲意圖及鄭克塽受降應是不知情。

五、結論

1662 年 2 月鄭成功打敗臺灣的荷蘭人後，不久派利勝神父攜帶招諭書出使馬尼拉，在航向馬尼拉途中，利勝將招諭書譯成西班牙文，其抵達馬尼拉的日期以 5 月 10 日或 12 日較為可信。菲島統治者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得知鄭成功的威脅之後，立即召開多次會議商討對策，最終做了四項因應措施：（1）將伊利甘、卡拉棉、特納提和三寶顏的駐軍撤回馬尼拉防守；（2）提議驅逐菲島華人，並決定除了 2,500 名華人（不包括教徒）可留在菲島以外，其他都得離開；（3）以西班牙人、混血兒、黑白混血兒、原住民、黑人等族群為招兵對象，被召募的士兵隨之派駐防守菲島；（4）派遣由指揮官 Augustín Martínez 所帶領的軍船前往臺灣海岸偵察動向。雖然第一項撤回各地要塞兵力在前人研究略有提及，但筆者找到更多未刊檔案作補充，而其他三項以往多未提到。至於第二項的驅逐菲島華人，此消息傳出後，造成馬尼拉華人群起反抗被殺之不幸事件。究其原因，乃是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害怕聚居在澗內的眾多華人會與國姓爺裡應外合的恐懼心理所引起。

以往研究已對馬尼拉華人動亂事件有一些描述，但筆者從新史料中看見更多的訊息，其中包含在澗內被殺的西班牙人姓名，以及事件爆發時剛從中國返回馬尼拉的道明會神父 Juan de Polanco 親眼見證此事，並對此事有細微的紀錄，可以

¹³⁴ 鄭氏受降前無船隻從日本和東南亞進入馬尼拉，直到 1684 年 2 月 16 日有兩艘華船從日本開往臺灣，因船難而停泊馬尼拉；1684 年 10 月 12 日有一艘來自望加錫的大使船；1685 年 7 月 3 日有一艘船隻從暹羅要到交趾支那，因途中船難而抵達馬尼拉；1685 年 7 月 4 日有一艘來自暹羅的華船，因船難而抵達馬尼拉。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438r-440v;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20r-121v, 265r-268r。前述兩艘從日本原擬到臺灣，卻停靠馬尼拉的船舶資料，中譯參見方真真、方淑如譯註，《臺灣西班牙貿易史料》，頁 96-97。

補充耶穌會教士所寫 1662-1663 年間馬尼拉事件和利勝神父手稿內容之不足。從 Juan de Polanco 神父的記載，可見馬尼拉官方透過菲島原住民之手來處理華人反抗事件，而且所述華人被殺人數多於其他紀錄。

馬尼拉華人動亂事件平息後，利勝神父攜帶答覆國姓爺的回函搭船返航。為解決此問題，1663 年 4 月 2 日，鄭經的兩位官吏首長（應指鄭泰和洪旭）以鄭經名義寫信讓利勝攜往馬尼拉，利勝所搭船舶於同月 21 日停泊馬尼拉港報關，抵達後將該信函譯成西班牙文呈上。不久馬尼拉官方討論鄭經方面所提出要求，最後雙方簽訂和平條約，並交給利勝神父兩封公函：一封是給鄭經的兩位官吏首長的答覆函；另一封是致鄭經的信函，以往僅知此信函，不知有前一封答覆函。於是國姓爺威脅馬尼拉的事件終於告一段落。實際上，鄭成功招諭呂宋早在他於 1662 年 6 月 23 日病歿就已結束，1666 年 6 月 12 日馬尼拉奧古斯丁修院的 Alonso Quijano 神父寫給國王陛下信中也提及此事，信中述及國姓爺威脅菲島、企圖讓菲島稱臣，此事結果是國姓爺並未到本島，也沒有在群島內外與我們或荷蘭人有戰事，而且隨著國姓爺的死亡，讓他的企圖無法實現。¹³⁵ 但馬尼拉當局得知國姓爺病歿消息較晚，直到雙方簽和平條約才得以鬆懈。為了因應國姓爺入侵而被撤回的伊利甘、卡拉棉、特納提和三寶顏等要塞的兵力，事後重新被提及討論，要求恢復原有的駐軍，尤其是三寶顏要塞最被重視且最常被上書要求重新駐紮軍力。¹³⁶

鄭成功招諭呂宋之事，馬尼拉當局與鄭成功雙方的認知有異。西班牙方面認為鄭成功背信忘義，菲島保護其所屬船隻來馬尼拉貿易，並提供其糧食和軍需。鄭成功方面則認為西班牙凌迫其商船，此情形早在 1655 年 8 月臺灣荷蘭長官就接到鄭成功對馬尼拉西班牙當局的抱怨信函，信中提到他的部下去馬尼拉交易，數年來經常遭受極為可惡、背信的對待，有時他的商人在那裡被打死，他們的貨物被奪去，有時他的商品被拿走而不付款，有時只付半價，於是鄭成功下令封鎖

¹³⁵ 原文如下：「Dando cumplimiento a su Real carta, en que Vuestra Magestad me mandale de avizo de lo sucedido con el tirano Pumpuan, que amenazaua estas Islas con cruel guerra, pretendiendo el vasalleje de ellas, y, obedeçiendo a Vuestra Magestad como leal vazallo y humilde capellán suyo, digo señor, que el tirano no vino a las Islas, ni a tenido batalla alguna dentro ni fuera de ellas con nosotros ni con los olandezes,... Manila y Junio 12 de 1666. Humilde capellán y vasallo de Magestad. Fray Alonso Quixano.」參見 AGI, Filipinas, 86, N.20.

¹³⁶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131r-135r, 136r, 143r-144v, 145r-146v, 147r-148v, 154r-154v, 155r-156v, 157r, 158r-159v, 160r-202r, 203r-204v, 207r-207v, 209r-211v, 212r-225v, 226r-228v, 229r-234v.

船隻去馬尼拉貿易，並要求荷蘭人公告此禁令，但荷蘭人拒絕，¹³⁷ 惹怒鄭成功，認為臺灣荷蘭人和馬尼拉西班牙人同樣蠻橫傲慢，虐待鄭方百姓，於是決定封鎖臺灣的貿易。¹³⁸ 1660年初荷蘭人已知鄭成功企圖攻打臺灣，隔年4月鄭成功揮軍臺灣。¹³⁹ 1662年1月3日鄭成功已計畫若打敗仗，就去攻打馬尼拉或呂宋的島嶼。¹⁴⁰ 可見鄭成功企圖征討呂宋早有跡可尋，攻下在臺灣的荷蘭人後，馬尼拉很快地成為下一個目標。

馬尼拉當局在鄭成功打敗荷蘭人之後，知道其軍力不容小覷，面對鄭成功的威脅極為小心謹慎處理，更召集馬尼拉重要軍政教人士召開多次會議商討對策，並留下眾多豐富的文件。相較於鄭成功的征菲意圖，馬尼拉官方對鄭經和鄭克塽的征菲意圖較不關注，因為有不少是謠傳或口頭說說，有的訊息還未傳到馬尼拉官方耳中就已無疾而終，有的消息西班牙人就當時情勢不認為會發生，因此相關的西班牙文史料較少提及，尤其是鄭克塽方面目前更不見相關紀錄。鄭氏企圖征菲的西班牙文史料皆來自馬尼拉官方的文件，其所獲得之消息不會是西班牙人之臆測。1663年鄭經方面派利勝到馬尼拉，與之簽訂和平條約，此條約應有送達鄭經手中，當時鄭經正面臨滿清和荷蘭聯軍的進攻，西班牙史料也有記載。¹⁴¹ 荷文史料提到鄭經因面臨歉收及糧食短缺，才將父親鄭成功的敵對計畫，轉而選擇向馬尼拉提出互惠的貿易計畫。¹⁴² 從此看來，鄭經是精明的人，選擇對其有利的作為，但此和約並無法牽制他後來存有的征菲意圖。鄭經有6次的征菲企圖，但西班牙文史料只記錄4次，即1671年、1672年、1673年及1680年，其中馬尼拉官方最在意的是1672年和1680年。1672年曾遣使節前往臺南與鄭經交涉，惟因遇難而未果；1680年曾特別部署相關軍備抗敵入侵。鄭克塽時期的征菲意圖僅有施琅在澎湖海戰大勝鄭軍之後，鄭氏將滅亡之際的1683年7月16日之後，馬尼拉當局並無收到相關訊息，故西班牙文史料不見此次的記載。

¹³⁷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1648-1655）》（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534-535、537。

¹³⁸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1655-1662）》（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頁96-97、116-117。

¹³⁹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1655-1662）》，頁379-380、613。

¹⁴⁰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1655-1662）》，頁738-739。

¹⁴¹ AGI, Filipinas, 9, R.3, N.48a; AGI, Filipinas, 201, N.1, fols. 1r-2v.

¹⁴² Wei-chung Che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2013), p. 225. 中譯本參見鄭維中著、蔡耀緯譯，《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1662-1683》（新北：衛城出版社，2021），頁462。

引用書目

AGI (Sevilla: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AGI, Contaduría, 1236, fols. 134v, 403v, 406r-406v, 406v, 524r-525r.

AGI, Contaduría, 1238, fols. 272r, 272v-273r, 318v, 318v-319r.

AGI, Contaduría, 1240, fols. 749r-749v.

AGI, Filipinas, 9, R.2, N.34.

AGI, Filipinas, 9, R.2, N.34b.

AGI, Filipinas, 9, R.2, N.34d.

AGI, Filipinas, 9, R.2, N.36.

AGI, Filipinas, 9, R.2, N.36a.

AGI, Filipinas, 9, R.3, N.48a.

AGI, Filipinas, 11, R.1, N.23.

AGI, Filipinas, 24, R.4, N.27.

AGI, Filipinas, 43, N.39.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147r-149r, 438r-440v.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20r-121v, 265r-268r.

AGI, Filipinas, 86, N.20.

AGI, Filipinas, 201, N.1.

AGI, Filipinas, 331, L.7, fols. 141v-142r.

APSR (Ávila: Archivo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APSR(Ávila), 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Historia de los Grados Militares,” 下載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網址：<https://www.yumpu.com/es/document/read/14613667/historia-de-los-grados-militares-soldados-digital>。

李毓中，〈「殲滅」或「空穴來風」的艦隊？：1662 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一）〉（2009 年 7 月 14 日），「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下載日期：2023 年 5 月 24 日，網址：<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09/07/14/「殲滅」或「空穴來風」的艦隊？——1662 年鄭成功/>。

李毓中，〈「殲滅」或「空穴來風」的艦隊？：1662 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二）〉（2009 年 8 月 7 日），「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下載日期：2023 年 5 月 24 日，網址：<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09/08/07/「殲滅」或「空穴來風」的艦隊？——1662 年鄭成功/>。

J.E. 威爾斯 (Wills, John Elliot) (著)、耿升 (摘譯)

1982 〈多明我会士李科罗与台湾郑氏政权〉，《中国史研究动态》（北京）1982(5): 14-20。

方真真、方淑如（譯註）

2006 《臺灣西班牙貿易史料》。臺北：稻鄉出版社。

方真真

2007 〈從西班牙史料考察十七世紀末期環臺灣海域的暴風雨紀錄〉，《臺灣文獻》（南投）58(4): 125-151。

2022 〈埋骨於基隆和平島：十七世紀來臺灣傳教的道明會神父 Mateo de Cobisa〉，《國史館館刊》（臺北）74: 1-38。

方真真（著、主譯）

- 2012 《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第一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石原道博

- 1941 〈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始末〉，收於加藤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東洋史集說：加藤博士還曆記念》，頁93-110。東京：富山房。

石原道博（著）、鄭瑞明（譯）

- 1983 〈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始末〉，《臺北文獻（直字）》（臺北）61/62: 221-236。

江日昇

- 1960[1704] 《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6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江樹生（譯註）

- 2003 《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1648-1655）》。臺南：臺南市政府。
2011 《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1655-1662）》。臺南：臺南市政府。

李毓中

- 1998 〈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菲律賓關係初探〉，《漢學研究》（臺北）16(2): 29-57。
1999 〈塞維亞印度總檔案館中有關鄭經的西班牙文史料譯述〉，《臺灣風物》（臺北）49(1): 137-145。
2012 〈國姓爺與菲律賓總督的「戰爭」：1662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原住民族文獻》（臺北）6: 21-28。

張先清

- 2008 〈17世紀歐洲天主教文獻中的鄭成功家族故事〉，《學術月刊》（上海）40(3): 131-142。

松方冬子（著）、杉本房代（譯）、劉序楓（校修）

- 2012 〈唐、蘭風書中有關鄭氏政權瓦解的訊息及其傳日經過〉，《臺灣史研究》（臺北）19(1): 173-192。

夏琳

- 1958 《閩海紀要》，臺灣文獻叢刊第1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8 《海紀輯要》，臺灣文獻叢刊第2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匪石

- 1960 〈鄭成功傳〉，收於鄭亦鄒，《鄭成功傳》，臺灣文獻叢刊第67種，頁63-126。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連橫

- 1962[1921] 《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荊和

- 1963 《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

黃滋生、何思兵

- 2009 《菲律賓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幣原坦

- 1931 〈國姓爺の呂宋招諭〉，《歷史地理》（東京）57(5): 571-579。
1931 〈國姓爺の呂宋招諭再說〉，《歷史地理》（東京）58(4): 285-295。
1938 〈國姓爺の呂宋招諭〉，收於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頁226-253。東京：富山房。

鄭維中（著）、蔡耀緯（譯）

2021 《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1662-1683》。新北：衛城出版社。
賴永祥

1954 〈明鄭征菲企圖〉，《臺灣風物》（臺北）4(1): 17-33。

Álvarez, José María 白若瑟

1930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Barcelona: Librería católica internacional.
Alva Rodríguez, Inmaculada

2000 “La Centuria Desconocida: el Siglo XVII.” In Leoncio Cabrero, ed., *Historia General de Filipinas*, pp. 207-248. Madrid: Ediciones de Cultura Hispánica.

Blair, E. H. and J. A. Robertson (eds.)

1906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36*. Cleveland, Ohio: A.H.Clark.

Borao Mateo, José Eugenio 鮑曉鷗

1996 “Consideraciones en torno a la imagen de Koxinga vertida por Victorio Ricci en Occidente.”
Encuentros en Catay (Taipei) 10: 48-77.

Borao Mateo, José Eugenio 鮑曉鷗 (et al.)

2002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Busquets Alemany, Anna

2013 “Koxinga, los españoles de Manila y el alzamiento de los chinos de 1662: el testimonio de Victorio Riccio.” *Revista Iberoamericana de Estudios de Asia Oriental* (Madrid) 6: 7-43.

2019 “Por Dios, por el rey y por Koxinga: las negociaciones de Vittorio Riccio.” In Javier Martín Ríos, ed., *Estudios Lingüísticos y Culturales sobre China*, pp. 169-183.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2020 “Victorio Riccio: An Entangled Voice in the 1662 Chinese Uprising in Manila.” In Jos Gommans and Ariel Lopez, eds., *Philippines Confluence: Iberian, Chinese and Islamic Currents, c. 1500-1800*, pp. 169-189.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Combés, Francisco

1667 *Historia de las Islas de Mindanao, Iolo y sus Adyacentes*. Madrid: Por los herederos de Pablo de Val.

Cheng, Wei-chung 鄭維中

2013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Campo López, Antonio C.

2020 “Molucas y España en el siglo XVII.” In Javier Serrano Avilés and Jorge Mojarro, eds., *En el Archipiélago de la Especiería: España y Molucas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pp. 38-67. Madrid: AECID y Desperta Ferro Ediciones.

De la Concepción, Juan

1788-1792 *Historia General de Philipinas*. Manila: en la Impr. del Seminar, Conciliar, y Real de S. Carlos: por Agustín de la Rosa, y Balagtas.

Díaz, Casimiro

1890 *Conquista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Valladolid: Luis N. de Gaviria.

Fernández Navarrete, Domingo 閔明我

- 1676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en la Imprenta Real por Iuan Garcia Infançon.

Murillo Velarde, Pedro

- 1749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 Philipinas de la Compañia de Iesus*. Manila: En la Imprenta de la Compañia de Iesus, por D. Nicolas de la Cruz Bagay.

McCarthy, Charles J.

- 1970 "On The Koxinga Threat of 1662." *Philippine Studies* (Quezon City) 18(1): 187-196.

Ocio, Hilario Maria

- 1891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desde su Fundación hasta Nuestros Días, Parte Primera, Comprende desde 1587 a 1650*. Manila: Establecimiento Tipográfico del Real Colegio de Santo Tomás.
- 1891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desde su Fundación hasta Nuestros Días, Parte Segunda, Comprende desde 1658 a 1700*. Manila: Establecimiento Tipográfico del Real Colegio de Santo Tomás.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 1992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Madrid: Espasa-Calpe.

Valladares, Rafael

- 2001 *Castilla y Portugal en Asia (1580-1680): Declive Imperial y Adaptación*.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Wills, John E. 衛思韓

- 1980 "The Hazardous Missions of a Dominican: Victorio Riccio, O.P., in Amoy, Taiwan and Manila." In Jean-Robert Armogathe, *Actes du I^{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au temps des Lumieres* (Chantilly, 16-18 septembre 1977), pp. 231-243 (French), 243-257(English). París: Les Belles Lettres-Cathasia.

Threats of Conquest of Luzon from Taiwan by the Zheng Family: Examina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Chen-chen F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ttempt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Zheng family to conquer Luzon using mostly previously unpublished Spanish historical records. In 1662, Koxinga (Zheng Chenggong) issued a letter threatening the Philippines, which was delivered by Father Victorio Riccio, who arrived in Manila by May 10 or 12 of that year. Father Victorio Riccio translated the letter into Spanish. When faced with Koxinga's threats, the Manila government relocated garrisons from Iligan, Calamianes, Ternate and Zamboanga to Manila and recruited more cavalry for defense, and dispatched a military vessel under Agustín Martínez's command to Taiwan's coastline to monitor the enemy's actions. To remove domestic support for Koxinga's navy, only 2,500 Chinese individuals (excluding Christians) were allowed to stay in the Philippines, while the rest were to be expelled from the archipelago. The news of expulsion triggered a rebellion by the Chinese in Manila on May 25, 1662.

After the Chinese rebellion in Manila concluded in early July, Father Victorio Riccio brought back the response letter to Koxinga from the Governor of Manila, 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 Koxinga had already passed away and the letter was received by his son Zheng Jing, who deliberated with his court on the issue. On April 2, 1663, two officials, Zheng Tai and Hong Xu, drafted a letter in his name, which Father Victorio Riccio delivered to Manila. His ship docked in Manila's port on April 21, 1663. The Manila government considered Zheng Jing's demands and, in the end, the two sides signed a peace treaty. The Manila government issued two official letters of response to be delivered by Father Victorio Riccio, one to Zheng Jing and the other to his two officials, thereby putting an end to Koxinga's threats to Manila.

When Koxinga defeated the Dutch, the Manila government knew that his strength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nd his threats to conquer the Philippines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However, the threats of Zheng Jing and Zheng Keshuang, Koxinga's grandson, were not given much consideration by the Manila government. At times, their intentions to conquer the Philippines were mere rumors; on other occasions the actual plans of conquest were abandoned before Manila learnt of them; and other times, the threats were acknowledged but not viewed as a serious concern given the circumstances. Zheng Jing threatened to conquer the Philippines six times, but Spanish records mention only four instances in 1671, 1672, 1673, and 1680. The Manila government paid the most attention to threats in 1672 and 1680. In 1672, an envoy was sent to Tainan to negotiate with Zheng Jing, but the mission failed because the vessel was diverted to Macau by a storm. In 1680, the military and the navy were deployed in Manila for defense against enemy threats. During Zheng Keshuang's reign, there was only one threat of conquest, which came after July 16, 1683, when the Zheng family was on the verge of decline. Nonetheless, Spanish records do not mention it a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hilippines did not acknowledge receiving it.

Keywords: Conquer of Luzon, Koxinga, Zheng Jing, Zheng Keshuang, Taiwan

霧社事件後清流部落之 土地取得與生計變遷： 兼論周遭族群關係（1931-1980）*

陳慧先**

摘 要

霧社事件起事六社餘生者，在 1931 年被遷至原漢交界的「川中島」合併為一社，即今南投縣仁愛鄉清流部落（Alang Gluban）。

本文從當代清流部落地景出發，透過口述訪談與檔案文獻蒐集，試圖補白部落現場較少被述說的故事。文中使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豫約賣渡」相關文書，增補川中島土地流轉過程的細部環節，並聚焦於 1931-1980 年代部落主要生計經濟：水田稻作。霧社事件後，官方強制移住臺灣島內原住民、推行「水田稻作」，各地成效不一。川中島社一帶海拔較低、環境宜耕，且該地本闢有良田、鋪設水路，是改行「水田稻作」較成功的例子，但也因遠離霧社原生聚落、土地利用方式轉變，造成內部傳統文化斷裂。1970 年代，清流部落作為第一個原住民保留地重劃示範區，改善耕作環境，然至 1970-1980 年代，單靠農業收入逐漸無法支應日常生活所需。重劃期間為籌措築田經費的外地工作經驗，開啟部分族人赴外謀職契機，而求學、工作等需求也使部分族人必須暫離或搬離部落。

從「川中島社」到「清流部落」五十年間土地、生計經濟變遷，呈現近代國家力量在 20 世紀初如何擾動臺灣島內各族群生活空間，以及原住民族被導向農耕民化後的縮影。

關鍵詞：霧社事件、川中島社、清流部落、水田稻作、水圳、部落史

* 本文為筆者執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族群』與國家：戰後清流部落（Alang Gluban）的發展（1945-2008）」（計畫編號：111-2410-H-005-002-MY2）之部分研究成果。論文初步構想曾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以〈霧社事件其後：清流部落賽德克族人的遷徙、文化轉變與周邊族群互動（1931-1960）〉為題，在輔仁大學主辦之「第 16 屆文化交流史：人群的移動與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感謝評論人許毓良教授悉心指教。會議稿經架構調整、大幅增補內容後投稿本刊，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具體修正意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李進億教授費心幫忙繪製地圖，清流部落 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長期接納筆者的打擾、給予指點，以及諸位撥空接受訪問的族人們，謹此一併深致謝忱。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24 年 4 月 18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8 月 26 日。

- 一、前言
 - 二、移居土地的流轉與初期肆應
 - 三、周邊族群互動
 - 四、「農耕民化」下的水田稻作
 - 五、戰後經濟作物、農地重劃與原鄉人口外流
 - 六、結論
-

一、前言

1930 年的霧社事件，長久以來是臺灣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中，最受社會大眾矚目的。除受戰後歷史詮釋影響外，事件本身在當時即引起一定程度關注，不僅影響其後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也促使 1920-1930 年代部分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正視原住民議題。「霧社事件」後臺灣總督府的「集團移住」政策採取強制且更全面執行的手段，除將參與反日的賽德克族六社餘生者於 1931 年 5 月遷往川中島（今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¹），也牽動後續一連串賽德克族人移居，影響更擴及全島近 35% 的部落，² 對臺灣原住民傳統文化造成極大衝擊。

過去相關歷史研究主要集中在「霧社事件」本身、日本當局「理蕃」政策轉變，以及不同時期對事件的歷史詮釋等議題。³ 去年（2023）甫出版的《霧社事

¹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之部落區域範圍，今清流部落包括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 16-22 鄰，而根據最新的（2024 年 2 月）戶政資料，目前清流部落計 164 戶 514 人。參見「行政院公報資訊網」，下載日期：2024 年 3 月 22 日，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9035/ch02/type3/gov13/num3/images/Eg01.pdf；「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下載日期：2024 年 3 月 22 日，網址：<https://jenaihr.nantou.gov.tw/1499/0112>。

² 葉高華，《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頁 75。

³ 如戴國輝編著、魏廷朝翻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臺北：國史館，2002）；近藤正己，〈台灣總督府の「理蕃」体制と霧社事件〉，收於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2：帝國統治の構造》（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 35-60；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臺北）60:3（2010 年 9 月），頁 11-57；顧恒湛，〈流轉記憶：霧社事件紀念碑的歷史閱讀〉，《臺灣史研究》（臺北）29:1（2022 年 3 月），頁 159-207 等。

件調查研究》，⁴ 亦主要聚焦霧社事件前史與事件本身。霧社事件起事六社餘生者及其後裔，1931 年移居川中島後的發展，特別是戰後部分較少受到關注。包括位於清流部落的「餘生紀念館」，館內陳列的大事年表，也止於 1945 年 10 月。這樣的現象，除取決前人研究者各自的關懷，也與 1931-1980 年代間，部落內部日常漸進的發展，對比「霧社事件」鉅變，較不引人注目且資料零散有關。

與本文相關之前人研究，一是探討原鄉部落傳統如何回應外部力量帶來的變遷，此類型的研究以人類學者居多；⁵ 二是從政策、社會組織面向，討論蕃地／山地社會生計、產業與供銷組織的變化；⁶ 三則是與清流部落直接相關著述。其中，將清流部落作為主題探討的研究，以非歷史學領域的討論居多，包括出身清流部落的族人著作，以及人類學、民族學及觀光等相關領域的研究論文，如：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等合著的《清流部落生命史》，⁷ 在 1999-2001 年間調查清流部落族譜，整理戶政資料並針對當時年齡 60 歲以上的長者進行豐富的口述紀錄，內容以神話傳說、Gaya、部落遷徙、傳統生活與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為主。書中收錄由 Dakis Pawan（郭明正）撰寫的〈Kari Alang Nu Gluban（清流部落簡史）〉，⁸ 勾勒 Seediq Tgdaya 在霧社事件前的發展，與 1931 年六個部落遷至川中島的過程。

Dakis Pawan 出身清流部落，除上述短文外，另著有《賽德克族語中歷史文化現象的探討》、《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正名運動》等

⁴ 鄧相揚、簡史朗，《霧社事件調查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3）。

⁵ 如黃應貴，《「文明」之路第二卷：「現代化」下文化傳統的再創造（1945-199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王梅霞，《交織、轉化與再創造：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社會文化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

⁶ 如陳秀淳，《日據時期臺灣山地水田作的展開》（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何世龍，《日治時期理蕃政策研究：以東臺灣「集團移住」與「蕃地稻作」為例》（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22）；李力庸，〈從改善生活到投資山地：戰後山地的農業政策與推廣（1945-1960）〉，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歷史學系協辦，「第二屆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3 樓第一會議室，2012 年 6 月 19-20 日），頁 1-19；李力庸，〈從合作社到農會：戰後山地供銷體制的變動〉，發表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變動中的東亞：跨域視野的觀察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會議室，2016 年 5 月 13-14 日），頁 1-14；李力庸，〈從改善生活到組織山地：山地定耕農業的政策與推廣（1945-1960）〉，《臺灣學研究》（新北）28（2022 年 12 月），頁 67-94 等。

⁷ 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南投：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2002）。

⁸ Dakis Pawan（郭明正），〈Kari Alang Nu Gluban（清流部落簡史）〉，收於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 7-13。

書，⁹ 對於族語與文化傳統保存著力甚多，並透過口訪部落耆老，增補關於霧社事件清流部落的內部觀點。Bakan Pawan（巴干·巴萬）的〈霧社事件遺族的心聲：以莫那·魯道直系家族史為中心〉，¹⁰ 分別從家庭史、部落內部視角與賽德克族 Gaya（族律）等面向，重新探討莫那·魯道的歷史定位。而 Mona Pawan（張進昌）的碩士論文〈賽德克清流部落社區營造策略之研究〉，¹¹ 則提出對部落未來社區營造的建議與期待，指出清流部落賽德克族人擁有獨特的文化內涵以及霧社事件的歷史經驗，與優美自然環境條件，然部落必須克服族群、國家認同缺乏自信、核心價值渙散、部落組織架構複雜等困境。九二一大地震後曾經歷霧社事件的部落耆老快速凋零，幸有《清流部落生命史》的口訪留下許多寶貴紀錄。近年來也有年輕一代的族人，探討清流部落當代織布產業推廣與部落空間規劃等相關議題。¹²

村上優的〈日本殖民主義治理中的現代性——成為「模範蕃社：川中島」1931-1945〉，¹³ 透過口訪，以空間、時間、身體等現代性概念，從人類學視角檢視殖民統治者如何在異地，重新將霧社反日六社餘生者打造成一個新的「模範蕃社」——川中島社。趙芝良等的〈黑暗中的景觀凝視與敘事：賽德克巴萊下的清流〉¹⁴ 則探討 2011 年 9 月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後，為清流部落帶來的觀光熱潮，藉由分析部落族人如何進行導覽，以及旅人的凝視、提問，點出未來在臺灣進行「黑暗觀光」的侷限與各種可能。

⁹ 郭明正，〈賽德克族語中歷史文化現象的探討〉（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 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郭明正編，〈賽德克正名運動〉（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2008）。

¹⁰ 巴干·巴萬，〈霧社事件遺族的心聲：以莫那·魯道直系家族史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18）。

¹¹ 張進昌（Mona Pawan），〈賽德克清流部落社區營造策略之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¹² 如曾彙娟，〈部落織布產業推廣的文化意義與實踐：以賽德克族清流部落為例〉（花蓮：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應用人類學組碩士論文，2022）。郭益誠（Temu Walis）則正進行「以原住民族規劃概念思考部落整體空間規劃：以清流部落為例」的研究計畫。

¹³ 村上優，〈日本殖民主義治理中的現代性——成為「模範蕃社：川中島」1931-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2018）。

¹⁴ 趙芝良、全恆儀、洪貝旬，〈黑暗中的景觀凝視與敘事：賽德克巴萊下的清流〉，《戶外遊憩研究》（臺北）27: 3（2014 年 9 月），頁 57-82。



圖 1 當代清流部落稻作景致

說明：由清流部落面對惠蓀農場方向，中後方隱約可見之聚落為中原部落。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

上述族人與相關研究者的論著，無論是否為賽德克族裔，均盡可能以部落內部觀點，挑戰過去既有研究或與當代對話。不過，亦可發現目前與清流部落直接相關的研究，討論焦點主要集中在日本統治時期，或近一、二十年有關族群正名、社區營造、部落觀光與文化復振等議題。有關霧社事件後清流部落的發展，尚缺乏較系統性的整理與探討，特別是 1945-1980 年間的清流部落圖像相對影薄。

筆者在 2010 年夏天，第一次進入清流部落，當時稻穗搖曳與溪流、層山相映的景象（如圖 1），至今印象深刻。爾後因為不同機緣，有較多與部落長輩接觸的機會，對於族人搬遷到「川中島」後這段過去較少被提及的時段感到疑惑與好奇。此外，曾聽聞族人提及從事文化復振工作或是推廣部落觀光所面臨的難題：由於清流部落族人移住等歷史經驗，使他們遠離霧社原生聚落，造成內部文化傳承斷裂，如織布、狩獵、傳統家屋搭建等傳統技藝的流失。¹⁵ 早年族人口訪中，

¹⁵ 年輕一代的清流族人亦述及類似感受。參見曾彙娟，〈部落織布產業推廣的文化意義與實踐：以賽德克族清流部落為例〉，頁 2-3。

亦有受訪者表示，對九二一地震後家屋重建未能複刻「原味」而感到可惜——當時政府單位鼓勵以傳統方式築屋，但自霧社遷居後傳統家屋建造技術並未傳承，族人對於老屋的想法只保留日治時期「板子屋」概念。¹⁶ 而從在地觀光導覽的視角，外界熟知的「霧社事件」相關遺跡、遺址或塑像、紀念碑，多半不在部落境內。

本文選擇從當代部落地景出發，透過口述訪談與檔案文獻蒐集，試圖補白部落現場較少被述說的故事。內容聚焦在清流部落土地的取得、從傳統農獵生活到以水田稻作為主的生計變化，並兼論遷居後與周邊族群的互動，勾勒清流部落生活史，時間涵括 1931 年至 1980 年代。希望兼顧在地觀點與官方文書記載，再探原鄉部落發展的共相，並呈現清流部落的特殊性。2005 年「原住民族基本法」頒布後，為「部落」賦予法治地位，自 2009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部落核定作業要點」公布實施後至今（2024），已核定的原住民族部落數為 737 個。當代「部落」一詞實已超越居住空間屬性意涵，不僅是遵循傳統規範而共同生活的團體，更是原住民族社會基本自治單位。¹⁷ 近十年來在官方推動下，已有二十多本部落史研究出版，但整體而言比例仍偏低，希望本文能為未來有志書寫「清流部落史」者，提供一小塊拼圖。

二、移居土地的流轉與初期肆應

1930 年 10 月 27 日霧社事件爆發，事件期間日本當局共出動軍隊 1,303 名、警務人員 1,306 名，起事六社族人總數包括老弱婦孺不過 1,234 名，壯丁數約 300 餘人，¹⁸ 終究寡不敵眾。同年 12 月戰事結束，六社餘生者被安置在保護蕃收容所，1931 年 4 月發生「第二次霧社事件」，收容所內六社後裔遭「味方蕃」襲擊。

¹⁶ 張進昌（Mona Pawan），〈賽德克清流部落社區營造策略之研究〉，頁 126。

¹⁷ 詹素娟，〈「部落」如何「歷史」？：部落的時空變動與文獻特性〉，收於孫大川主編，《原住民族部落歷史研究理論與實務》（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4），頁 109-110、117。文中對漢語將「部落」作為原住民聚落專稱的由來演變，與近 10 年轉向「部落史」研究的時代意義，有進一步清晰地討論。

¹⁸ 生駒高常，〈霧社蕃騷動事件調查覆命書〉，收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下）》，頁 365-366；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收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下）》，頁 579、594。

經歷兩次事件之後，六社遺族僅存不到 300 人。爾後，理蕃當局選定能高郡蕃地北港溪右岸「川中島」作為餘生者移居地。本節將闡述「川中島」土地的取得經過、初期族人的適應，以及移居後部落的土地分配。

（一）移居土地的取得

清流部落在日治時期之所以被命名為「川中島」，是因其三面鄰水，為北港溪與眉原溪交會的沖積平原。賽德克族語稱之 Gluban，意即中途休息的地方。據《仁愛鄉志》記載：其所在位置原為泰雅族眉原群傳統領域，眉原群族人曾在川中島臺地上方建立摩古卡恩社（Mkgaong），後於 1924 年在日警迫令下遷居今眉原部落，廢社後原址成為霧峰林家的開墾地。¹⁹ 而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資料，川中島土地共 137 甲，為豐原郡神岡庄林懋亮²⁰ 等人受讓，原有佃農 18 戶、129 人，後官方以「豫約賣渡」（或稱預約賣下）²¹ 北斗郡二林庄官有地 50 甲作為交換條件，限期該地居民於 1931 年 5 月 10 日前全數搬遷。²²

在 1904 年出版的臺灣堡圖中，北港溪庄以東均屬「生蕃地」，為何官方在 1931 年會以北斗郡二林庄官有地與神岡林家交換？而《仁愛鄉志》所載霧峰林家開墾地，所指又是為何？

「川中島」一帶土地，從眉原群傳統領域到作為霧社事件餘生者的移居地之前，有過數次轉手。1903-1912 年間，日本官方透過武裝警察，大規模、大範圍推進中部山地隘勇線，佔領原住民領域。²³ 1910-1920 年代，已有多方人士向官方

¹⁹ 鄧相揚，《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119；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志》（南投：南投縣仁愛鄉公所，2008），頁 1789-1790。

²⁰ 林懋亮，為豐原神岡社口林振芳（1832-1905）之孫、林佐璿（1860-1933）三子。參見張麗俊著、許雪姬主編，〈水竹居主人日記/1907-08-02〉，「臺灣日記知識庫」，下載日期：2023 年 4 月 2 日，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6%B0%B4%E7%AB%B9%E5%B1%85%E4%B8%BB%E4%BA%BA%E6%97%A5%E8%A8%98/1907-08-02>。〔按：以下各引用日記均省略資料庫名稱、下載日期及網址〕。

²¹ 為官方釋出財產售予民間的一種制度，民間以承諾於一定期限內開墾成功為條件，向官府申請無償租借土地，期約屆滿且被認為達成原承諾時，政府則將官有土地賣出予民間申請者。參見吳密察，〈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1898-1905）」的展開及其意義〉，《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10（2017 年 12 月），頁 24。

²²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頁 689-690；〈保護蕃と入替へに 川中島の農民の移住〉，《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5 月 8 日，第 5 版。據報載共 16 戶、130 人。

²³ 鄭安晞，〈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1895-192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1），頁 265-280。

以「豫約賣渡」方式申墾北港溪庄以東蕃地。其中「川中島」所在範圍，曾在 1915 年 10 月由鈴木市太郎等人，向官方申墾南投廳北港溪堡北港溪庄東方蕃地——眉原溪與北港溪匯流處共 134 甲 9 分 5 厘，並於 1917 年至法院公證輾轉將賣渡許可權讓予南投吳宗敬，²⁴ 但吳仍委任鈴木等人作為「豫約賣渡」代理人。1920 年 10 月墾成眉原溪左岸一部約 76 甲，取得開墾成功賣渡許可；眉原溪右岸一部約 58 甲，其中部分因地質堅硬、坡度傾斜開墾未成返還官方，彼時今清流部落範圍已有廣東籍佃人 24 戶，官方調查指出：「該地地勢平坦、地味中庸，為最適農耕之地」。²⁵ 此外，吳宗敬另於 1920 年申請「豫約賣渡」眉原溪左岸與前墾成區北接與南接之地，並在 1922 年取得開墾成功賣渡許可約 38 甲。²⁶ 上述兩處開墾成功的土地皆位於今清流部落境內（參見圖 2）。

目前可查找到吳宗敬與林懋亮兄長林少超（1880-？）在 1925 年間的往來書信與文書資料，內容涉及土地買賣與赴能高郡更名事宜，²⁷ 推測豐原神岡社口林家應是在 1925 年前後自吳宗敬手中取得川中島一帶土地。

川中島周邊、近眉原駐在所的北港溪左岸（蕃地ハイバラ官有原野），即後來同屬賽德克 Tgdaya 群巴蘭社等在 1938-1940 年間的遷居地，則是由林水性（1874-？）、林逢春（1853-？）等人在 1924 年取得開墾成功賣渡許可（1917 年申請豫約賣渡），成功面積約 66 甲。林水性曾任霧峰林家林輯堂、林烈堂、林澄堂等人之樟腦會計與開墾地主任，1903 年移居北港溪庄，曾從事舊式糖廊砂糖製

²⁴ 吳宗敬，南投人，醫師。1887 年生。1910 年自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曾任赤十字病院醫員，後於南投開設宗敬醫院。歷任南投信用組合監事、南投街協議會員，曾參加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1934 年赴上海開業，回臺後在南投開業，後遷移至臺中州新高郡集集街開設吳醫院。1951 年當選第一屆民選南投鎮長。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編註，〈黃旺成先生日記/1935-01-27〉。

²⁵ 〈開墾地成功賣渡許可（鈴木市太郎外三名）〉（1921 年 3 月 1 日），《大正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五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3160008；〈埤圳新設認可ノ件〉（1922 年 1 月 1 日），《大正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追加第二卷地方殖產土木》，「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7158001。

²⁶ 〈豫約賣渡許可（吳宗敬）〉（1923 年 6 月 1 日），《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七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3577004。

²⁷ 〈南投吳宗敬寄豐原郡神岡庄社口林少超書留郵便〉（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21.022.0177.0003；〈內買吳宗敬土地書類袋〉（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21.022.0177.0001；〈大正 14 年 6 月 13 日林少超寄吳宗敬預金證〉（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21.022.0177.0004。另參見楊仁江，〈社口林宅〉（臺北：弘化文化事業公司，1987），頁 72。



圖 2 1920 年代今清流部落一帶土地「預約賣渡」範圍示意圖

說明：李進億繪製。

資料來源：〈開墾地成功賣渡許可（鈴木市太郎外三名）〉（1921 年 3 月 1 日），典藏號：00003160008；〈豫約賣渡許可（吳宗敬）〉（1923 年 6 月 1 日），典藏號：00003577004；〈埤圳新設認可ノ件〉（1922 年 1 月 1 日），典藏號：00007158001。

造，及擔任南投廳北港溪庄保正。²⁸ 林逢春則是於 1881 年即在埔里社堡牛眠山庄務農，1886-1890 年間任埔里社屯兵正營左哨百人長，除務農、經商外，也在 1898 年後經營土地開發事業，曾任牛眠山庄第九區區長、埔里社辦務署北角區庄長、埔西區土地整理組合長、埔西區區長，協助臨時臺灣土地調查，並於 1925 年獲臺灣總督府授予木杯表彰。²⁹

²⁸ 〈林水性外二名豫約賣渡許可地成功賣渡許可地代金徵收報告（臺州中知事）〉（1924 年 8 月 1 日），《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九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3781004X001。

²⁹ 〈林水性外二名豫約賣渡許可地成功賣渡許可地代金徵收報告（臺州中知事）〉（1924 年 8 月 1 日），典藏號：00003781004X001。

上述承購、申請開墾川中島周邊土地者的林懋亮與林水性等人，都與清領末期協辦「開山撫番」的家族有淵源：林懋亮出身豐原神岡社口林家、林水性曾任職霧峰林家。神岡社口林家在清法戰爭期間（1884），奉彰化知縣命督辦團練、保甲局務。1885年罩蘭（今苗栗卓蘭）庄民與原住民發生衝突時，曾協助官方入「番界」安撫，後亦協助巡撫劉銘傳「征剿生番」、幫辦東勢角撫墾諸役。³⁰

霧峰林家自清領末期即在北港溪堡一帶發展，於「開山撫番」期間，下厝林朝棟轄下隘勇副營曾駐紮北港溪。1888年，林朝棟與林文欽合股開設「林合公司」（林家合同之組合號），開墾沿山一帶經營樟腦業。1899年因實施樟腦專賣，霧峰林家自清代以來經營的樟腦業大受影響，聯名陳情並請追認清代「林合」開墾之土地，隔年日本政府核准其開墾地所有權。³¹ 下厝林輯堂再向臺灣總督府申請開墾北港溪堡水長流原野 12 萬坪（40.8 甲），及北港溪堡北港溪庄之原野 30 萬坪（102 甲），僱佃農各 20 戶及 50 戶，組織保甲自衛、開墾田園，於 1901 年核准。未久林輯堂過世，事業由其獨子林資彬（1898-1964）繼承。³² 資彬亦另向日人近藤勝三郎（1873-？）³³ 購置水長流（今國姓鄉）土地，招苗栗一帶客家人前往開墾而成良田。³⁴

這些自清末以來即在沿山邊區經營事業的家族之相關人士，之所以在 1910-1920 年代申請預約賣渡或承購北港溪庄以東蕃地官有原野，或與過去邊區拓墾經

³⁰ 黃秀政，〈林氏宗族與清代中部的開發〉，《興大歷史學報》（臺中）12（2001年10月），頁122-123。

³¹ 王世慶，〈霧峰林家之歷史〉（手稿影本），頁60-63。

³² 王世慶，〈霧峰林家之歷史〉（手稿影本），頁64-65。

³³ 近藤勝三郎，日本德島縣人。日治初期抵臺，曾在埔里經營蕃產交易，娶巴蘭社頭目 Robo Nawi 之女 Iwan Robo 為「內緣妻」（未依法結婚登記但同居在男方戶內之女子），後又娶荷戈社頭目 Awi NoKan 之妹 Obing Nokan。精通賽德克族語，與 Tgdaya 群往來密切，為日本官方長期仰賴之「蕃通」，擔任嚮導、翻譯與偵探情資等工作，縱橫霧社山區十餘年，有「生蕃近藤」之稱。其弟近藤儀三郎與莫那·魯道的么妹狄娃斯·魯道結婚，日後卻失蹤，使狄娃斯·魯道形同被遺棄，此事被認為是促使莫那·魯道等人發起「霧社事件」的原因之一。參見鄧相揚、簡史朗，〈霧社事件調查研究〉，頁200；保羅·D·巴克萊（Paul D. Barclay）作、堯嘉寧譯，〈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278-280、頁305-308。

³⁴ 近藤勝三郎在日治時期曾取得今國姓鄉水長流一帶放領的官有地，經營農牧場、從事山產交易，後將土地轉售霧峰林家。參見ヒポ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実編譯，〈霧社緋櫻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日本：教文館，1988），頁：13、124、127；許雪姬，〈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初探〉，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336。林獻堂在其日記中，亦曾提及林資彬曾向日本人購買水長流土地六甲「其土甚薄而雜以小石，實難耕種」一事。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著，〈灌園先生日記/1935-12-13〉。

驗和地緣關係有關。附帶一提，1910 年代鈴木市太郎、林水性申請預約賣渡期間，鄰近該二筆土地所在的北港溪上游、今黃肉溪右岸，已被劃為「蕃人耕作預定地」與「蕃人移住預定地」，不許可他人申請預約賣渡，成為北港溪中游眉原群移住地。³⁵ 1920 年代中葉的「森林計畫事業」區分調查，原本規劃再移入 350 名 Toda 群與 Truku 群族人，後因霧社事件爆發而取消。³⁶

（二）移居初期的肆應

1931 年 5 月 6 日，298 名霧社事件六社餘生者分兩批遷往川中島。川中島海拔近 500 公尺，而餘生者的祖居地霧社則是高達 1,200 公尺，自然環境相差甚大，族人一時難以適應。1931 年初至眉原部落擔任公醫的井上伊之助，在 5 月 14 日即趕赴川中島行醫，留下相關記事：

連日大雨造成河川水位急增，無法通行，只好坐流籠攀附臨時搭建的鐵絲吊橋渡河過去，沒看過這情景的人，無法瞭解是多麼危險的事。到了那邊一看，在帳篷內橫躺著數十名患者，其中也有數名在霧社事件中負傷的泰雅人。³⁷ 他們本來住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山，要他們遷移到平地居住，特別是在蚊蟲孳生的這個時期，瘧疾就一個傳染一個，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罹患者出現，此時《日刊新聞》上刊有川中島移住者全部滅絕的消息。我和一名曾是衛生兵的青年巡查拼命醫療，結果令人慶幸地，死亡者很少，到了秋風時節，許多人已康復了。³⁸〔按：底線為筆者所繪，以下同〕

短時間搬遷至環境迥異的移居地導致許多族人水土不服，甚至有移住者全數滅絕的傳聞。有些族人認為是原先住在該地的平地人，因被迫遷離而懷恨下毒報復。³⁹

³⁵ 〈蕃人移住地及耕作地豫定ノ場合認可ヲ要スル通達ノ件（各州廳）〉（1920 年 10 月 1 日），《大正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五十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3052003。

³⁶ 葉高華，《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頁 47、117。

³⁷ 按：2008 年賽德克族正名之前，賽德克族被官方列為泰雅族底下的亞族，故當時指稱族別時的語彙仍作泰雅族。以下同。

³⁸ 井上伊之助著，石井玲子漢譯，鄭仰恩、盧啟明校註，《臺灣山地傳道記：上帝在編織》（臺北：前衛出版社，2016），頁 222-223。

³⁹ 〈Obing Nawi（蔡專娥，1925-）女士口述〉，收於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 331。

據 1933 年的調查，當時川中島戶口 86 戶，人口僅剩 244 人，其中 75 人罹患瘧疾（マラリア），⁴⁰ 此外還有恙蟲病等風土病，⁴¹ 搬遷初期處境十分艱辛。

遷居至川中島後，日人為興築部落工事——川中島警察官吏駐在所、教育所等所需之勞動力，一度禁止族人們狩獵、織布，直到日方認為情況大致底定才恢復，男子使用的獵刀與女性織布的工具，都是生活穩定下來後才陸續添置。⁴² 傳統賽德克族女孩大約在七、八歲開始學習織布，以自學自通方式從旁觀摩母親或其他親友，有些害怕被家人斥責的女兒，會到鄰居或親友家偷偷學習編織。⁴³ 狩獵方面，搬遷到川中島後日人禁止族人自製獵槍，僅能在上山狩獵前向駐在所申請借出槍枝，陷阱獵則不受限制。⁴⁴ 狩獵、織布通常是透過父祖輩的傳習與母女間模仿學習承繼，但效果則視各家庭環境而異。以狩獵為例，移居川中島後，有些父輩並不希望小孩學習狩獵，然因祖父輩常無法拒絕孫兒請求，而有傳授狩獵、作陷阱等技巧的機會。⁴⁵

表 1 為 1933 年，《高砂族調查書》中川中島社該年度的獵獲收入，對比當時賽德克 Tgdaya 群尚未搬離霧社地區的巴蘭社，川中島社族人在狩獵方面的收益十分微薄，顯見至少在搬遷 2-3 年後，仍甚少進行狩獵。⁴⁶

表 1 1933 年川中島社與巴蘭社獵獲收入比較表（單位：円）

	總額	山羊	鹿	羌仔	猿	山豬	小鳥	獸皮	獸骨	鹿鞭	鹿茸	其他
川中島社	13	0	0	0	0	0	0	8	5	0	0	0
巴蘭社	2,612	314	833	57	23	1,110	3	24	10	130	75	33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二編：生活》（臺北：該課，1937），頁 136-137。

⁴⁰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一編：戶口、內臺人トノ接觸、衛生》（臺北：該課，1936），頁 6、頁 464。

⁴¹ 〈川中島の風土病 恙蟲も居る 當局で對策攻究中〉，《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9 月 4 日，第 3 版。

⁴²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 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頁 220。

⁴³ 曾瑞琳·鐵米拿葳依編著，《泰雅賽德克傳統織布文化》（臺中：鐵米拿葳依，2000），頁 13。

⁴⁴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 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頁 234。

⁴⁵ 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0 年 8 月 19 日，地點：Dakis Pawan 先生埔里住家。

⁴⁶ 族人表示，日治時期由於官方管控槍枝、農忙等因素，老一輩的族人遷居川中島後，不太有機會進行過去那種 2-3 天以上、深入遠山的狩獵，多半是利用農閒空檔在後山進行陷阱獵或捕撈溪中魚、蝦，與日常農耕不大有衝突。反而是戰後初期，因政府對狩獵槍隻管控較寬鬆，族人狩獵頻率較日治後期來得高。參見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4 年 7 月 28 日，電話口訪。



圖 3 1931 年移住川中島初期族人暫居的帳篷（右前方處）。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圖 4 1930 年代中葉川中島社一隅，新建的屋舍後方平坦處為農田。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家屋搭建方式在搬遷至川中島後有不小的變化。根據 1916 年日人調查，傳統賽德克族家屋為半穴式，地下挖掘約 3-4 尺，立柱數十根，屋寬約 3-4 間，屋長約 2-2.5 間，⁴⁷ 牆壁以橫木堆砌，外側再以木頭或竹子固定，並以葛藤網綁。屋頂以茅草或石板覆蓋，地板多以泥土覆蓋，僅有一個入口，窗戶不大，霧社群的家屋甚至不設窗戶。床鋪設在屋內角落，床與床間設有爐火。⁴⁸

霧社事件的餘生者初遷川中島後，先是棲身在日方臨時搭建的帳篷，後依照日方的規劃興築新部落。⁴⁹ 在規劃中，川中島駐在所設在部落制高點，以便監視六社遷居者，家屋則搭建在駐在所下方，日人官舍建築採日式建築，族人們的家屋外觀雖大致維持傳統樣貌，不過在日人禁止下，內部不再向下挖掘，為快速興建，屋頂以鋪設白茅為主，不像過去為求堅固也會採集頁岩搭建。⁵⁰ 1931 年 7 月新建的屋舍全數完工，共 46 戶。⁵¹

移居後的最初幾年，時有族人脫逃的報導。⁵² 如 1932 年曾有一位部落青年，因飼養牛隻與其他族人發生衝突，放火燒屋後往川中島駐在所後方山區逃逸，途中殺害一名出身新竹州太湖的腦丁。⁵³

（三）移居後的土地分配

1931 年「保護蕃收容所襲擊事件」後，官方選定能高郡蕃地、北港溪右岸的川中島，作為餘生者的移居地，彼時已闢有水田 34 甲、園圃 7 甲、原野 96 甲，合計 137 甲的土地。在劃定族人屋舍與教育所、駐在所等官屬用地位置後，於 1931

⁴⁷ 一日尺約 0.33 公尺，一間約 1.818 公尺。換句話說傳統賽德克族家屋向地下挖掘約 0.99-1.32 公尺，屋寬約 5.45-7.27 公尺、屋長約 3.64-4.55 公尺。

⁴⁸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四冊：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頁 43-44、47。

⁴⁹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 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頁 218。

⁵⁰ 陳慧先口訪，〈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0 年 8 月 19 日，地點：Dakis Pawan 先生埔里住家。

⁵¹ 〈川中島移住蕃の蕃屋全く竣成 當局もホツと安堵〉，《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7 月 21 日，夕刊第 2 版。

⁵² 〈脱走した蕃人四名は 各白米二升を携帯 十日餘りの食糧がある模様 霧社警備全線を警戒中〉，《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7 月 30 日，第 3 版。

⁵³ 〈川中島社番丁 放火燒自宅逃去 竝殺害附近腦丁一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6 月 1 日，夕刊第 4 版。

年 5 月 13 日將水田劃分給起事各社餘生者（詳見表 2），園圃及原野則暫訂為各社所有。⁵⁴

表 2 1931 年霧社事件起事餘生各社水田分配面積及當期作的收穫量

舊社名	戶數	人口	水田分配面積	耕作面積	收穫量
Hogo	10	34	2.432 甲	2.400 甲	10.50 石
Drodux	20	93	7.094 甲	3.600 甲	19.50 石
Mahebo	30	71	5.050 甲	3.400 甲	16.00 石
Truwan ⁵⁵	9	21	1.432 甲	2.032 甲	6.40 石
Boarung	27	54	3.700 甲	3.400 甲	28.80 石
Suku	12	25	1.714 甲	1.314 甲	11.20 石
共用試作田	—	—	2.267 甲	1.250 甲	6.25 石
計	108	298	23.689 甲	17.396 甲	98.65 石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頁 6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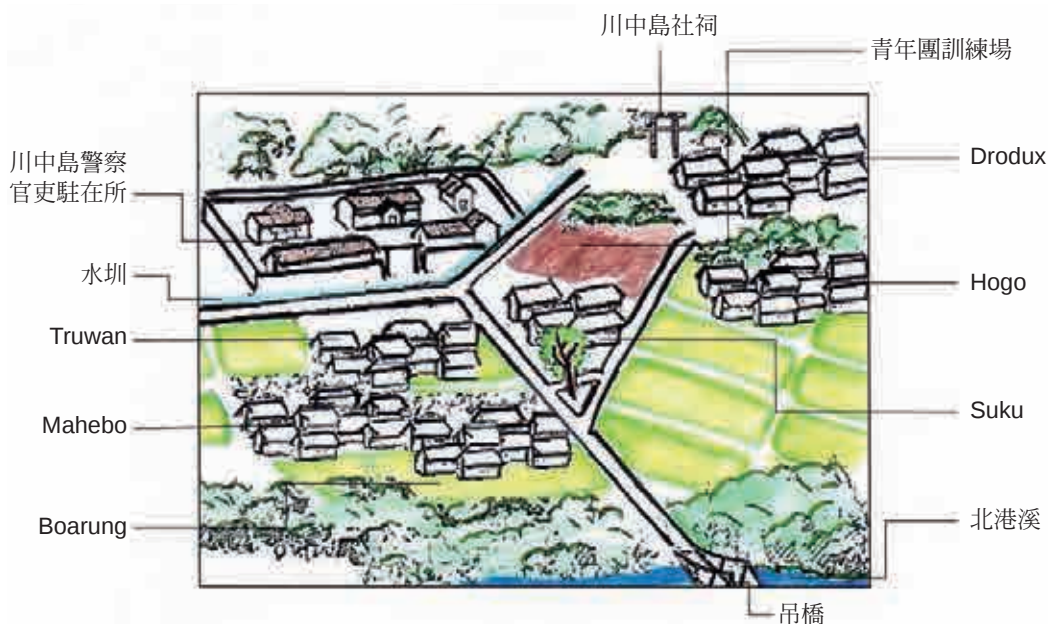


圖 5 日治時期川中島社內部空間分布示意圖

說明：感謝村上優女士同意筆者引用改繪。

資料來源：參考、改繪自村上優，〈日本殖民主義治理中的現代性——成為「模範蕃社：川中島」1931-1945〉，頁 45「圖・三・3」。

⁵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頁 685、691。

⁵⁵ 按：舊塔羅灣社水田分配面積小於耕作面積，似有疑義。

官方最初以原部落為單位分配水田，採共同耕作制。後因集體耕作方式不便，加上有族人對於以人口比例分配糧食的作法感到不平，自 1932 年後改依每戶每人分配水田耕作，每人可分配到的水田約 0.8 公頃，其餘空地平原則自由耕作，生活模式也由共同生活轉為個人生活。⁵⁶

分得水田的位置大致配合遷居後的家屋地點，原 Drodux、Hogo 社的水田坐落在面駐在所右側，原 Truwan、Mahebo、Boarung 社則位於面駐在所左側，原 Suku 社的家屋與農田則鄰近正對駐在所的青年團訓練場（參見圖 5）。⁵⁷

三、周邊族群互動

1931 年臺灣總督府理蕃課調查指出，當時川中島社與 Toda 群與 Truku 群的幾個部落關係敵對。⁵⁸ 賽德克族內部分為三個語群：Truku、Toda、Tgdaya，霧社事件起事的一方屬 Tgdaya 群，即日治時期日人所稱的「霧社群」，霧社群共有 11 社（原為 12 社，但在起事時已減為 11 社），⁵⁹ 其中六社參與霧社事件起事。起事六社的原居地在日人安排下，於 1932 年重新分配給事件中的「友蕃」——Toda 群與 Truku 群。對官方而言，一方面可安定「親日蕃」生活，另一方面有利未來的「理蕃」教化。⁶⁰

至今，外界對於「霧社事件」中抗日與非抗日方仍有些想像，認為事件後兩方將持續敵對關係。然而，就族人內部觀察，老一輩族人的思考邏輯，是以傳統 Gaya 來看待此事——賽德克語傳統語彙中並無「仇恨」的同義詞。由於祖居地地緣關係，Tgdaya、Toda、Truku 三語群，彼此早有往來，除工作接觸外，也相互通婚。霧社事件期間，在官方策動下，抗日方與非抗日方一度敵對，但幾年後雙

⁵⁶ ヒボ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実編譯，《霧社緋櫻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頁 83、155-156、230。

⁵⁷ 至於林野地部分，則以眉原溪為界，眉原溪左岸的山林由原 Drodux、Hogo、Suku 社使用，右岸歸原 Truwan、Mahebo、Boarung 社。參見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4 年 7 月 28 日，電話口訪。

⁵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臺北：該課，1938），頁 134。

⁵⁹ 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頁 14-16。

⁶⁰ 〈霧社反抗蕃佔有地處分と味方蕃の移住〉，《理蕃の友》1: 10（1932 年 10 月），頁 5。

方隨即恢復通婚，特別在戰後因為宗教關係，化解雙方嫌隙。⁶¹ 早年訪談者觀察到：族人們頂多提到不願意再返回傷心地，而未聽聞表達對 Truku 群或 Toda 群不諒解。⁶²

遷居川中島的族人，與同處北港溪流域、鄰近的泰雅族眉原部落，以及 1939 年由巴蘭社等社遷住中原部落的賽德克 Tgdaya 群族人往來親密。⁶³ 此外，也與鄰近的梅子林（今南投縣國姓鄉北港村）漢人聚落頗有往來。

（一）眉原

1931 年「霧社事件」餘生者初抵「川中島」時，眉原是附近唯一的原住民部落，屬於泰雅族。眉原（Mb'ala）社位居北港溪流域，1923-1925 年間由北港溪中游數社集中合併而成，其中包括參與 1920 年 Slamaw 事件的部分泰雅族人，由於霧社群曾在日人策動下協助攻擊 Slamaw，為此日方在遷徙前事先徵求眉原族人同意，並由眉原社頭目協助勸說六社族人同意移居川中島。⁶⁴ 為使眉原與川中島族人和睦，1931 年 5 月 8 日，官方準備酒與鹹鱒魚等禮物，邀請眉原社族人至川中島舉行交歡典禮。遷居初期，眉原社族人除提供川中島社族人日常用品、食物外，還協助建造住屋、開闢耕地。待生活逐漸步入正軌後，川中島社族人透過饗宴，以及賠補 Gaya（族律），在川中島宴請眉原部落的族人，往後幾年也會在年底擇日款待，⁶⁵ 兩社關係友好，族人之間亦有通婚。⁶⁶ 戰後初期眉原一度與清流、中原一同編入互助村，後才隸出新生村。⁶⁷

據族人口述，戰後居住在梨山的 Slamaw 族人，曾趁日人離臺之際，計畫攻打清流部落，以報 1920 年 Slamaw 事件之仇。當時清流部落與鄰近同為賽德克族

⁶¹ 郭明正，〈專題演講：霧社事件後——川中島的人事物〉，時間：2020 年 4 月 20 日 10:10-12:00，地點：國立中興大學人文大樓 203-2 室。

⁶² 簡鴻模，〈Alang Gluban（清流部落）生命史研究〉，收於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 49。

⁶³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頁 134。

⁶⁴ ヒボ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実編譯，〈霧社緋櫻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頁 153。

⁶⁵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頁 690；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 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頁 234。

⁶⁶ 例如族人 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的外祖父即是來自眉原的泰雅族人，外祖母則為霧社事件後遷居川中島的賽德克族人。

⁶⁷ 葉高華，〈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頁 269。

的中原部落一時人心惶惶，甚至已作好應戰準備。所幸後來經眉原部落泰雅族人居中斡旋、勸阻，向 Slamaw 族人表達清流、中原、眉原三部落和睦共處之現況，才化解此一衝突。⁶⁸

（二）中原

與清流部落族人同屬賽德克族 Tgdaya 群的巴蘭、タカナン、カツツク等社，在 1938-1940 年亦被遷至北港溪流域。賽德克族 Tgdaya 群中未加入反抗方的巴蘭等社，是霧社事件後霧社群中少數留在原社的部落。不過，為興建濁水溪電力工程（今萬大發電廠前身），日人將巴蘭等社遷至眉原與川中島間的「中原」，⁶⁹並在 1940 年 6 月舉辦盛大的遷住儀式。濁水溪的電力工程堰塞河流形成碧湖，淹沒原巴蘭社良田 15 甲、旱田 60 甲，該社 144 戶 661 人全數被遷往「中原」。族人對原有良田沒至湖底感到不捨，加上中原部落較原居地低約海拔 600 多公尺，酷暑與瘧疾等問題令許多族人甚為不滿。規劃作為中原部落的土地，原有 20 幾戶本島人農家，時已開拓 40 餘甲美田，經官方收買後，作為巴蘭等社族人的遷居地。⁷⁰

附帶一提，由於中原部落一帶海拔較低、遠離傳統獵場，加上耕地有限與水土不服等問題，日本戰敗離臺後，族人出現幾波遷移潮。1950 年 3 月，臺中縣政府向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報告，說明：「仁愛鄉互助村中原社山地人民二十餘人擬遷回原地」。然而，當時臺灣省民政廳的回覆是：「中原社村民，如再遷回原地，不特有礙進化，且影響護林，如該社耕地不敷，生活困難，應另擬計畫呈請擴充新地，或移住較妥地」。⁷¹ 否決族人遷回故地。中原部落戰後第一波遷移潮主要搬遷至離祖居地較近的眉溪。第二波移民潮在 1950 年代，移居至清流部落附近的梅子林，土地是透過當時南投縣議員高愛德（Awi Hepah、田中愛二，1916-

⁶⁸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 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頁 250-253。

⁶⁹ 〈理蕃ニュース〉，《理蕃の友》8: 10（1939 年 10 月），頁 8。

⁷⁰ 〈巴蘭社的遷村〉（1940 年 8 月），收於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編、黃幼欣主編、陳瑜霞譯，《〈理蕃之友〉中文初譯本·第三卷：第七年六月號-第十二年十二月號（1938 年 6 月-1943 年 12 月）》（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6），頁 210。

⁷¹ 〈據報該縣仁愛鄉互助村中原社山地人民二十餘人擬遷回原地等情希知照由〉（1950 年 3 月 28 日），〈山地人民移住案〉，「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440012152002。

1996)⁷² 介紹，向平地人購買。第三波遷移潮則在 1960 年代，1959 年八七水災土石流重創中原部落，不少族人搬離日治時期家屋，形成新聚落——中原新村。⁷³

相較之下，清流部落族人則未在日本政府離開後，企圖搬離新部落。族人認為：清流部落位於北港溪與眉原溪沖積台地，地理環境條件較好，八七水災時不像中原部落耕地受到嚴重的損害。此外，搬遷至清流部落的霧社事件六社遺族，對事件後結合的新部落有很強的向心力。⁷⁴ 中原部落與清流部落族人間通婚頻繁，加上戰後隸屬同一行政區劃（互助村）、教會（中原天主教教會）與教育機構（互助國小），雙方往來密切。

（三）梅子林

除前述眉原部落泰雅族人、中原部落賽德克族人，族人們也與週邊的漢人頗有接觸。⁷⁵ 物資採買除前往埔里，也會就近至國姓採購，特別是鄰近的梅子林。梅子林一帶的客家人，部分是原本居住在川中島的漢佃，被迫遷離後又輾轉回到鄰近川中島的梅子林墾居。1931 年，官方以彰化北斗郡二林庄官有地交換川中島一帶土地，與原地主達成協議，但並未與實際在該地耕作生活的佃農交涉。老一輩清流族人表示初入川中島時，見漢佃不得不放棄拓墾已久的土地，慌忙趕著水牛橫渡北港溪，而有感於雙方同處無奈境遇。由於用來交換的二林官有地近海，土地條件、自然環境與川中島相差甚大，部分佃農之後又返回川中島附近的梅子林從事農作。⁷⁶

位於國姓鄉的梅子林與清流部落兩者僅一橋之隔，早年山地管制期間在今

⁷² 原 Hogo 社人，曾歷經霧社事件，日治時期任警手、青年團團長，戰後初期受訓後任職警察，後當選第 6 屆仁愛鄉鄉民代表大會主席、第 5-7 屆南投縣議員。1951 年創辦山民汽車客運公司（後改組為南投汽車客運公司）任董事長，並投資羽毛球拍公司以及泰雅渡假村。參見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 71-72；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志》，頁 142、152；〈盜伐仁愛山林案，高愛德報告經過〉，《商工日報》，1955 年 3 月 1 日，第 4 版。

⁷³ 簡鴻模、依婉·貝林，《中原部落生命史》（南投：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2003），頁 51-52。

⁷⁴ 陳慧先，〈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0 年 8 月 19 日，地點：Dakis Pawan 先生埔里住家。

⁷⁵ 陳慧先，〈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0 年 8 月 19 日，地點：Dakis Pawan 先生埔里住家。

⁷⁶ ヒボ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実編譯，《霧社緋櫻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頁 154-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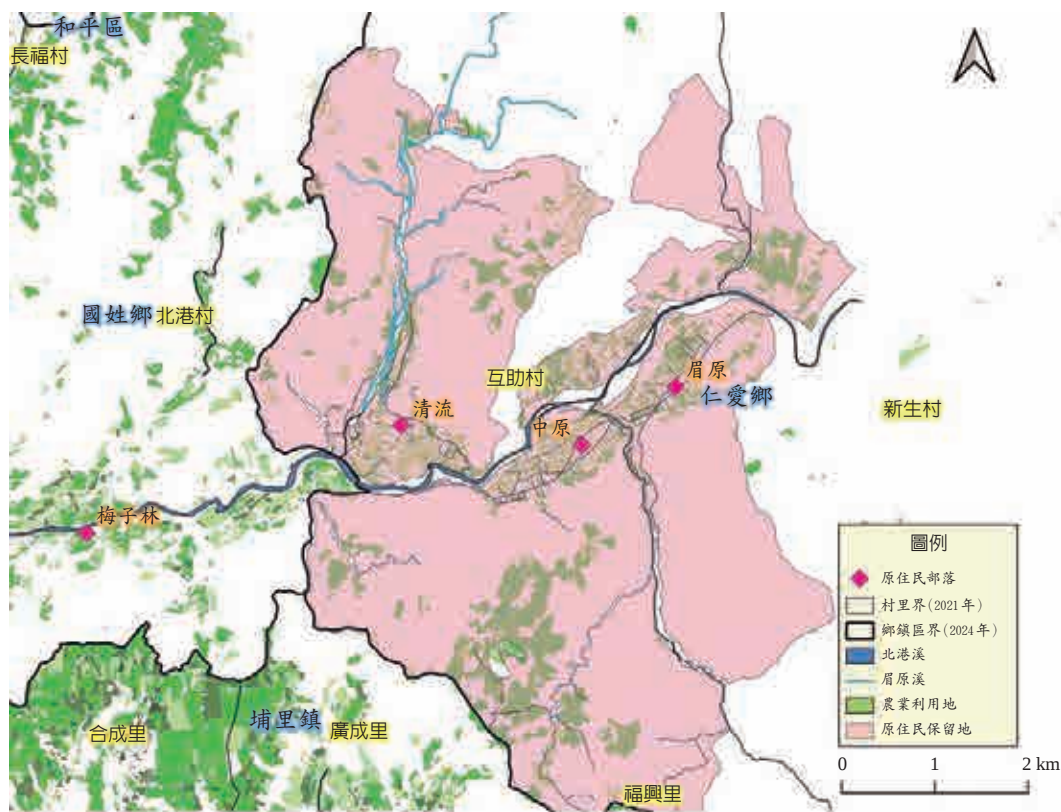


圖 6 清流部落與周邊聚落相對位置圖

說明：李進億繪製。

資料來源：國土繪測服務雲，下載日期：2024 年 7 月 18 日，網址：<https://maps.nlsc.gov.tw/T09/mobilemap.action>。

「梅林橋」邊設有檢查哨，但梅子林居民可自由出入清流部落，不像一般外地人須申請入山證。早年（1950 年代）北港村梅子林一帶漢人會進入部落工作，例如協助開闢新田，或採收香茅草等。⁷⁷ 現居梅子林、高齡 94 歲的謝金妹（1929-）女士，出生於川中島，其父原為新竹新豐人，日治時期遷至川中島務農。1931 年舉家遷居彰化二林，太平洋戰爭期間為躲避空襲，與家人徒步回到近山的梅子林。據她口述：剛到梅子林時沒田沒地、生活貧困，清流族人 Bakan Walis（邱寶秀，1909-1993）⁷⁸ 對他們相當照顧，並提供稻米、金錢等幫助，後承租族人在川中島

⁷⁷ 陳慧先口訪，〈Lubi Mahung（張呈妹）女士口訪紀錄〉、〈Puhuk Walis（桂文同，1946-）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2 年 8 月 18 日，地點：清流部落。

⁷⁸ Bakan Walis 的公公 Bagah Pukoh 是 Durodux 之頭目，是霧社事件起事六社中唯一活著到川中島的头目。

後山的保留地務農，也開過麵店、作饅頭與部落族人交換稻米。⁷⁹ 清流部落族人表示過去在稻米收成後，有些人家會將部分稻米送到梅子林的理髮店，作為家人一個年度的理髮費用。⁸⁰

無論是清流部落族人，或是長年居在梅子林的受訪者，均透露戰後初期擁有水田耕作的清流族人，生活較鄰近的梅子林有餘裕，「稻米」是早年族人們與外界交易的重要物資。接下來的一節，將闡述清流部落族人移居川中島後從事水田稻作的情形。

四、「農耕民化」⁸¹ 下的水田稻作

日治初期，官方即有獎勵原住民從事農耕取代狩獵，使其漸成「良民」的農耕民化統治方針。⁸² 而《高砂族調查書》更敘明官方將霧社事件餘生者遷居川中島的理由之一，即是「希望將反抗蕃遷至霧社以外之地，透過教化善導，使其成為純樸農民，進而矯正其殺伐風氣，以除禍根」。⁸³

1931 年底因應霧社事件爆發而頒布的「理蕃政策大綱」，重申鼓勵集約定地耕作與集團移住，⁸⁴ 「水田化」與日治後期集團移住政策緊密扣連。根據陳秀淳的研究，水田稻作未必比原住民傳統輪耕農業方式適合山林，統治者推行水田稻作政策的背後，除森林保育、改善原住民生計外，更有政治上的考量。⁸⁵ 無論如何，近代國家透過水稻技術、水圳設施的引入，達到使原住民定耕、定住等目標，

⁷⁹ 陳慧先，〈謝金妹女士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3 年 11 月 30 日，地點：謝金妹女士梅子林住處。

⁸⁰ 張進昌（Mona Pawan），〈賽德克清流部落社區營造策略之研究〉，頁 84。

⁸¹ 此處使用「農耕民化」一詞，援引自前人研究者近藤正己、陳秀淳等之用語。參見近藤正己，〈台灣總督府の「理蕃」体制と霧社事件〉，頁 48；陳秀淳，〈日據時期臺灣山地水田作的展開〉，頁 11、20。

⁸² 例如 1895 年民政局長水野遵在〈臺灣行政一斑〉意見書於殖產部份有關撫育原住民項，已提及可撥予土地耕種使其漸成良民；1907 年時任警察本署代理署長的大津麟平提到，狩獵是原住民「兇暴」精神延續的主因，應以農事漸次取代之。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理蕃誌稿：第一編、第二編〉（臺北：該署，1918），頁 4、532；陳秀淳，〈日據時期臺灣山地水田作的展開〉，頁 25。

⁸³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頁 154。

⁸⁴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4），頁 262、265。

⁸⁵ 陳秀淳，〈日據時期臺灣山地水田作的展開〉，頁 3-6、77。

不僅在過程中改變部落原本內部權力結構，也使其生產模式、歲時祭儀、財產觀念與社會秩序產生巨大改變。⁸⁶

傳統上賽德克族人的耕作方式採刀耕火種，一般而言選擇陽光充足、坡度較緩處開墾。約在秋天除草、砍樹，待曬乾後焚燒，接下來翻土、整平土地、播種。通常第一年種粟、第二年植稻、第三年播黍、第四年則種植地瓜與樹豆(sunguc)，若土地較肥沃，則連續播種粟或稻兩年，待土地貧瘠後改種榛樹，廢耕 5-6 年甚至 10 年，待榛樹長大後再重複進入新的循環。1910 年代中葉，日人已獎勵賽德克族人水田耕作，但因環境不合適而收穫欠佳，加上族人認為在水田工作容易致病，對於水田稻作並無好感。⁸⁷ 根據 1929 年該年度的統計資料，在霧社事件發生前，霧社地區的水田耕作面積有 14 甲，生產量 210 石，產值約 4,200 日圓。⁸⁸ 官方對霧社賽德克族人的「授產」，除水田外，還包括畜牧與養蠶，在 1929 年「蕃人牧牛數」為 623 頭，收繭量為 330.644 貫（約 1,240 公斤），產值約 1,717 圓。⁸⁹

（一）移居後的部落農作

雖然官方在 1910 年代中葉已在霧社地區向賽德克族人推廣水稻種植，不過，移居川中島初期，族人們表現出對水田稻作缺乏經驗，無法維護移居前該地原有之水稻，加上部分土地缺乏水源，實際可耕作面積低於官方分配的水田面積。⁹⁰ 日本當局隨即著手指導水田稻作，並提供農具與耕牛。根據 1932 年末調查：移居之初二期稻的收成，較原該地本島人種植時期減少約三成。除水稻外，作物還

⁸⁶ 吳明季，〈價值、參與和主權：臺灣原住民部落發展實踐的三個面向〉（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22），頁 122。

⁸⁷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四冊：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頁 51。

⁸⁸ 生駒高常，〈霧社蕃騷動事件調查覆命書〉，頁 379。

⁸⁹ 一貫為 3.75 公斤，換算該年度收繭量為 1239.915 公斤。1916 年能高郡霧社駐在所某巡查自日本購回蠶種試種，成績優異，隔年即由南投廳農會配發蠶種，交由負責撫育的警察輔導原住民飼養，初期推廣成效不佳，而後漸入佳境，甚至有原住民婦女主動要求養蠶。1924 年能高郡霧社養蠶指導所成立，由於短時間即可獲得相當之收益，至 1926 年位於較深山部落亦已普及。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五編》（臺北：該局，1938），頁 1085-1086；生駒高常，〈霧社蕃騷動事件調查覆命書〉，頁 379。

⁹⁰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頁 685、691。

包括陸稻、小米、甘藷及芋頭。⁹¹

移居初期，部落內飼有水牛 44 頭、黃牛 17 頭、豬隻 6 頭，每戶平均飼養雞隻 4 隻左右，除官方配給外，部分由埔里街家畜市場購入，而在調查之際尚無養蠶業與林產品，部落現金收益主要來自「出役」以及「木炭」等收入。⁹²

原居霧社地區的賽德克族人，是以坡地輪作為主，須重新學習適應水田稻作的耕作模式。如前節所述官方最初以原部落為單位分配水田，採取共同耕作制。每日上午八點鐘，由警察集結族人們至駐在所前庭點名，分水稻除草組、畦路修補組、採集建築用材三組進行工作。後因集體耕作方式不便，1932 年改將水田分配每戶每人耕作。⁹³ 至 1933 年，川中島社可耕作水田已有 28.13 甲，平均每戶 0.327 甲、每人 0.115 甲，對比同年《高砂族調查書》各族水田數平均每戶 0.362 甲、每人 0.059 甲，川中島社每人可使用之水田超出各族每人平均數近 2 倍。⁹⁴

表 3 是 1933 年，川中島社與仍居住在霧社地區的巴蘭社農產收入之比較，可以看到該年川中島水稻生產量增至近 340 石（1931 年為 98.65 石，參見表 2），是主要作物之最大宗，而小米、陸稻等傳統作物產量甚低，與巴蘭社農產類別形成對比。此外，當時川中島社內已種植香蕉、玉米等作物。

表 3 1933 年川中島社與巴蘭社農產收入比較表

	水稻 （石）	陸稻 （石）	粟 （石）	甘藷 （斤）	里芋 （斤）	玉蜀黍 （石）	小豆 （石）	蔬菜 （斤）	香蕉 （斤）
川中島社	339.62	00.0	005.50	024,200	4,600	0.48	03	240	480
巴蘭社	082.32	83.5	910.95	288,400	3,900	0.00	20	000	00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二編：生活》，頁 34-35。

⁹¹ 〈蕃人所要調查書：臺中州能高郡川中島社〉（臺北帝國大學手抄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下載日期：2024 年 7 月 26 日，網址：<https://dl.lib.ntu.edu.tw/s/forest/item/94088#?c=&m=&s=&cv=>。

⁹² 移居川中島前，在霧社地區族人已飼育相當數量之家畜，包括：牛、豬、山羊、雞等，為個人所有。後因霧社事件爆發，逃難、移居過程中被迫棄養多數家畜。參見〈蕃人所要調查書：臺中州能高郡川中島社〉。

⁹³ 依高永清回憶錄的說法，每人分配有 0.8 公頃的水田，而根據〈蕃人所要調查書：臺中州能高郡川中島社〉記載每戶分有 0.1 甲。參見ヒポ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実編譯，《霧社緋櫻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頁 83、155-156、230。

⁹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二編：生活》，頁 506、510。

1934年6月,《理蕃之友》刊載兩則來自川中島給警務局警務課課長森田俊介(1899-1980)的信件內容。其一是時任警手的中山清(高永清,1914-1982)⁹⁵致信報告部落近況:

蕃社社眾都很好……每天白天外出到田裡耕種,每天到很晚集合在教育所,熱心地學習國語,田裡滿滿都是綠油油的稻穗波浪、小米。帶有香味的微風吹動,大家都非常高興。蕃社的風氣也變好,3年前遷移當時不好的想法、散不開的心情都遠離而去。好像轉世過來的爽朗笑聲到處聽得到,蕃社眾人都說,就像重生一樣。

其二是霧社事件起事六社唯一存活的頭目 Bagaha Pukoh(Drodux 社人,1882-1950)同年5月所寫,提到搬遷之初族人原本都擔心會被滅口,沒想到反而得到許多水田與旱田,過著幸福的生活,並透露當時正在進行第一期稻作水田除草工作,表示該年雨水充足、水稻長得很好,信中還邀請警務課課長於稻米收成時至部落一遊。⁹⁶ 理蕃機構機關報刊載該信雖可能帶有宣傳意味,但多少反映搬遷三年後族人已漸適應新環境與水田稻作生活。

(二) 水圳的興築與修復

水圳是從事水田稻作不可或缺的水利設施,也是當代清流部落重要地景。相較於臺灣平地社會,多數山地部落採行定耕,使用水圳的歷史並不長。僅蘭嶼達悟族人栽種水芋築有灌溉水路,及平埔族與漢人接觸後種植水稻亦興築水利設施,而東海岸與花東縱谷中段地區阿美族人興築的水利設施,則多半在「開山撫

⁹⁵ 漢名高永清,族名 Piho Walis。賽德克 Hogo 社族人,霧社事件後與族人遷居川中島。1932年在日人安排下與花岡二郎遺孀 Obing Tado 結婚,初任警手,後於1941年升任乙種巡查、1942年取得乙種「限地醫」的醫師資格,戰後當選第一任民選(此前為官派或由鄉民代表間接選舉選出)仁愛鄉鄉長並連任一屆(1951-1957),曾任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議員、臺灣省議會第一屆議員(1957-1960),省議員任期屆滿後,返回仁愛鄉故里,繼續在衛生所服務,1970年公職退休,爾後於廬山溫泉經營碧華莊旅館,從事觀光事業。參見ヒポ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実編譯,《霧社排櫻の狂い咲き: 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頁188-189;〈議員小傳: 高永清〉,「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下載日期:2023年4月13日,網址:<https://drtpa.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⁹⁶ 〈蕃社消息〉(1934年6月),收於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編、黃幼欣主編、陳連浚譯,《〈理蕃之友〉中文初譯本·第一卷:創刊號-第四年四月號(1932年1月-1935年4月)》(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6),頁332。

番」後的 1870、1880 年代開展。由於多數居住在中央山地的臺灣原住民，傳統上多以旱田耕種小米、陸稻、地瓜等作物為主，早期並不如漢人重視水利，規模較大、有組織的水利建設，大抵要到日治時期才完成。⁹⁷

川中島的狀況則較為特殊，在被官方選定作為移居地前，該地已鋪設水圳。第一節述及之吳宗敬，曾於 1919 年向臺灣總督府申請「埤圳新設」，命名「眉原圳」，計畫引「眉貓冷溪」灌溉，費用由申請人出資估計耗資 10,684 圓 85 錢 9 厘、總圳長 4,739 間（約 8,615.502 公尺，參見圖 2），⁹⁸ 範圍涵蓋今清流部落。但在族人遷居川中島時，該地水源仍不足以供給境內全數農田。1931 年霧社事件餘生者移居經費清單，列有一筆 16,000 日圓的眉原及川中島的水路開鑿費，佔移居總金額 44,427 日圓的 36%。⁹⁹ 1932 年 8 月，社內圳路遭洪水摧毀，官方耗資 6,150 日圓於隔年 3 月修復，當時已同時引入北港溪與眉原溪水。¹⁰⁰ 根據《臺灣總督府埤圳調》〈臺中州管內埤圳調〉紀錄，至 1937 年 3 月「川中島埤圳」，可灌溉兩期作田 50.13 甲，是當時能高郡轄內「蕃人圳」中灌溉面積最大，在臺中州管內則僅次於新高郡的「口口ナ（羅娜）埤圳」。¹⁰¹

水圳的維持與管理並非易事，特別是在二戰結束後，經歷戰爭與政權交替，許多原鄉水圳毀損，水利設施無法持續運作。由於早年山地鄉水利工程並不屬於一般農田水利會業務範圍，通常透過山地鄉公所的土木技師負責工程設計，由農復會審核，再經由技師進行小型工程。¹⁰² 1952-1953 年間清流部落境內的水圳「清流圳」，集水面積約 2,500 公頃，水路長 1,730 公尺，水路破損程度中等，可灌溉面積僅有 26.47 公頃，評估工事所需人力為 8,000 人，經費約 121,600 元，修復後可再增加 51.13 公頃之灌溉面積。¹⁰³

⁹⁷ 王世慶，〈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收於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 131、174；陳鴻圖，《臺灣水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頁 173-177。

⁹⁸ 「埤圳新設認可ノ件」（1922 年 1 月 1 日），典藏號：00007158001。

⁹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頁 691。

¹⁰⁰ 〈蕃人所要調查書：臺中州能高郡川中島社〉。

¹⁰¹ 〈臺中州管內埤圳調〉，《臺灣總督府埤圳調》（昭和 12 年 3 月），引自〈日治初期台灣埤圳調查與台帳台帳〉，「臺灣水圳文化網@Sinica」，下載日期：2022 年 8 月 16 日，網址：<https://gis.rchss.sinica.edu.tw/canal/archives/date/2017/05/>。

¹⁰² 李力庸，〈從改善生活到組織山地：山地定耕農業的政策與推廣（1945-1960）〉，頁 78。

¹⁰³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山地定耕基本調查》（臺北：該廳，1954），頁 92-93。

戰後清流部落水圳曾多次興修。1954年3月25日，出身清流、時任仁愛鄉鄉長的高永清在水圳通水典禮致詞表示：「改善山胞生活皆賴于水利設施，此工程遠於民國四十一年曾屢次晉省陳述，後幸蒙農復會、水利局等補助，今能順利完工係村民熱烈幫忙所致」。雖獲農復會、水利局經費補助，但工程進行仍須仰賴村民義務勞動，包括搬運水泥、砂石，以及塗工，當時清流部落約有56戶，每日動員近百位15-50歲男、女，待水圳修復完工後，每年稻穀年收穫可達25萬5千公斤。¹⁰⁴ 1962年，另有一則有關清流部落水圳竣工的報導。¹⁰⁵

Lubi Mahung (張呈妹, 1941-) ¹⁰⁶ 女士記憶中，至少親身經歷三次部落水圳修建：

第一次修水圳，大概是國小的時候，我們的父母親都要去背沙子、小石頭，水圳的水泥很厚，材料是政府發的。八七水災以後，水圳壞了，又做了一個新的。以前是用眉原那邊的水，叫 mb'ala，現在用的是北港溪的大河流。以前的水圳壞了是政府做，但中間我們要自己修理，全部落的人一起去修。經費可以向政府申請，但不一定每年有。不需要交水租，就直接用。水不夠，也會搶水呀，通常是輪流，會講好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那邊，早上到中午是這邊……。¹⁰⁷

興築水圳與平日的維修，主要透過動員全部落族人協力「出工」。從日治到戰後，清流部落水圳曾多次毀損，水源主要引自眉原溪與北港溪水，受溪水多寡影響時有異動。

山地鄉水圳經費來源、水權性質都與平地農村不同。依「山地灌溉工程辦法」，普通工由地方出工辦理，其餘技術工及材料費則由省府補助興辦，編列水利局山地水利工程預算。¹⁰⁸ 1958年山地行政檢討會議決議，山地水利工程費用在10萬

¹⁰⁴ 〈仁愛鄉清流圳，舉行通水典禮：山胞老幼歡欣若狂〉，《臺灣民聲日報》，1954年3月28日，第4版。

¹⁰⁵ 〈仁愛鄉互助村，三大工程今日竣工〉，《臺灣民聲日報》，1962年10月13日，第4版。

¹⁰⁶ 戰前日名安田ミエ子，互助國小、「霧社農校」畢，祖父 Bagah Pukoh 為原 Drodux 社頭目，生父 Takun Bagah (邱安田) 是戰後第一任官派村長。莫那·魯道之女馬紅·莫那遷至川中島後未再生育兒女，據 Lubi 女士的家人表示，由於馬紅·莫那希望收養出身頭目家庭的小孩，因而多次拜託 Lubi 女士的母親割愛，後如願收養 Lubi Mahung。

¹⁰⁷ 陳慧先口訪，〈Lubi Mahung (張呈妹) 女士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2年8月18日，地點：清流部落。

¹⁰⁸ 〈臺灣省政府令(48)423府民字四號字第26837號〉，收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原住民族

元以下者，免送農復會審核，以爭取時效。¹⁰⁹ 1960 年省府公布「臺灣省山地鄉小型水圳暨簡易飲水工程養護辦法」規定：以受益人出工辦理為原則，並依受益土地面積大小、受益人口多寡徵收材料費（以不超過該工程所需養護材料為限），因風雨意外必須緊急搶修時，先由鄉公所墊付，若損壞程度超過養護費應編擬預算報主管機關撥付。¹¹⁰ 由於山地原鄉水圳不隸屬農田水利會，族人雖不像平地農民需要繳交水租（即農田水利會會費），不過仍須繳交水圳養護材料費。

高永清擔任省議員任內，曾就水圳、水權問題提出質詢。由於山地鄉水圳並未登記水權，也沒有固定的主管機關，大抵由各地鄉公所管理。為避免用水糾紛引發爭議，建議省政府應妥善處理山地鄉水圳水權的問題。¹¹¹ 從省議會的會議紀錄中可以看到多位原住民籍議員，如章博隆（1915-2019，臺東阿美族人）、陳學益（1929-2003，Sibu Pihu，花蓮秀林太魯閣族人）、黃國政（1916-，花蓮秀林人）等，都曾多次針對水圳興建、修復提出質詢，突顯戰後山地水利經費不足、水利主管機關與農牧部門未能互相配合，以及山地水圳修築技術人才缺乏等諸多問題。¹¹²

清流部落境內水圳，除 1931 年前已興築之部分水路，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新闢水圳，經費主要來自官方或相關單位補助，並仰賴族人在水圳興築期間動員部落青壯人口「出工」、參與平時的維護。清流部落至近年（2019 年）才隸屬南投水利會灌溉區，在此之前長期面臨灌溉、排水設施無法逐年更新，加上水圳取水口、溝渠與管線位於山區，常因颱風、豪雨坍方等阻斷供水，¹¹³ 遇到規模較大毀損，無法及時修復。

料彙編 3：臺灣省政府公報中有關原住民法規政令彙編（1）》（南投：該會，1998），頁 1237。

¹⁰⁹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代電（47）101 民丁字第 187847 號〉，收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3：臺灣省政府公報中有關原住民法規政令彙編（1）》，頁 1237。

¹¹⁰ 〈臺灣省政府令（49）411 府民字第 18407 號〉，收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3：臺灣省政府公報中有關原住民法規政令彙編（1）》，頁 1239。

¹¹¹ 〈請政府設法整理山地鄉農田灌溉水〉（1957 年 6 月 2 日），《臺灣省議會議事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2-03-01OA-02-6-4-0-00350。

¹¹² 〈請政府提前興建臺東縣長濱水圳以利生產案〉（1967 年 5 月 15 日）、〈一、請在山地鄉保留地興建水利設施〉（1968 年 6 月 3 日）、〈請政府派員赴各山地鄉調查偏僻地區水圳堤防之施設情形案〉（1961 年 11 月 20 日），《臺灣省議會議事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3-03-09OA-01-5-3-03-05293、003-04-01OA-03-6-4-0-00382、003-02-04OA-01-5-3-03-05314。

¹¹³ 佟振國，〈部落頭香！仁愛鄉互助、新生村明年納入水利會灌區〉（2019 年 4 月 26 日），「自由時報電子報」，下載日期：2024 年 10 月 26 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71707>。

（三）水田稻作的戰後延續

1945 年二戰結束，經歷戰爭與政權交替，由於水利設施無法持續運作，加上統治政權強制力消失，不少部落隨即放棄水田稻作，回復傳統雜耕方式——在耕地上同時種植小米、蔬菜，以及其他如芋頭、蕃薯等雜糧作物，滿足絕大部分生活所需糧食。有別於上述情形，戰後清流部落持續從事水田稻作。為推行山地定耕，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於 1952 年 6 月起耗時一年，動員各縣山地室與鄉公所的農林技術人員調查山地農耕狀況。1950 年代初期，互助村（包括現今的清流部落與中原部落）定耕面積為 108.54 公頃（含水田 74.01 公頃、旱田 34.53 公頃）。¹¹⁴

1955 年臺灣省立農學院（今國立中興大學前身）園藝系，在農復會經費資助下，針對臺灣中部山地園藝資源進行調查，同年 9 月 12 至 21 日於南投縣仁愛鄉進行田野調查。¹¹⁵ 領隊臺灣省立農學院園藝系教授程兆熊（1907-2001）¹¹⁶ 對 1950 年代中葉清流部落有以下的描繪，記錄戰後初期清流部落富饒美好的農村景緻：

……過一個吊橋，在很多水田間一直走，就到了清流。居住在清流的山胞又較中原山胞來得富足。那是因為眉原、中原、清流三個地方，都是位於能高山下一個大山谷間，而這一大山谷，在溪水穿過著的兩旁，很是平坦，愈下愈闊，清流則位於最平闊處。在清流部落的房屋旁有一股清流，那真是清的可愛。水流很急，直下與溪流相會合。……我們在眉原、中原和清流那一帶，盤桓了一日，雖然對我們所要調查的山地園藝資源上，沒有甚麼足資注意的事，但在眼面前，卻分明呈現了一個美妙的鄉村……。通常對一個鄉村而言，水田是一件重要的事，水田讓人定著，而又為「富」之

¹¹⁴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山地定耕基本調查》，頁 4、5。

¹¹⁵ 臺灣省立農學院園藝系，《臺灣省中部山地園藝資源調查報告》（臺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56），頁 7。

¹¹⁶ 程兆熊，江西貴溪縣人，臺灣省立農學院園藝系創系系主任。原就讀中山大學物理系轉園藝系，後取得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與凡爾賽國立園藝學院（Ecole Nationale d'Horticulture）工程師。來臺後數度與園藝系師生調查臺灣山地園藝資源，並由農復會（現農委會前身）出版調查報告，經考察、實驗支持臺灣山地種植溫帶果樹，有「臺灣蘋果之父」美譽。於香港與錢穆、唐君毅等人創辦新亞書院。參見〈臺灣山地資源調查的一闕牧歌〉，「豐年社農傳媒」，下載日期：2023 年 4 月 3 日，網址：<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78036>；程兆熊，《臺灣山地紀行》（新北：華夏出版有限公司，2022），書封作者簡介。

所出……。¹¹⁷

……水田裡有的還有鯽魚，水都是活水，於在清水的禾苗裡游來游去。在平地稻田已經夠美麗了，在山地，稻田尤有說不出的美。¹¹⁸

1956年，臺灣省立農學院園藝系的調查報告書指出：清流部落的水稻栽培較其他山地為佳，定耕程度亦高於他處，一年二穫、水田面積達47甲。¹¹⁹此次調查，目的在評估臺灣山地溫帶園藝物產發展，然清流一帶由於海拔較低，不利發展溫帶山地園藝資源，也因此在此後臺灣山地推廣溫帶作物階段未能參與其中。

根據李力庸的研究，戰後至1980年代臺灣的山地農業發展，大抵可以分成兩個階段：1945-1960年，延續日治時期模式，推廣梯田與水田稻作定耕；1960年後，開發高山果樹、高冷蔬菜及畜牧業。前期的山地定耕農業，延續日治時期的山地水田政策，成本甚高、生產效益卻不如預期。¹²⁰相較之下，清流部落有別於多數位於日治時期「蕃地」的部落，屬從事「水田稻作」較成功的例子。清流部落位於海拔498公尺的河川沖積臺地，坐落於眉原溪沿岸、北港溪中游最寬闊處，水源相對充足，先天環境條件相較其他位於高海拔部落更適宜水田稻作。對比居住在霧社山區的族人，如Truwan溫泉區（春陽，海拔約1200公尺）一帶，日治時期在官方強制推廣下雖曾一度出現水田，但僅侷限於特定地區，由於米價格昂貴，並未成為當地族人的主要糧食。¹²¹

五、戰後部落經濟作物、農地重劃與人口外流

1950年代起清流族人已陸續種植經濟作物，並將農產商品化。就整體原住民族社會來看，自1961年後，商業收入為山地原住民收入增加最多的部分，對市場依賴的人口增加，受市場價格與需求影響，新經濟作物不斷出現，傳統封閉式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已不復存在。¹²²

¹¹⁷ 程兆熊，《臺灣山地紀行》，頁94-95。

¹¹⁸ 程兆熊，《臺灣山地紀行》，頁101。

¹¹⁹ 臺灣省立農學院園藝系，《臺灣省中部山地園藝資源調查報告》，頁21。

¹²⁰ 李力庸，〈從改善生活到組織山地：山地定耕農業的政策與推廣（1945-1960）〉，頁68、90。

¹²¹ 王梅霞，《交織、轉化與再創造：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社會文化變遷》，頁293-294。

¹²² 王梅霞，《交織、轉化與再創造：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社會文化變遷》，頁294。

（一）部落經濟作物

清流部落屬亞熱帶氣候，1950年代初期，部落種植柚類、柑類、柿樹、龍眼等，樹種購自員林。此外亦栽種桃、梅、檸檬、番石榴、檳榔、木瓜、枇杷等。農作物則有蓖麻、油桐、甘蔗、甘藷、粟，及木豆、決明豆等。後山另有50餘甲的野生茶樹。¹²³

1950年代中葉，政府大力推廣山地經營高價值商品作物，如香菇、溫帶水果與藥材等。¹²⁴清流部落族人表示，選擇栽種何種經濟作物通常是迎合外在市場需求，並受鄰近地區漢人農家盛行的作物影響，農會水稻班、霧峰與彰化農技(改)所，也會定期與機動性協助部落產銷工作。¹²⁵1960年代前後，族人曾陸續種植香茅草、木薯、青梅、香菇、四季豆等經濟作物，早期香茅草價格高，一度是清流部落最重要的經濟作物：

稻穀收成後，我們就開始山裡的工作。就是部落後方的山地。例如：香茅、木薯。木薯收成後要刷、要曬，然後賣給外面的。有平地人會來收，是國姓那邊的人、梅子林也有，是一些比較附近的地方。後來，香茅油、木薯便宜了，就都沒有種了。最後，我們是種梅子，那個時候梅子比較貴，大概是第一個孩子大概上師範學校的時候。梅子種在山上，很遠的地方，要開車去。會請年輕人爬樹，鋪布在地上，把梅子打下來。稻穀一期四個月，每年兩期，其餘時間就到山裡工作。¹²⁶

部落裡曾種植過的經濟作物，依時序包括香茅、木薯與青梅，栽種與經營的時間，多半利用稻作休耕的時段，收購者主要是鄰近部落的國姓鄉平地人，而非農會、產銷班等單位。而二穫的稻米曬乾後，族人會預留該年度所需的量，其餘則售出。¹²⁷

¹²³ 臺灣省立農學院園藝系，《臺灣省中部山地園藝資源調查報告》，頁21。

¹²⁴ 李力庸，〈從改善生活到組織山地：山地定耕農業的政策與推廣（1945-1960）〉，頁89。

¹²⁵ 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0年8月19日、2021年9月9日、2022年7月27日、2024年7月28日，地點：Dakis Pawan先生埔里住家、清流部落、清流部落、電話口訪。

¹²⁶ 陳慧先口訪，〈Lubi Mahung（張呈妹）女士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2年8月18日，地點：清流部落。

¹²⁷ 張進昌（Mona Pawan），〈賽德克清流部落社區營造策略之研究〉，頁84。

此外，也會至埔里販售農產品與自製品，包括織布、背網等工藝品，香茅油、樹薯、生漆汁、香菇、玉米等農作物，雞、鴨、火雞等家禽畜產，以及獸皮、蝴蝶、甲蟲等。當時至埔里車站下車即有在地漢人主動收購，折換現金後，再購買生活所需的日用品。由清流前往埔里的公車每日只有兩班，去程常擠滿攜帶農作物前往埔里販售的族人，回程則購回新添置的日常生活用品。不過，後來由於香茅、樹薯、生漆等作物價格不穩定，而改植杉木造林。¹²⁸ 政府亦曾輔導種植漆樹、楓樹、杉木等作物，但由於等待時間較長，收益並不高。¹²⁹

在口訪中族人較常提及直接與外界交易的狀況。日治到戰後初期，政府以交易所、供銷會與農會等形式，限制外界直接與原鄉交易，但成效似乎不佳。清流部落所屬的仁愛鄉物資供銷會成立於 1953 年，¹³⁰ 除一般山地供銷業務外，亦曾協助招商承辦鄉產昆蟲蝴蝶收購、代理會員標售林木事宜。¹³¹ 至 1962 年，仁愛鄉物資供銷會與同時期其他山地鄉供銷會情況類似，面臨營運不善、鉅額虧損等問題，一度被要求停辦，改由鄉公所接辦山地保留地林產物處理與指導農作物運銷事宜。¹³²

設置供銷會的初衷，是為保障族人在買賣過程中不受剝削，但實際運作卻未如預期。首先，透過供銷會集中收購山地農產物，再運往平地，有時反而比族人直接運銷至平地來得耗時耗力。此外，時有公家機關、學校機構巧立名目，向供銷會攤派支領費用的情形，以及賒帳過濫未能如期收回等問題，導致供銷會周轉困難。¹³³ 再者，經由供銷會收購須加收代辦費，收購金額有時甚至比平地商人還低，¹³⁴ 對族人而言未必是最佳選擇。

¹²⁸ 張進昌（Mona Pawan），〈賽德克清流部落社區營造策略之研究〉，頁 84。

¹²⁹ 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 74。

¹³⁰ 《仁愛鄉志》中記載仁愛供銷會創立於 1964 年，應為誤植。參見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志〉，頁 1065。

¹³¹ 〈仁愛鄉物資供銷會招商承辦收購鄉產昆蟲蝴蝶公告〉，《臺灣民聲日報》，1957 年 4 月 19 日，第 2 版；〈仁愛鄉物資供銷會代理會員標售赤陽木公告〉，《臺灣民聲日報》，1957 年 7 月 23 日，第 6 版。

¹³² 〈供銷會賴帳仁愛鄉代提出指責〉，《臺灣民聲日報》，1962 年 10 月 4 日，第 4 版；〈仁愛鄉物資供銷會辦理不善虧損頗鉅〉，《臺灣民聲日報》，1962 年 12 月 14 日，第 4 版。

¹³³ 〈臺灣省各山地鄉物資供銷會業務改進要點〉、〈附臺灣省各山地鄉物資供銷會加強業務事項〉，收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3：臺灣省政府公報中有關原住民法規政令彙編（1）》，頁 1193、1214；〈巧立名目攤派支〉，《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10 月 15 日，第 5 版。

¹³⁴ 〈仁愛物資供銷會，業務經營不善，省令嚴加改進〉，《臺灣民聲日報》，1962 年 9 月 16 日，第 4 版；李力庸，〈從合作社到農會：戰後山地供銷體制的變動〉，頁 10。

(二) 1970 年代的農地重劃

距離清流部落入口處不遠的三角公園，立著一塊刻有「南投縣仁愛鄉清流麓（農）地重劃區」的山形紀念碑，部落內也有座「重劃紀念橋」。

戰後政府為擴大農地生產效益，自 1958 年起試辦農地重劃，1959 年「八七水災」重擊臺灣，災後多處農地經界滅失，政府順勢於重災區推行農地重劃，並於 1961 年公布「十年農地重劃計畫」。¹³⁵ 1976-1977 年初，官方選定清流部落作為山地保留地重劃示範區，檯面上的理由是「為適應時代需要及配合六年經建計畫，改善偏遠地區人民生活」，¹³⁶ 因而開辦山地保留地重劃。¹³⁷



圖 7 1982 年落成之「南投縣仁愛鄉清流麓（農）地重劃區」紀念碑



圖 8 1977 年 4 月落成之「重劃紀念橋」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21 年 11 月 1 日。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22 年 7 月 17 日。

¹³⁵ 〈本省農地重劃十年實施計畫〉，《臺灣民聲日報》，1961 年 9 月 27 日，第 3 版；劉瑞煌，〈臺灣之農地重劃〉，《土地問題研究季刊》（臺北）1: 4（2002 年 12 月），頁 30。

¹³⁶ 按：依《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記錄說明是在民國 66 年（1977）初選定，而位於清流部落、民國 71 年（1982）12 月所立之「南投縣仁愛鄉清流農地重劃記要」則記載於民國 65 年（1976）辦理。參見〈民政廳簽為南投縣長劉裕猷督屬創辦山地仁愛鄉清流保留地重劃工作，績效卓著，擬予記功一次案。〉（1978 年 2 月 27 日），《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第 1415 次會議》，「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501141507。

¹³⁷ 政府為何選擇於此時進行山地保留地的農地重劃，很可能與 1966 年修訂的〈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規定：「完成地籍測量後開始登記耕作權與地上權，登記後持續耕作或使用滿十年，轉移所有權。」有關——此一時期，正值山地保留地所有權轉移階段。可惜目前尚未能找到直接的相關史料。感謝匿名審查人提點此一時間脈絡。

最初，山地保留地重劃預計先在南部推廣，曾徵詢信義鄉、仁愛鄉的萬大，以及臨近清流部落的中原部落作為示範地，不過由於部分須自費負擔，以及重劃後保留地重新分配等問題，許多部落對於重劃一事頗有疑慮。後來以清流部落作為示範實施，原因之一是因為當時仁愛鄉鄉長高光華（Awi Dakis, 1931-2001）¹³⁸ 是清流部落族人，加上當時部分返鄉年輕族人協助遊說長輩，終於使部落族人同意進行土地重劃。¹³⁹

附帶一提，在 1966 年〈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修訂後，明定原住民得依規定取得土地所有權，在 1976-1977 年清流部落農地重劃前，族人們已完成土地登記。由於農地重劃須規劃水路與農用道路等空間，因此重劃後的土地是扣除公用設施後，再按原登記比例劃分，重劃後農地的位置，基本上與原土地坐落位置相近。¹⁴⁰

在此之前，受地形不平整等因素影響，部落農作土地利用零碎，灌溉系統與田間道路亦無整體規劃。¹⁴¹ 當年重劃的面積約 65 公頃，土地傾斜度原本為 25 度左右，土地重劃後，¹⁴² 不僅單一水田面積擴大，田園兩側新增的道路也使農務、搬運更為便利。然而由於重劃後，造田、興築田埂等部分仍須自理，不擅於此的族人們必須僱用具備造田技術者來協助，費用上是一筆不小的負擔，許多族人為此必須透過貸款支付。後在政府輔導下，部分族人赴臺北太平洋建設公司從事勞力工作，賺取現金。¹⁴³ 族人認為農地重劃有助於往後的農耕，過程中為籌措經費而赴外工作的經驗，也影響往後部分族人選擇離開原鄉從事勞動工作：

¹³⁸ 高光華，清流部落賽德克族人。霧社事件中之花岡二郎遺腹子。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任職教師、校長，曾任第 7 屆仁愛鄉鄉長。參見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志》，頁 142。

¹³⁹ 陳慧先口訪，〈Tado Nawi（高信昭）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1 年 11 月 1 日，地點：Tado Nawi 先生清流部落宅。

¹⁴⁰ 戰後族人們每戶耕作的土地，基本上延續 1932 年日本官方分配之空間範圍，不過在日人離臺到土地所有權登記前，由於每戶人口增減情況不一，為因應需求，部落內已有零星換地，或以物換地之情形。參見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4 年 7 月 28 日，電話口訪。

¹⁴¹ 郭益誠（Temu Walis），〈南投縣仁愛鄉清流部落的農地重劃〉，《原教界》（臺北）114（2023 年 12 月），頁 43。

¹⁴² 〈民政廳簽為南投縣長劉裕猷督屬創辦山地仁愛鄉清流保留地重劃工作，績效卓著，擬予記功一次案。〉（1978 年 2 月 27 日），《臺灣省政府委員會會議第 1415 次會議》，「臺灣省政府委員會會議」，典藏號：00501141507。

¹⁴³ 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0 年 8 月 19 日，地點：Dakis Pawan 先生埔里住家；陳慧先口訪，〈Tado Nawi（高信昭）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1 年 11 月 1 日，地點：Tado Nawi 先生清流部落宅。

水田做好了，以後耕作就方便嘛，但是因為我們有了做勞工的經驗，以後賺錢也很容易。那時候剛好臺灣經濟在起步，大興土木，所以很多人，不要說我們部落，連隔壁村全部都跑去當勞工，一直到目前都還是。比起種水田或歷年來的農作物，勞工收入還更好。因為一般農作物大概四個月半年以後才會長，準備一個月，然後種下去，不管什麼產物，種水稻、種蔬菜，要四個月才會長，長大到採收完大概也要半年，但是投入的那些資本，不見得會回收，穀賤傷農，萬一價錢不好，一下子沒有了。水稻是固定價格，但後來種水稻根本養不起家裡，以前還可以……。¹⁴⁴

1970年代清流部落的農地重劃，雖然改變部落地景、大幅提升農耕條件，但受大環境影響，能固定賺取現金、可預期性較高的勞動力工作，成為農耕之外的選擇。原鄉農業發展除受限先天自然環境，投入的資本又未必能獲利，甚至回收，影響族人投資農業意願，¹⁴⁵ 陷入惡性循環。

為提升山地農業，戰後初期多位原住民籍省議員曾提案應充實山地農業教育，如增設農業補習班、升格既有的山地農業學校，或於各山地鄉設置農業學校等，¹⁴⁶ 不少清流部落族人即畢業自「霧社農校」。山地農校的設置，可追溯至日治時期。¹⁴⁷ 創設於1935年的臺中州霧社農業講習所（一年制）數度改制、改名，¹⁴⁸ 清流部

¹⁴⁴ 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0年8月19日，地點：Dakis Pawan先生埔里住家。

¹⁴⁵ 〈一、關於工業用地向山坡地發展〉（1975年4月25日），《臺灣省議會公報》，「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05-05OA-32-6-5-01-00998，頁171。

¹⁴⁶ 〈為切實提高山地農業教育計請于各縣山地中心地點附設農業補習班案〉（1949年12月19日），《臺灣省議會議事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01-08OA-00-5-3-0-00139；〈請將縣立南投屏東山地農校升格為省立農校以利山地農業教育案〉（1963年12月3日），《臺灣省議會議事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3-03-02OA-01-5-3-05-05430；〈請在山地鄉等設農業學校以提高山地農業知識而利改善山地人民生活案〉（1966年11月14日），《臺灣省議會公報》，「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3-03-08OA-16-5-4-05-00580。

¹⁴⁷ 為培養山地堅實的農民，臺灣總督府在1931-1936年間，陸續於各轄有蕃地的州廳設置「農業講習所」。這些農業講習所在戰後由政府接收，於原址擴充成立一年制的山地農業職業補習學校，每年保送200-350名原住民學生。至1957年，經過一連串的整併、改制，僅存「南投縣立山地農業職業學校」與「屏東縣立山地職業農業學校」兩所，1961年再改制為五年制的農業職業學校，1968年為配合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又改為山地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專收全臺原住民學生，每年招收160名，經考選保送，一律住校並給予公費待遇。1946-1970年間，共有4671名原住民學生，保送進入各山地農業學校。參見臺灣省政府民政廳，《發展中的臺灣山地行政》（南投：該廳，1971），頁61-62。

¹⁴⁸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中州霧社農業講習所」，1946年設「臺中縣山地職業補習學校」，1950

落的族人們習慣稱它為「霧社農校」或「農校」，是不少清流部落族人的母校。

不過，山地農業教育實務上面臨許多難題。以「霧社農校」為例，雖有旱田、旱地與林地 19 多公頃，寒帶果園 10 甲，作為實習園地，但因位居山谷，長期缺乏可供實習的水田，必須另擇地實習。¹⁴⁹ 曾就讀「霧社農校」的 Tado Nawi（高信昭，1949-），¹⁵⁰ 提到就讀農校時曾赴臺中於今之中興大學校園實習：

因為那時候全省只有兩個山地農業職業學校，一個在屏東，全省只有兩個，花蓮是阿美族分南北的，北的跑到我們這邊來，南的就是到屏東。……我們那時是五年制、兩年高中的程度，要進入普通大學難上加難。我們農校，一般實習都在工作，做怎麼接枝、怎樣幹活。我本身也到過中興大學實習，在農場那邊種菜，暑期的時候，那時候還有老百姓住在那裏……。¹⁵¹

然而，就讀農校的學子畢業後也未必從事農務。Tado Nawi 提到，農校在校期間，有正就讀「政工幹校」的畢業學長返回母校宣傳招生，吸引不少農校學生投考軍校。因此，他在農校畢業後並沒有回歸部落從事務農，而是進入軍校就讀。此外，山地農校有不少畢業生，往後從事教職，由於原鄉學校地處偏遠，較難留住一般師資，因此常任用願意在原鄉任教的山地農業學校畢業生為代課老師，促

年改名為「南投縣立山地短期農業補習學校」（一年制），1957 年才改為「南投縣立山地初級農業職業學校」（三年制，只設農業科），1961 年改為「南投縣立山地農業職業學校」（五年一貫制）。1968 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停招五年制學生，改為「省立南投山地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三年制），1971 年增設普通師範科（1975 年停招），1972 年改稱「省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三年制），2000 年再改為「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三年制）。參見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志》，頁 1111；〈校史沿革〉，「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下載日期：2023 年 4 月 22 日，網址：<https://www.ravs.ntct.edu.tw/home?cid=211>；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 昭和 11 年版》（臺北：該局，1937），頁 8。

¹⁴⁹ 〈充實山地農業教育，培養山地農業人才〉（1970 年 5 月 25 日），《臺灣省議會議事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3-04-05OA-03-6-8-0-00399。

¹⁵⁰ 「霧社農校」畢、陸軍官校畢業，職業軍官。祖父 Tado Nokan 為霧社事件起事六社荷歌社（Gungu）頭目，於吐魯灣戰役陣亡。祖父的姊姊 Obing Nokan，嫁給近藤勝三郎（其弟近藤儀三郎娶莫那魯道之妹 Tiwas Rudo）。姑姑 Obing Tado（高山初子，高彩雲，1914-1996），是花岡二郎的妻子，事件後改嫁 Pihu Walis（中山清，高永清，1914-1982）。伯父 Puhuk Tado（川村忠夫，1919-1942），參與高砂義勇隊，於新幾內亞戰事中亡。

¹⁵¹ 陳慧先口訪，〈Tado Nawi（高信昭）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1 年 11 月 1 日，地點：Tado Nawi 先生清流部落宅。

使省教育廳在「霧社農校」試辦師範科，並於 1971 年增設普通師範科，¹⁵² 族人當中亦有出身「霧社農校」師範科的教師。若以 2000 年前後在清流部落進行的口述紀錄來看，自「霧社農校」畢業後實際從事農業者僅約兩成，且 1970 年以後出生者幾乎都從事農業以外的職業。¹⁵³

根據學者統計臺灣原住民農業收入所占比，在 1972 年仍占 57%，至 1978 年僅占 40.75%，往後均低於非農業收入。¹⁵⁴ 在 1930-1970 年代，清流部落的自然環境與耕作條件，較多數山地部落更具優勢；此外，更因作為第一個原住民保留地重劃示範區，而大幅提升耕作環境、重塑部落地景。即便如此，由於政府收購稻米的金額固定，戰後雖另種植香茅、梅子等較高價的經濟作物，但價格時有起落，至 1970-1980 年代前後，多數族人單靠農業生產已難以維持家計。族人表示，大約在 1970 年代中葉後，許多家庭開始有比較明顯的資金需求與壓力，原因包括家中子弟赴外地求學費用等，特別是「農地重劃」自付款金額較高而必須貸款，在此之前部落族人較少有向農會等機構貸款的經驗。¹⁵⁵ 時至今日，清流部落仍有部分族人持續種植水稻，不過多半僅供自用，或將自家農地租給其他族人耕作之情形。¹⁵⁶

（三）原鄉人口外流

如上所述，1970 年代為籌措農地重劃所需經費，成為部分族人外出就業契機。不過，在此之前，陸續已有族人因為職務、教育或工作需求等因素，搬遷或一度離開部落。

¹⁵² 〈關於為培養山地人才，希望將農工學校改為專科學校之問題〉（1972 年 1 月 12 日），《臺灣省議會議事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3-04-08OA-03-6-6-0-00268。「霧社農校」在「臺灣省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時期，曾於 1971 年增設普通師範科，後於 1975 年停招。參見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志》，頁 1111。

¹⁵³ 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

¹⁵⁴ 顏愛靜、楊國柱，《原住民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頁 411-412。

¹⁵⁵ 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4 年 7 月 28 日，電話口訪。

¹⁵⁶ 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1 年 9 月 9 日，地點：清流部落；陳慧先口訪，〈Lubi Mahung（張呈妹）女士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2 年 8 月 18 日，地點：清流部落。

1. 外出求學

戰後出生的族人常提及部落長輩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¹⁵⁷ 自 1940-1950 年代起，即有不少部落的學童前往埔里就讀中、小學。戰後清流部落學童按學區劃分就讀中原部落的互助國小，從部落步行到學校約半小時，該校學生主要來自清流、中原、眉原等三個原住民部落。

在 1968 年 9 月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進入初等中學必須通過升學考試，原住民籍學童可參加「山地獎學金」¹⁵⁸ 考選：

以前山地獎學金有名額限制，南投高中【初級部】十名、草商（每學期不一樣，有時是花蓮高工）十一至十三名，十四名以後是霧社農校，還有花蓮農校，最後是台東農校。……我五十四至五十七年在草商，五十七年至六十年在投中，六十年至六十五年在臺大……。¹⁵⁹

許多家長為了讓子女更具升學競爭力，小學階段就會將小孩送至埔里就讀，寄宿教會或親戚家中。

九年一貫教育實施後，部落學童多選擇位於國姓鄉的國姓國中、北梅國中或北港國中就讀，同儕中有較多的閩南人與客家人。九年國教實施初期，有些族人經由建教合作在老師推薦下，畢業後就到外地工作，或者選擇在南投或臺中縣等可以當日往返的地方工作。¹⁶⁰

2. 因職務搬遷

1950-1960 年代，幾位擔任公職或當選民意代表的族人，不少因職務關係搬

¹⁵⁷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 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頁 268-269。

¹⁵⁸ 1950 年台灣省政府頒布「臺灣省中等學校山地學生獎學金考選辦法」，適用於國民學校的原住民籍畢業生升學初中。提供獎學金名額的學校，包括：省立師範學校四年制簡易師範科預科、省立中學初級部、省立職業學校初級部等。參見涂予尹，〈論多元文化主義下種族優惠性差別待遇的法正當性基礎〉（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頁 34-35。

¹⁵⁹ 〈Takun Walis（邱建堂，1952-）先生口述〉，收於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 115。

¹⁶⁰ 〈Bahgah Nawi（梁志強，1975-）先生口述〉、〈Kulas Walis（高水明，1956-）先生口述〉，收於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 298、306。

離部落。日治時期受日人栽培，在戰後投入政界持續發揮影響力的清流族人，除前文已提及之高永清、高光華與高愛德外，還有桂敏彥（Puhuk Walis、牧野敏彥，1914-1992）。¹⁶¹ 高永清、桂敏彥與高愛德，在日治時期均曾任高砂族青年團幹部，並曾於1935年、1937年與1941年的《理蕃の友》留下發言紀錄。¹⁶²

戰後他們三位總計囊括1屆省議員、3屆南投縣議員，以及5任仁愛鄉鄉長、3任仁愛鄉鄉民代表主席等公職與民意代表。¹⁶³ 然而他們在日後陸續搬離清流部落，例如1950年代，高永清為競選省議員，變賣清流部落的水田、旱田與房屋，搬入在第二任鄉長任內於霧社街上購置的房舍；¹⁶⁴ 桂敏彥一家也在擔任鄉長後，賣掉部落的房、地定居霧社。¹⁶⁵

3. 工作需求

不少族人自中學，甚至小學階段即已外出就學，有些族人畢業後繼續留在外地工作。¹⁶⁶ 由於部落裡的長輩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餘生者後裔從事公教、警察與護理人員的比例甚高。¹⁶⁷ 一般而言，公職、警察與護理等職業別，有較多留在「原鄉」（原住民族地區）的工作機會，然而甚少一開始就能分發到原居地，通

¹⁶¹ Puhuk Walis（桂敏彥），羅多夫社人，臺中夜中學畢，霧社事件時於臺中州理蕃課工作，曾任川中島社青年會副會長；戰後擔任警察，當選第3、4屆仁愛鄉鄉長。參見〈躍進理蕃の實績を如實に示す！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會（一）〉，《理蕃の友》7:1（1938年1月1日），頁12；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181-183。

¹⁶² 陳慧先，《「原漢分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20），頁147、152、154、158、160-161。

¹⁶³ 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志》，頁26-27、30。

¹⁶⁴ ヒボ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実編譯，《霧社緋櫻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頁235。

¹⁶⁵ 〈Temi Puhuk（桂節娥，1940-）女士口述〉，收於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182、185。

¹⁶⁶ 〈Mekici Nawi（高明吉，1954-）先生口述〉，收於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73。

¹⁶⁷ 根據銓敘部110年的統計，目前臺灣原住民族任職公務員的類別中，以警察人員所占比例最高，佔原住民族整體公務員人口的38.8%，而其中位階最高、曾任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警政監的高元光（Puhuk Walis，1956-），是清流部落的族人。參見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頁268-269；〈原住民族任公務人員概況（110年年底）〉，「銓敘部」，下載日期：2023年5月17日，網址：<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1841&Page=9854&Index=1>；〈110年1月人事異動〉，「警光」，下載日期：2023年5月17日，網址：<https://police.npa.gov.tw/ch/app/data/view?module=wg014&id=1836&serno=5b50176e-4dfd-4880-905f-e2e53b8ffa66>。

常須工作一段時間、經過多次請調，才能真正「返鄉」。

從日治時代到戰後，透過政府、教會系統栽培，或經由國家考試脫穎而出的族人為數不少，許多跨越日治與戰後的部落菁英，在參選民意代表或擔任地方公職後，陸續搬離部落；而戰後世代，許多族人從求學階段就必須離鄉背井，加上 1970-1980 年代後農業產值逐漸無法支應家庭生計，也促使年輕一輩族人赴外地謀職。

六、結論

若要標誌霧社事件餘生者遷居川中島後的歷史大事，1943-1945 年間部落青年參與高砂義勇隊、戰後 1970 年代花岡一郎「忠奸爭議」與莫那魯道遺骨返還、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與災後部落社區總體營造，以及 2008 年賽德克正名，是相對較常被提及的議題。然而，除了這些一時或突發的「事件」，清流部落在地生活常態為何？

本文從當代部落地景出發，透過其他學門相關研究者較少利用的官方檔案資料，以及前人既有、與近 2-3 年間親自進行的口述訪談，重新勾勒 1931-1980 年代間清流部落的「日常」。依序探討移居土地的流轉、周邊族群往來互動，以及自 1931-1980 年代間部落主要生計經濟——水田稻作，並擴及水圳建設、農作商品化後的產銷交易，1970 年代中葉清流部落被選定作為第一個原住民保留地農地重劃示範之歷程，以及 1970-1980 年代以後部落農業人口下降、人口外移等現象。

比較遺憾的是，相對於日治時期「川中島社」豐富的檔案文獻，因戰後官方將清流部落與中原部落合併為「互助村」（空間範圍請見圖 6），單就清流部落境內相關統計資料不易辨識取得。由於多數官方統計資料至多僅及於鄉層級，即便有些統計擴及至村，行政村也未必與部落空間疊合，清流部落即是一例。戶籍人口資料是少數能透過「鄰」來辨識部落範疇的資訊，但也有其限制。¹⁶⁸ 故戰後部分較難以具體數據呈現變化，除零星的報導和山地農業調查報告，多仰賴口述

¹⁶⁸ 以當代清流部落人口為例，仁愛鄉戶政事務所網頁每月提供該鄉最新的「各鄰住戶人口統計」，但所內電腦統計系統僅保留最新數據並覆蓋舊資料，近年留存紙本資料只到村的層級。更早的資料除統計方式不同外，也多在九二一大地震時毀損，即便所方費心幫忙仍甚難取得其他清流部落相關統計。

訪談，或既有的回憶錄與前人口述成果。¹⁶⁹

過去有關霧社事件餘生者移居地「川中島」土地來由，多僅說明原為眉原群傳統領域，後官方自社口林懋亮家族手中取得。本文透過臺灣總督府檔案等史料，補充 1904-1931 年間土地流轉過程的空白，呈現近代國家力量向中央山地逼近，以及霧社事件後強制臺灣原住民族移住，擾動島內多族群生活空間。多年前，筆者曾詢問部落長輩，為何在清流部落入口不遠處，有一座漢人式的土地公廟？得到的答案是：可能是過去開採樟腦的「腦丁」所留下來的，當時略感疑惑。透過目前可掌握的資料顯示，1903-1912 年間官方於中部山地大幅推進隘勇線，自 1910 年代後半至 1920 年代，北港溪庄以東番地，即眉原溪以東、黃肉溪以西一帶，已有日人與漢人以「豫約賣渡」方式申墾，範圍包括今清流部落與中原部落所在位置。最遲至 1920 年，清流部落境內已有廣東籍佃人 24 戶，坐落於部落的土地公廟，較可能是早年拓墾該地的佃人所留下。

既有史料記載與口述訪談，均論及清流部落與同屬北港溪中游的中原與眉原部落關係親密，或可印證馬淵東一對泛泰雅族群的觀察——「以河川流域為中心的地域觀念的共通性，勝過於系統的共通性」。¹⁷⁰ 由於眉原、清流與中原等部落，多數族人是在 1920-1930 年代十餘年間陸續被迫遷北港溪中游，類似的境遇讓彼此更能共感。此外，本文也梳理清流部落與「梅子林」漢人聚落間的往來。部分梅子林居民，為 1931 年之前開墾「川中島」的佃戶，後因該地作為霧社事件餘生者遷居地而迫遷彰化二林，其後有些人再搬回與川中島相鄰的梅子林。梅子林與清流部落分屬今國姓鄉、仁愛鄉，早年兩地之間設有檢查哨，但梅子林居民進出清流部落並不受限。八七水災後，部分中原部落族人因家園毀損，透過曾任南投縣議員的高愛德介紹，向當地居民購地落腳梅子林。過去梅子林居民的經濟狀況，普遍不如從事稻作的清流族人有餘裕，居民亦向清流族人租借保留地種植香茅、

¹⁶⁹ 這種情況恐怕是不少進行「部落史」研究者共同的難題，由於「部落」的規模，有些等同村，更多是小於村的幾個鄰，官方統計資料以鄉鎮為單位的統計數字已不多，更別說是以村，甚至更小的鄰為單位。參見林修澈，〈原住民族「部落史像」的拼圖及其方法〉，收於孫大川主編，《原住民族部落歷史研究理論與實務》，頁 222。

¹⁷⁰ 馬淵東一，〈山地高砂族的地理知識與社會、政治組織〉，收於滿田彌生、蔣斌主編，《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日籍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群、生活與環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頁 249；葉高華，〈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頁 102。

木薯等經濟作物，或協助族人造田、修築水圳。

1931 年霧社族人移居川中島之初，先是採行共同耕作制，1932 年日方才改以每戶每人為單位分配耕地，生產模式從部落集體制轉向個人。根據陳秀淳的研究，水田稻作未必比原住民傳統輪耕農業方式適合山林；李力庸的研究亦指出，1945-1960 年臺灣的山地農業發展，延續日治時期模式推廣梯田與水田稻作定耕，成本甚高、生產效益不如預期。清流部落有別於多數位居山地的部落，是推行水田稻作發展較成功的例子。由於當地海拔僅約 500 公尺，又是北港溪中游沖積台地、土壤肥沃，較高海拔地區宜耕，在 1970-1980 年代以前，水田稻作大抵能維持一定收益。不過也因為地勢較低，1960 年代後臺灣山地農業政策轉向開發高山果樹、高冷蔬菜及畜牧業階段，無法順勢發展。

水圳是當代清流部落醒目的地景，也是部落記憶重要的一環。本文透過檔案資料與族人的口述，勾勒清流部落境內水圳的發展，提供東臺灣之外原住民部落水圳的實例。有關清流部落境內水圳，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0 年代初漢人申墾者出資興築的紀錄，族人移居之初官方也數次撥款興修。至 1930 年代，「川中島埤圳」已是能高郡境內灌溉範圍最大、臺中州內排名第二的「蕃人圳」。過去山地鄉水利工程不屬於一般農田水利會而未分配水權，族人們雖不像平地農民需要繳交水租（即農田水利會會費），但自 1960 年代後亦需繳交水圳養護材料費用。水圳主要修築經費來自官方或相關單位的補助，並仰賴族人在興築期間動員部落青壯人口「出工」、參與平時維護。

1960 年代前後，清流部落族人陸續種植香茅草、木薯、青梅、香菇、四季豆等經濟作物。為保障族人利益、防止外人剝削，官方先後設有供銷會、山地鄉農會等協助產銷的管道。不過，多位受訪族人表示，過去選擇栽種何種作物主要受外界市場影響，考量實際收益，不少族人選擇與進入部落收購農產的商人交易，或由族人將農產品與自製品攜至埔里販售。

1976 年，清流部落成為第一個山地保留地重劃示範區。農地重劃後雖改善原本的耕作環境，然至 1970-1980 年代單靠農業收入已漸無法支應生活所需。農地重劃期間為籌措經費的外地工作經驗，開啟部分族人赴外工作的契機。清流部落族人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在 1960、1970 年代已培養多位大專院校畢業生，從

事公、教、軍、警、護等工作，但也意味著有不少族人須自小學階段就離鄉背井赴外求學，或因職務、工作等需要，搬離或暫離部落。此外，部落內也很難充分提供與這些畢業生所學相對應的工作，即便是公、教、護理人員等有較多機會留在「原鄉」服務的職業別，也甚少一開始就能分發到原居地，通常需要工作數年、多次請調，才能真正「返鄉」。自 1980 年代至今，清流部落經歷九二一大地震，及部分族人參與發起賽德克族正名運動，也陸續有族人回歸部落，投入文化復振工作，¹⁷¹ 或在退休後重返部落田園生活，繼續為清流部落歷史寫下新的篇章。

霧社事件餘生者，在 1931 年 5 月被遷至位於原漢交界、自 1910 年代中葉臺灣總督府開放外界申墾的「川中島」。移居之際該地已闢有良田、鋪設水路，是眉原溪一帶最肥沃宜耕之地。1934 年《理蕃の友》所載，川中島族人中山清、舊羅多夫社頭目 Bagah Pukoh 對於官方授予水田的感念，或許不全然是官樣文章或溢美之詞。有別於多數位於「蕃地」的部落，川中島是推行「水田稻作」較成功的例子，這樣的情形持續至戰後，1970 年代清流部落被選為第一個原住民保留地重劃的示範區。相較於居住在地力較貧瘠的梅子林漢人聚落，清流族人的生活顯然更有餘裕，稻米也成為與外界交換的主要物資。然而自 1960 年代後臺灣社會側重工、商業發展，農業產值長期被低估，在整個臺灣社會農村人口流往都市的趨勢下，清流部落亦然。從清流部落土地、水田稻作經濟變遷，可以看到近代國家力量在 20 世紀初如何擾動島內各族群的生活空間，以及臺灣原住民被導向農耕民化後的縮影。

¹⁷¹ 如 Temi Nawi (曾瑞琳, 1939-2022) 女士，是清流部落中第一批從事部落傳統文化復振的族人。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後，曾任教師，並擔任教廷駐華大使館秘書 8 年，後赴羅馬傳信大學完成碩士與博士課程。回臺後她婉拒在大學任教的機會，返回部落長期致力於賽德克族語和傳統織布文化復振，1987 年創設「仁愛鄉山地服務中心」，1990 年立案成立「社團法人南投縣天主教山地研究社」；Dakis Pawan (郭明正, 1954-2021) 老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畢業，退休前為埔里高工機械科專任教師。1990 年代初 (38 歲)，重回故鄉向部落長輩請益、口訪，長期致力於族語復振工作，參與多項賽德克 Tgdaya 語翻譯、編纂與顧問工作，並曾任族語認證委員。參見曾瑞琳·鐵米拿威依編著，《泰雅賽德克傳統織布文化》，編著者簡介；多面向藝術工作室、李道明，《永遠的部落 19 賽德克的女兒，泰雅族·曾瑞琳》(臺北：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1998)。

引用書目

- 《自由時報》
- 《商工日報》
- 《理蕃の友》
- 《臺灣日日新報》
- 《臺灣民聲日報》
- 《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典藏號：00501141507。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44001215200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臺灣省議會議事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01-08OA-00-5-3-0-00139、002-03-01OA-02-6-4-0-00350、003-02-04OA-01-5-3-03-05314、003-03-02OA-01-5-3-05-05430、003-03-09OA-01-5-3-03-05293、003-04-01OA-03-6-4-0-00382、003-04-08OA-03-6-6-0-00268。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臺灣省議會公報》，「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3-03-08OA-16-5-4-05-00580、003-05-05OA-32-6-5-01-00998。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3052003、00003160008、00003577004、00003781004X001、0000715800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大正 14 年 6 月 13 日林少超寄吳宗敬預金證〉，登錄號：2021.022.0177.0004。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 〈內買吳宗敬土地書類袋〉，登錄號：2021.022.0177.0001。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 〈南投吳宗敬寄豐原郡神岡庄社口林少超書留郵便〉，登錄號：2021.022.0177.0003。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 王世慶，〈霧峰林家之歷史〉（手稿影本）。
- 郭明正，〈專題演講：霧社事件後——川中島的人事物〉，時間：2020 年 4 月 20 日 10:10-12:00，地點：國立中興大學人文大樓 203-2 室。
- 陳慧先口訪，〈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0 年 8 月 19 日，地點：Dakis Pawan 先生埔里住家。
- 陳慧先口訪，〈Lubi Mahung（張呈妹）女士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2 年 8 月 18 日，地點：清流部落。
- 陳慧先口訪，〈Puhuk Walis（桂文同，1946-）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2 年 8 月 18 日，地點：清流部落。
- 陳慧先口訪，〈Tado Nawi（高信昭）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1 年 11 月 1 日，地點：Tado Nawi 先生清流部落宅。
- 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0 年 8 月 19 日，地點：Dakis Pawan 先生埔里住家。
- 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1 年 9 月 9 日，地點：清流部落。
- 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2 年 7 月 27 日，地點：清流部落。
- 陳慧先口訪，〈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4 年 7 月 28 日，電話口訪。
- 陳慧先口訪，〈謝金妹女士口訪紀錄〉，訪問時間：2023 年 11 月 30 日，地點：謝金妹女士梅子林住處。

- 〈110年1月人事異動〉,「警光」,下載日期:2023年5月17日,網址:<https://police.npa.gov.tw/ch/app/data/view?module=wg014&id=1836&serno=5b50176e-4dfd-4880-905f-e2e53b8ffa66>。
- 〈原住民族任公務人員概況(110年年底)〉,「銓敘部」,下載日期:2023年5月17日,網址:<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1841&Page=9854&Index=1>。
- 〈校史沿革〉,「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下載日期:2023年4月22日,網址:<https://www.ravs.ntct.edu.tw/home?cid=211>。
- 〈臺中州管內埤圳調〉,《臺灣總督府埤圳調》(昭和12年3月),引自〈日治初期台灣埤圳調查與台帳台帳〉,「臺灣水圳文化網@Sinica」,下載日期:2022年8月16日,網址:<https://gis.rchss.sinica.edu.tw/canal/archives/date/2017/05/>。
- 〈臺灣山地資源調查的一闕牧歌〉,「豐年社農傳媒」,下載日期:2023年4月3日,網址:<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78036>。
- 〈蕃人所要調查書:臺中州能高郡川中島社〉(臺北帝國大學手抄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下載日期:2024年7月26日,網址:<https://dl.lib.ntu.edu.tw/s/forest/item/94088?c=&m=&s=&cv=>。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下載日期:2023年4月2日,網址:<https://reurl.cc/1el9pD>。
-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下載日期:2024年3月22日,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9035/ch02/type3/gov13/num3/images/Eg01.pdf。
- 「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下載日期:2024年3月22日,網址:<https://jenaihr.nantou.gov.tw/1499/0112>。
- 「國土繪測服務雲」,下載日期:2024年7月18日,網址:<https://maps.nlsc.gov.tw/T09/mobilemap.action>。
-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下載日期:2023年4月13日,網址:<https://drtpa.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 ヒボ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実(編譯)
- 1988 《霧社排櫻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日本:教文館。
- 井上伊之助(著),石井玲子(譯),鄭仰恩、盧啟明(校註)
- 2016 《臺灣山地傳道記:上帝在編織》。臺北:前衛出版社。
- 巴干·巴萬
- 2018 〈霧社事件遺族的心聲:以莫那·魯道直系家族史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 王世慶
- 1994 〈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收於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131-21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王梅霞
- 2023 《交織、轉化與再創造: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社會文化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生駒高常
- 2002 〈霧社蕃騷動事件調查覆命書〉,收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下)》,頁363-473。臺北:國史館。
- 多面向藝術工作室、李道明
- 1998 《永遠的部落19 賽德克的女兒,泰雅族·曾瑞琳》。臺北: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沈明仁（總編纂）

- 2008 《仁愛鄉志》。南投：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李力庸

- 2012 〈從改善生活到投資山地：戰後山地的農業政策與推廣（1945-1960）〉，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歷史學系協辦，「第二屆沿山地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頁 1-19。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3 樓第一會議室，6 月 19-20 日。
- 2016 〈從合作社到農會：戰後山地供銷體制的變動〉，發表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變動中的東亞：跨域視野的觀察國際學術研討會」，頁 1-14。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會議室，5 月 13-14 日。
- 2022 〈從改善生活到組織山地：山地定耕農業的政策與推廣（1945-1960）〉，《臺灣學研究》（新北）28: 67-94。

吳密察

- 2017 〈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1898-1905）」的展開及其意義〉，《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10: 5-35。

吳明季

- 2022 〈價值、參與和主權：臺灣原住民部落發展實踐的三個面向〉。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論文。

村上優

- 2018 〈日本殖民主義治理中的現代性——成為「模範蕃社：川中島」1931-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

何世龍

- 2022 《日治時期理蕃政策研究：以東臺灣「集團移住」與「蕃地稻作」為例》。臺東：東臺灣研究會。

周婉窈

- 2010 〈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臺北）60(3): 11-57。

林修澈

- 2024 〈原住民族「部落史像」的拼圖及其方法〉，收於孫大川主編，《原住民族部落歷史研究理論與實務》，頁 197-230。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近藤正己

- 1992 〈台灣總督府の「理蕃」体制と霧社事件〉，收於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2：帝国統治の構造》，頁 35-60。東京：岩波書店。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

- 2014 《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

保羅·D·巴克萊（Paul D. Barclay）（作）、堯嘉寧（譯）

- 2020 《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馬淵東一

- 2012 〈山地高砂族的地理知識與社會、政治組織〉，收於滿田彌生、蔣斌主編，《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日籍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群、生活與環境研究論文集》，頁 239-28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涂予尹

- 2015 《論多元文化主義下種族優惠性差別待遇的法正當性基礎》。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許雪姬

- 1999 〈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初探〉，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 297-35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張進昌 (Mona Pawan)

- 2011 〈賽德克清流部落社區營造策略之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明正 (Dakis Pawan)

- 2002 〈Kari Alang Nu Gluban (清流部落簡史)〉，收於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頁 7-13。南投：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
- 2012 《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 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14 《賽德克族語中歷史文化現象的探討》。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郭明正 (編)

- 2008 《賽德克正名運動》。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郭益誠 (Temu Walis)

- 2023 〈南投縣仁愛鄉清流部落的農地重劃〉，《原教界》(臺北) 114: 42-45。

陳秀淳

- 1998 《日據時期臺灣山地水田作的展開》。臺北：稻鄉出版社。

陳慧先

- 2020 《「原漢分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陳鴻圖

- 2020 《臺灣水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曾瑞琳·鐵米拿葳依 (編著)

- 2000 《泰雅賽德克傳統織布文化》。臺中：鐵米拿葳依。

曾彙娟

- 2022 〈部落織布產業推廣的文化意義與實踐：以賽德克族清流部落為例〉。花蓮：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應用人類學組碩士論文。

黃秀政

- 2001 〈林氏宗族與清代中部的開發〉，《興大歷史學報》(臺中) 12: 99-131。

黃應貴

- 2012 《「文明」之路第二卷：「現代化」下文化傳統的再創造 (1945-199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程兆熊

- 2022 《臺灣山地紀行》。新北：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楊仁江

- 1987 《社口林宅》。臺北：弘化文化事業公司。

葉高華

- 2023 《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詹素娟

- 2024 〈「部落」如何「歷史」？：部落的時空變動與文獻特性〉，收於孫大川主編，《原住民族部落歷史研究理論與實務》，頁 109-142。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 1998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3：臺灣省政府公報中有關原住民法規政令彙編（1）》。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省立農學院園藝系

- 1956 《臺灣省中部山地園藝資源調查報告》。臺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

- 1954 《山地定耕基本調查》。臺北：臺灣省政府農林廳。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

- 1971 《發展中的臺灣山地行政》。南投：臺灣省政府民政廳。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 2011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四冊：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 1918 《理蕃誌稿：第一編、第二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 1937 《高砂族授產年報 昭和 11 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 1938 《理蕃誌稿：第五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

- 1936 《高砂族調查書・第一編：戶口、內臺人卜ノ接觸、衛生》。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 1937 《高砂族調查書・第二編：生活》。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 1938 《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 2002 〈霧社事件誌〉，收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下）》，頁 479-708。臺北：國史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 2011 《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編）、黃幼欣（主編）、陳連浚（譯）

- 2016 《《理蕃之友》中文初譯本・第一卷：創刊號-第四年四月號（1932 年 1 月-1935 年 4 月）》。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編）、黃幼欣（主編）、陳瑜霞（譯）

- 2016 《《理蕃之友》中文初譯本・第三卷：第七年六月號-第十二年十二月號（1938 年 6 月-1943 年 12 月）》。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趙芝良、全恆儀、洪貝旬

- 2014 〈黑暗中的景觀凝視與敘事：賽德克巴萊下的清流〉，《戶外遊憩研究》（臺北）27(3): 57-82。

劉瑞煌

- 2002 〈臺灣之農地重劃〉，《土地問題研究季刊》（臺北）1(4): 24-32。

鄧相揚

- 2000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鄧相揚、簡史朗

- 2023 《霧社事件調查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鄭安睇

- 2011 〈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1895-192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

戴國輝（編著）、魏廷朝（翻譯）

- 2002 《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臺北：國史館。

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

- 2002 《清流部落生命史》。南投：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

簡鴻模、依婉・貝林

- 2003 《中原部落生命史》。南投：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

顏愛靜、楊國柱

- 2004 《原住民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臺北：稻鄉出版社。

顧恒湛

- 2022 〈流轉記憶：霧社事件紀念碑的歷史閱讀〉，《臺灣史研究》（臺北）29(1): 159-207。

Alang Gluban after Musha Incident: Land Acquisition, Livelihood Changes and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 (1931-1980)

Huei-Hsien Chen

ABSTRACT

In 1931, survivors of the six tribes involved in the Musha Incident were relocated to Kawanakajima adjacent to the Han Chinese community, where they merged into a single tribe, now known as Alang Gluban, situated in Rena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Taking the present-day Alang Gluban landscape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aims to recount lesser-known stories about the tribal scenery based on oral interview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In particular, the process of land transfer in Kawanakajima is illuminated by the Collection of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especially “sale on forward contract” transactions, which subsequently led to the transition to paddy rice cultivation as the tribe’s primary means of subsistence in the years 1931-1980.

After the Musha Incident,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were generally rel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engage in paddy rice farming, with outcomes varying from place to place. The case of Kawanakajima, thanks to its low altitude and arable location, not to mention the fertile fields and paved waterways left by the former inhabitants, provided a relatively successful example of land-use change to paddy rice culti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given its geographical distance from Musha and the change in land usage practices, the tribe’s schism with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During the 1970s, Alang Gluban became the first indigenous reserve redistricted to showcase the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However, by the 1980s, income from agriculture wa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sustain the population. In the wake of some tribesmen’s experience of working off-site to raise funds for field improvements during redistricting, more opted to leave the tribe, either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to pursue education or earn their living.

From the Kawanakajima Tribe to today's Alang Gluban, the changing land use and livelihoods of tribal members over the past 50 years shows how modern state power affected the living space of Taiwan's ethnic group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how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were driven to switch from hunting to farming.

Keywords: Musha Incident, Kawanakajima Tribe, Alang Gluban, Paddy Rice Farming, Irrigation System, Tribal History

Left Behind: Untold Stories of Former Korean Sex Workers in Post-WWII Taiwan

Yoshihisa Amae*

ABSTRACT

After WWII, Koreans in Taiwan were repatriated to newly liberated Korea; however, not all left the island. According to “The Register of Korean Expatriates in Taiwan (臺灣韓僑登記名冊)” of 1947, 358 Koreans remained, including 48 young women who were heads of their households. Among these women, a third married local men, with another third labeled as “to be deported.” A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llowed Koreans to stay in Taiwan if they had a “proper job,” it is inferred that these women did not meet this requirement. Many had previously worked as prostitutes, with some believed to have been “comfort women”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rawing on government archival documents from Academia Historica and the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personal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elderly members of the Korean community in Taiwa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tcolonial lives of the young Korean women who remained on the island, whether by choice, chance, or coercion. Of the 48 women listed in the 1947 Register, only one is openly acknowledged as a former comfort woman, with two others allegedly so, while the rest may have worked as prostitutes.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binary distinction between “comfort women” and “prostitutes,” commonly viewed as distinct, if not opposing, categories. While different, the two groups share significant similarities. Both comfort women and prostitutes were trafficked overseas against their will and subjected to great hardship, and many comfort women were formerly prostitutes within the Japanese empire.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se women were victims not only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patriarchal forces that coerced them into prostitution but also of the Confucian ideals of female chastity, which hindered their return home after the war.

Keywords: Korean Diaspora, Comfort Women, Prostitutes, Japanese Empire, Colonial/Postcolonial Taiwan, WWII

* Adjunct Researcher at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來稿日期：2024 年 4 月 26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9 月 18 日。

01. Introduction
 02. Who Are the Hanqiao and Why They Matter
 03. Koreans in Postwar Taiwan: 1947 Register as Entry Point
 04. Taiwanese Police Records
 05. Korean Sex Workers in Prewar Taiwan
 06. From Prostitutes to Comfort Women
 07. Toyokawa Akiyoshi: A Korean Collaborator
 08. Data from Travel Permits from Taiwan to China
 09. Korean Comfort Women Survivor Testimonials
 10. Women Left Behind
 11. Conclusion: Beyond the Binarism of Prostitutes versus Comfort Women
-

--In the memory of Sök Hwak-sil (1927-1950)

1. Introduction

On March 28, 1950, a woman was found dead in her apartment in Changhua (彰化), central Taiwan. According to local news reports, a blood-stained knife was discovered at the scene. The deceased was a 23-year-old Korean woman named Sök Hwak-sil (石確實). Neighbors described her as an “unclean woman” who was married to a Taiwanese man but was living with two Korean men. On the night she lost her life, neighbors reported hearing a cry before someone slammed the door and rushed downstairs.¹ The police later detained Kim Il-che (金日濟) and Chang Sŭng-do (張承道), who admitted to being with Sök that evening. Chang told the police that he had left the site earlier that evening and was unaware of what had happened. Kim, on the other hand, stated that Sök had killed herself while he was in the bathroom. He told the police that Sök was in love with him and had asked him to marry her. According to Kim, when he refused, Sök lost all self-control and stabbed herself in the chest.² Due to insufficient evidence, Kim was not indicted, and the case was dismissed.

¹ *Taiwan minsheng ribao* [Taiwan People's Voice Daily], March 31, 1950, p. 5.

² *Taiwan minsheng ribao* [Taiwan People's Voice Daily], April 7, 1950, p. 4.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young Korean women like Sök who, instead of returning to newly liberated Korea, stayed in Taiwan during the post-WWII period. They are ethnic Koreans, known as *hanqiao* (韓僑) in postwar Taiwan, who were allowed to stay as long as they had “proper employment (正當職業).”³ Those who had a local spouse were also permitted residency, while the rest faced deportation.⁴ “The Register of Korean Expatriates in Taiwan (臺灣韓僑登記名冊 hereafter 1947 Register),” compiled by the Korean Association in Taiwan (臺灣韓僑協會) in February 1947, contains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358 compatriots in Taiwan, 48 of whom were young women in their early and mid-twenties.⁵ They are all heads of household (戶長) with no other family members listed. They arrived in Taiwan after 1928, with most coming between 1937 and 1945, and all but a few were teenagers at the time of their arrival. Given that it is unusual for so many young women to be traveling alone, it is assumed that most of them were trafficked to Taiwan in the 1930s and 40s as sex workers—specially as prostitutes (*shōgi*) and barmaids (*shakufu*).⁶ All but one woman were without jobs (the column for occupation

³ “Hanqiao chuli banfa dagang 〈韓僑處理辦法大綱〉 [Outline of Measures for Handling Overseas Koreans],” (June 10, 1946), in Pei-ping Xie, ed., *Zhanhou qiansong waiqiao fanguo shiliao huibian 1: Hanqiao bian* [Repatriated Migrants after World War II: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Vol. 1: Koreans] (Taipei: Academia Historica [Hereafter as AH], 2008), pp. 54-55.

⁴ A Korean woman was ordered to be deported after being caught engaging in prostitution. See “No. 392: Wei hanqiao nūzi Cui Yingzi feifa juliu mimi maiyin qingyu xianling chujing you 〈392：為韓僑女子崔英子非法居留秘密賣淫請予限令出境由〉 [No. 392: Restrict departure of Korean woman Ch’oe Yōng-ja’s illegal residence and secret involvement in prostitution, please issue an order for her deportation],” (August 29, 1951), 6. Hanqiao guanli 〈6. 韓僑管理〉 [6. Management of Korean Expatriates], Collection Number (Hereafter as CN): 04070251, in Gugsapyeonchan-wiwonhoe [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 ed., *Jungguk daeman sojae hanguksa jaryo josabogo II*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Materials on Korean History in China and Taiwan II] (Gwacheon: Gugsapyeonchan-wiwonhoe, 2007), Online Database: Korea History 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id/fs_014. This woman is not listed in the 1947 Register.

⁵ “Taiwan hanqiao dengji mingce 〈臺灣韓僑登記名冊〉 [The Register of Korean Expatriates in Taiwan],” (February 10, 1947), *Hanqiao diaocha yu dengji* 《韓僑調查與登記》 [Investig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Korean Expatriat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rchives (Taipei: AH), CN: 020-110400-0010.

⁶ The prewar Japanese state controlled the sex industry through a licensing system. The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legalized in Japan in 1900, was later expanded to its colonies: Taiwan in 1906 and Korea in 1916. Licensed prostitutes had to register with the police and could only work at their registered brothels. They were obligated to undergo weekly health checkups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s and were suspended from work if they did not pass. Barmaids worked in restaurants (*ryōriten*) serving alcohol. While they were not prostitutes, sexual transactions sometimes occurred. Unlike licensed prostitutes, who were required to live in brothels, barmaids were not permitted to live at their workplaces to prevent illegal sex, and their movements were not restricted. A licensed prostitute’s contract lasted for four years and could not be renewed with the same employer. However, barmaids and geisha (*geigi*) were not subject to these restrictions. See Jungwon JIN,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Taiwanshi yanjiu*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aipei) 17: 3 (September 2010), pp. 127-128.

in the 1947 Register is left blank). Of the 48 women, 16 had a “should be deported (應行遣送)” stamp beneath their names, while another 18 were marked as “married to a citize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已與中華民國人結婚).” Six women were listed under “Whereabouts Unknown (去向不明者).”

Why did so many young women stay in Taiwan after WWII instead of returning to the motherland? What were their postwar lives like?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any connection to the infamous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using relevant literature, including testimonials from former Korean comfort women, as well as a careful reading of relevant government archive materials, primarily from the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hereafter AH) and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hereafter NAA).⁷ However, since the written records are very limited, I have drawn on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personal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senior members of the Korean community.

2. Who Are the Hanqiao and Why They Matter

While several works examine Korean sex workers and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⁸ none focus on their postcolonial lives. In fact, there are very few studies on *hanqiao* in postwar Taiwan.⁹ Early postwar records indicate that

⁷ The NAA was established to manage and preserve government records, as well as to ensure public acc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chives Act, which was passed in December 1999 and came into effect in January 2002.

⁸ Som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as follows: Jungwon JIN,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pp. 107-149;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in Osaka Sangyō Daigaku Sangyō Kenkyūjo, ed., *Kindai shakai to baishun mondai* [A Study of Modern Prostitution] (Osaka: Osaka Sangyō Daigaku Sangyō Kenkyūjo, 2001), pp. 81-116; Takashi Komagome, “Taiwan shokuminchi shihai to Taiwanjin ‘ianfu’ [Colonial Rule of Taiwan and Taiwanese ‘Comfort Women’],” in VAWW-NET Japan, ed., *‘Iantfu’: Senji seibōryoku no jittai I: Nihon, Taiwan, Chōsen hen* [“Comfort Wome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Vol. I: Japan, Taiwan, and Korea] (Tokyo: Ryokufu shuppan, 2000), pp. 118-155.

⁹ Seong-su An, “Jidujiao chuango yu Taiwan gangshi de hanren yimin: Yi Jilong Hanguo jiaohui wei zhongxin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Korean Immigration in Taiwan Port City: A Focus on Korean Church in Keelung],”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2011); Junghwa minguk haninhoe [Korean Association in ROC], *Daeman hanin 100nyeonsa* [Centennial History of Koreans in Taiwan] (Incheon: Daeman hanin 100nyeonsa pyeonchan wiwonhoe, 2019); Yoshihisa Amae, “Taiwan kankyō no posuto koroniaru: Yim Du-uk Taiwan kankyō kyōkai rijichō wo chūshin ni [Postcolonial Bodies: A Tale of

there were 2,199 Korean civilians in Taiwan when the war ended in August 1945,¹⁰ most of whom opted to return to Korea which was liberated from Japanese rule after 35 years. According to records, 1,971 civilians left Taiwan on April 24, 1946;¹¹ however, 1947 Register documents 358 individuals who remained. The actual number was likely larger, as people were able to travel across borders with relative eas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¹² Smuggling was rampant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particularly the Ryukyu Islands, as well as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and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until tens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heightened in the late 1940s.¹³ There were also people hiding on the island to avoid deportation. The numbers are inconclusive, as some were waiting to be repatriated, with 16 out of 358 marked as “willing to return to their homeland (自願回國).”

In postwar Taiwan, *hanqiao*, as an ethnic minority, experienced liminality between their “motherland” Korea—both real and imaginary—and their new “homeland” Taiwan where they had settled since the end of WWII. Korean women faced dually marginalized based on their ethnicity and gender. Among them, former sex workers were considered the marginals of the marginalized, as the sex industry was stigmatized in the Confucius society which held female chastity in high regard.¹⁴ It is therefore not difficult to imagine their intersectionality — that is, the multiple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nd disadvantage these women experienced due to their race, sex, clas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

Yim Duuk and Ethnic Koreans in Postwar Taiwan, 1945-1970],” *Ritsumeikan Ajia Nihon kenkyū gakujutsu nenpō* [Annual Review of Asia-Japan Research at Ritsumeikan] (Ibaraki) 1 (June 2020), pp. 28-47.

¹⁰ “Hanqiao zhanhuan jizhong qingshi an 〈韓僑暫緩集中請示案〉 [On Temporarily Easing Concentration of Korean Expatriates],” (January 15, 1946), *Hanguoren chuli qingxing* 《韓國人處理情形》 [Situation of Handling Koreans], Taiwan Provincial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Archives (Nantou: Taiwan Historica [hereafter as TH]), CN: 00306510041003.

¹¹ Pei-ping Xie, ed., *Zhanhou qiansong waiqiao fanguo shiliao huibian 1: Hanqiao bian* [Repatriated Migrants after World War II: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Vol. 1: Koreans], p. 684. Additionally, there were 1,313 former Korean soldiers and civilian employee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According to local news, 850 of them left Taiwan on March 20, and the remaining 463 departed on March 23. See *Taiwan xinshengbao* [Taiwan Xinsheng Daily News], March 23, 1946, p. 4.

¹² Among the 54 Korean individuals who applied for residential cards between May and November 1947, 48 were not listed in the 1947 Register. See *Hanqiao diaocha yu dengji* [Investig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Korean Expatriat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rchives, CN: 020-110400-0010.

¹³ For details, see Masaie Ishihara, *Kūhaku no Okinawa shakaishi: Senka to mitsubōeki no jidai* [The Blank Social History of Okinawa: The Era of Looting and Smuggling] (Tokyo: Banseisha, 2000).

¹⁴ Katrina Maynes, “Korean Perceptions of Chastity, Gender Roles, and Libido: From Kisaengs to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Grand Valley Journal of History* (Allendale) 1: 1 (February 2012), p. 3.

under both prewar Japanese and postwar Chinese Nationalist regimes, as well as the complex problems that arose from these intersecting factors.

Giving voice to those rendered voiceless and socially marginalized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humanities. The stories of young Korean women in postwar Taiwan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land's past by adding another layer of human experience. Furthermore, they shed light on responsibilities of colonialism and war induced by the Japanese empire.¹⁵ Koreans in postwar Taiwan, including the young women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remnant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as their dislocation would not have occurred without the imperial structure into which the Korean nation was forcibly incorporated and the demands it created.

3. Koreans in Postwar Taiwan: 1947 Register as Entry Point

The 1947 Register lists Korean expatriates by city and province, provid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name, gender, age, birthplace, occupation, and time of arrival in Taiwan (or China).¹⁶ Sök Hwak-sil, whose tragic death was discussed earlier, was 21 years old, originally from South P'yöngan Province (平安南道), and arrived in Taiwan (or China) in "1942."¹⁷ She is marked as "should be deported." Sök is among the few who came from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only 33 northerners are listed, which is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all individuals recorded. Kim Il-che and Chang Söng-do, who were implicated in Sök's death, are among them.¹⁸ Other young women who were single like Sök at the end of WWII mostly hailed from the southern provinces, particularly Kyöngsang Province (慶尙道), which is divided into North and South. Eighty

¹⁵ For discussions among Japanese intellectuals on this issue, see Eika Tai, "Japan's Colonial Responsibility and National Subject Formation," *Jinken Mondai Kenkyū* [The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Osaka) 12/13 (March 2013), pp. 77-96.

¹⁶ The place of their arrival can be other parts of China, and not Taiwan, as it is written, "*laihua nianyue* 來華年月 [year and month arriving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ate of their arrival is written in the Year of the Republic (*mingguo* 民國).

¹⁷ The exact month of her arrival is not provided.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that reported her death, Sök arrived in Taiwan in "March 1947." She most likely came to Taiwan via mainland China in 1947.

¹⁸ Kim and Chang arrived in Taiwan in November 1946 from Hainan Island, where they had worked as train conductors for a mine owned by a Japanese company. Kim Il-che 金日濟,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Kaohsiung City, October 19, 2016.

percent of the women listed are from this province (see Figure 1, striped region).¹⁹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single women from Kyōngsang Province is striking. This region appears to have been a hotbed of sex trafficking, with records indicating tha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women from Kyōngsang became comfort women. Of the more than 170 women who came forward after 1991 as former comfort women, 97 were from North and South Kyōngsang Provinces, compared to 27 from North and South Chōlla Province (全羅道) and 10 from North and South Ch'ungch'ōng Province (忠清道).²⁰ Coincidentally, Fujinaga Takeshi, a Japanese expert on modern Korean history, notes that there was a widespread rumor in the city of Kyōngju (慶州), North Kyōngsang Province, in the summer of 1939 that “a man surnamed Ch'oe (崔)” was trafficking large numbers of women to Taiwan, and many brothel owners from North and South China as well as Japan were flocking to Kyōngju to purchase women.²¹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which Fujinaga consulted in his research, 70 percent of the women arriving from Korea in 1939 were from Kyōngsang Province.²²

Another detail gleaned from the 1947 Register is that all 48 women were relatively young,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4.8 years; the youngest was 21, and the oldest 36.²³ Eighty-two percent arrived in Taiwan after 1936 (58% arrived between 1936 and 1941, and 24% between 1942 and 1945). Their average age at the time of arrival was 18.²⁴ Additionally, nearly 40 percent of the women were “married to a citize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²⁵ In Tainan City, for example,

¹⁹ Out of the 48 women, the birthplaces of 10 were unknown.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from Kyōngsang Province among the total 358 listed in the Register is 41 percent.

²⁰ Young-hoon Rhee, ed., Chizuko T. Allen, trans., *Anti-Japan Tribalism: The Root of the Korean Crisis* (Honolulu: PacRim Marketing Group, 2024), p. 235.

²¹ Takeshi Fujinaga, “Senjiki Chōsen ni okeru ‘ianfu’ dōin no ‘ryūgen’ ‘zōgen’ wo megutte [Concerning the ‘Rumors’ and ‘Fabrications’ of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Wartime Korea],” in Toshihiko Matsuda and Jungwon JIN, eds., *Chiiki shakai kara miru teikoku Nihon to shokuminchi: Chōsen, Taiwan, Manshū* [Imperial Japan and Its Colo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Communities: Korea, Taiwan, and Manchuria] (Kyoto: Shibunkaku, 2013), p. 741.

²² Takeshi Fujinaga, “Senjiki Chōsen ni okeru ‘ianfu’ dōin no ‘ryūgen’ ‘zōgen’ wo megutte [Concerning the ‘Rumors’ and ‘Fabrications’ of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Wartime Korea],” p. 742.

²³ Two of the names are listed without an age. The age in the 1947 Register may reflect the person’s “Korean age,” which starts at one at birth and increases with each New Year, not on birthdays.

²⁴ The arrival dates of 14 women are unknown.

²⁵ Six women are listed as “Whereabouts Unknown” and, therefore, have no marks. Unless they were married, they would have received a “should be deported” stamp.



Figure 1: Cities and Provinces in Korea

Note: Created by the author, 2024.



Figure 2: Cities, Counties, and Townships in Taiwan

Note: Created by the author, 2024.

five out of seven women were married to local men,²⁶ as were all three women in Tainan County. While the possibility of genuine romance cannot be entirely ruled out, these marriages were most likely arrangements of convenience to avoid deportation.

4. Taiwanese Police Records

Police records in the NAA offer insights into why these women remained in Taiwan. Three Korean women were documented by the Tainan City police in

²⁶ No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for the two other women, except their gender and an incomplete address.

an August 1946 report titled “Investigation Form of Koreans Expatriates.”²⁷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s personal data of these women, including age, place of birth, and current address. It also lists their level of education, prewar and current occupations, date of arrival in Taiwan, reasons for coming, willingness to return to Korea, and reasons for wanting to stay in Taiwan.

Yi Chun (李春) was one of the three women investigated. She was 22 years old, single, and illiterate. In the prewar period, she was employed as a “barmaid in a restaurant (料理店酌婦)” and was described as currently being a “prostitute in a club (遊樂館妓女).”²⁸ The document states that she “was duped into coming to Taiwan (被人欺騙來臺)” in 1941 and was unwilling to return to Korea because she has “no relatives in Korea, no job, and no confidence in having a stable life there (本國並無親戚回國無職業不自信生活安定).” She owed the brothel owner 2,000 yuan, which amounted to a year’s salary for a low-skilled laborer.

Yi’s name appears in the “Whereabouts Unknown” s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1947 Register. The Tainan police document reveals her original (prewar) address in Taiwan as “Sengetsurō (鮮月樓),” a Korean brothel in Taichung, before she moved to Tainan. It is likely that Yi left Tainan and went into hiding after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to avoid deportation. In addition to Yi, eight other Koreans are listed under “Whereabouts Unknown,” five of whom were women in their early twenties.

One of these women, Chǒng Chin-ok (鄭今玉), also appears in the Tainan City police record. She was married to a Chinese lieutenant surnamed Hu (胡) and expressed a desire “not to return to Korea (不要回韓).” Chǒng arrived in Taiwan in 1942 to “visit a friend (訪問友人)” and was unemployed in both the prewar and postwar periods.²⁹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Chǒng was living with Hu, but their marriage procedures had not yet been completed. It is possible that Chǒng run away later, leading to her inclusion in the “Whereabouts Unknown” section of the 1947 Register.

²⁷ “Dianfa tainan shi hanqiao diaocha biao 〈電發臺南市韓僑調查表〉 [Telegraphic Dispatch: Investigation Form of Korean Expatriates in Tainan City],” (August 14, 1946), *Hanqiao guanli* 《韓僑管理》 [Management of Korean Expatriates], Tainan City Government Archives (New Taipei: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hereafter as NAA]), CN: A376610000A/0035/B065.1/1/13/003.

²⁸ Barmaids is a euphemism for unlicensed prostitutes.

²⁹ This information cannot be taken at face value, as it is unlikely that a teenage girl would travel alone to “visit a friend” in 1942.

Sök Hwak-sil's postwar trajectory resembles those of these women, as she also moved frequently. She married a Taiwanese man in Kaohsiung and was still married at the time of her death in 1950, despite living in a different city with two Korean men. Neighbors reported seeing the three of them going to movies and living together in a small apartment. One neighbor recalled that Sök often cried but would not reveal what was troubling.³⁰ Police records found in NAA indicate that she lived in Tainan for a while before moving to Kaohsiung in December 1949 after her marriage.³¹ Another document reveals that she was admitted to a mental hospital in Taipei in November 1947 for just over a month.³² According to the 1947 Register, Sök arrived in Taiwan (or China) in 1942, meaning she was only 16 or 17 at the time of her arrival. Her address in Taichung City is adjacent to Sengetsurō, a Korean brothel. Similar to ex-Korean comfort women whose testimonials we will examine later, single women like Yi and Sök seem to have moved from one city to another to evade arrest and deportation.

5. Korean Sex Workers in Prewar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Japanese census, there was only one Korean woman in Taiwan in 1920. The number of female Korean has grown rapidly thereafter, surpassing that of male Korean by 1925. By 1932 and continuing through 1943, the female Korean population outnumbered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significantly (see Figure 3).³³ While most men worked in the fishery industry, women predominantly found employment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接客業

³⁰ *Taiwan minsheng ribao* [Taiwan People's Voice Daily], March 31, 1950, p. 5.

³¹ “Jiansong hanqiao Shi Que-shi riqiao Rujiao Chiyo deng dongtaibiao ge yifen 〈檢送韓僑石確實日僑入角チヨ等動態表各乙份〉 [Enclosed are one copy each of the activity records for Korean expatriate Sök Hwak-sil and Japanese expatriate Irisumi Chiyo],” (January 6, 1949), *Riqiao guibi huiji* 《日僑規避回籍》 [Japanese Expatriates Evading Repatriation], Academia Historica Archives (New Taipei: NAA), CN: A202000000A/0036/474/1262/31/024.

³² “Zhun Tainan xianzhengfu dian wei hanqiao Shi Que-shi qianzhu gaiqu xi zhizhao jufuyou 〈准臺南縣政府電為韓僑石確實遷住該區希知照具覆由〉 [The Tainan County Government is hereby authorized by telegram to confirm the relocation of Korean expatriate Sök Hwak-sil to the specified area and to provide notification and a response],” (March 4, 1948), *Waiqiao huji yidong dengji an* 《外僑戶籍異動登記案》 [Case of Registration for Foreign Nationals' Household Record Change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rchives (New Taipei: NAA), CN: A379000000A/0037/133.53/1.

³³ No statistics are available after 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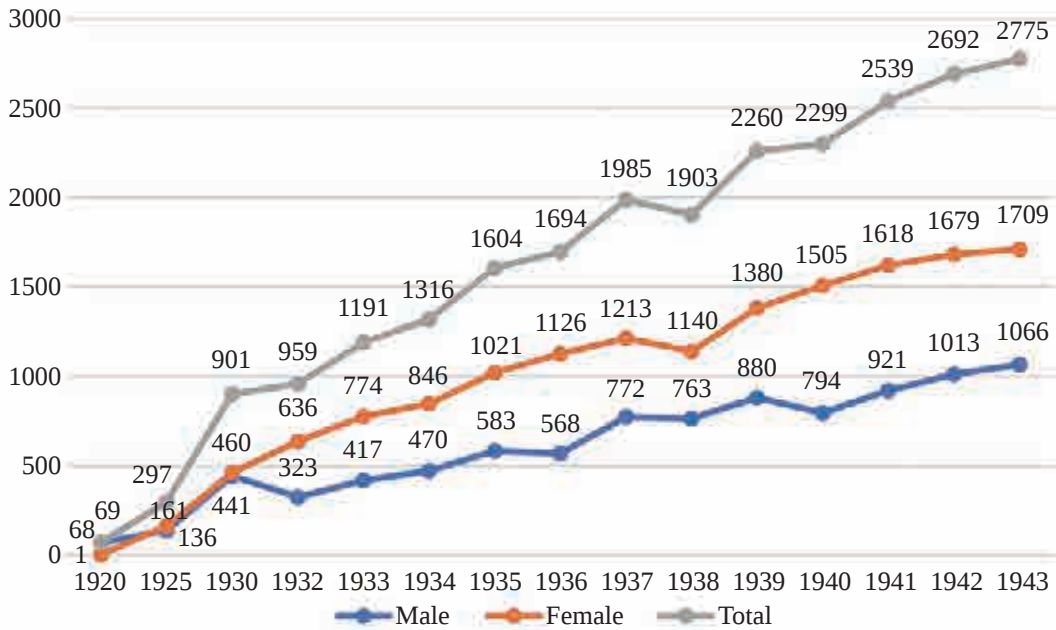


Figure 3: Korean Population in Taiwan

Sources: Taiwan sōtoku kambō rinji kokusei chōsabu [Temporary Census Bureau, Office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ed., *Kokusei chōsa kekkahyō Shōwa go-nen, zentō-hen* [National Census Results, Showa Year Five, Island-Wide Edition] (Taihoku: Taiwan sōtoku kambō rinji kokusei chōsabu, 1934), p. 22; “Meiji sanjū hachi-nen ikō kakunenbetsu kokō [Annual Household Census Since Meiji year 38]”; Taiwan sōtokufu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ed., *Taiwan kokō tōkei* [Taiwan Household Statistics] (Taihoku: Taiwan sōtokufu, 1944), pp. 108-109.

sekkyakugyō)” as prostitutes and barmaids.³⁴ The number of Korean licensed prostitutes (129) even exceeded that of Taiwanese prostitutes (119) by 1930.³⁵ Nevertheless, the vast majority of licensed prostitutes were Japanese, numbering

³⁴ Hospitality industry was a euphemism for sex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³⁵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94. This was not the case for “unlicensed prostitution,” however. Taiwanese women dominated the industry, which primarily served Taiwanese male customers. Since the late 1920s, colonial authorities began registering unlicensed prostitutes in Taiwan as “barmaids (*shakufu*).” See Fujinaga Takeshi, “Teikoku Nihon to shokuminchi kōshō seido: Taiwan no jirei wo chūshin ni [Imperial Japan and the Colonial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Taiwan],” *Teikoku shisutemu no seiji bunka teki hikaku kenkyū*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Imperial Systems] (Kyoto) 11 (September 2005), p. 2.

871 in 1930.³⁶ The number of Korean licensed prostitutes continued to rise in the 1930s and 40s, peaking at 249 in 1940. Although the number dropped to 185 in 1942 (with no data available after 1942), Koreans comprised nearly 25 percen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licensed prostitutes in Taiwan during 1939, 1940, and 1941.³⁷

The high percentage of Korean sex workers in Taiwan can be attributed to regulations concerning licensed prostitution in the Japanese Empire. In Taiwan, the minimum age for prostitution was set at 16, whereas it was 17 in Korea and 18 in Japan.³⁸ Korean historian JIN Jungwon notes that among the 1,618 women brought to Taiwan from Korea as prostitutes during the Japanese period, ages 16 and 17 represented the largest groups, with 235 (14.5%) and 243 (15%) respectively.³⁹ The influx of Korean sex workers into Taiwan coincid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licensed prostitution in colonial Korea. The number of licensed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Korea, both Japanese and Koreans, surged due to the economic boom generated by World War I, with Korean licensed prostitutes increasing from 585 in 1913 to 1,314 in 1919.⁴⁰

³⁶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94.

³⁷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94.

³⁸ Takeshi Fujinaga, "Chōsen shokuminchi shakai to 'ianfu' seido no seiritsu katei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in Korean Colonial Society]," in VAWW-NET Japan, ed., *"Ianfu" senji seibōryoku no jittai I: Nihon, Taiwan, Chōsen hen* ["Comfort Wome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Vol. I: Japan, Taiwan, and Korea], p. 204. Althoug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atifi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 in 1925, which prohibited sex trafficking of women under 21, it kept the minimum age for prostitutes in Japan at 18 and excluded its colonies from the convention's application. See Xiu-zhen Liao, "Nihon shokumin tōchika no Taiwan ni okeru kōshō seido to shōgi ni kansuru shogenshō [Events Relating to Licensed Prostitutes and Prostitute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Ajia joseishi kokusai symposium jikkō iinkai, ed., *Ajia joseishi: Hikakushi no kokoromi* [Asian Women's History: An Attempt at Comparative History] (Tokyo: Akashi shoten, 1997), pp. 416-417.

³⁹ The third largest group was 18 years old, with 167 girls (10%), and 54 girls (3%) were under 16. See Jungwon JIN,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p. 137, Figure 6. However, the numbers in the figure only add up to 1,155, not 1,618. No explanation is provided.

⁴⁰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kōshō seido to nihongun 'ianfu' seido [Colonial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and the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System]," in Noriyo Hayakawa, ed., *Shokuminchi to sensō sekinin* [Colonialism and War Responsibility]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2005), p. 34. It is worth noting, however, that the numbers of prostitutes and barmaids were much lower in colonial Korea compared to Japan proper. For example, in 1930, Japan had 52,117 prostitutes and 75,535 barmaids, whereas Korea had 3,205 and 1,685, respectively. The population ratio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in 1930 was approximately

Many young women were forced into prostitution against their will. Reports of girls being kidnapped or duped into prostitution appeared in Korean newspapers as early as the late 1910s.⁴¹ Poverty compelled families in rural areas to sell their daughters into indentured prostitution,⁴² while brokers trafficked these girls abroad to areas like China, Japan, Taiwan, and Sakhalin to maximize their profits.⁴³ It is said that Korean prostitutes were particularly popular among Japanese men, who perceived them to be “docile” and “better looking” than Japanese women.⁴⁴ These vulnerable girls endured hard labor and conditions akin to slavery,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uffering. Notably, the *Taiwan nichinichi sinpō* reported at least five suicide attempts by Korean prostitutes between 1926 and 1934, alongside an incident in which a drunken soldier severely injured a Korean prostitute by stabbing her.⁴⁵

Anothe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overrepresentation of Korean women in Taiwan’s sex industry was social change in Japan. Beginning in the 1920s, a social movement against licensed prostitution emerged in Japan, making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Japanese women to enter the business, let alone travel to Taiwan to work as prostitutes. JIN argues that Korean girls filled this gap.⁴⁶ There were 21

three to one. See Masaru Tonomura, “Shōgitō shūsengyō to ianfu no yōin kakuho: Nihon naichi to Chōsen tonō hikaku [Role of Prostitute Brokerage in the Recruitment of Comfort Women : A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Proper and Colonial Korea],” *Ryūkoku daigaku keieigaku ronshū*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Studies Ryukoku University] (Kyoto) 61: 2 (April 2022), p. 31.

⁴¹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kōshō seido to nihongun ‘ianfu’ seido [Colonial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and the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System],” p. 35.

⁴²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99. In 1926, the advanced payments for Korean girls were 250-300 yen for a three-year contract (occasionally rising to 400 or 500 yen), compared to 1,000-2,000 yen for girls sold into prostitution in Japan. See Yūko Suzuki, Yōng-ae Yamashita, and Masaru Tonomura, eds., *Nihongun “ianfu” kankei shiryō shūsei, jō* [Collection of Relevant Documents on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Army, Vol. 1] (Tokyo: Akashi shoten, 2006), p. 821.

⁴³ Yoshiaki Yoshimi and Hirofumi Hayashi, eds., *Kyōdō kenkyū nihongun ianfu* [A Joint Research on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Tokyo: Ōtsuki shoten, 1995), p. 216.

⁴⁴ Takeshi Fujinaga, “Chōsen shokuminchi shakai to ‘ianfu’ seido no seiritsu katei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in Korean Colonial Society],” p. 205.

⁴⁵ *Taiwan nichinichi sinpō* [Taiwan Daily News], October 12, 1927, p. 5.

⁴⁶ Jungwon JIN,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p. 139. While the data shows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Japanese licensed prostitutes in Taiwan during the 1920s, their numbers were still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Koreans. See Jungwon JIN,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p. 124, Figure 4.

Korean brothels on the island, with major cities typically hosting two or three each.⁴⁷ In addition, there were twice as many “restaurants” employing Korean barmaids.⁴⁸ Notably, all but one of the 21 brothels were owned by Korean men, three of whom shared the surname “Ch’oe.”⁴⁹

The brothel business was lucrative, allowing some owners to gain financial power and ascend to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within the local Korean community in Taiwan. One such example was Kim Ch’an-ho (金贊瑚), owner of Chōkarō (朝花樓), a Korean brothel in Takao (present-day Kaohsiung), who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local Korean association in March 1938.⁵⁰ Yang Ō-su (梁魚壽), co-owner of Senkarō (鮮花樓), a Korean brothel in Taihoku (present-day Taipei),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Taiwan Korean Association in Taihoku in 1937.⁵¹ Both Kim and Yang seem to have returned to Korea after the war, as their names do not appear in the 1947 Register. Kil Yōng-bin (吉英彬), co-owner of Sengetsurō, another Korean brothel in Takao, left Taiwan soon after the war but later returned.⁵²

6. From Prostitutes to Comfort Women

When the Japanese military began establishing comfort stations for the soldi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uring the 1930s and 40s, many women were

⁴⁷ Jungwon JIN,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p. 133, Table 3.

⁴⁸ Close to 50 Korean restaurant owners are recorded between 1933 and 1942. See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90.

⁴⁹ It is not clear if they were related or if one of them is the same Ch’oe who is rumored to be trafficking girls to Taiwan from Kyōngju. See footnote 21.

⁵⁰ In the same meeting in which Kim was elected, association members raised 500 yen as a donation to the military in celebration of the fall of Nanjing in December 1937. See *Taiwan nichinichi sinpō* [Taiwan Daily News], March 21, 1938, p. 7.

⁵¹ Meitetsu Haruyama, ed., *Taiwan tōnai jōhō hontōjin no dōkō* [Intelligence Inside Taiwan: Trends of the Islanders] (Tokyo: Fuji shuppan, 1990), p. 41.

⁵² Jungwon JIN,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p. 133, Table 3. For Kil’s postwar activities, see Yoshihisa Amae, “Taiwan kankyō no posuto koroniaru: Yim Du-uk Taiwan kankyō kyōkai rijichō wo chūshin ni [Postcolonial Bodies: A Tale of Yim Duuk and Ethnic Koreans in Postwar Taiwan, 1945-1970],” p. 38.

recruited from Japan and its colonies as “comfort women.”⁵³ Initially, the military required comfort women to be “professional sex workers aged over 21 from Japan proper.”⁵⁴ However, as the demand grew, non-professional women were also recruited from Korea and Taiwan—often through deceptive means—and shipped to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even dangerous frontlines, along with Japanese comfort women.⁵⁵ The job was intense and perilous, but the compensation was substantial,⁵⁶

⁵³ For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which ranges from 60,000 to 200,000, see Ikuhiko Hata, *Ianfu to senjō no sei* [Comfort Women and Sex in the Battle Zone] (Tokyo: Shinchōsha, 2005), pp. 397-406.

⁵⁴ Komagome Takashi, however, believes that such a requirement did not apply to women in the Japanese colonies, namely Korea and Taiwan, given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id not adhere to the 1921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 within its colonies. See Takashi Komagome, “Taiwan shokuminchi shihai to Taiwanjin ‘ianfu’ [Colonial Rule of Taiwan and Taiwanese ‘Comfort Women’],” p. 134. Tonomura Masaru, a scholar of modern Korean history, argues that the military would have preferred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sex workers over inexperienced women for the smooth management of the comfort stations. Military officials would not have wanted women recruited against their will, for if this became publicly known, it could tarnish the reputation of the imperial army. See Masaru Tonomura, “Shōgitō shūsengyō to ianfu no yōin kakuho: Nihon naichi to Chōsen tonō hikaku [Role of Prostitute Brokerage in the Recruitment of Comfort Women : A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Proper and Colonial Korea],” p. 41.

⁵⁵ The Allied forces captured 20 Korean “comfort girls” in August 1944 in the mopping-up operations after the fall of Myitkyina in Burma. According to this declassified US Army report, approximately 800 Korean girls arrived in Rangoon in August 1942 in groups of 8 to 22, from which they were distributed to various parts of Burma, usually to fair-sized towns near Japanese Army camps. See “US-11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49: Korean Comfort Women, 1944,” (October 1, 1944), *Comfort Women Resource Center*. Available at: https://international.ucla.edu/cks/care/us_allieddocs/250902, accessed October 15, 2024. During the Battle of Ramou, 10 to 14 women lost their lives fighting alongside the soldiers. See Toyomi Asano, “Kita Biruma Yunnan sensen ni okeru nihongun no sakusen tenkai to ‘ianfu’ tachi [“Comfort Women” and the Japanese Military’s Operations on the Yunnan Front in North Burma],” in Gunjishi gakkai, ed., *Nichū sensō sairon* [Revisit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Tokyo: Kinseisha, 2008), p. 309.

⁵⁶ For instance, Mun Ok-chu (文玉珠), a former Korean comfort woman, deposited 26,145 yen in her military postal savings account between March 1943 and September 1945 while working in Burma. See Ok-chu Mun, *Biruma sensen Tate shidan no ‘ianfu’ datta watashi* [I Was a “Comfort Woman” of the Tate Division in the Burma Front] (Tokyo: Nashi no kisha, 1996), p. 206. A diary of “Mr. Park (朴),” a receptionist at the Kikusui Club (菊水俱樂部), a comfort station in Singapore, reveals that he visited the bank to wire 11,000 yen to one of the Korean girls who used to work at Kikusui. See Byeong-jik An, ed., Kazuo Hori and Kan Kimura, trans., *Biruma Singapōru no jūgun ianjo* [Comfort Stations in Burma and Singapore], p. 159. Available at: *nadesiko-action*, http://nadesiko-ac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3/10/comort_women_diary.pdf, accessed January 15, 2024. According to Mun, in those days, one could buy a small house in Taegu for 1,000 yen. See Ok-chu Mun, *Biruma sensen Tate shidan no ‘ianfu’ datta watashi* [I Was a “Comfort Woman” of the Tate Division in the Burma Front], p. 76. A former Navy Lieutenant Colonel recalls that the women came to the war front with an advance payment of 4-5,000 yen and were on a one-year contract. Some paid it back in a matter of three to six months. They accumulat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savings, on average, 5,000 to

compelling many debt-ridden women to seek overseas opportunities as comfort women. Data indicates that within a decade after Japan's invasion of Manchuria in September 1931, the number of prostitutes in Japan decreased by 25,000, while the number of barmaids and geisha dropped by nearly 40,000.⁵⁷

Some brothel owners in Taiwan viewed Japan's expansionism as an opportunity and took their employees to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for profit. Okubira Keidō (奥平恵道), an Okinawan man who ran a barber shop in Denryōchō (田寮町), a popular red-light district in Keelung, recalls:

When the war [the Sino-Japanese war] began, they [the military] said there were no women in China. "Bring them over, so that we can boost our morale..." That is when the madam of the brothel in Gijūchō (義重町) took several women and went to China. She told people around her, "I'm going to make lots of money over there!" However, the women who came back later told me it was so distressing. They had to take in 20 to 30 men a day. These comfort women were all exhausted.⁵⁸

Another account from a 1955 magazine article, written by a former Navy Lieutenant Colonel, shares the testimonial of a female brothel owner in Tainan:

I went to Manila in December 1942. My establishment was in Tainan, and at the

10,000 yen; some saved 30,000 yen. See Minoru Shigemura, "Tokuyōin toiu na no butai [A Unit Called Special Task Force]," *Bungei shunjū* [Annals of Art and Culture] (Tokyo) 33: 22 (December 1955), p. 225. The aforementioned US Army report also mentions that while the income of the girls varied depending on how much of a debt they owned, the comfort station master received 50 to 60 percent of their earnings. On average, a girl would earn 1,500 yen per month. See "US-11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49: Korean Comfort Women, 1944," p. 3. The same report also notes that the Army issued an order in late 1943 stating: "Certain girls who had paid their debt could return home. Some of the girls were thus allowed to return to Korea."

⁵⁷ Yuki Fujime, "Nihonjin 'ianfu' wo fukashi ni suru mono [What Makes Japanese "Comfort Women" Invisible]," in VAWW-NET Japan, ed., *Sabakareta senji seibōryoku*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Under Trial] (Tokyo: Hakutakusha, 2002), p. 102. For more details, see Ikuhiko Hata, *Ianfu to senjō no sei* [Comfort Women and Sex in the Battle Zone], p. 30, Table 2-2. Hata notes that the case was different for Korea: the number of licensed prostitutes in Korea, which reached 7,900 in 1937, remained almost the same in 1942. He infers that, in Korea, those who were recruited as military comfort women were mostly inexperienced women, not professionals. See Ikuhiko Hata, *Ianfu to senjō no sei* [Comfort Women and Sex in the Battle Zone], p. 409.

⁵⁸ Mamoru Akamine, ed., *Okinawa sekimin no Taiwan hikiage shōgen shiryōshū* [A Collection of Testimonies and Documents of "Okinawans" Who Repatriated From Taiwan] (Naha: Kokusai insatsu, 2018), pp. 175-176.

time, the mood to advance to the south was so strong that navy officers from Takao and Tainan visited us often. So, when the war broke out and Manila fell, I immediately visited the Navy headquarters in Taihoku and asked for permission to open a store in Manila. It was not until the end of 1942 that I got permission. I quickly gathered 13 women in my place, and together with a chef, a hairdresser, a carpenter, and a plaster worker, 30 of us departed from Takao by the year's end.⁵⁹

According to her, they traveled to Manila on a Navy vessel. In Manila, they were assigned a “freemason temple,” which they converted into a comfort station for Navy officers. There were four or five other comfort stations for enlisted sailors. The Army, being larger in size, had one comfort station for officers and a dozen for enlisted men. Business flourished, and the number of women later grew to 20. However, after the American counterattack in September 1944, the Navy ordered that all “special task force (*tokuyōin*)” return to Japan.⁶⁰

While there are no documents or testimonials suggesting that any of the 21 Korean brothel owners in Taiwan took their employees overseas as comfort women,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Korean sex workers in Taiwan also became comfort women. JIN Jungwon, who examined the family registers of brothel owners in Taiwan, found that among the 43 women at Chōsenrō (朝鮮樓) in Tainan, 15 returned to Korea, and while the other 27 were sold to other Korean brothels. She infers that some of these women eventually became comfort women.⁶¹ Another brothel in Tainan, named Sengetsurō, had 64 women registered under the Korean owner Ch'oe. When Ch'oe returned to Korea in 1942, 24 women also returned home,⁶² but the fate of the remaining 40 remains uncertain.

7. Toyokawa Akiyoshi: A Korean Collaborator

As noted earlier, in addition to Korean brothels, nearly 50 restaurants were

⁵⁹ Minoru Shigemura, “Tokuyōin toiu na no butai [A Unit Called Special Task Force],” p. 223.

⁶⁰ *Tokuyōin* (特要員) was a term used in the Navy for comfort women. Minoru Shigemura, “Tokuyōin toiu na no butai [A Unit Called Special Task Force],” p. 224.

⁶¹ Jungwon JIN,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p. 120, footnote 32.

⁶² Jungwon JIN,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p. 120, footnote 32.

run by Korean owners in colonial Taiwan. These establishments employed barmaids whose primary role was to serve beverages and entertain customers. Although it was illegal, many of these women also engaged in sex work. “Toyokawa Akiyoshi (豊川晃吉),” a native of Jeju Island, is mentioned in declassified army documents as one of the three contact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procuring comfort women for the Southern Expeditionary Army Group (*Nanpō sōgun* 南方總軍) deployed in Borneo. He operated a restaurant in Keelung named Meigetsutei (明月亭).⁶³

According to Zhu De-lan, a Taiwanese expert on comfort women, Toyokawa, aside from his own family members, had a total of 43 individuals (30 employees and 13 co-inhabitants) registered under his household between March 1933 and October 1944, 38 of whom were female and 5 males. Among the 38 females, 21 were below the age of 20 (11 from Korea; 8 from Okinawa, and 2 from Japan); and 11 between 21-25 years old (4 Koreans; 5 Okinawans, and 2 Japanese); and 6 between 26-35 years old (5 Koreans and 1 Okinawan). Of the individuals registered, 17 stayed in Taiwan for less than one year, while 25 remained for over a year.⁶⁴ Zhu speculates that these women were brought in from Korea and Japan, later shipped to Borneo to serve as comfort women after staying at Toyokawa’s establishment.⁶⁵ NHK crews, who visited Keelung and interviewed Toyokawa’s wife, confirmed that he went to Borneo with five women (four Koreans and one Okinawan) but no additional details are known.⁶⁶

Toyokawa likely gained the favor of the local Military Police Corps (Kempeitai), which designated him as one of the three procurers of comfort women due to his patriotic attitude.⁶⁷ According to a *Taiwan nichinichi sinpō*

⁶³ NHK, “Dokumentarii special: Ajia no jūgun ianfu 51nenme no koe [Documentary Special: Asian Military Comfort Women — Voices 51 Years Later],” Broadcasted on December 28, 1996. Available at: <https://vimeo.com/869794198>, accessed May 15, 2024.

⁶⁴ De-lan Zhu, *Taiwan weianfu* [Taiwan’s Comfort Women] (Taipei: Wunan, 2009), pp. 333-334.

⁶⁵ De-lan Zhu, *Taiwan weianfu* [Taiwan’s Comfort Women], p. 335.

⁶⁶ NHK, “Dokumentarii special: Ajia no jūgun ianfu 51nenme no koe [Documentary Special: Asian Military Comfort Women — Voices 51 Years Later],” Broadcasted on December 28, 1996. Available at: <https://vimeo.com/869794198>, accessed May 15, 2024.

⁶⁷ “Nanpō haken tokōsha ni kansuru ken 〈南方派遣渡航者に関する件〉 [On People Dispatched to the South],” (March 1942), *Rikuamitsu Dainikki* 《陸軍密大日記》 [Army Classified Documents] No. 22, 2/3,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National Archive of Japan, Ref.: C01000379100. The other two were Japanese, one male and one female. The man was the owner of a brothel in Keelung and had formerly been a corporal in the Military Police Corps. See De-lan Zhu, *Taiwan weianfu* [Taiwan’s Comfort Women], p. 330.

article from May 1943, Toyokawa—referred to as “president (of the Korean Association in Keelung 半島人協和會)” —led a contingent of 150-member to attend the Keelung Shinto Shrine. This was in response to the military’s announcement that they would accept applications for the Navy Special Volunteers System from subjects of the Japanese colonies, including Koreans. Toyokawa also made formal visits to the Naval Affairs Office and the Military Police Corps in Keelung, donating money to each agency.⁶⁸

After the war, Toyokawa did not return to Korea. Like other Koreans and Taiwanese who had adopted Japanese names during colonial rule, Toyokawa changed his name back to “Yim Du-uk (任斗旭).”⁶⁹ According to the 1947 Register, where his name appears first, he was 40 years old, originally from Jeju Island, South Chōlla Province, and had arrived in Taiwan in June 1924. Yim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Korean Association in Taiwan and facilitated the settlement of Korean fishermen and their families in Taiwan.⁷⁰ The fates of the women listed in his family register during the Japanese era remain largely unknown, except for one, Tatsu (龍) from Miyazaki Prefecture, Japan, who became Yim’s wife and bore him three children.⁷¹

8. Data from Travel Permits from Taiwan to China

There is additional data suggesting that comfort women who were trafficked overseas from Korea via Taiwan were experienced sex workers. Fujinaga Takashi’s study shows that in 1939, 577 Korean women (an increase from 110 in the previous year) moved from Korea to Taiwan, while 656 Korean women (compared to 165 the year before) were shipped from Taiwan to mainland

⁶⁸ See *Taiwan nichinichi sinpō* [Taiwan Daily News], May 16, 1943, p. 2. Earlier that year, Toyokawa led a 50-member contingent of Koreans to visit wounded soldiers at the Army Hospital in Keelung after attending the Keelung Shrine. They donated magazines to the patients. *Taiwan nichinichi sinpō* [Taiwan Daily News], March 12, 1943, p. 3.

⁶⁹ De-lan Zhu, *Taiwan weianfu* [Taiwan’s Comfort Women], p. 332.

⁷⁰ For more, see Yoshihisa Amae, “Taiwan kankyō no posuto koroniaru: Yim Du-uk Taiwan kankyō kyōkai rijichō wo chūshin ni [Postcolonial Bodies: A Tale of Yim Duuk and Ethnic Koreans in Postwar Taiwan, 1945-1970],” pp. 28-47.

⁷¹ Kim Chwa-ja (金佐子),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Kaohsiung City, December 31, 2018.

China.⁷² The same study indicates that out of the 1,869 women (and men) who received a travel permit from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to travel to South China between November 1938 and January 1940 as “employees of comfort stations (慰安所従業員/慰安所關係),” 607 were Koreans (see Figure 4).⁷³ These figures suggest that Taiwan served as a midpoint in a triangular sex trade between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South China. Of the 577 women who arrived from Korea in 1939, 321 (55.6%) were classified under the “commercial sector (商業),” which included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while 221 (38.3%) were categorized as “unemployed (無職).” In 1940, among a total of 432 individuals, 168 (38.8%) belonged to the “commercial sector,” and 232 (53.7%) were “unemployed.” As for Korean women who traveled from Taiwan to China, among the 656 in 1939 and 143 in 1940, 53 (8%) and 73 (51%) were recorded as “unemployed,” respectively.⁷⁴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se two years, nearly half (38-53%) of Korean women were categorized as “unemployed,” with the notable exception of those who went to China in 1939 (8%). Fujinaga infers that the unemployed women may have been inexperienced individuals recruited through deception and abduction.⁷⁵

⁷²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102.

⁷³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102. This number might include comfort station managers and other male employees, as the gender of the employers is specified by us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婦 (women)” only on two occasions. Fujinaga points out that the surge in the number of women from Nov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and from October 1939 to December 1939 coincides with the Japanes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namely the Guangdong Operation and the Nanning Operation. See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105. This data differs from that of Komagome, who calculated the total numbers as 1,590 (807 Japanese, 523 Koreans, and 260 Taiwanese). See Takashi Komagome, “Taiwan shokuminchi shihai to Taiwanjin ‘ianfu’ [Colonial Rule of Taiwan and Taiwanese ‘Comfort Women’], pp. 140-141.

⁷⁴ While the remaining women were classified under the “commercial sector,” in 1939, 451 women (446 departing from Takao and 5 from Taihoku) were categorized as having “other jobs.” Among these, 437 went to Guangdong Province. See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104, Table 13-2.

⁷⁵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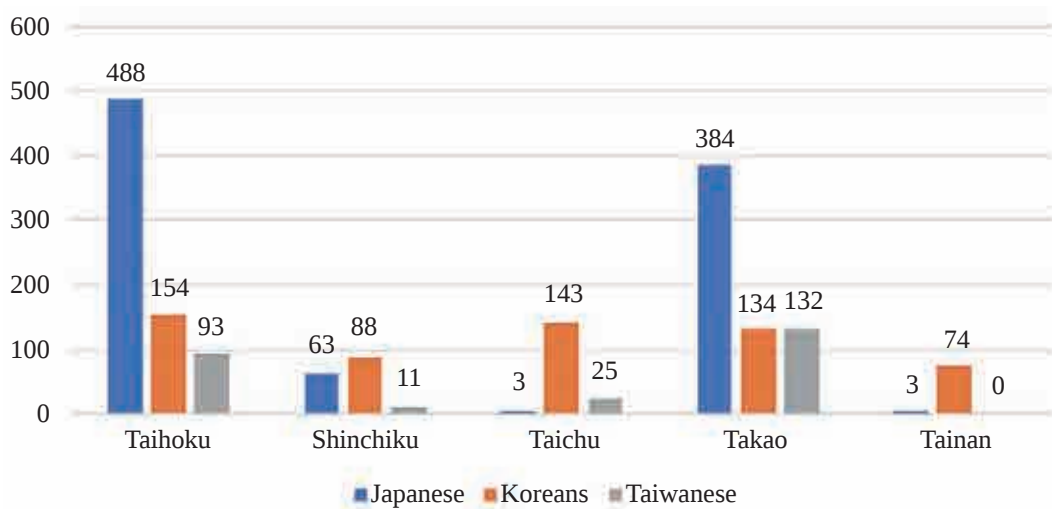


Figure 4: Number of Comfort Women Traveling to South China from Five Prefectures (*shū*) in Taiwan, November 1938 - January 1940.

Note: I did not include in this figure Hōko/Penghu (澎湖) Prefecture and Taitō/Taitung (臺東) Prefecture, which had 73 (57 Japanese, 13 Koreans, and 3 Taiwanese) and 1 (Korean) respectively.

Source: Takeshi Fujinaga,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p. 106.

There were also Koreans trafficked to Okinawa from Taiwan as comfort women. At the end of 1944, an Okinawan doctor on Miyako Island, sent by the military to Taipei to procure medical supplies, boarded a military vessel that carried 53 Korean comfort women on his return to Miyako. The ship, which departed from Keelung, was attacked by a US plane the next morning off Yonaguni Island, killing 46 women and 2 military personnel who were escorting them.⁷⁶

9. Korean Comfort Women Survivor Testimonials

The 1947 Register and government archive police records provide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Korean women but not their stories. Unlike comfort women

⁷⁶ Okinawa kyōiku iinkai [Okinawa Board of Education], ed., *Okinawa kenshi* [History of Okinawa Prefecture] (Tokyo: Toshō kankō kai, 1989), Vol. 10, pp. 260-262.

survivors, whose experiences are well-documented due to the attention following Kim Hak-sun's (金學順) public testimony in 1991, little is known about ex-Korean sex workers like Yi Chun and Sök Hwak-sil, who did not return to Korea. Personal testimonials by Korean comfort women survivors are thus valuable sour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stwar lives of these women who were left behind in what was once the outer territories of the Japanese Empire.

In the collection of testimonials compiled by the Korean Council in 2000, there are three testimonials (out of a total 34) by ex-Korean comfort women who were brought to Taiwan during the war;⁷⁷ all three managed to return to Korea after the war.

Yi Ok-gun (李玉粉), born in 1926 in North Kyöngsang Province, was the only girl in the family. She recounted being duped by “a Japanese man and a Korean man” who brought her to Taiwan together with around 30 other girls. At just 12 years old, she was taken to Shōka (present-day Changhua) comfort station, which she described as “the headquarters of comfort stations on the island.”⁷⁸ Initially, there were 40 women, but on the second day, seven women were sent elsewhere. According to her, the master of the comfort station was a Japanese man in his 40s. After realizing that Yi had not yet reached 14, which was the minimum age to take a customer by law in Taiwan [sic],⁷⁹ he assigned her to work as a maid in the comfort station. Horrified after discovering what the women were forced to endure there, Yi fled to a local police station, where the authorities helped her contact her family in Korea. However, when a police officer visited her mother, she denied that her daughter was missing, likely out of fear. The police chief then decided to hire Yi as a nanny, but when he and his family were recalled to Japan in 1942, he failed to pay her wages and reported her to the military. She was subsequently taken away and sent to Takao, where she was forced to serve as a comfort woman in the military barracks for the “special attack unit (*tokkōtai*).”⁸⁰ At the *Tokkōtai* comfort station, Yi, along with 40 other comfort women, were

⁷⁷ Korea Chongshindae's Institute, ed., Zhenlie Jin and Yibing Huang, trans., *Beilüewang qinglüe zhanzheng de weianfu* [Comfort Women in Invaded Areas and Battlefields]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2001).

⁷⁸ Apart from these testimonials, there is no other evidence to prove that a comfort station existed in Changhua.

⁷⁹ This may be an error.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minimum age would have been 16 for *shōgi* (prostitutes) and 12 for *geigi* (geisha) and *shakufu* (barmaids). See Jungwon JIN,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p. 127.

⁸⁰ This special attack unit was called *Shinyōtai* (震洋隊), a troop of one-man motorboats, each loaded with a ton of high explosives.

compelled to have sex with 20 to 30 soldiers daily. The men used condoms, and the women underwent physical checkups bi-monthly. As US air raids intensified, the women spent the night in shelters with the soldiers, entertaining them by singing, dancing, and serving alcohol. It was during this time that Yi learned to play the violin and sing *gunka* (Japanese war songs). The soldiers would slap the women when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performances.⁸¹

Yi was 21 years old when the war ended. She vividly recalls listening to the surrender broadcast on August 15. The next day, the owner of the comfort station and the female manager fled. While Japanese soldiers were repatriated, the Korean women were abandoned, becoming vulnerable to exploitative Taiwanese men who coerced them into working in bars, wearing Chinese dresses, serving alcohols, and singing Chinese songs. They frequently had to relocate to evade the authorities. Eventually, after more than a year, Yi and another ex-comfort woman managed to escape and were rescued by an American ship repatriating Koreans released from US POW camps.⁸² They arrived in Busan four days later, where Yi was reunited with her family.⁸³

Pak T'u-ri (朴頭理) and Kim Pun-sŏn (金分善) are two other women who ended up in Taiwan as comfort women. Park, like Yi, was sent to Shōka, while Kim was taken to Shinchiku (present-day Hsinchu 新竹) and later to Manila. 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 were similar, as the Japanese female manager of the comfort station collected money from soldiers and treated the Korean girls harshly, forcing them to serve 20 to 30 men daily. Kim, however, recalls some sympathetic Japanese soldiers who befriended the girls. One officer named Yamamoto (山本), distinguished by “three (or four) stars on his shoulder,” was especially kind: he purchased Kim a ticket to Korea and assisted her in shipping her luggage.⁸⁴

Pak returned to Korea after the war with a Korean man working at the comfort station. Although she wished to marry him, she abandoned the idea upon

⁸¹ Korea Chongshindae's Institute, ed., Zhenlie Jin and Yibing Huang, trans., *Beilüewang qinglüe zhanzheng de weianfu* [Comfort Women in Invaded Areas and Battlefields], p. 101.

⁸² Korea Chongshindae's Institute, ed., Zhenlie Jin and Yibing Huang, trans., *Beilüewang qinglüe zhanzheng de weianfu* [Comfort Women in Invaded Areas and Battlefields], p. 103.

⁸³ Korea Chongshindae's Institute, ed., Zhenlie Jin and Yibing Huang, trans., *Beilüewang qinglüe zhanzheng de weianfu* [Comfort Women in Invaded Areas and Battlefields], p. 104.

⁸⁴ Korea Chongshindae's Institute, ed., Zhenlie Jin and Yibing Huang, trans., *Beilüewang qinglüe zhanzheng de weianfu* [Comfort Women in Invaded Areas and Battlefields], p. 341.

discovering he had a family in Seoul.⁸⁵ All three women experienced unhappy postwar lives, unable to tell their families the truth about their pasts and instead claiming they had worked in factories. Many comfort women survivors suffered from loneliness due to failed marriages and social discrimination, with some forgoing marriage altogether, knowing that they could not conceive due to damaged wombs.

None of the three appear in the 1947 Register, indicating that they likely left Taiwan by the time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While it is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the exact number, it appears that the majority of women brought to Taiwan to work in local brothels or comfort stations had left the island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war.⁸⁶

10. Women Left Behind

After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came into light in Korea in 1991, women's group activists in Taiwan began searching for former comfort women on the island, identifying 48 survivors.⁸⁷ Among them was a Korean woman, named Noh Myōng-sŏn (盧命仙), who lived in the southern seaport of Donggang (東港), Pingtung County.⁸⁸ According to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the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Noh was brought to Taiwan by a Korean broker along with nine other young girls when she was "16 years old."⁸⁹ Her name appears in the 1947 Register, which lists her as being 27 years old, from South Chungcheong Province, and having arrived in Taiwan in "April 1936."⁹⁰ Noh is marked as "should be deported."

⁸⁵ Korea Chongshindae's Institute, ed., Zhenlie Jin and Yibing Huang, trans., *Beilüewang qinglüe zhanzheng de weianfu* [Comfort Women in Invaded Areas and Battlefields], p. 268.

⁸⁶ Among the 1,974 Koreans who were repatriated from Taiwan in 1946, 1,146 (58%) were women. See Peiping Xie, ed., *Zhanhou qiansong waiqiao fanguo shiliao huibian 1: Hanqiao bian* [Repatriated Migrants after World War II: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Vol. 1: Koreans], p. 684.

⁸⁷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ed., *Taiwan weianfu baogao* [A Report on Taiwan's Comfort Women] (Taipei: Taiwan shangwu, 1999), p. 84.

⁸⁸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Noh Myōng-sŏn," June 1 and June 15, 1992, audio material C103 and C105,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Th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Taiwanese Hokkien. I thank Ms. Yvonne Lin for providing the Chinese transcript.

⁸⁹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Noh Myōng-sŏn," June 15, 1992, audio material C105.

⁹⁰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her name in the 1947 Register is "盧明仙".

Noh was trafficked to Taiwan by a “male ginseng seller” who deceived her into believing that Taiwan was a fun place with plenty of money. Her parents consented to her departure because a fortune teller had predicted that their daughter would die at age 17. The girls were not told what they would be doing in Taiwan. It took a week to reach Taiwan on the ship that was loaded with many Japanese soldiers. Noh was forced to serve as a comfort woman in Nantou (南投) for Japanese soldiers for “two years,” before being taken to Manila, where she remained until the war ended in 1945.⁹¹ In Nantou, there were two restaurants/bars: one was run by a Korean and another by a Japanese. In Manila, where there were more Japanese soldiers, she was compelled to have sex with 40 soldiers daily from 8 a.m. to 5 p.m. The Korean manager kept all the earnings for himself and would physically abuse the girls whenever they refused to work.

After the war, Noh and the other girls were brought back to Taiwan. However, the Korean manager died shortly thereafter, leaving them to fend for themselves. Unable to return to Korea, she worked as a maid at a travel agency in Donggang for 10 years.⁹² At age 28, Noh married a local Taiwanese man from Donggang who was 40 years old.⁹³ However, since she could not tolerate the husband abusing his children from the previous marriage (two girls and three boys), after 10 years she left him and moved to Tainan, where she worked as a maid in a hotel and also cooked and did laundry for other people.⁹⁴ Noh was unable to have her own children because the Korean manager had forced her to take contraceptive drugs while she was a comfort woman. In 1982, she remarried another Taiwanese man from Donggang, who was kind and treated her well. Their

⁹¹ In her own words: “去馬尼拉也是賺日本兵。我先在南投做兩年，才被帶馬尼拉，戰後就回來臺灣……。” She later mentioned staying in Manila for “one year;” however, no exact dates were provided during the interview.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Noh Myōng-sōn,” June 1, 1992, audio material C103.

⁹² When asked if she ever thought of returning to Korea, Noh replied that when she was 33, they heard that a ship was coming, so they went to Keelung and waited there. After three months she gave up and returned to Donggang.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Noh Myōng-sōn,” June 15, 1992, audio material C105.

⁹³ Noh’s marriage is confirmed in the Kaohsiung County police records, July 10, 1948, *Keyi fenzi kaoguan: Diaocha waidie, jianfei keyi fenzi an* 《可疑分子考管：調查外諜、奸匪可疑份子案》 [Examin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uspicious Persons: Investigating Cases of Foreign Spies and Bandits and Suspicious Persons], National Polic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rchives (New Taipei: NAA), CN: AA01010000C/0037/301.1/0004, Available at: <https://aa.archives.gov.tw>.

⁹⁴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Noh Myōng-sōn,” June 1, 1992, audio material C103. However, when Noh was interviewed a second time, she said she left the marriage because “she did not get along with the children.”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Noh Myōng-sōn,” June 15, 1992, audio material C105.

marriage lasted until he passed away in 1988. Noh had never disclosed her past to either of her husbands and knew little about the fates of the other Korean girls, except for one who visited her “40 years ago.”⁹⁵ In the interview, she expressed that she would rather stay in Taiwan because she is already old, does not speak Korean, and does not know where her younger brother is living.⁹⁶ She also said she has already been naturalized (我已經歸化做臺灣人了).⁹⁷

Noh is the only Korean comfort woman publicly known to have remained in Taiwan.⁹⁸ However, there are two other women listed in the 1947 Register who are also believed to have been comfort women: Kim Yǒng-ae (金英愛) and Ch’oe San-su (崔三守). According to the 1947 Register, Kim Yǒng-ae, aged 22 and from North Kyōngsang Province, is marked as “willing to return to the homeland.”⁹⁹ My source, Yi Yǒng-ja (pseudonym), a senior member of the Korean community, informed me that Kim remained in Taiwan after the war and ran an inn in Yilan County, which she inherited from a Taiwanese man with whom she had a relationship. The inn was popular with lumberjacks working in the nearby Mount Taiping (太平山). Yi, who lived there as a child, recalls Kim asking her to call the “*nee-chan* (姉ちゃん)” for the male customers.¹⁰⁰ She remembers her pocket being full of coins as tips by both the girls and the men.¹⁰¹ Eventually, Kim fell in love with a retired soldier named Son (孫), who once served in the ROC military. Son, who came to Taiwan in 1949, was born and raised in Manchuria and had a Korean mother. Kim sold the property, married Son, and the two moved to Keelung where Son worked as a Chinese teacher in the Korean School. She died in 1997 and is buried alongside her husband in a public cemetery in Keelung.¹⁰²

Ch’oe San-su is another alleged comfort woman survivor I learned about from the same source. Ch’oe, from South Kyōngsang Province, was 24 years old

⁹⁵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Noh Myōng-sŏn,” June 1 and June 15, 1992, audio material C103 and C105.

⁹⁶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Noh Myōng-sŏn,” June 1, 1992, audio material C103.

⁹⁷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Noh Myōng-sŏn,” June 15, 1992, audio material C105.

⁹⁸ Noh, along with two other women, testified at a press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Taipei Women Rescue Foundation on August 14, 1992. See *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 August 15, 1992, p. 1.

⁹⁹ It is unclear when Kim arrived in Taiwan. The date of arrival to China (來華年月) is listed “as same as (同)” alongside five minors who were “born in Taiwan (在臺出生).” This is probably an error, as all others in the Register who were “born in Taiwan” are minors.

¹⁰⁰ *Nee-chan*, a casual term for “older sister” in Japanese, is used here to refer to prostitutes.

¹⁰¹ Yi Yǒng-ja 李榮子 (pseudonym),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Kaohsiung City, August 26, 2023.

¹⁰² Yi Yǒng-ja (pseudonym),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Kaohsiung City, August 26, 2023.

when she came to Taiwan in “April 1936,” the same date listed for Noh in the 1947 Register. As both women are recorded as living in Kaohsiung County, Ch’oe could have been the friend who visited Noh after the war. She, like Noh, is marked as “should be deported.” Ch’oe was the surrogate mother of my source,¹⁰³ but due to her neglect and abuse, the father, who worked on the ship and was often absent, arranged for another woman to care for the child.¹⁰⁴ However, there is no concrete evidence to confirm that they were indeed ex-comfort women. My source learned about their past indirectly through neighbors in the Korean community who spoke of them as “comfort women.” Neither Kim nor Ch’oe had children of their own.

Through my conversation with senior members of the Korean community, many of whom are second-generation *hanqiao* born in the 1930s, I discovered that adoptions were common in the early post-WWII Korean community. Many women were unable to conceive and thus adopted Taiwanese children. Their infertility might have been linked to the fact that many young women who remained in Taiwan were former sex workers. Given that a number of women had married Korean men before the 1947 Register was compiled,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the actual number of single women who remained in Taiwan after WWII exceeded 48.¹⁰⁵

11. Conclusion: Beyond the Binarism of Prostitutes versus Comfort Women

More than 50 young single Korean women remained in Taiwan after WWII. Based on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hese women were mostly ex-sex workers who were trafficked to Taiwan in the 1930s and 40s. While the full picture is not clear, some were sent to South China and other territories in the Asia-Pacific as comfort women via Taiwan. The 1947 Register lists 48 names — 16 marked for deportation,

¹⁰³ My source told me that her biological mother was also a comfort woman. She became mentally ill not long after giving birth to her and was subsequently deported to Korea. Others, however, told me that Yǒng-ja was adopted from a Taiwanese family.

¹⁰⁴ Yi Yǒng-ja (pseudonym),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Kaohsiung City, August 26, 2023.

¹⁰⁵ There are about 20 women in the Register who are married to Koreans and under 25 years old. Most of them likely married after the war ended in August 1945.

18 married to local men, and 6 with unknown whereabouts. These marriages were likely arranged to help the women stay legally on the island.

Why did they not return to Korea after the war? Perhaps they lacked the means, became bound by new contracts, or were coerced into forced marriages.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some did not wish to return, particularly if they had been sold by their families or duped into prostitution. For many, home was not a place of longing, but one of shame and rejection.¹⁰⁶

What these women could not foresee was that, after decades of neglect, women like them who were forced to serve Japanese soldiers would become national symbols, commemorated as “daughters of the nation” through statues and memorials.¹⁰⁷ Through mass media and global activism, “comfort women,” or “sex slaves,” became a symbol of anti-Japanese sentiment and a global reference for women’s rights violations. Historian Carol Gluck referred to this as a “traveling trope.”¹⁰⁸ Ironically, when the world was finally ready to hear their stories, many survivors could no longer “speak,”¹⁰⁹ as their voices were often overshadowed by nationalistic and activist narratives that shaped them into “perfect victims.”¹¹⁰

Were Sök Hwak-sil and other 47 women in the 1947 Register prostitutes or comfort women? We do not know, and perhaps it does not matter,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not as significant as is commonly believed. Many comfort women and prostitutes were deceived by recruiters offering legitimate

¹⁰⁶ Yi Yöng-ok, a comfort woman survivor, noted: “At that time, a woman’s chastity was considered more important than her life. How could I tell people I was raped daily by many soldiers? It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humiliation to my parents. Many times, I regretted coming back home alive.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for me to die there...” See Pyong Gap Min, “Korean ‘Comfort Women’: The Intersection of Colonial Power, Gender, and Class,” *Gender and Society* (Newbury Park) 17: 6 (December 2003), p. 950.

¹⁰⁷ Yuha Park,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Colonial Rule and the Battle over Mem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5), pp. 88-89.

¹⁰⁸ Carol Gluck, “What the World Owes the Comfort Women,” in Jie-Hyun Lim and Eve Rosenhaft, eds., *Mnemonic Solidarity: Global Intervention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 141.

¹⁰⁹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Subaltern Talk: Interview with the Editors,” in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eds., *The Spivak Reader: 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287-308. Spivak explains that “speak” is not the same as “talk,” and that speaking and hearing together complete the speech act. Also, see C. Sarah Soh, *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p. 181-190.

¹¹⁰ For example, see C. Sarah Soh, *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 pp. 103-105; and Yuha Park,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Colonial Rule and the Battle over Memory*, pp. 98-99.

jobs or sold into prostitution due to family poverty. They were trapped in indentured servitude, sexually exploited, and suffered long-lasting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It is incorrect to assume that all prostitutes entered the profession voluntarily and therefore do not deserve sympathy, while comfort women were all forc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into becoming “sex slaves” and thus deserve greater empathy. It would also be incorrect to conjecture that the lives of comfort women were worse than those of prostitutes.¹¹¹ In many cases, prostitutes became comfort wome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learly separate the two groups. Furthermore, th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system did not emerge in isolation; it was supported by a network of licensed prostitution within the Japanese empire. As some works have pointed out,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was an extension of the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that had existed in Japan since the Meiji period.¹¹²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military comfort women” outlived the Japanese Empire.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e Korean Army established “special comfort units,” and thousands of women—many of them from orphanages and impoverished backgrounds—were exploited as “US military comfort women (*migun wianbu*)” near American bases in South Korea under the Cold War setting.¹¹³

¹¹¹ It is often believed that on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mfort women and prostitutes is the number of men they had to service each day. There were cases where prostitutes in prewar Japan and its colonies had to serve 20 to 30 men daily. See Yōn-ok Song, “Kōshō seido kara ‘ianfu’ seido e no rekishiteki tenkai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to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in VAWW-NET Japan, ed., *‘ianfu’: Senji seibōryoku no jittai I: Nihon, Taiwan, Chōsen hen* [“Comfort Wome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Vol. I: Japan, Taiwan, and Korea], p. 32 and footnote 20.

¹¹² Yōn-ok Song, “Kōshō seido kara ‘ianfu’ seido e no rekishiteki tenkai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to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pp. 20-41; and Yoshiaki Yoshimi, *Kaishun suru teikoku: nihongun “ianfu” mondai no kitei* [Empire of Prostituti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 “Comfort Women” Problem] (Tokyo: Iwanami shoten, 2019).

¹¹³ See C. Sarah Soh, *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 pp. 215-217; Young-hoon Rhee, ed., Chizuko T. Allen, trans., *Anti-Japan Tribalism: The Root of the Korean Crisis*, pp. 211-217; and Jeong-ja Kim, *Kankoku kichimura no beigun “ianfu”: kokka bōryoku wo tou josei no koe* [“Comfort Women” in US Military Base Villages in South Korea: Women’s Voices Accusing State Violence] (Tokyo: Akashi shoten, 2023). Surprisingly, postwar Koreans referred to sex workers serving U.S. servicemen near military bases, as well as civilians, as “comfort women” (*wianbu*) until the 1960s. By the 1970s, civilian sex workers were no longer called “comfort women,” although the term “US comfort women” appeared in government documents until the 1990s. See Young-hoon Rhee, ed., Chizuko T. Allen, trans., *Anti-Japan Tribalism: The Root of the Korean Crisis*, p. 215.

Whether Sök was a prostitute, a comfort woman, or both, her untimely death in 1950 — be it by suicide or homicide — was undoubtedly connected to her past of being forced to sell her body. Her failed marriage and mental illness reflect the enduring trauma. Women like her were victims not only of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m, which commodified female bodies for men's sexual pleasure and transported them overseas, but also of patriarchal ideology and Confucius notions of female chastity that justified men's dominance and denied women agency.¹¹⁴ Furthermore, the Cold War and Korea's division made it impossible for someone like her, from the North, to return home. Whether Sök wanted to return, we may never know. For many women like her, however, "home" had become a distant and unattainable place, as their lives were adrift like small boats on the turbulent seas of empire.

¹¹⁴ Chizuko Ueno, *Nashonarizumu to jendaa* [Nationalism and Gender] (Tokyo: Iwanami shoten, 2012), p. 103.

References

- Lianhe bao* 《聯合報》 [United Daily News]
- Taiwan minsheng ribao* 《臺灣民聲日報》 [Taiwan People's Voice Daily]
- Taiwan nichinichi sinpō* 《臺灣日日新報》 [Taiwan Daily News]
- Taiwan xinshengbao* 《台灣新生報》 [Taiwan Xinsheng Daily News]
- “Nanpō haken tokōsha ni kansuru ken 〈南方派遣渡航者に関する件〉 [On People Dispatched to the South],” (March 1942), *Rikuamitsu Dainikki* 《陸軍密大日記》 [Army Classified Documents] No. 22, 2/3,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National Archive of Japan, Ref.: C01000379100.
- Academia Historica (AH) Archives 「國史館」 檔案, CN: A202000000A/0036/474/1262/31/024. New Taipei: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A).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rchives 「外交部」 檔案, CN: 020-110400-0010. Taipei: Academia Historica (AH).
- National Polic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rchives 「內政部警政署」 檔案, CN: AA01010000C/0037/301.1/0004. New Taipei: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A).
- Tainan City Government Archives 「臺南市政府」 檔案, CN: A376610000A/0035/B065.1/1/13/003. New Taipei: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A).
-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rchives 「臺北市政府」 檔案, CN: A379000000A/0037/133.53/1. New Taipei: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A).
- Taiwan Provincial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Archives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檔案, CN: 00306510041003. Nantou: Taiwan Historica (TH).
- NHK, “Dokumentarii special: Ajia no jūgun ianfu 51nenme no koe 〈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スペシャル：アジアの従軍慰安婦：51年目の声〉 [Documentary Special: Asian Military Comfort Women — Voices 51 Years Later],” Broadcasted on December 28, 1996. Available at: <https://vimeo.com/869794198>, accessed May 15, 2024.
-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Noh Myōng-sŏn 盧命仙,” June 1 and June 15, 1992, audio material C103 and C105,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 Kim Il-che 金日濟,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Kaohsiung City, October 19, 2016.
- Kim Chwa-ja 金佐子,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Kaohsiung City, December 31, 2018.
- Yi Yōng-ja 李榮子 (pseudonym),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Kaohsiung City, August 26, 2023.
- An, Byeong-jik 安秉直, ed., Kazuo Hori 堀和生 and Kan Kimura 木村幹, trans., *Biruma Singapōru no jūgun ianjo* 《ビルマ・シンガポールの従軍慰安所》 [Comfort Stations in Burma and Singapore] (2013). Available at: *nadesiko-action*, http://nadesiko-ac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3/10/comort_women_diary.pdf, accessed January 15, 2024.
- “US-11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49: Korean Comfort Women, 1944,” (October 1, 1944), *Comfort Women Resource Center*. Available at: https://international.ucla.edu/cks/care/us_allieddocs/250902, accessed October 15, 2024.
- Akamine, Mamoru 赤嶺守 (ed.)
- 2018 “*Okinawa sekimin*” *no Taiwan hikiage shōgen shiryōshū* 《「沖縄籍民」の台湾引揚げ証言・資

料集》[A Collection of Testimonies and Documents of “Okinawans” Who Repatriated From Taiwan]. Naha: Kokusai insatsu.

Amae, Yoshihisa 天江喜久

- 2020 “Taiwan kankyō no postcolonial: Yim Du-uk Taiwan kankyō kyōkai rijichō wo chūshin ni 〈台湾韓僑のポストコロニアル：任斗旭・台湾韓僑協会理事長を中心に〉 [Postcolonial Bodies: A Tale of Yim Duuk and Ethnic Koreans in Postwar Taiwan, 1945-1970],” *Ritsumeikan Ajia Nihon kenkyū gakujutsu nenpō* 《立命館アジア・日本研究学術年報》 [Annual Review of Asia-Japan Research at Ritsumeikan] (Ibaraki) 1: 28-47.

An, Seong-su 安城秀

- 2011 “Jidujiao chuanbo yu Taiwan gangshi de hanren yimin: Yi Jilong Hanguo jiaohui wei zhongxin 〈基督教傳播與臺灣港市的韓人移民：以基隆韓國教會為中心〉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Korean Immigration in Taiwan Port City: A Focus on Korean Church in Keelung].”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sano, Toyomi 浅野豊美

- 2008 “Kita Biruma Yunnan sensen ni okeru nihongun no sakusen tenkai to ‘ianfu’ tachi 〈北ビルマ雲南戦線における日本軍の作戦展開と「慰安婦」達〉 [“Comfort Women” and the Japanese Military’s Operations on the Yunnan Front in North Burma].” In Gunjishi gakkai, ed., *Nichū sensō sairon* 《日中戦争再論》 [Revisit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p. 296-322. Tokyo: Kinseisha.

Fujime, Yuki 藤目ゆき

- 2002 “Nihonjin ‘ianfu’ wo fukashi ni suru mono 〈日本人「慰安婦」を不可視にするもの〉 [What Makes Japanese “Comfort Women” Invisible].” In VAWW-NET Japan, ed., *Sabakareta senji seibōryoku* 《裁かれた戦時性暴力》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Under Trial], pp. 88-108. Tokyo: Hakutakusha.

Fujinaga, Takeshi 藤永壮

- 2000 “Chōsen shokuminchi shakai to ‘ianfu’ seido no seiritsu katei 〈朝鮮植民地社会と「慰安婦」制度の成立過程〉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in Korean Colonial Society].” In VAWW-NET Japan, ed., *‘Iantfu’: Senji seibōryoku no jittai I: Nihon, Taiwan, Chōsen hen* 《「慰安婦」：戦時性暴力の実態 I — 日本・台湾・朝鮮編》 [“Comfort Wome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Vol. I: Japan, Taiwan, and Korea], pp. 196-231. Tokyo: Ryokufu shuppan.
- 2001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Chōsenjin sekkyakugyō to ‘ianfu’ no dōin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朝鮮人接客業と「慰安婦」の動員〉 [A Statistical Study on Hostess Service Trade of Korea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In Osaka Sangyō Daigaku Sangyō Kenkyūjo, ed., *Kindai shakai to baishun mondai* 《近代社会と売春問題》 [A Study on Modern Prostitution], pp. 81-116. Osaka: Osaka Sangyō Daigaku Sangyō Kenkyūjo.
- 2005 “Shokuminchi kōshō seido to nihongun ‘ianfu’ seido 〈植民地公娼制度と日本軍「慰安婦」制度〉 [Colonial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and the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System].” In

- Noriyo Hayakawa, ed., *Shokuminchi to sensō sekinin* 《植民地と戦争責任》 [Colonialism and War Responsibility], pp. 7-38.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 2005 “Teikoku Nihon to shokuminchi kōshō seido: Taiwan no jirei wo chūshin ni 〈帝国日本と植民地公娼制度：台湾の事例を中心に〉 [Imperial Japan and the Colonial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Taiwan],” *Teikoku shisutemu no seiji bunka teki hikaku kenkyū* 《帝国システムの政治・文化的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Imperial Systems] (Kyoto) 11: 1-2.
- 2013 “Senjiki Chōsen ni okeru ‘ianfu’ dōin no ‘ryugen’ ‘zogen’ wo megutte 〈戦時期朝鮮における「慰安婦」動員の「流言」「造言」をめぐって〉 [Concerning the ‘Rumors’ and ‘Fabrications’ of the Mobiliz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Wartime Korea].” In Toshihiko Matsuda and Jungwon JIN, eds., *Chiiki shakai kara miru teikoku nihon to syokuminchi: Chōsen, Taiwan, Manshū* 《地域社会から見る帝国日本と植民地：朝鮮・台湾・満州》 [Imperial Japan and Its Colo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Communities: Korea, Taiwan, and Manchuria], pp. 723-755. Kyoto: Shibunkaku.
- Gluck, Carol
- 2021 “What the World Owes the Comfort Women.” In Jie-Hyun Lim and Eve Rosenhaft, eds., *Mnemonic Solidarity: Global Interventions*, pp. 111-154.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Gugsapyeonchan-wiwonhoe 국사편찬위원회 (國史編纂委員會) [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 (ed.)
- 2007 *Jungguk daeman sojae hanguksa jaryo josabogo II* 《중국・대만소재 한국사 자료 조사보고 II (中國・臺灣朝鮮歴史資料研究報告 II)》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Materials on Korean History in China and Taiwan, Vol. II]. Gwacheon: Gugsapyeonchan-wiwonhoe. Online Database: Korea History 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id/fs_014.
- Haruyama, Meitetsu 春山明哲 (ed.)
- 1990 *Taiwan tōnai jōhō hontōjin no dōkō* 《台湾島内情報・本島人の動向》 [Intelligence Inside Taiwan: Trends of the Islanders]. Tokyo: Fuji shuppan.
- Hata, Ikuhiko 秦郁彦
- 2005 *Ianfu to senjō no sei* 《慰安婦と戦場の性》 [Comfort Women and Sex in the Battle Zone]. Tokyo: Shinchōsha.
- Ishihara, Masaie 石原昌家
- 2000 *Kūhaku no Okinawa shakaishi: Senka to mitsubōeki no jidai* 《空白の沖縄社会史：戦果と密貿易の時代》 [The Blank Social History of Okinawa: The Era of Looting and Smuggling]. Tokyo: Banseisha.
- JIN, Jungwon 陳延浚
- 2010 “Zai zhimindi Taiwan shehui jiafengzhong de Chaoxianren changjiye 〈在殖民地臺灣社會夾縫中的朝鮮人娼妓業〉 [Standing in the Gap of Society: Korean Prostitutes in Colonial Taiwan].” *Taiwanshi yanjiu* 《臺灣史研究》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aipei) 17(3): 107-149.
- Junghwa minguk haninhoe 중화민국한인회 中華民國韓人協會 [Korean Association in ROC]
- 2019 *Daeman hanin 100nyeonsa* 《대만한인 100 년사 (韓人在臺百年史)》 [Centennial History of Koreans in Taiwan]. Incheon: Daeman hanin 100nyeonsa pyeonchan wiwonhoe.

Kim, Jeong-ja 金貞子

- 2023 *Kankoku kichimura no beigun "ianfu": kokka bōryoku wo tou josei no koe* 《韓国・基地村の米軍「慰安婦」：国家暴力を問う女性の声》[“Comfort Women” in US Military Base Villages in South Korea: Women’s Voices Accusing State Violence]. Tokyo: Akashi shoten.

Komagome, Takeshi 駒込武

- 2000 “Taiwan shokuminchi shihai to Taiwanjin ‘ianfu’ 〈台湾植民地支配と台湾人「慰安婦」〉 [Colonial Rule of Taiwan and Taiwanese ‘Comfort Women’].” In VAWW-NET Japan, ed., *‘Ianfu’: Senji seibōryoku no jittai I: Nihon, Taiwan, Chōsen hen* 《「慰安婦」：戦時性暴力の実態 I——日本・台湾・朝鮮編》[“Comfort Wome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Vol. I: Japan, Taiwan, and Korea], pp. 118-155. Tokyo: Ryokufu shuppan.

Korea Chongshindae’s Institute 韩国挺身队研究会 (ed.) Zhenlie Jin 金镇烈 and Yibing Huang 黄一兵 (trans.)

- 2001 *Beiluewang qinglüe zhanzheng de weianfu* 《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Comfort Women in Invaded Areas and Battlefields].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Liao, Xiu-zhen 廖秀真

- 1997 “Nihon shokumin tōchika no Taiwan ni okeru kōshō seido to shōgi ni kansuru shogenshō 〈日本植民統治下の台湾における公娼と娼妓に関する諸現象〉 [Events Relating to Licensed Prostitutes and Prostitute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Ajia joseishi kokusai symposium jikkō iinkai, ed., *Ajia joseishi: Hikakushi no kokoromi* 《アジア女性史：比較史の試み》[Asian Women’s History: An Attempt at Comparative History], pp. 414-428. Tokyo: Akashi shoten.

Maynes, Katrina

- 2012 “Korean Perceptions of Chastity, Gender Roles, and Libido; From Kisaengs to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Grand Valley Journal of History* (Allendale) 1(1): 1-19.

Min, Pyong Gap 閔丙甲

- 2003 “Korean ‘Comfort Women’: The Intersection of Colonial Power, Gender, and Class,” *Gender and Society* (Newbury Park) 17(6): 938-957.

Mun, Ok-chu 文玉珠

- 1996 *Biruma sensen Tate shidan no ‘ianfu’ datta watashi* 《ビルマ戦線楯師団の「慰安婦」だった私》[I Was a “Comfort Woman” of the Tate Division in the Burma Front]. Tokyo: Nashi no kisha.

Okinawa kyōiku iinkai 沖縄教育委員会 [Okinawa Board of Education] (ed.)

- 1989 *Okinawa kenshi* 《沖縄県史》[History of Okinawa Prefecture], Vol. 10. Tokyo: Tosho kankō kai.

Park, Yuha

- 2025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Colonial Rule and the Battle over Mem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Rhee, Young-hoon 李榮薰 (ed.), Chizuko T. Allen (trans.)

- 2024 *Anti-Japan Tribalism: The Root of the Korean Crisis*. Honolulu: PacRim Marketing Group.

Shigemura, Minoru 重村実

- 1955 “Tokuyōin to iuna no butai 〈特要員と言う名の部隊〉 [A Unit Called Special Task Force].” *Bungei shunjū* 《文芸春秋》[Annals of Art and Culture] (Tokyo) 33(22): 221-225.

Soh, C. Sarah

- 2008 *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ong, Yŏn-ok 宋連玉

- 2000 “Kōshō seido kara ‘ianfu’ seido e no rekishiteki tenkai 〈公娼制度から「慰安婦」制度への歴史的展開〉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to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In VAWW-NET Japan, ed., *‘ianfu’: Senji seibōryoku no jittai I: Nihon, Taiwan, Chōsen hen* 《「慰安婦」：戦時性暴力の実態 I — 日本・台湾・朝鮮編》 [“Comfort Wome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Vol. I: Japan, Taiwan, and Korea], pp. 20-41. Tokyo: Ryokufū shuppan.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 1996 “Subaltern Talk: Interview with the Editors.” In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eds., *The Spivak Reader: 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pp. 287-308. New York: Routledge.

Suzuki, Yūko 鈴木裕子, Yōng-ae Yamashita 山下英愛, and Masaru Tonomura 外村大 (eds.)

- 2006 *Nihongun “ianfu” kankei shiryō shūsei, jō* 《日本軍「慰安婦」関係資料集成：上》 [Collection of Relevant Documents on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Army, Vol. 1]. Tokyo: Akashi shoten.

Tai, Eika

- 2013 “Japan’s Colonial Responsibility and National Subject Formation.” *Jinken Mondai Kenkyū* 《人權問題研究》 [The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Osaka) 12/13: 77-96.

Taiwan sōtoku kambō rinji kokusei chōsabu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査部 [Temporary Census Bureau, Office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ed.)

- 1934 *Kokusei chōsa kekkahyō Shōwa go-nen, zentō-hen* 《國勢調査結果表：昭和五年（全島編）》 [National Census Results, Showa Year Five, Island-Wide Edition]. Taihoku: Taiwan sōtoku kambō rinji kokusei chōsabu.

Taiwan sōtokufu 臺灣總督府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ed.)

- 1944 *Taiwan kokō tōkei* 《臺灣戶口統計》 [Taiwan Household Statistics]. Taihoku: Taiwan sōtokufu.

Tonomura, Masaru 外村大

- 2022 “Shōgitō shūsengyō to ianfu no yōin kakuho: Nihon naichi to Chōsen tono hikaku 〈娼妓等周旋業と慰安婦の要員確保：日本内地と朝鮮との比較〉 [Role of Prostitute Brokerage in the Recruitment of Comfort Women : A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Proper and Colonial Korea].” *Ryūkoku daigaku keieigaku ronshū* 《龍谷大学経営学論集》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Studies Ryukoku University] (Kyoto) 61(2): 25-46.

Ueno, Chizuko 上野千鶴子

- 2012 *Nashonarizumu to jendaa* 《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 [Nationalism and Gender]. Tokyo: Iwanami shoten.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婦女救援基金會 (ed.)

- 1999 *Taiwan weianfu baogao* 《臺灣慰安婦報告》 [A Report on Taiwan’s Comfort Women]. Taipei: Taiwan shangwu, 1999.

Xie, Pei-ping 謝培屏 (ed.)

- 2008 *Zhanhou qiansong waiqiao fanguo shiliao huibian 1: Hanqiao pian*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1：韓僑篇》 [Repatriated Migrants after World War II: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Vol. 1: Koreans]. Taipei: Academia Historica.

Yoshimi, Yoshiaki 吉見義明

- 2019 *Kaishun suru teikoku: nihongun "ianfu" mondai no kitei* 《買春する帝国日本軍「慰安婦」問題の基底》 [Empire of Prostituti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 "Comfort Women" Problem]. Tokyo: Iwanami shoten.

Yoshimi, Yoshiaki 吉見義明 and Hirofumi Hayashi 林博史 (eds.)

- 1995 *Kyōdō kenkyū nihongun ianfu* 《共同研究：日本軍慰安婦》 [A Joint Research on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Tokyo: Ōtsuki shoten.

Zhu, De-lan 朱德蘭

- 2009 *Taiwan weianfu* 《臺灣慰安婦》 [Taiwan's Comfort Women]. Taipei: Wunan.

回不去的女人們： 隱匿於二戰後臺灣的前韓籍性工作者

天江喜久

摘 要

二戰結束後，在臺韓人被遣返回光復後的韓國，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歸國。根據 1947 年的〈臺灣韓僑登記名冊〉記錄，共有 358 名韓國人留在臺灣，其中包括 48 名登記為戶長的年輕女性。在這些女性中，約有三成與臺灣本地男子結婚；另有三成則被標註為「應行遣返」。由於國民政府僅允許擁有「正當職業」的韓國人留臺，可推斷這些女性未符合相關規定：許多人曾從事性工作者，其中一些可能曾在日軍軍營中擔任慰安婦。

本文根據國史館與國家檔案局的官方資料，以及作者在韓僑社群中進行的私人訪談，聚焦於梳理戰後留在臺灣的年輕韓國女性的生命故事——無論她們是出於自願、非自願，或是僅因機緣巧合而留下。在 1947 年的登記名冊裡，48 名女性中僅有一人在公開記錄中被確認為前慰安婦，另有兩人據稱是前慰安婦，其餘女性則可能為娼妓。然而，作者認為「慰安婦」與「娼妓」的二元劃分並不準確。無論是慰安婦還是娼妓，她們皆遭受人口販運而被迫來臺。許多慰安婦在日本帝國時期曾為娼妓。這些女性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和父權體制的受害者，同時也受到儒家貞潔觀念的束縛，而這些觀念使她們在戰後無法回到家鄉。

關鍵詞：朝鮮人／韓僑、慰安婦、娼妓、日本帝國、臺灣、後殖民

蔣經國在臺軍事權力的建立： 以與王叔銘交往為中心的探討（1950-1965）*

蘇聖雄**

摘 要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強調槍桿子裡出政權，領導人的權力奠定須以武力為憑藉。關於蔣經國在臺灣權力的建立，尤其是政治權力及情治、政工系統的作用，已有諸多研究。然而，系統性分析其軍事權力建立的研究相對稀少。本文以蔣經國與王叔銘的交往為經，蔣經國軍事權力的建立為緯，考察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臺灣軍方高層人事變動的過程，並分析蔣經國在其中的角色及其掌握軍權的手段。本文指出，情治與政工是蔣經國掌握軍事權力的基礎，後者在軍隊中自成系統，並掌控軍隊黨部，配合情治系統監控全軍。然而，蔣經國掌握軍事權力的方法並不限於此。指揮系統是國軍資源所在，也是軍官升遷的最重要渠道，蔣經國深諳其中門道，在指揮系統中進行布局，其手段主要包括運作人事和培植派系，總目標是瓦解舊黃埔系。蔣經國與王叔銘的關係由盟友至破裂，不僅呈現了軍事高層權力關係的變化，亦反映了王叔銘與兩蔣建軍思想的歧異，以及黨國政治與軍事專業化的衝突。

關鍵詞：蔣經國、蔣中正、王叔銘、參謀總長、石牌訓練

* 本文寫作過程，承蒙李君山、汪正晟、林孝庭、林志宏、林桶法、張力、郭岱君、陳紅民、陳翠蓮、楊雄威、楊維真、趙相科、齊茂吉、劉維開（依姓氏筆畫排序）等諸位學者及匿名審查人的建議與指正，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稿日期：2024 年 6 月 4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9 月 25 日。

- 一、前言
 - 二、盟友互助
 - 三、猜忌萌生
 - 四、相互決裂
 - 五、結論
-

一、前言

蔣經國在近代臺灣史上極具重要性，其掌權過程受乃父蔣中正的扶植殆無疑義，然而自 1937 年從蘇聯回到中國，經過 10 年歷練於論資排輩的中國國民黨仍顯生澀。1948 年中期，他擔任上海市地區經濟管制督導專員管制物價、防範囤積居奇，最後在政商與親族的壓力之下，從「只打老虎，不拍蒼蠅」變成「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遭遇從政生涯以來最嚴重的挫敗。¹

在黨政軍複雜的人事背景之中，即便蔣中正革命歷史之久、職位之高，施政或推動變革都難免投鼠忌器，更何況是蔣經國。因此，在 1970 年代蔣經國全面掌權之前，應有一個鋪墊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蔣中正賦予其職位或分享部分權力便可輕易推進。尤其在軍隊，就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強調槍桿子裡出政權，領導人權力之奠定須以武力為憑藉。蔣經國在這個方面，明顯十分不足，他從未任職或就讀於中國的陸軍軍官學校等軍校，也從未指揮軍隊作戰而毫無戰功，於一群赫赫有名的中央軍將領之中無法比肩。因此，蔣經國得以建立其在臺軍事權力，應有一較為複雜的過程，值得深究。

關於蔣經國在臺權力的建立，尤其是政治權力或於情治和政工系統的作用，相關著作已有不少，惟系統分析其建立「軍事權力」的研究相對較少。固然政治、軍事密切關連，惟軍事體系自成一格，與黨政仍有區別，何況武裝力量的控制為

¹ 江南，《蔣經國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頁 178、185、190。

掌握政權的核心，應有獨立考察的價值。

王叔銘是中華民國高級將領，曾任空軍總司令及參謀總長，在當時軍事指揮體系之中，參謀總長是僅次於總統的人物，在軍中具代表性，王與蔣經國素有深交，兩人又留有日記，恰好提供一個合適的切入角度。本文以蔣經國與王叔銘的交往為經，蔣經國軍事權力建立為緯，考察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前期臺灣軍方高層人事的異動經過，分析蔣經國於其中的角色及掌握軍權的手段。

本文利用的史料，主要有三種：《王叔銘日記》、《蔣經國日記》，以及美英的檔案。《王叔銘日記》現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時間自 1946 年至 1998 年，涵蓋 53 年，超過 400 萬字，不乏臧否人物、政治觀點、世局變化等內容。² 已有數名學者利用該日記撰著論文，如胡平生、林桶法、張力等。³ 其中以張淑雅〈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一文，與本文主軸最為相關。該文指出，1950 年代王叔銘關係最密切的官員是蔣經國，兩人屢屢商量重大問題，不僅談論公事，也常一起慶生或過節，討論家庭問題；如此良好關係後來破裂，一直到晚年才回復。⁴ 所論清楚呈現兩者的演變，惟並未聚焦於蔣經國軍事權力的建立，並且寫作時蔣經國的日記尚未開放，諸多問題尚有探討空間。

《蔣經國日記》原藏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後移轉至國史館，時間自 1937 年至 1979 年（缺 1948 年），涵蓋 42 年，超過 300 萬字。國史館於 2023 年底開始出版，目前已出版 1970-1979 年。⁵ 林孝庭曾以該日記為基礎撰寫

² 張淑雅，〈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收於許雪姬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 128-130。

³ 舉要如胡平生，〈1948 年傳作義與陳繼承的齟齬：由《王叔銘日記》等觀之〉，收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臺北：國史館，2013），頁 691-713；張力，〈王叔銘將軍日記中的八二三戰役〉，《中華軍史學會會刊》（臺北）14（2009 年 9 月），頁 45-63；林桶法，〈政府遷臺初期空軍人事的糾葛〉，收於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下冊）》（臺北：世界大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557-585；林桶法，〈重起爐灶的落實：1950 年代蔣中正在臺的軍事整頓〉，收於黃克武主編，《重起爐灶：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頁 47-117；林桶法，〈從蔣介石、胡宗南、王叔銘日記析論 1949 年蔣、胡戰略紛歧〉，收於呂芳上主編，《日記中的蔣介石》（臺北：政大出版社，2020），頁 235-267。

⁴ 張淑雅，〈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頁 134-142。

⁵ 字數為筆者估計。參見蔣經國著、歐素瑛等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0）》（臺北：國史館，2023），館長序，頁 XXII-XXIII。

專書，重新探討蔣經國在臺灣的作為，於情治案件的分析，曾提及蔣經國注意到臺灣警備副總司令李立柏，利用匪諜案打擊向來與他不和的王叔銘。⁶ 陳翠蓮亦曾利用蔣經國的日記及新出檔案史料撰書，提及蔣中正在黨組織、政工、情治等「打造威權基礎工程」。⁷ 本文將以二者研究為基礎再做拓展。

美英的檔案方面，美國在臺外交或軍事官員定期向其中央政府回報臺灣政情，相關紀錄收藏於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部分外交報告出版為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方並有中央情報局蒐集臺灣情報。此外，王叔銘出身空軍，與美國空軍將領往來較多，部分紀錄收於美國空軍學院（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的克拉克特藏（Clark Special Collections）。英國在臺外交系統亦定期撰寫臺灣的政情報告，對於軍方高層的異動有一些觀察，相關檔案收入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Foreign Office（外交部檔案，簡稱 FO）全宗或在臺領事館的檔案。⁸

本文首先探討軍方高層人事組成及其錯綜複雜的關係，及蔣經國如何於人事變動過程與王叔銘合作，鞏固軍事權力；其次探討雙方為何衝突，其結構性因素為何，又反映了蔣經國怎麼樣的軍事權力布局；最後則探討兩人分裂過程與分道揚鑣後各自的發展，尤其關注王叔銘對蔣經國軍事權力上升的觀察。本文的「軍事權力」係指個人對武裝力量的影響或控制的能力。軍事權力的建立牽涉到人事、制度、威望等層面，本文將特別聚焦於人事，也就是蔣經國如何建立軍事方面的人脈。文中所論時間主要是 1950-1965 年，也就是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於 1950 年 3 月在臺復行視事，到 1965 年 1 月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的這段期間。

二、盟友互助

蔣經國，1910 年生，1925 年赴蘇聯讀書工作 12 年，曾於蘇聯軍校就讀並加

⁶ 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新北：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頁 61。

⁷ 陳翠蓮，《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臺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2021），頁 159-176。

⁸ 英國在臺領事館的檔案已出版：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Slough, U.K.: Archive Editions Ltd., 1997), vol. 10: 1952-1960.

入紅軍，除了學習野戰戰術、紮營等軍事技術，也接受軍隊政工的課程。期間參加共產黨的小組組織，成為蘇聯共產黨的候補黨員。1937年返國，開啟了在中國的事業。⁹ 王叔銘生於1905年，年長蔣經國5歲，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入廣東軍事航空學校第一期，復選送蘇聯留學空軍6年餘，1931年返國，歷任空軍軍官學校教育長、美籍空軍志願隊中國人員管理處主任、航空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參與中日戰爭諸多作戰，1946年升任空軍副總司令兼參謀長。¹⁰ 空軍是各軍種之中專業化程度最高的，王叔銘長期浸濡於此，具專業化特質，表現獲美軍高度評價，而由於行事風格彪悍，外界予其「王老虎」（Tiger Wang）的稱號。¹¹

或許因年齡相近且同具蘇聯經驗，王叔銘與蔣經國相互親近。從日記考察，至少在1945年開始，雙方已有一定交情，蔣稱王叔銘為「叔銘兄」，王則稱蔣為「經國兄」。蔣經國搭機飛北平，常夜宿王叔銘家中。¹² 某次蔣出差到北平，宿王叔銘住所，雙方「侃侃把話，不覺談了四小時」，言談中蔣十分肯定王之為人，認為其「剛直」、「堪為知己」。¹³

蔣經國與王叔銘易於深交，與各自的工作有關。蔣中正素喜運用手令，王叔銘擔負空軍傳遞任務，同時進行偵查工作，而蔣經國也是蔣中正對外聯繫的一個重要窗口，常代赴前方聯繫或了解狀況。1949年初蔣中正下野後，王叔銘身為空軍副總司令，仍指派飛機往來前線與後方為蔣中正傳達指示。蔣經國則在這段期間成為蔣中正非正式的「機要秘書」，傳遞指示並綜整情報回復。王叔銘與蔣經

⁹ 蔣經國，〈我在蘇聯的日子〉，收於 Ray S. Cline 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 226-228；“Biographic Sketch: Chiang Ching-Kuo 1963,” “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下載日期：2024 年 6 月 3 日，網址：<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biographic-sketch-chiang-ching-kuo/docview/1679088019/se-2>。一說蔣經國曾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見烏可力，〈塵封往事藏驚雷：回憶傅鍾前輩領導中國共產黨莫斯科中山大學支部局發展蔣經國入黨始末〉（2020 年 5 月 31 日），「禁聞網」，下載日期：2024 年 6 月 3 日，網址：<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baitai/20200531/1337126.html>。烏可力係烏蘭夫次子，烏蘭夫曾在蘇聯學習，與蔣經國是同學。

¹⁰ 〈王叔銘先生傳略〉，收於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20 輯》（臺北：國史館，1990），頁 30-34。

¹¹ “Wang Shu-ming,” (1955), *Report on leading personalities in Formosa*, Foreign Office (以下簡稱 FO)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檔號：371/133497。

¹² 《蔣經國日記》（臺北：國史館藏），1945 年 2 月 4 日、11 月 11 日、12 月 12 日。

¹³ 《蔣經國日記》，1946 年 5 月 1 日。

國業務互補重疊，往還增多。¹⁴

1950年代初期，蔣經國出任情治機構的負責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亦擔任軍隊政工首長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¹⁵ 其權力的擴張，為有政治敏感度的人所覺察。1950年7月，中國國民黨發表改造委員會名單，三民主義青年團系統親陳誠者占多數，而黨內資淺的蔣經國在列。王叔銘以為如此名單是蔣中正培養陳誠，參謀總長周至柔則以為培養陳誠是姿態，實際上是培養蔣經國。¹⁶ 在軍隊中，亦有人嗅到蔣經國權力的上升。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驤希望能獲得陸軍高級將領出國提名，找上王叔銘，盼王幫忙與蔣經國一談。¹⁷

權力明顯上升者與既有權力者相互競爭在所難免。當時軍中具有相當權力與威望者，總統蔣中正而外，當屬軍令系統的參謀總長與三軍首長（參見文末附錄），他們是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周至柔、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聯合勤務總司令負責後勤，向來無法與陸海空軍比肩）；而行政院長陳誠雖屬文職，以在軍隊甚久，亦累積相當威望。至於掌管軍政的國防部長，由於軍令與軍政分離，權力大受限制。（表1）上述幾個職位相較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階級更高、職權更廣，軍中並另有其他要職，蔣經國掌握政工與軍隊黨部，相較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委員，軍法權限較弱，人事影響力也有限，類似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以下簡稱「救國團」），雖隸屬於蔣經國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在軍隊內卻沒有活動。¹⁸ 因此，蔣經國在軍中擔

¹⁴ 沈懷玉訪問、周維朋記錄，〈鄭敦浦先生訪問紀錄〉，收於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記錄，《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589；沈懷玉訪問、林東璟記錄，〈張欣超先生訪問紀錄〉，收於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記錄，《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下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76；張玉法、陳存恭訪問，黃銘明記錄，〈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85、96、105、119；《蔣經國日記》，1946年8月10日，1949年1月24日、10月20日；〈1947年日記〉，《日記》，「王叔銘」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3-01-01-002，1947年9月21日〔按：以下省略檔案名稱及館藏號，全文皆以《王叔銘日記》為名代表〕；《王叔銘日記》，1950年3月17、19、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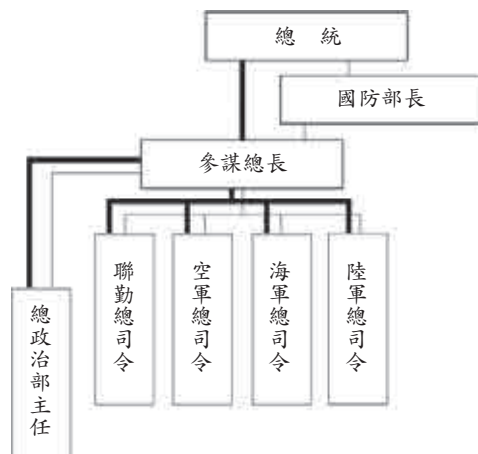
¹⁵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五組人事調查表〉，《行政職任狀派令聘書與受領各種勳章證書》，「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403-00010-037；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秘史》（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6-7。

¹⁶ 《王叔銘日記》，1950年7月27日。

¹⁷ 《王叔銘日記》，1952年4月22日。

¹⁸ 中國共產黨的共青團在軍隊基層建立委員會、支部等組織，受黨的領導，協力控制軍隊，成為強化軍隊政治工作之助手。中國國民黨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名義上不隸屬於黨，而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

表 1 中華民國軍事系統表（1955）



說明：粗線示軍令系統，細線示軍政系統。國防部設參謀總長，為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但參謀總長在軍令系統為總統之幕僚長，總統依憲法行使統帥權，關於作戰之指揮命令，直接經由參謀總長下達於軍隊。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局編，《國防部年鑑》（臺北：該局，1955），頁 7-8。

任的職務，僅為其權力建立在制度上的起步。

（一）王叔銘出任空軍總司令

王叔銘原為空軍副總司令，上司為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周至柔在遷臺初期的國軍頗具權勢，他主持空軍甚久，曾任航空委員會主任、中央航空學校校長，1946 年空軍總司令部建立，任首任總司令，1950 年 3 月兼參謀總長。¹⁹ 王叔銘作為空軍副總司令為周至柔副手，理應同舟共濟，實際上對周十分厭惡不滿，多次向蔣經國毫無隱諱地批評。²⁰ 這些批評有派系鬥爭等因素。²¹ 蔣經國對他的抱怨並未

部，卻沒有在軍隊建立組織，而於各縣市、學校及社會發展。參見潘進章，〈共軍共青團之探究〉，《國防雜誌》（臺北）22:3（2007 年 6 月），頁 82-92；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編，《綠旗飄揚三十年》（臺北：該部，1982），頁 61-72；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と民主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頁 83-85。

¹⁹ 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記錄，〈周至柔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臺北）13（2013 年 11 月），頁 185-186。

²⁰ 《王叔銘日記》，1952 年 3 月 3、9 日。

²¹ 林桶法分析，周王心結有出身不同及個性等原因：王留學蘇聯學空軍，對出身陸軍的周掌空軍有所不服，周又不重視王的意見，而王個性剛直主觀，也是重要原因。參見林桶法，〈政府遷臺初期空軍人事的糾葛〉，頁 557-585；徐康良，〈徐康良先生回憶錄〉，《口述歷史》8（1996 年 12 月），頁 225。

照單全收，某次聽後自記「周、王之間成見甚深，各說各有理，難分是非」。²²

蔣中正考慮空軍內部紛爭，1952年3月將空軍總司令一職改由王叔銘接替，周單任參謀總長，蔣中正自記：「空軍總司令已由王叔銘接任布達，以為數年來內部軍事主要之懸案，亦為整軍、建軍最大之障礙，竟得肅清於一旦，不可謂非感召之力」。²³

蔣經國不想偏向一方，調解周至柔與王叔銘，自己卻難以避免與周至柔衝突。1952年的一次軍隊黨部委員開會，討論黨代表大會「以黨領軍」的決議，周至柔在會上以舉手方式否決此一決議，令蔣經國既憂且怒，兩人惡感於焉倍增。²⁴ 蔣經國自記：「周至柔對政治部的態度，由冷淡而轉向攻擊，想必有人在中挑撥也」；²⁵ 「以各方面的情況來觀察，可以斷定有一個『反政治部反蔣經國』的暗流，正在向各方面發展，並且有人想將周總長亦拉進去」。²⁶ 王叔銘觀察，原為蔣經國政工下屬的胡偉克自與蔣經國不睦後，「亟盡所能向周至柔方面倒去，企圖聯周以予經國不快」，「毛人鳳〔國防部保密局局長〕亦聯周威脅經國」。²⁷ 1953年年中，周至柔在參謀會報批評政工監察制度，說政治部要監察官做「衛使」，蔣經國認為周刻意誤解。²⁸ 經此一事，蔣以為對周的關係已難維繫，「自今以後，恐再不能保持此一關係了，他〔周至柔〕已處處設法阻撓政治部的工作，因各人的觀念根本不同也」。²⁹

接替周至柔擔任空軍總司令的王叔銘，延續與蔣經國良好的關係，蔣經國得藉其涉入空軍內部。王叔銘因尊崇蔣中正，對其子經國「全力支持他的工作」。³⁰

²² 《蔣經國日記》，1949年3月25日，1952年3月19日、12月30日。

²³ 周至柔離任空軍總司令更直接的因素，或為毛邦初事件發生，毛與周互相指控。參見〈上星期反省錄〉（1952年3月22日），收於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2）》（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2023），頁88。

²⁴ 《蔣經國日記》，1952年5月25日。

²⁵ 《蔣經國日記》，1952年6月3日。

²⁶ 《蔣經國日記》，1952年7月15日。

²⁷ 毛人鳳與蔣經國鬥爭的原因，或是自恃功高而排斥蔣經國，以及與蔣宋美齡為同鄉有較好的關係以為靠山；胡偉克係第一任政工幹校校長，因與蔣經國不合，不久即退休。參見徐好文、胡必林，〈戴笠接班人毛人鳳升官圖〉，《傳記文學》（臺北）61:6（1992年12月），頁72；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秘史〉，頁5-6；《王叔銘日記》，1953年1月4日；陳寶川口述，卓遵宏、歐素瑛訪問，《陳寶川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9），頁297。

²⁸ 《蔣經國日記》，1953年7月15、18日。

²⁹ 《蔣經國日記》，1953年8月1日〈上星期反省錄〉。

³⁰ 《王叔銘日記》，1962年4月17日。

兩人可說是「密友」與「盟友」，時常共商與運作空軍工作與人事。其例甚多，首先，新任空軍政治部主任職缺，蔣經國意以國防部戰略計劃研究委員會委員吳順明出任，直接詢問王叔銘，王「認為可以，至如何簽擬，容再商之」。³¹ 其次，他們擬「由〔向〕上級發動」調換空軍官校校長方朝俊，³² 既然王叔銘的上級為參謀總長周至柔乃至總統蔣中正，可見兩人密議向參謀總長或總統發動一些人事異動；後來周至柔不滿方朝俊降調一案，王叔銘便直接向蔣中正提議此事，方朝俊終被調職。³³ 再者，兩人討論空軍長期人事的培養，「吾人之見解相同，均認為航空班中只有徐康良、陳嘉尚兩人可以培養，其餘均非上乘人才」。³⁴ 此外，毛邦初案是政府遷臺初期一大案，王叔銘多次與蔣經國洽商解決辦法，將所知內情經蔣經國報告蔣中正。³⁵

蔣經國與王叔銘除共商空軍事務之外，也會跳脫單一軍種，討論國軍整體人事與發展。如蔣經國的總政治部主任職將於 1954 年中屆滿，蔣、王討論人事問題，曾發想「政治部可改為新聞機構」。³⁶ 兩人並討論海軍內部複雜，總司令梁序昭「仍只用同鄉」，「海總梁序昭兩年來已將福建系統的人物全部起用」。³⁷ 陸軍亦為討論重點，兩人曾討論孫立人在大陸淪陷時先來臺，同美軍有默契；陸軍內部情況仍有腐敗存在，如公款私用、長官隨便送錢與部下。³⁸

蔣經國與王叔銘刻意運作陸軍將領胡宗南再起。胡宗南係往昔中央軍三大軍系領袖之一，國共內戰中主力盡失，1950 年 3 月下旬才赴臺，是最後一位離開中國大陸的高級將領。³⁹ 王叔銘與胡宗南皆黃埔一期畢業，稱之「胡宗南同學」。⁴⁰

³¹ 後來吳獲選出任。參見《王叔銘日記》，1952 年 3 月 16 日；〈吳順明國防部人事令〉（1952 年 6 月 3 日），筆者自藏。

³² 《王叔銘日記》，1953 年 3 月 14 日〈上星期反省錄〉、3 月 16 日。

³³ 《王叔銘日記》，1953 年 7 月 3、29 日。

³⁴ 陳嘉尚後來接王叔銘擔任空軍總司令。參見《王叔銘日記》，1954 年 7 月 11 日。

³⁵ 《毛邦初案辦理經過紀要》（1956 年 2 月），「外交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典藏號：11-07-02-10-23-034；《王叔銘日記》，1952 年 1 月 11、14、25 日。

³⁶ 《王叔銘日記》，1953 年 6 月 7、9 日。

³⁷ 《王叔銘日記》，1955 年 1 月 16 日、11 月 5 日，1956 年 12 月 3 日。

³⁸ 《王叔銘日記》，1956 年 6 月 10 日。

³⁹ 胡為真，《疾風勁草：胡宗南與國軍在大陸的最後戰役（1949-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香港：開源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20），頁 1-2。

⁴⁰ 《王叔銘日記》，1951 年 6 月 21 日。

蔣經國雖曾批評胡宗南「陰陽怪氣」，不知其到底在想什麼，但私下關係仍佳。⁴¹ 胡宗南於國共內戰大敗，兩人力保胡宗南，對於監察院對胡之彈劾，蔣經國「設法使其案件不能成立」。⁴² 彈劾案平息後，兩人討論運作胡宗南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⁴³ 胡宗南後來受任江浙游擊隊總指揮，遲不赴任，蔣經國往勸早日就職，盡速展開工作。⁴⁴ 胡宗南到職不久，共軍進攻大陳，王叔銘嘆息「胡宗南晚年之命運不佳，總是遭到困難的事」。⁴⁵ 爾後兩人又運作胡宗南入國防大學受訓，「期能明年接主陸總」。⁴⁶ 此事如若成真，王叔銘擔任空軍總司令、胡宗南出任陸軍總司令，蔣經國在軍界可望有更雄厚的憑藉。然而由於中外人士對胡宗南頗有批評，他始終無法出任軍中要職。⁴⁷ 暫不論結果為何，此一過程可見蔣經國與王叔銘相互合作，對軍隊人事介入甚深。

胡宗南沒有當上陸軍總司令，政府遷臺初期的陸軍總司令是孫立人。孫係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於中日戰爭末期立有戰功，聲譽卓著，與美軍關係良好，獲歐洲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之邀參觀歐洲戰場。⁴⁸ 與美軍顧問一樣，孫立人無法接受政工人員對軍隊指揮體系的干擾，他本非蔣中正起家的黃埔體系出身，更難避免遭致兩蔣敵視。⁴⁹ 蔣經國對王叔銘明白表示，孫立人有兩點缺點，「利用美人作自我宣傳」，以及「公眾場合從來不提及總統」。⁵⁰

海軍總司令是國軍另一重要職位，蔣經國對政府遷臺後首任總司令桂永清的工作頗為不滿，以為他都是為自己打算，令人寒心，結果一定是自趨滅亡。王叔

⁴¹ 《蔣經國日記》，1951年6月20日；胡為真講述、汪士淳撰寫，《國運與天涯：我與父親胡宗南、母親葉霞翟的生命紀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68。

⁴² 《王叔銘日記》，1950年7月9日。

⁴³ 此案遭胡部下反對未果。參見《王叔銘日記》，1951年2月25日。

⁴⁴ 《王叔銘日記》，1951年3月21日、6月19-21日、7月15、22日。

⁴⁵ 《王叔銘日記》，1952年2月15日。

⁴⁶ 《王叔銘日記》，1952年6月7日。

⁴⁷ 《王叔銘日記》，1954年12月11日，1955年3月13、14、16日、9月5日，1956年2月6日、12月3日，1957年8月7日。

⁴⁸ 〈孫立人中文傳略〉，《個人資料》，「孫立人」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典藏號：105-01-11-001。

⁴⁹ 陳存恭訪問、蔡惠如紀錄，〈王霖先生訪問紀錄〉，收於陳存恭訪問、萬麗鵬等紀錄，《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42-43。

⁵⁰ 《王叔銘日記》，1953年3月14日〈上星期反省錄〉。

銘勸蔣經國與桂永清做一次懇談，蔣不以為然，認為無效且沒有結果。⁵¹ 蔣經國對桂永清不滿，桂對蔣也不客氣。王叔銘日記顯示，桂永清透過葛武榮（黃埔二期畢業，國民大會代表）藉驅逐趙龍文（海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鬥爭蔣經國，並且利用美國人攻擊蔣經國。⁵² 其實桂永清也知蔣中正刻意培養蔣經國接棒，但他心理始終難以接受，認為自己黃埔一期出身，輩分、經驗都比蔣經國高，因而與趙龍文嚴重衝突。⁵³ 最後桂離任總司令職，由海軍青島系領袖馬紀壯接任。⁵⁴ 英國方面觀察到，桂永清的調職表面上是兩年任期已到，實際上是蔣經國等人逼使其離職。⁵⁵

1954 年年中，軍方高層兩年任期結束，有的輪調，有的續任。蔣經國卸下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出任改組後的國防會議副秘書長。⁵⁶ 國防會議由政府及軍方高層組成，其設置據英國方面的觀察，有防止軍事首長坐大的意圖，同時弱化了參謀總長的職權。⁵⁷ 周至柔由參謀總長轉任國防會議秘書長，與副秘書長蔣經國雖有爭競，但關係並未激化。⁵⁸ 倒是 1955 年年中孫立人案爆發，蔣經國親自指揮情治系統偵辦，就表面上看，孫案是陸軍中將蔣經國辦案處理前陸軍總司令、現為參軍長的陸軍二級上將孫立人，無論蔣是否有意發起鬥爭，他在軍隊都豎立

⁵¹ 《蔣經國日記》，1951 年 9 月 23 日。

⁵² 《王叔銘日記》，1951 年 6 月 21 日。

⁵³ 桂永清藉驅趙而鬥蔣經國，實際上趙擔任海總政治部主任後，對政治部內親近桂永清人士（四維學社）的鬥爭更為慘烈。參見孫家麒，《蔣經國竊國內幕》（香港：自力出版社，1961），頁 13；〈蔣中正致周至柔手令〉（1951 年 7 月 3 日），《籌筆：戡亂時期（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17-028；王國璋，〈桂總長早故之因與彭孟緝躍升背景〉，《傳記文學》103: 5（2013 年 11 月），頁 79。

⁵⁴ 〈蔣中正手令〉（1952 年 4 月 3 日），《籌筆：戡亂時期（十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400-00019-023；張力、曾金蘭訪問紀錄，〈徐學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張力等訪問紀錄，《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 2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134；雷洵，〈雷洵（海軍官校 40 年班）：也為我那個時期的軍人說幾句話〉（2016 年 4 月 15 日），「神仙、老虎、狗」，下載日期：2024 年 4 月 25 日，網址：<https://chaoyisun.pixnet.net/blog/post/64252657>。

⁵⁵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April 1952,”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pp. 83-84.

⁵⁶ 《國防會議簡史（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100-00043-001；李雲漢校閱、林泉整編，《郭寄嶠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 153-154。

⁵⁷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July 1954,”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p. 534; “Chinese National Defence Council (1954),” FO 371/110301.

⁵⁸ 《王叔銘日記》，1954 年 9 月 27 日，1955 年 5 月 1 日。

某種正面或負面的聲威，外界因此盛傳蔣經國鬥倒孫立人，⁵⁹ 英人亦視蔣經國為此案的勝利者。⁶⁰

（二）王叔銘出任參謀總長

1957年五二四事件（劉自然事件）爆發，對蔣經國的聲望造成很大的傷害。或以為五二四事件是蔣經國在臺事業的轉折，此後從報章雜誌上消失，拒絕媒體報導，很少出現在公開場合，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服務榮民和修築中橫公路。⁶¹ 實際上就軍中權力而言，其力量並無變化，仍舊冉冉上升。事實上，他在五二四事件前的1954年中以後，就刻意淡出公眾視野，英國人分析這是因為蔣中正避免其子受到外界攻擊，蔣經國仍舊掌握著國防部的一些軍事部門（如軍隊政工）及國家安全局，權力隨時間過去愈來愈大。⁶²

蔣經國兼任了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退輔會）職務，1956年任副主任委員同時代理主任委員職務，1957年5月25日真除主任委員，剛好在五二四事件第二天。其實蔣經國在五二四事件以前就十分投入退輔會工作，赴中橫公路勘查，充分認識到退輔會的重要性。相對於許多人認為該工作煩難、無所謂且吃力不討好，他以為退輔工作是建軍工作的一部分，對於退輔工作必須要有政治上的認識。⁶³ 退輔會不是管理現役軍人，沒有牽涉資源更多的軍事指揮體系，但由於照顧了廣大榮民，蔣經國於退役軍人之間培養了聲望，同時獲得了相關組織的支持，從另一層面提升了在軍人間的影響力。⁶⁴

⁵⁹ 蔣經國極力在日記自清。參見《蔣經國日記》，1955年8月19日、8月20日〈上星期反省錄〉、8月27日〈上星期反省錄〉。

⁶⁰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July and August 1955,”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pp. 623-624.

⁶¹ 肖如平，《蔣經國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頁222-225；江南，《蔣經國傳》，頁372-375。

⁶² “Annual review for 1954,”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pp. 571-572.

⁶³ 輔導工作紀要編輯委員會編，《輔導工作紀要（第1輯）民國43年11月至48年12月》（臺北：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974），頁258-259、580；魏秀梅，《趙聚鈺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32、67、89-90、92；蔣經國，《向危險的方向前進》，收於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5冊）》（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頁319-320。

⁶⁴ 1963年中旬《紐約時報》曾分析，蔣中正年紀已老，承繼人以陳誠、蔣經國最為可能，副總統陳誠按憲法應為承繼人，但蔣經國「利用秘密警察及退役軍人」，為陳誠有力之競爭者（底線為筆者所

退輔工作之餘，蔣經國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職位並未中斷，情治工作持續進行，透過對舊部的「指導」，對國軍政工仍牢牢掌握。於其軍事權力更重要的是，與他關係密切的盟友王叔銘出任了參謀總長。

原先參謀總長周至柔擔任 2 個任期共 4 年後，調任國防會議秘書長，離開這個實權職位，由桂永清接替。桂永清僅出任該職 31 天便因心臟病猝逝，由彭孟緝代理。⁶⁵ 蔣經國與彭孟緝相善，許多事情得以藉其推行，或視其為蔣經國的「劊子手」（executioner）。⁶⁶ 惟蔣經國以為彭「自卑感太重，不能久代參謀總長」。所謂「自卑感」，或指彭孟緝係黃埔五期出身，在眾多黃埔前期將領面前不好施展，黃埔一期的陸軍總司令黃杰與空軍總司令王叔銘皆對彭不滿，向蔣中正抗議彭為黃埔五期，既乏經歷，又無戰功，如何接總長指揮三軍。⁶⁷ 蔣經國因此曾考慮支持私交甚深並為黃埔一期的胡宗南任參謀總長，惟胡「因中外人士關係，不能負重責」，最後蔣經國便擁護亦屬黃埔一期的王叔銘出任。蔣經國直接與王密談此事，建議先安排接替空軍總司令人選，並提到蔣中正曾表示徐康良體弱且判斷力不佳，不適合由其接空軍總司令。王叔銘為此擬推陳嘉尚為空軍接班人，⁶⁸ 蔣經國接著建議王叔銘使陳嘉尚多與蔣中正接近。⁶⁹ 這個蔣經國介入空軍人事的過程於軍中傳開，引起未晉升者的不滿，曾出現反蔣經國之油印品，言其干預國家大事。⁷⁰

加，下同）；除了於退撫工作培養聲望，蔣經國雖無顯赫戰功，但曾多次親赴金馬前線，尤其在八二三炮戰期間，多次代表總統冒著猛烈砲火親赴金門撫慰軍民，贏得軍民的向心力及將領的認同。軍中領導統御向來強調「跟我來」，威勢與撫慰、權與德並行，這亦是蔣經國建立其軍事權力的關鍵之一。參見《王叔銘日記》，1963 年 7 月 15 日。

⁶⁵ 傳聞桂永清反對政工，為蔣經國派人注射毒針暗殺；時任第八十四師師長的尹國祥在桂永清過世前有接觸，他指出桂身體不太好，有心臟病，在臺北永春坡舉行軍隊校閱前，其夫人已打好幾通電話要師長多注意，桂仍花費很多時間訓話，當日回家後感到不舒服，請留德私人醫師檢查，私人醫師認為他為高血壓，實際上是心臟病，下錯了藥一下子就去世。參見劉鳳翰訪問、劉海若紀錄，《尹國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123-125；〈孫郭案 36 年至 45 年底紀事總表〉，「監察院」，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11 日，網址：<https://cybsbox.cy.gov.tw/CYBSBoxSSL/edoc/download/5239>。

⁶⁶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August 1954,”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p. 541.

⁶⁷ 據說，蔣中正駁斥他的兩位門生說：「他不能指揮，我是三軍統帥，不能在他的參謀下指揮你們嗎？」黃杰、王叔銘認了但作消極抵制。參見王國璋，〈桂總長早故之因與彭孟緝躍升背景〉，頁 80。

⁶⁸ 《王叔銘日記》，1954 年 12 月 11 日。

⁶⁹ 《王叔銘日記》，1955 年 6 月 19 日。

⁷⁰ 《王叔銘日記》，1956 年 4 月 12-14 日。

1957年6月23日，蔣經國赴王叔銘家密談，透露蔣中正的人事調任案，包括王叔銘調參謀總長、彭孟緝調陸軍總司令、梁序昭連任海軍總司令、陳嘉尚任空軍總司令。⁷¹三日後，軍方人事正式發表。⁷²王的出線，固然與軍種平衡、王與美軍友好、⁷³獲蔣中正信任等因素有關。蔣經國作為他的盟友，支持他的事業而早已布局，應也是重要因素。美方因此觀察，王叔銘升任參謀總長，意味蔣經國的影響力並未因五二四事件而削弱。⁷⁴

王叔銘出任參謀總長後，日記中記載與蔣經國的往還大幅增加。參謀總長總攬陸海空軍，此時蔣經國與王叔銘進一步商討全軍各事，如陸軍人事、海軍人事、空軍人事、軍中黨務、軍事政策（如臺籍新兵比例）等。⁷⁵某次兩人會晤談論人事與業務，人事方面談及蔣緯國調為國防部第五廳廳長、胡忻擬調第一軍軍長、毛景彪可調為總統府第二局局長、黃鎮球調國防會議秘書長等；業務方面，談及軍隊黨部簡化案、運用投誠共軍作心理戰的顧慮等等。⁷⁶討論的結果，若須經總統蔣中正同意，由蔣經國向上報告，蔣經國再將結果告知王叔銘。⁷⁷種種運作，國軍高層已有風聲，後來出任參謀總長的賴名湯在日記提到，蔣經國早已管理軍事，尤其是人事，「但總是暗的」。⁷⁸

三、猜忌萌生

蔣經國與王叔銘雖成為盟友，相互合作，但不是沒有誤會或衝突。其實，王

⁷¹ 《王叔銘日記》，1957年6月23日。

⁷² 同年8月，國防會議秘書長由周至柔易為文人張羣。周至柔調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愈加遠離軍事相關職務。參見劉澤民主編，《臺灣省政府主席年譜：周至柔》（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頁52-53；《聯合報》，1957年6月26日，第1版。

⁷³ “A. A. E. Franklin to Selwyn Lloyd, July 2, 1957,” *Senior defence posts in Formosa (Taiwan)*, FO 371/127497.

⁷⁴ “Chinese Nationalists Shake up High Command,”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1957/06/26*, Current/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 Collection (Langley: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OIA) /ESDN (CREST): 03153704.

⁷⁵ 《王叔銘日記》，1957年7月20日、9月28日、10月6日、11月17日、12月14日，1958年2月7日、3月23日。

⁷⁶ 《王叔銘日記》，1958年1月5日。

⁷⁷ 《王叔銘日記》，1958年1月7日。

⁷⁸ 葉惠芬、林秋敏、周美華編輯校訂，《賴名湯日記 I：民國五十二-五十五年》（臺北：國史館，2016），1964年3月12日，頁197。

叔銘在出任參謀總長之前，便不可避免聽到許多攻擊蔣經國的聲音，例如「大家均以為經國兄之幹部極不健全，如胡軌、趙聚鈺等均非良才，而經國兄獨用之」，「經國不接受新近朋友之勸告，完全聽小人讒言」。⁷⁹ 不過王往往不以為意，刻意迴護。⁸⁰

蔣經國也聽了不少王叔銘的壞話，於相處過程予以印證，一度極不諒解。1951年蔣正推動政工制度，或許是與王叔銘意見不合，在日記記下「王叔銘又是好色卑鄙，被人所棄」。⁸¹ 1952年王升任空軍總司令，蔣經國思考「王叔銘之能力與學問實不足為一軍之將，今日人事之調整，實不合理想，但比不調動要來得好」。⁸² 之後，蔣經國在日記對王屢有批評，如批評他「是一位想不開看不遠的人」，⁸³ 「沒有誠意和情感者，不可與其為深交」。⁸⁴ 1956年中，蔣經國想起一位不知何人的「知己」提醒，說在今日環境中，有高級人員想利用他作橋樑，要當心這些人過河拆橋。蔣經國發現，「王叔銘即是搭橋和拆橋同為一人的一類人，實不可不慎防也」；「在私人關係來講，他待我很好，但是他是在玩弄政治而不是在創造革命事業，王叔銘有其長處，亦應用其所長，但是與其為友，則不可不謹慎小心也」。⁸⁵

蔣經國評價王叔銘的為人不是那麼正面，為何仍支持王的升遷？首先，蔣經國跟王叔銘私交較好，雖知曉其諸多缺點，仍以為能夠「勸其改正」。⁸⁶ 其次，蔣以為有人刻意挑撥他與各方面的關係，離間他與幹部以及親友的感情，將他孤立起來，或因此堅持維繫王這個舊友，支持其事業。⁸⁷ 再者，諸將各有缺點，不是王才有缺陷，蔣經國以為「如此之調整〔王叔銘等人的升遷案〕，目前而言甚為適當」。⁸⁸ 當然，蔣經國對王的疑慮，全都向父親明說。蔣經國的日記固定呈

⁷⁹ 《王叔銘日記》，1956年7月16日。

⁸⁰ 《王叔銘日記》，1955年2月5日〈上星期反省錄〉。

⁸¹ 《蔣經國日記》，1951年7月14日〈上星期反省錄〉。

⁸² 《蔣經國日記》，1952年3月14日。

⁸³ 《蔣經國日記》，1953年1月13日。

⁸⁴ 《蔣經國日記》，1956年1月8日。

⁸⁵ 《蔣經國日記》，1956年8月13-14日、9月8日、9月25日，1957年4月6日、5月4日。

⁸⁶ 《蔣經國日記》，1957年6月26日。

⁸⁷ 《蔣經國日記》，1956年12月23日。

⁸⁸ 《蔣經國日記》，1957年7月〈本月大事預定表〉。

繳蔣中正閱讀，日記所記的一切，等於是向蔣中正傳達自己的情報與看法。⁸⁹

蔣經國於王叔銘出任參謀總長之後，與其工作更趨密切，摩擦隨之大幅增加，他先前對王已有負評，此後更加猜忌，這可從三點進行觀察，各項同時反映蔣經國掌握軍事權力的方法與布局，部分情形在王出任總長前已肇其端。

（一）王叔銘批評情治與政工

情治與政工是蔣經國工作的核心，也是蔣中正維繫政權的重要手段。1949年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政治行動委員會」在臺成立，統一並強化情報工作，蔣經國是委員之一，其工作獲蔣中正肯定。1950年蔣中正總統復職後，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組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所有情治機構統歸管轄。⁹⁰ 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不僅監控平民，由於得以「指導協調」大陸的游擊及敵後、保防、諜報等工作，涉入了軍事系統。⁹¹ 蔣經國復以此職代替總統蔣中正聯繫協調，例如重要將領將出任軍事要職，蔣經國常於明令發布前先行告知；這對一般將領而言，無疑會視蔣經國為總統的代言人，提升其在制度以外的權力。⁹²

1950年4月，蔣經國又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⁹³ 該職務同時負責控制中國國民黨軍隊黨部，是其深入軍事指揮體系，在軍界擴展權力的另一重要方式。

⁸⁹ 蔣中正於其日記有很多閱讀蔣經國日記的記載。參見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2）》，1952年1月2日，頁15；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3）》（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2023），1953年2月27日，頁69；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8）》（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2024），1958年1月28日，頁31；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6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2024），1960年3月31日，頁82。

⁹⁰ 〈政治行動委員會工作報告〉（1949年8月15日至12月底止），《中央情報機關（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2-00010-004；〈1950年「三十九年工作反省錄」〉，收於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2023），頁5-6；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秘史》，頁6-7。

⁹¹ 〈現行情報治安機關隸屬及工作關係表〉（1953年），《中央情報機關（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2-00013-012。

⁹² 如1954年6月黃杰接任陸軍總司令前，蔣經國先行到訪，「轉達總統德意，擬調余（黃杰）充任陸軍總司令，並告余對陸總人事須妥為攷慮」。之後蔣中正才正式召見黃杰；蔣經國後出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也於該職發揮類似作用。參見《黃杰日記》（史丹佛：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2012C1，1954年5月24日。館藏資訊可參見 https://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kt8w1039ss/entire_text/?query=huang%20jie。

⁹³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五組人事調查表〉，《行政職任狀派令聘書與受領各種勳章證書》，「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403-00010-037。

時中華民國雖已行憲，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化明為暗，建立各級黨部，將黨的力量「秘密」深入政府。⁹⁴ 軍隊中建立軍隊黨部（特種黨部），與政工體系結合，黨部化名「周國光」、「王師凱」等，蔣經國曾擔任黨部書記長。⁹⁵

蔣經國的情治與政工工作招致多方不滿，美軍多次表示，政工的推動使國軍花太多時間在非訓練的任務。⁹⁶ 不滿於此的國軍高級將領也很多，如前述周至柔、桂永清、孫立人，而與蔣經國關係較好的胡宗南及王叔銘也對此多少有所疑慮。早在蔣經國接政工之初，王叔銘與胡宗南便以為政工幹部能力與人品不足，尤其是高級幹部，如蔣堅忍（時任陸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是腐敗奸險之徒，趙龍文（海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是一十足之官僚，既無政工學識，又無政工經驗，在海軍中工作不好，尚挑撥是非，這些分子均是蔣經國之重要幹部，可預測其工作前途不會有好結果。⁹⁷

王叔銘擔任參謀總長後，在國防部推動的一些政策，限制了蔣經國情治與政工的發展。國防部組織心戰研究機構，踩到蔣經國政工的領域，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堅忍告知王叔銘「蔣經國不甚同意在國防部組織有心戰研究機構」，並告稱心戰是總政治部的業務，情報及新聞方面不應干涉。王不同意如此看法，認為「心戰工作是最重要之工作，但是總政治部迄未做好，余作事只求現實，不講人情，不求虛面也」。⁹⁸ 後來參謀次長賴名湯為此事向蔣經國解釋說明，組織心理

⁹⁴ 喬寶泰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上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249-260。

⁹⁵ 陳存恭、吳美慧訪問，吳美慧紀錄，〈李獻琨女士訪問紀錄〉，收於陳存恭訪問、萬麗鵬等紀錄，《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頁67；賴名湯口述、賴啓訪錄，《賴名湯先生訪談錄（下冊）》（臺北：國史館，2011），頁463。

⁹⁶ “Week 41, 1403052, 10/14/51, from Taipei (ALUSNA),” Records of the Army Staff, RG 319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以下簡稱 NARA), Entry 57, Box 497, China 1951 (Taipei); “Current Intelligence. Current Intelligence Review [Chinese Nationalist Political Department Impedes U.S. Efforts to Reorganize Armed Forces, and Other Topics] 1952,” “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Office”, 下載日期：2024年6月3日，網址：<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current-intelligence-review-chinese-nationalist/docview/1679113397/se-2>。

⁹⁷ 王叔銘還曾批評「我政工黨務均為工作不力也」；「我認為現行之政工制度實有改良之必要，否則不只影響三軍戰力而已也」；「各政工主任報告的內容平泛乏味，足見彼等之無能力弱，余對此至為焦慮」；「審核軍事會議報告書，各單位所擬者多不通順，且冗長無味，此乃幕僚之軟弱的證明，尤其政工和後勤更差」。參見《王叔銘日記》，1951年6月22日、8月16、18日，1954年4月23日，1957年1月10日。

⁹⁸ 《王叔銘日記》，1958年11月15日。

作戰研究機構不干涉蔣經國心理研究之組織及權力，但蔣經國仍「不甚諒解」。王叔銘聽到蔣經國的反應後也很乾脆，「余為國家及國軍利益，只好不顧朋友之私情而毅然處之也」。⁹⁹

王叔銘推動國軍精簡，政工體系直接受到衝擊。王收到很多政工體系的反應，但「為改進國軍素質，精簡政策之決心決不動搖」，私下還批評政工人員只想升官升級，並不見得發揮多少力量，軍隊低階指揮官與政工人員迄今有問題存在，主因就是政工人員升太快，而引起其他軍官之不滿，又政工人員另有系統，「殊為荒唐也」。¹⁰⁰ 王叔銘的這些政策，與政工系統利益直接衝突。其實王叔銘身處指揮系統，對政工的作用難免感到懷疑，某次聽蔣經國讚賞的政工幹部劉子清報告後自記：「此種無用之政工幹部對事既不深入，當無能力處理，日前蔣經國告稱劉為人很好且能幹，殊不知其用意安在，政工人員無是非又是一證」。¹⁰¹ 王因此命令下屬不透過總政治部直接報告軍中問題。蔣經國得知後十分疑慮，「不知王之用意何在？近日來看見王的矇上欺下之作風，無任憂痛」。¹⁰²

王叔銘不僅對政工有所批評，還抑制了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編階。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堅忍曾要求提高其編階為上將，王不同意。¹⁰³ 此事貌似雖小，卻對王叔銘傷害極大。因為蔣堅忍是蔣經國政工的主要幹部，王未予其機會，等於阻擋蔣經國的人的發展，未能壯大蔣經國派系，也未能提高政工體系在國軍的地位；此外，期待未獲滿足的蔣堅忍，難保不會挾怨向蔣經國進讒言。¹⁰⁴ 蔣堅忍未能如願後幾天，蔣經國在日記記下：「王叔銘重利無義，善於玩弄別人，對此人不宜過於接近，以免上當，據說王叔銘有王老虎之稱，非因其作戰勇敢而得此外號，乃由於他善於害人也」。¹⁰⁵ 與政工幹部一樣，對於情治幹部，王叔銘也

⁹⁹ 蔣堅忍係 1956 年 7 月升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參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登記補充片〉，《蔣堅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檔案（臺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29-210000-1990；《王叔銘日記》，1958 年 11 月 18 日。

¹⁰⁰ 《王叔銘日記》，1959 年 1 月 25 日、2 月 28 日。

¹⁰¹ 《王叔銘日記》，1959 年 3 月 20 日。

¹⁰² 《蔣經國日記》，1959 年 1 月 26 日。

¹⁰³ 《王叔銘日記》，1958 年 7 月 24 日。

¹⁰⁴ 王叔銘之後反省：「從許多的事看來，經國受了情報人員之偏差報告的影響，受了蔣堅忍之挑撥及反對我者之讒言，在友誼上發生動搖矣」。參見《王叔銘日記》，1959 年 7 月 16 日、1969 年 5 月 21 日。

¹⁰⁵ 原先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編階為中將，1962 年 3 月方修訂為二級上將。參見王漢國等著，《政戰風雲路：歷史、傳承、變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頁 340；《蔣經國日記》，1958 年 7 月 26 日。

有所提防。他注意到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情報局之員額運用仍有吃空的嫌疑，「應逐漸設法改正之」。王並於日記提醒自己國防部人事行政局長易勁秋「也是蔣經國的人」；¹⁰⁶「易勁秋是蔣經國之人，是在一廳專負人事聯絡之責」。¹⁰⁷

蔣經國持續觀察王叔銘對情治與政工的壓抑，於日記不斷抱怨，他發現目前軍中問題要以政工人員情緒低落最可憂慮，批評「王叔銘的手段甚為凶毒，在他的觀念中只有權利而無誠意，到處玩花樣，聯甲倒乙」，「此人正在包圍我，利用我，我應明察之」。¹⁰⁸某次蔣經國因國防部新聞室主任柳鶴圖阻礙退輔會之宣傳，直接給其一大難堪，氣勢洶洶說到「你小心點，你時常與總政治部搗亂！」柳感到難以忍受。王叔銘在日記記下此事，沒注意到柳的問題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問題，還以為「經國此種行動，對其個人無好處非宜也，老朋友如余者應勸告之」。¹⁰⁹王當時沒有想到他已深深得罪了蔣經國，日後才反省這是失勢的原因，嘆息「個人只知做事，不會做官，生性過耿直，不喜敷衍人，因此得罪了很多的人，對經國方面聯絡太少」。¹¹⁰

（二）另立軍事派系的衝突

蔣經國與王叔銘另一衝突點，在軍事派系的建立。辦學是蔣中正培植軍中人脈的重要方式，過往如黃埔軍校、廬山軍官訓練團、峨嵋軍官訓練團等。在臺初期，蔣經國亦仿其父，以政工幹部學校培養個人派系。他以總政治部主任指導政工幹校的建設，由總政治部第一組副組長王昇草擬建校計畫，1951年11月第一期學生入校編隊，正式開課。¹¹¹蔣經國雖非校長，對政工幹校的教育十分關心，

¹⁰⁶ 《王叔銘日記》，1958年7月10日。

¹⁰⁷ 《王叔銘日記》，1958年7月24日。

¹⁰⁸ 《蔣經國日記》，1958年5月1日、11月22、24日。

¹⁰⁹ 《王叔銘日記》，1959年3月30日。

¹¹⁰ 王叔銘自我檢討的全文為：「幾日來不斷的反省，檢討自己的缺點，個人只知做事，不會做官，生性過耿直，不喜敷衍人，因此得罪了很多的人，對經國方面聯絡太少，易勁秋是經國的幹部，去年為他辦理獎懲案件誤了期限，我曾處罰了他。柳鶴圖為美國新聞官請勳章，經國曾說他對他不好，不該頒勳章，非常不滿意。又為輔導委員會宣傳事，亦因不明個細，使得經國不高興，這些地方均恐未得經國之諒解，亦不便再為之解釋」。參見《王叔銘日記》，1959年7月4、8日。

¹¹¹ 《王昇日記》（史丹佛：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2013C5，1951年1月〈本月大事預定〉、2月〈本月大事預定〉、10月27日〈上星期反省錄〉；國軍政工史稿編纂委員會編，《國軍政工史稿》（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頁1564-1567。

每週不但對正規班學生講課，也對教職員和情報訓練人員授課。¹¹² 這些政工幹校學生畢業後到軍事機構、部隊中開枝散葉，成為蔣經國軍事權力的基礎之一。在軍中甚久的王叔銘，深知幹部訓練為培植個人派系的重要方式，於政工幹校第一期畢業後言道：「此為經國之後起幹部第一批出籠，將來其成績如何，應視其忠實之程度如何也」。¹¹³ 王叔銘不知蔣經國還有一個非常隱密的情報訓練。蔣經國為統合「軍統局」與「中統局」情報幹部，自1950年7月起，在石牌開辦訓練班，每期調訓120人左右，共8期，約1千餘人。¹¹⁴ 一面輪訓原有工作人員，一面召訓新人，新舊相雜，建立以蔣經國為中心的中華民國新情治體系。¹¹⁵

另一個王叔銘沒注意到的，是蔣經國藉另一石牌訓練班培植幹部。此石牌訓練又稱實踐學社，是日本教官白鴻亮領導日本軍事顧問「白團」的軍事訓練。¹¹⁶ 過去的研究已呈現該訓練的目的，不僅強化國軍幹部軍事的技能與素養，同時鞏固了對蔣中正個人的信仰與向心。¹¹⁷ 較少提及的是，這也是蔣經國掌握軍事權力的重要手段。

眾所周知，中華民國陸軍最大派系為黃埔系，黃埔教官及前期學員影響力尤大。對於這些戰爭經驗豐富的「舊黃埔」前輩，除了胡宗南等少數與其交好者，蔣經國對他們沒有好感，視之為反對自己的「黑力量」。¹¹⁸ 他以政工幹校培養其派系，但國軍長期面對戰爭，素來重視帶兵作戰的指揮體系，政工終究非軍隊核心，石牌訓練班為蔣經國製造另一個培植派系的機會。

陸軍將領劉安祺很早便察覺蔣經國的心思，向王叔銘透露「經國欲以石牌系打破黃埔系」。¹¹⁹ 其實在劉發此言之前，王叔銘已聽聞前石牌訓練班主任、時為代理參謀總長的彭孟緝，大力培植受過石牌訓練班的軍官。空軍將領趙國標曾在

¹¹² 小谷豪治郎，《蔣經國傳：現代中国八十年史の証言》（東京：プレジデント社，1990），頁216-217。

¹¹³ 《王叔銘日記》，1953年4月21日。

¹¹⁴ 王昇係石牌訓練班副主任，主任為蔣經國。參見王昇，《王昇回憶錄（手稿）》，王昇自藏影本，頁129-133；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頁189-203。

¹¹⁵ 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秘史》，頁26-37。

¹¹⁶ 黃慶秋編纂，《日本軍事顧問（教官）在華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8），頁2、8-9。

¹¹⁷ 陳鴻獻，〈蔣中正先生與白團（1950-1969）〉，《近代中國》（臺北）160（2005年3月），頁91-119；王長河、彭群堂，〈白團對國軍撤退來臺後的貢獻與戰略意涵〉，《中華軍史學會會刊》（臺北）26（2021年12月），頁39-66。

¹¹⁸ 《蔣經國日記》，1952年7月15日。

¹¹⁹ 《王叔銘日記》，1955年9月5日。

石碑訓練班受訓，面告王叔銘說彭孟緝在石碑聚餐的講話，「語中似有組織作用」，「石碑學員都以為要做官須走經國路線」。¹²⁰ 王叔銘對此十分不以為然，認為「石碑訓練班實有需要，但冀其勿造成特種派系也」，他直接將想法告知蔣經國「請其注意」。蔣經國的回應似屬正面，王自記「彼之意見與我同」。¹²¹ 之後王叔銘又向蔣經國說「吾人均不同意彭孟緝由石碑組織保升學員升級，此不但有害人事制度，且鼓勵軍人走斜路；彭孟緝此種幼稚作風實為可恥，吾人商決報總統申明之」。¹²² 王接著直接向蔣中正報告，蔣表明不明瞭此事，收回原來的石碑保人升官案。¹²³

後來，彭孟緝仍然成功擢升石碑訓練班學員。¹²⁴ 整個看下來，若兩蔣真正反對，彭孟緝此舉難以理解，實情或為蔣經國暗中授意，而王叔銘始終不知。爾後俞濟時向王叔銘透露「彭孟緝是經國之傀儡，毫無人事權」，¹²⁵ 一些評論也證實這個說法。¹²⁶ 綜合上述應可推論，石碑訓練班確屬蔣經國培養陸軍派系的一環，王叔銘批評石碑訓練班及彭孟緝，等於間接批評了蔣經國。¹²⁷

石碑訓練班的問題，在王叔銘僅為空軍總司令時，只能抱怨或阻礙石碑系統在空軍的發展，但在其接任參謀總長之後，便有權力予以全盤反制。1958年12月，王叔銘明確表達反對，其原因概略有二點，一為石碑訓練以日本教官辦理正規班之教育，日本教官既非現代軍事人才，又是可疑間諜分子，欲以人情關係用作研究可以，用之作教官則條件不足；二為石碑學員已於國軍形成一派系，如任其發展下去，則無異害國軍之團結。他上書總統作一誠懇坦白的建議。¹²⁸ 某次，王叔銘陪蔣中正見石碑學員，王「甚不滿意」，因為「各學員都不實情實說，均投總統之所好而言也」，於是壓抑石碑學員較其他軍中人員為多的機會，「手令

¹²⁰ 《王叔銘日記》，1955年2月19日。

¹²¹ 《王叔銘日記》，1955年3月9日。

¹²² 《王叔銘日記》，1955年3月12日。

¹²³ 《王叔銘日記》，1955年3月13日。

¹²⁴ 《王叔銘日記》，1957年1月20日。

¹²⁵ 《王叔銘日記》，1955年9月18日。

¹²⁶ 孫家麒，《蔣經國竊國內幕》，頁17。

¹²⁷ 王叔銘失勢後，曾傳出蔣經國說王「時常攻擊彭孟緝，且常發牢騷，似不妥當」。參見《王叔銘日記》，1959年7月25日。

¹²⁸ 《王叔銘日記》，1958年12月7日。

各軍種派員出國受訓或考察，不可憑情感講人情而派員」。¹²⁹

事實上，兩蔣就是以石牌訓練班（實踐學社）作為培養拔擢優秀軍官的重要方式，一般已視之為地下國防大學，非實踐學社學員無法晉升師長以上職務，王叔銘的態度根本上與兩蔣建軍思想相左。¹³⁰ 王沒有注意到他對兩蔣建軍政策與權力的挑戰，滿心以為自己一片赤忱為國。後來蔣中正欲專請石牌受訓人員在石牌茶敘，王叔銘「實不敢苟同，似此可能造成小派系之事，在求大團結之今日中，實非所宜」，於是「特將此事告知經國兄」，未料蔣經國「以很不自然的表情，同意我的見解」。王似乎察覺了甚麼，但仍以為自己是「顧慮大前題」，「今日總統再不宜自造小圈，而分離其所愛之子弟也」。¹³¹

（三）蔣經國與陳誠之間選邊站問題

蔣經國藉石牌訓練班產生新的軍事派系，除了要替代舊黃埔系，也要取代其他資深軍事將領盤根錯節的人脈，這裡面最重要的是副總統陳誠。陳誠是蔣中正麾下重要將領，軍事經歷極其豐富，曾擔任參謀總長兼海軍總司令、東南軍政長官等要職，其系統稱作土木系。他雖於 1950 年代的臺灣離開軍職，人脈、威望仍存，並參與蔣中正的機密反攻計畫。¹³² 美方於 1961 年分析陳誠對軍隊仍有相當影響力，軍中許多人是他過去的部屬。¹³³ 外界一般視蔣經國與陳誠競爭繼任蔣中正的總統職位，¹³⁴ 英國方面甚至曾猜測蔣中正若過世，陳誠以副總統身分繼位，

¹²⁹ 《王叔銘日記》，1958 年 12 月 23 日。

¹³⁰ 受訓受擢升的郝柏村日後回憶：「蔣總統在臺整軍建軍從培養幹部著手，『圓山軍官訓練團』及『實踐學社』是幹部搖籃，無疑地我的成績受到肯定，獲得蔣總統親自召見與個別談話，被列為計畫拔擢的一員」；蔣經國透過提拔石牌訓練班學員以培植新派系，背後應有其父蔣中正的授意或首肯，即此時期蔣經國形同蔣中正的代表或分身，這種傳統中國身分政治是蔣經國崛起的原因之一。參見郝柏村，《郝柏村回憶錄》（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136、165；岳天，〈國軍深造教育第三時期：對國軍聯參教育的回顧〉，《國防雜誌》（臺北）11: 11（1996 年 5 月），頁 22。

¹³¹ 《王叔銘日記》，1959 年 4 月 5 日。

¹³² 葉惠芬，〈陳誠對反攻大陸計畫的參與及影響〉，《國史館館刊》（臺北）59（2019 年 3 月），頁 27-76。

¹³³ "Ch'EN Ch'eng,"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簡稱 NSF) (Boston: John F. Kennedy Library), China, Box 22, General 7/25/61-7/27/61.

¹³⁴ 美國早在 1953 年，便認為蔣經國將承繼蔣中正，成為臺灣政府與政治圈最有權力的人。參見 "Visit of General Chiang Ching-Kuo to the U.S.," (May 28 195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RG 330, NARA, Entry 199, OSD CD(1953), Box 8, CD3;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August 1954," "A. H. B. Hermann to Harald Macmillan,"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pp. 537, 659.

擁有相當實力的蔣經國可能發動政變。¹³⁵

不論蔣經國是否真欲爭取大位，他對陳誠的確素無好感，認為此人多言主觀、氣量小、個性強，行為不得其法，對父親信仰不夠，結黨營私且處處針對他。¹³⁶ 在陳誠出任副總統前，蔣經國曾對王叔銘表示「陳誠如不作行政院長，而想作副總統，則為不存好心之表現」。¹³⁷ 陳出任副總統後，與新任國防部長俞大維赴金門視察，王叔銘跟隨往赴，事後與蔣經國談及此事，蔣詢問陳、俞去金門何事，「言中似有不滿」，王叔銘感到莫名其妙。¹³⁸ 其中幽微，或為陳誠攜國防部長至金門前線視察，彰顯其剛升任副總統的權威及在軍中的分量，引起蔣經國的警戒。

1958年抗戰建國紀念日（7月7日），王叔銘公開發表一篇〈克難建軍〉文章，提到一班失意政客和無聊的自命「文化人」假借自由民主的美名攻訐政府，破壞團結危害國家，同時提到有些人「因為台灣侷促一隅，遂致懷疑反共抗俄之前途，處處過度敏感」。¹³⁹ 王叔銘所指或為《自由中國》雜誌對政府的批評固然不對，但相關單位反制也實在是「過度敏感」。蔣經國認為該文極不恰當，大表不滿，召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堅忍指責王叔銘「克難建軍一文之所云偏差」。此際，路透社雇員蔡文智揣測王叔銘此文是「反對蔣經國」，並且說王叔銘「原是蔣經國之人，現已倒為陳副總統之人」。蔣堅忍將蔣經國的不滿及蔡文智的文章密告王叔銘，王「至感氣憤」，親筆寫信給蔣經國，詳述其作克難建軍一文之用意，並說明「我之立場是總統的學生，不是任何人之私人」。¹⁴⁰

此事表面暫告平息，然而就派系角度觀察，王叔銘的說明等於明確表態他雖然不是陳誠派，也不會是蔣經國派，他效忠蔣中正而非蔣經國，不會對蔣經國百依百順。如此態度蔣經國是否能夠接受？從日記來看，蔣經國深感厭惡，批評王叔銘「自作聰敏，存私心玩弄政治」。¹⁴¹ 一連串的衝突，使蔣對王的猜忌愈益加

¹³⁵ "A. H. B. Hermann to Harald Macmillan,"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p. 660.

¹³⁶ 《蔣經國日記》，1946年7月20日，1947年1月21日、3月13日，1951年2月14日、10月19日，1953年6月2日。

¹³⁷ 《王叔銘日記》，1954年1月18日。

¹³⁸ 《王叔銘日記》，1954年9月14日。

¹³⁹ 〈今為抗戰建國紀念 王叔銘撰文籲克難建軍〉，《聯合報》，1958年7月7日，第1版。

¹⁴⁰ 《王叔銘日記》，1958年7月12日。

¹⁴¹ 《蔣經國日記》，1958年7月14日。

深，王做甚麼，都令蔣感到別有心機。某日王叔銘來找蔣，蔣以為「居心不正者不能與其作知己之友」。¹⁴² 他又想起周至柔曾對他說「王叔銘倘使要把某人打垮，他必定不擇手段而達其目的」，蔣認為「事實證明確是如此」，¹⁴³ 判斷「由於王叔銘之處理人事與『小事』，可以充分的看出其為人之小氣而不開闊，善於運用各種關係而達到其所要達到之目的，倘使說其真本領何在，則在其善觀氣色也」。¹⁴⁴

質言之，蔣經國與王叔銘所以成為盟友，有友情成分，也有相互固權的利益考量。當後者漸不一致，衝突在所難免。王叔銘出任參謀總長，蔣經國對軍隊的掌握達到新高，然而王並非蔣經國的應聲蟲，有「王老虎」之稱的他，個性剛強，和蔣經國以兄弟相稱而不下屬自居。蔣經國與王叔銘於政工、情治、派系等方面發生衝突，也就是於建軍思想與兩蔣發生分歧。蔣經國因此對王叔銘極感負面，認為王有才無德、自私自利，在日記中毫無保留地批評。王叔銘一心自認效忠領袖蔣中正而盡心盡力，沒有發現建軍思想的分歧，對蔣經國工作有所不滿但惡感不深。雙方都以為對方受小人包圍，希望勸誡對方改正，也都沒有效果。

從另一角度來看，蔣經國與王叔銘的衝突，或可視作蘇聯式黨國體制常出現的「紅」與「專」的衝突，即黨國政治需求與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衝突。在軍事部門，此衝突體現在黨國政治運行與軍事專業化或正規化的衝突。以中國共產黨為例，其建政後，領導人深悉必須推動軍事專業化，加強裝備與組織制度的建設，打造紅軍為一現代化軍隊，於是形成一批專業軍官團。雖然專業軍官團也是黨的成員，但他們傾向從軍事專業需求出發思考問題，而非以政治思考優先，反對軍隊政治控制造成的無效率。黨與軍如是分歧，最終造成了衝突。¹⁴⁵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與軍事領袖彭德懷的衝突，從某種角度上看便是此一情態的體現。¹⁴⁶

¹⁴² 《蔣經國日記》，1958年5月30日。

¹⁴³ 《蔣經國日記》，1958年6月5日。

¹⁴⁴ 一些較小的事情也損害了王叔銘與蔣經國的關係。如蔣經國建議以夏功權為駐法國武官，是受夏功權之岳丈時任外交部長黃少谷之託而說項，王譏以「中國只是重人情，無制度而言」。參見《蔣經國日記》，1958年6月24日；《王叔銘日記》，1959年4月15日。

¹⁴⁵ Ellis Joffe,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5), pp. 147-151.

¹⁴⁶ 齊茂吉，〈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兼論「彭德懷事件」之發展始末〉，《中央大學人文學報》（桃園）5（1987年6月），頁119-158。

蔣經國在軍隊推動政工、情治、另立派系等工作，固然不反對軍事現代化，卻與美式軍事專業化進程格格不入。王叔銘的所作所為，恰為美英所欣賞，常以專業（professional）形容其表現，而王叔銘出身的空軍，也剛好是國軍各軍種中專業化特質最顯著者。英國方面，以為王叔銘擁有無畏的飛行員名聲，並且是個強有力的指揮官。¹⁴⁷ 美國方面，高度肯定八二三砲戰時，作為國軍軍令負責人的王叔銘的指揮作戰以及和美軍的聯繫，認為他不會對美方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總是掌握全盤狀況，是一個偉大的戰士（a great soldier）。¹⁴⁸ 對於國軍在砲戰中的表現，美國內部報告呈現空軍已發展成專業化程度極高的軍種（a highly professional force）。¹⁴⁹ 美國太平洋空軍總司令庫特上將（Laurence S. Kuter）對王叔銘帶起來的空軍讚譽有加，在一封給王的信表達專業上（professional）的尊重和敬意。¹⁵⁰ 另一封信則對臺灣軍隊的「精確」（precision）印象深刻，指出美國西點軍校可能都無法超越王叔銘領導軍隊行軍的精確，臺灣輪式車輛和履帶車輛精確駕駛，噴射式戰鬥機大隊精確飛行，及計畫、組織到執行的精確，庫特上將對王叔銘再次表達專業上的尊重和敬意，同時真誠恭賀臺灣軍隊精確的表現。¹⁵¹ 庫特對王的信可能有禮貌的成分，不過他在內部軍事報告中也是這樣陳述，表示臺灣的空軍是遠東最好的組織，他們訓練有素、裝備精良，從王叔銘到個別飛行員都非常積極。¹⁵² 他晚年的口述訪談，仍陳述臺灣空軍當時的表現不可置信的好。¹⁵³ 另一位美國軍官也有類似評

¹⁴⁷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March 1952,”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p. 72.

¹⁴⁸ “Report by the Commander, U.S. Taiwan Defense Command (Smoot)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Felt),” (Aug-Dec 1958) in Harriet Dashiell Schwar,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vol. xix: China, p. 507.

¹⁴⁹ “Quarterly Political Review, April-June 1959,” RG59, NARA,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793.00/8-2659.

¹⁵⁰ “General Laurence S. Kuter to General Wang Shu-ming,” (October 17, 1958), Clark Special Collections (Colorado: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MS 18-Kuter, Laurence S., Box 26.

¹⁵¹ “General Laurence S. Kuter to General Wang Shu-ming,” (October 14, 1957), Clark Special Collections, MS 18-Kuter, Laurence S., Box 26.

¹⁵² General Laurence S. Kuter, “Report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Presentation at ZI Commander's Conference, Patrick Air Force Base, November 20, 1958*, Clark Special Collections, MS 18-Kuter, Laurence S., Box 31.

¹⁵³ US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Oral History of General Laurence S. Kuter*, interview by Hugh N. Ahmann and Tom Sturm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1974), pp. 366-367.

論。美國空軍駐臺司令戴維斯（Benjamin O. Davis, 1912-2002）在回憶錄非常肯定王叔銘的為人和做事，對其指揮和任務導向（mission oriented）印象深刻。¹⁵⁴

雖然在國軍內部，不是對於王叔銘的軍事專業化領導沒有批評。王個性強硬，獨斷專行，不免有不滿之音。¹⁵⁵ 不過就上述脈絡而論，蔣經國與王叔銘的分歧，不僅是兩人建軍思想分歧或接班人權力競逐的問題，同時具有兩蔣黨國政治與軍事專業化衝突的背景。

四、相互決裂

（一）王叔銘的失勢

1959年6月，王叔銘參謀總長兩年任期即將屆滿。任期制度始於1952年，國軍仿美軍建立軍官兩年任期制度，避免過去軍閥的危險，創造用人彈性，並且可使指揮官獲得更多經驗，對於注重論資排輩的軍方而言，可以加速各軍種高階人事的新陳代謝。若有需要，可以再延長任期，標準完全操之於總統蔣中正。¹⁵⁶ 一般狀況之下，將領若無重大過失，連任一次一般不是問題。王叔銘似乎也自認會續任，與蔣經國討論很多軍中人事調整，就是沒討論到自己。¹⁵⁷ 事情就是那麼湊巧，就在任期屆滿前兩週，姚國驊匪諜案爆發而牽連到王叔銘，影響到他的仕途。

姚國驊案緣由，係姚國驊、謝淑儀被發現是匪諜，牽涉王叔銘熟識的大鵬劇團名伶徐露，以及徐的養父徐文熙。據姚國驊自白書稱：「總長〔王叔銘〕和我很好，徐露是我介紹接近總長的」；謝淑儀稱：「我有事都是找徐露的乾爸爸〔王叔銘〕」。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調查人員赴徐露臥室調查，發現徐露臥室掛滿王叔

¹⁵⁴ Benjamin O. Davis, *Benjamin O. Davis, Jr., American: An Autobiography*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c1991), p. 223.

¹⁵⁵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3, 1959) in Harriet Dashiell Schwar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xix: China, pp. 569-570; 汪士淳，〈《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訢的戰爭紀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頁120-121。

¹⁵⁶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March 1952,"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p. 72; "A. A. E. Franklin to Selwyn Lloyd, July 2, 1957," Senior defence posts in Formosa (Taiwan), FO 371/127497.

¹⁵⁷ 《王叔銘日記》，1959年5月3、31日。

銘親筆題字之玉照，以及兩人合照相片，家中並有一臺精製收音機，一開即聽到中共人民廣播電臺的聲音，徐露供稱收音機係王叔銘贈品。¹⁵⁸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警總）總司令黃杰、副總司令李立柏將相關調查資料呈報給蔣經國。蔣指示依法嚴辦，對王的事業即將重挫嘆息：「姚國華〔驊〕匪諜案之發生，可知潛伏在我內部之匪諜尚未肅清，同時由於王叔銘同此案有關人犯往來甚密，對王之影響至大，可知交友之重要了」。¹⁵⁹ 他赴陸軍服務社訪黃杰談此案，「深感此案之嚴重，務必徹查追根以明真相」。¹⁶⁰

王叔銘對自己涉入此案極度不悅，認為「警備總部情報處一向的作風是邀功求賞，自私自利」，某晚與蔣經國及黃杰討論此案，他們以為王叔銘與徐文熙家認識，暗示王恐會不積極辦理此案。王為此心中「至為氣憤」，「我〔王〕革命卅餘年反共最堅定，如果彼等確有上意〔上述暗示〕，則無異是侮辱我」。¹⁶¹

蔣經國其實也知道王叔銘與此案沒有直接關係，但先前累積的過節，促使其嚴厲究辦。自記：「姚國驊匪諜案牽涉王叔銘之部門至為明顯，王雖無直接政治的關係，但至少應負其無警覺而受匪諜利用以及生活腐化之責任，以後再要領導三軍殊不可能，為其個人惜」。¹⁶² 隨著案情的進展，蔣經國與負責的警總副總司令李立柏多次商談，發現與王叔銘有隙的李立柏，有借此案攻擊王的企圖，即警總有羅織罪名的可能。但是，與王亦有隙的蔣，仍以為王活該，自記：「王在此案中之失檢與失察確是事實，彼自應負責，但其平時之『對頭』必將擴大案件加以攻擊而無疑，人必先自毀而後人毀之」。蔣經國因此決定「對於敵人是不可寬恕的，此為做人與做事之基本原則，案案求真，事事徹查，此為十年以來處理匪諜案之要領」。¹⁶³

¹⁵⁸ 徐露養父為徐文熙，養母為謝淑儀。姚國驊是謝淑儀的妹夫。王叔銘喜好京劇，創立大鵬劇校，培養了徐露等人，因而與徐露有較多接觸。參見〈徐露可疑資料〉（1959年6月14日），《郭衣洞彭明敏等案》，「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8-00022-001。

¹⁵⁹ 廖文碩、陳昶安、李仕寧編輯校訂，《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第1冊）》（臺北：國史館，2022），頁580-581；《蔣經國日記》，1959年6月13日。

¹⁶⁰ 《蔣經國日記》，1959年6月15日。

¹⁶¹ 《王叔銘日記》，1959年6月12日。

¹⁶² 《蔣經國日記》，1959年6月17日。

¹⁶³ 後來，蔣經國讀李立柏親自送來由其所編寫之《姚國驊案側記之四》，發現完全以攻擊王叔銘為中心，其中所述事實多為虛構，極盡其挑撥分化與陷害之能事，自記：「由此更可證實李立柏為人之陰險惡毒，此人不擇手段，不講信義，不但不應上其當，更要防備他，有一天他亦會來陷害我的，社會上有一種人是專以能害人為快樂的」；李立柏在警總副總司令位置，之後沒有再升遷；林孝庭指出，

蔣經國深悉此案若使蔣中正知悉，很可能使王叔銘無法續任參謀總長，囑咐黃杰要警備總司令部速繕具詳細報告，並且詢問黃杰誰適合繼任總長。黃表示彭孟緝曾任總長，業務熟習，其繼任最為理想。蔣經國「頗以為然」。¹⁶⁴ 不數日，蔣中正於國防研究院召見王叔銘，告知其將調職，囑多研究陸、海軍事。王感到相當突然，「事前很機密」。辭出後順道訪蔣經國晤談，「彼〔蔣經國〕告以此次調職乃是任期屆滿，絕非政治問題，余〔王叔銘〕誠願如此也」。¹⁶⁵ 事實上，王叔銘去職就是因為涉入匪諜案的政治因素，不只是正常輪調。蔣中正在日記記下：「本日為叔銘粗陋失德不勝懊喪，多年培植竟至如此結果，甚為黨國人才難得憂也」；¹⁶⁶ 「叔銘與大鵬劇團之匪諜案不勝懊喪，不料其言行相背一至於此，幸在發覺尚早猶未被匪諜利用，惟叔銘之粗疏無識不能再使留任矣」；¹⁶⁷ 「叔銘失德欺蒙，包蔽匪諜，貪色奢侈，粗疏暴棄，一至於此，實為萬料所不及者，決予調免不能延誤矣」。¹⁶⁸

王叔銘調職令發布，震驚各界。政府表面上的理由是「任期屆滿，另有任用」，也就是正常輪調，隻字未提匪諜案或桃色風暴。美英法外交圈謠言四起，基本上猜對了主要原因，即王涉入名伶關係人的匪諜案，使得蔣中正對其喪失信任。¹⁶⁹ 王離任參謀總長改調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何應欽，職位雖榮但等同投置閒散。

王叔銘軍事生涯重挫，就蔣經國的軍事布局來說，也未嘗不是一個挫折。其實當王處處不支持蔣經國的軍事政策開始，蔣對王政治上已經由友轉敵，只是王

從蔣經國日記所載，可以強烈感受到他經手諸多匪諜與政治案過程中的矛盾性：一方面為了確保政權穩定，必須透過情治系統雷厲風行、勿枉勿縱；一方面又無法全盤掌握龐大的特務情治系統，無法充分信任執行者的準準與判斷能力。參見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頁58；《蔣經國日記》，1959年6月20日、8月16日。

¹⁶⁴ 廖文碩、陳昶安、李仕寧編輯校訂，《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第1冊）》，頁589、595。

¹⁶⁵ 《王叔銘日記》，1959年6月29日。

¹⁶⁶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2024），1959年6月16日，頁151。

¹⁶⁷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9）》，1959年6月20日〈上星期反省錄〉，頁153。

¹⁶⁸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9）》，1959年6月27日〈上星期反省錄〉，頁157。

¹⁶⁹ 〈總統令任免官員一件〉，《總統府公報》1031（1959年6月30日），頁6；“Inward saving telegram from Tamsui to foreign office, July 6, 1959;” “A. Veitch to N. C. C. Trench, July 6, 1959,” Army of Formosa (Taiwan), FO 371/141394.

始終不知。王叔銘對蔣經國「為國家及國軍利益，只好不顧朋友之私情而毅然處之也」；¹⁷⁰ 蔣經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蔣經國親信的蔣堅忍在王下臺後說「過去打倒了孫立人，現又打倒了王老虎」，¹⁷¹ 將孫立人與王叔銘對稱，可見此事從旁人視之，確實已上升到政治鬥爭層次。

蔣經國對此事感到的挫折或教訓，可以從此案發生後，日記多次提及印證。在王叔銘被告知離任總長當日，蔣記到：

王叔銘之總長職務在事實上並非調職，而是免職，可知一個人的事業，如不以德為基礎，而專靠玩弄手段而得來的地位，是決不會持久的。不將上級對其個人之信任來看作達成任務之一種重要力量，而反借此來作為爭權奪利之「護身符」，此種作法到最後一定歸於失敗，任何人必定是自毀而後人毀之，王叔銘今日之如此結局，即是一例也。真的總是真的，假的總是假的。¹⁷²

一個月後，仍自記感想：

彼〔王叔銘〕多少年來在我面前假裝其對我父親之忠，對我之關切，甚至多次問我錢夠用嗎？余始終未為其所動，以致未上其當，今日思之，自以為慰。用人之所長，此乃余對其之態度，不以道德為基礎而所得到的地位，一定是會慘敗的。自問對於姚國華〔驊〕案之處理，一本公正與真實之態度，並顧全大局與王叔銘之處境而處之，自問無愧，為王叔銘之尚不覺悟而嘆惜。江山易移，本性難改，此人休矣。¹⁷³

經此一事，多少影響到蔣經國日後的用人與待人。在王叔銘剛離任參謀總長時，蔣經國自記：「王叔銘並非沒有才能，而是因為沒有品德，而亦不研究新的學識，什麼都不懂而又要裝得什麼都懂。王叔銘案件應當是一種重大的教訓，今日的高級將領（包括我自己在內）皆須以此視為現實教育」。¹⁷⁴ 於是其用人漸偏

¹⁷⁰ 《王叔銘日記》，1958年11月18日。

¹⁷¹ 《王叔銘日記》，1959年12月15日。

¹⁷² 《蔣經國日記》，1959年6月29日。

¹⁷³ 《蔣經國日記》，1959年7月25日〈上星期反省錄〉。

¹⁷⁴ 《蔣經國日記》，1959年7月18日〈上星期反省錄〉。

重「德」而非「才」，此「德」意指忠厚誠實，不花言巧語，不欺上瞞下。蔣經國以為空軍總司令徐煥昇便是無才，認為徐「工作魄力較差，反應亦較遲緩」，但仍寧願用此性格之人，因為「雖有才而無德者，不可用之」。¹⁷⁵ 後來他也反省這樣用人有所缺陷，自認「用人重品德而往往忽略被用者之才能，因此而使工作受影響」，「余所選用之人且過於拘謹而缺乏開創力，過去亦曾經用過重幹才而忽視品德之人，但結果失敗了」。¹⁷⁶ 然而說是說，實際用人還是如此偏向。待人方面，王叔銘的經驗，促使其訓練自己喜怒不形於色，10年以後，蔣經國仍反省：「以後所要格外小心檢討和反省的，就是現在所交往的人中間，是否還有像王叔銘這一類人偽裝在我的左右」，「對付這種人必須自己保持冷靜，對於一切要多思考多觀察」，「只要自己保持安祥，對一切巧言令色者漠然無所表示，則任其手法如何高明，亦要知難而退，我在此上了一次重要功課」。¹⁷⁷ 喜怒不形於色，成為蔣經國的領導風格之一。¹⁷⁸ 誠然，個性養成非單一因素，蔣經國的蘇聯經驗已使其如此表現，不過與王叔銘從盟友到破裂的經過，對他應有相當深刻的影響。

（二）王叔銘對蔣經國軍事權力興起的觀察

王叔銘調職後與蔣經國不再合作，分道揚鑣。1959年兩人都屬盛年，蔣經國49歲，漸漸脫離五二四事件的陰影，事業穩步上升；王叔銘54歲，外放閒差，心理極度困挫。蔣經國經過多年深耕，在軍方已有較厚實的基礎，雖於王叔銘的人事布局上有所挫敗，由於王的繼任者是與蔣經國關係極佳的彭孟緝，他仍可牢牢掌握軍權，不因王下臺而減損實力。¹⁷⁹

¹⁷⁵ 《蔣經國日記》，1967年1月16日。

¹⁷⁶ 蔣經國在討論才德後續記「將王叔銘似作朋友，則我錯交了朋友，他對我而言，正是如他自己所講的『唯命是從』，尤其他對我父親偽裝忠貞，以假亂真，我就在此上當，現在已有事實證明了」。可見多年後，蔣經國仍受與王叔銘決裂的影響。參見《蔣經國日記》，1967年7月〈本月大事預定表〉。

¹⁷⁷ 《蔣經國日記》，1967年5月29日。

¹⁷⁸ 長期擔任蔣中正官邸醫師的熊九指出，蔣經國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是非分明，卻不念舊。參見陳三井訪問、李郁青紀錄，《熊九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129。

¹⁷⁹ 彭孟緝在桂永清猝逝後代理參謀總長一段時間，後來扶正。或是因其為黃埔五期，威望尚無法統御全軍，參謀總長由蔣經國秘密支持的黃埔一期王叔銘出任，彭孟緝改調陸軍總司令。據陸軍資深將領陸軍一級上將顧祝同透露，彭孟緝調陸軍總司令「因自己資望及戰績均差，自行膽怯〔怯〕不敢負此重責，彭曾要求陳副總統及俞部長免調陸總，並想調駐韓大使或駐美代表團團長等職，彭因怕陸軍高級將領不誠意接受其指揮，亦覺可怕」。參見《王叔銘日記》，1957年6月24日；“Chinese Nationalists Shake up High Command,”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1957/06/26, Current/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 Collection, 檔號 (FOIA) /ESDN (CREST) : 03153704。

彭孟緝經過兩年陸軍總司令的歷練，此際代王出任參謀總長，爾後連任兩次共6年（1959-1965），掌握國軍軍令要職，其背後則以蔣經國為後臺。據桂崇基（桂永清堂兄）觀察，黃埔一、二、三期出身的高級將領，多以老大哥自居，視蔣經國為老弟，心理上不願意接受他領導，所以桂永清猝逝後蔣中正越級命第五期彭孟緝出任總長，一則因為「彭早就走了小蔣〔蔣經國〕的派系和路線」，二則藉以警告黃埔一至三期門生，自己就不依期別倫理提拔，要他們認命接受蔣經國領導。之後彭孟緝所以能二次出任總長並晉升陸軍一級上將，也是因為其「善體上意」。¹⁸⁰

接替彭孟緝擔任陸軍總司令者為羅列，黃埔四期畢業，曾於中國陸軍大學、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深造，參加北伐、國共內戰，擁有一定名聲。¹⁸¹ 王叔銘的下臺而彭孟緝與羅列的上位，再加上黃埔六期空軍陳嘉尚，黃埔前幾期已被取代。

王叔銘離任參謀總長後，蔣經國仍須妥善面對各方的反應。由於王對美國友善與合作獲得肯定，臺方相關人員立刻向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 1906-1993）說明此事純粹為國軍正常輪調，相關軍事政策毫無改變。¹⁸² 對於王的下臺，坊間有諸多傳聞，有謂王與匪諜案有關，有謂王與美國過於接近。《聯合評論》是在香港出版的第三勢力期刊，刊登〈王叔銘垮台內幕〉一文，指出此事與桃色間諜案有關，高級官員爭風吃醋導致王的下臺，猶如之前的任顯群案，暗指蔣經國涉入此事。¹⁸³

蔣經國對這些傳言，認為「不利於我政府，且將影響士氣」。¹⁸⁴ 並且以為這是政敵所散布，「製造無中生有之謠言，又加罪於我身」，「總之政敵們無時不在暗算我，非將我致之於死地不可，自信一定能在敵人的面前挺起來，而且要作

¹⁸⁰ 賴名湯有類似觀察，他認為彭孟緝能夠升任總長，在於對蔣經國處處退讓，懂得為官之道。參見葉惠芬、林秋敏、周美華編輯校訂，《賴名湯日記 I：民國五十二-五十五年》，1964年9月19日，頁282；王國璋，〈桂總長早故之因與彭孟緝躍升背景〉，頁80-81。

¹⁸¹ "Inward saving telegram from Tamsui to foreign office, July 6, 1959;" "A. Veitch to N. C. C. Trench, July 6, 1959," Army of Formosa (Taiwan), FO 371/141394.

¹⁸² "Drumright to Secretary of States, July 8, 1959," RG59, NARA,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793.00/8-2659.

¹⁸³ 此處提到任顯群，係指前臺灣省政府財政廳長任顯群丟官入獄，官場流傳蔣經國爭奪任妻顧正秋未果，懷恨在心，因此羅織罪名將其下獄。參見谷正文口述，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臺北：獨家出版社，1995），頁113；胡文魯，〈台北通訊：王叔銘垮台內幕〉，《聯合評論》，1959年8月28日，第4版；《蔣經國日記》，1959年7月2日。

¹⁸⁴ 《蔣經國日記》，1959年7月2日。

還擊之準備」。¹⁸⁵

蔣經國的「政敵」就是前面提到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1960年初，隨著蔣中正總統任期即將結束，接班人選的鬥爭鬧得沸沸揚揚，各方謠言甚多，很多人以為陳誠與蔣經國權力衝突已成尖銳化。蔣中正後來三連任，陳誠與蔣經國衝突仍未停歇。¹⁸⁶但時間不站在陳誠一邊，他脫離軍職愈久，影響力愈減，蔣經國則反是，軍事權力明顯往蔣經國傾斜。1960年中，美國已視蔣經國權力僅次於其父。¹⁸⁷王叔銘在日記記下很多蔣經國軍事權力上升的觀察。1961年5月10日，空軍總司令陳嘉尚任期即將屆滿，蔣經國告其「將續任總司令，並不限一年或二年，亦或數月不一定」，語似帶威脅利誘。此事傳到王叔銘耳中，嘆息「如此看來任官期限之大權似已不屬總統，而操之經國之手矣，其然乎豈其然乎！」¹⁸⁸陳嘉尚連任後，透露「空軍重要均要報告蔣經國，彼同意再報總統」。¹⁸⁹陸軍方面，總司令羅列對彭孟緝想要的人不積極保薦，對自己權限內之事自行辦理並未上報，兩年任期一到並未續任，許多人傳言其調職是「蔣經國之背後搗亂」。¹⁹⁰至於海軍，總司令黎玉璽與蔣經國頗為配合。其實黎之出任海軍總司令，過程就跟蔣扶持王叔銘一樣，早經蔣經國的長期聯繫與部署。¹⁹¹

蔣經國的政敵無法在國內發聲，於是轉向海外進行批評。孫家麒長期於臺灣情治機構工作，在蔣經國手下做過事，知道許多「內幕」，後來脫離蔣陣營到香港，著書批判蔣經國。1961年底出版《蔣經國竊國內幕》、《我為什麼脫離臺灣國民黨》。王叔銘聞兩書出版，請人代購。對於《蔣經國竊國內幕》裡面所撰蔣經國藉由徐露家的事來害王叔銘，王以為是編造，「但其背【景】則屬確實」。¹⁹²

孫家麒書中所說的背景是什麼？其第二章「蔣經國怎樣竊奪軍權」，提到政

¹⁸⁵ 《蔣經國日記》，1959年9月8日。

¹⁸⁶ 《王叔銘日記》，1960年2月16日、7月17、23日。

¹⁸⁷ White House, "Situation in Taiwan as of 6/60," (1 June 1960),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下載日期：2024年4月24日，網址：<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224456/USDD?u=twncs183&sid=bookmark-USDD&xid=98652ed1&pg=10>。

¹⁸⁸ 《王叔銘日記》，1961年5月10日。

¹⁸⁹ 《王叔銘日記》，1961年8月25日。

¹⁹⁰ 《王叔銘日記》，1961年8月28日。

¹⁹¹ 張力訪問紀錄，《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168、191-192、212-216。

¹⁹² 《王叔銘日記》，1962年4月16日。

府遷臺後，在國軍制度方面有兩項重大措施，一是成立國防部總政治部，恢復軍隊政治工作；二是國軍將領實行以兩年為期的任期制度。他說兩大措施的動力都來自蔣經國，前者更由其親自主持，並且連任一次，兩個任期共 4 年，軍隊建立沒有政治部主任副署的部隊長命令無效的權威，即便蔣經國離任總政治部主任職，繼任者張彝鼎對部內公事概不過問，每日下棋，所有重要問題仍舊由蔣經國留下的主管人員直接向蔣請示。後者所謂「任期制度」，孫家麒認為是蔣經國所玩的一套「政治魔術」，對於他所不喜歡或不需要的人，不必找任何理由或藉口，可於任期屆滿時，冠冕堂皇地炒其魷魚。對於蔣所喜愛的人，可以使其繼續連任，真正無法再連任時，又可以派往另一重要單位過渡兩年，然後再捲土重來，依然有再來四年的機會，像彭孟緝擔任參謀總長就是這樣，「於是順我者『陞』，逆我者『垮』，可憐無數個久歷沙場、為國流血拚命的軍官，便如此這般地被太子先生一批一批打入『冷宮』」。¹⁹³ 王叔銘讀到此處，心有戚戚焉，自記：「我對經國原因總統之密切關係，曾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但我表面上則不顯露經國利用權力以達其私慾之處，但經國幼稚不明大體、不計道義，運用其卑詐險惡之手段來害我這個可靠的朋友」。¹⁹⁴

除了上述王叔銘所關心自己失勢的背景，孫家麒的書也提到蔣經國與陳誠的鬥爭。當時（1961 年）作為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的陳誠，仍有相當勢力，有人看好陳可能接班，孫家麒斬釘截鐵以為蔣經國必定是蔣中正的「繼承人」。¹⁹⁵ 孫並指明蔣經國為了容易掌權，特別喜愛提拔新人，不是因為重用人才，而是資深望重的人對國家有貢獻，指揮起來礙手礙腳，對方也不見得特別感恩，反倒是少壯幹部一但被擢升為方面大員，飲水思源，刻骨銘心，感恩圖報。¹⁹⁶

孫家麒在書中提及的內容顯然讓臺北當局無法容忍，該書因此遭遇發行受阻、消息封鎖及陷害等各種打壓手段。¹⁹⁷ 蔣經國在日記中指出，孫家麒出版此書的目的在於謀取利益，孫曾向國防部保密局索要 5 萬美元，試圖以此阻止書籍出

¹⁹³ 孫家麒，《蔣經國竊國內幕》，頁 8-11。

¹⁹⁴ 《王叔銘日記》，1962 年 4 月 17 日。

¹⁹⁵ 孫家麒，《蔣經國竊國內幕》，頁 3-5。

¹⁹⁶ 孫家麒，《蔣經國竊國內幕》，頁 15-16。

¹⁹⁷ 〈孫家麒君來函照登〉，《聯合評論》，1961 年 12 月 29 日，第 3 版。

版，但蔣經國拒絕通過金錢解決此事，雖然情治人員有意對孫進行制裁，但蔣經國出於不想引起更大關注，予以反對。¹⁹⁸ 不過不管蔣經國在日記怎麼說，孫的前上司、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主任陳建中還是支付了5千元港幣。最後由於數額太少，並沒有阻止書籍出版。¹⁹⁹

暫不論孫家麒是否為了賺錢，他攻擊蔣經國的內容，的確將許多事情加油添醋，例如兩年任期輪調的人事掌握權不在蔣經國，而在總統蔣中正。蔣中正固然扶植其子，替其移除權力路障，但人事異動仍須整體考量，蔣經國軍事政敵一一去除，是一個變動過程，甚至有些是意外（如桂永清猝逝），不是兩蔣隨其喜好任意調任。不過若僅就結果而論，孫家麒所述蔣經國對軍權的掌握，以及與陳誠鬥爭的過程，與實際發展確是若合符節。

或是由於孫家麒書兼具話題性、內幕與系統論述，不僅王叔銘，軍界大老何應欽亦讀了該書，某次與王叔銘見面時談到孫著，兩人皆認為「黃埔師生都是忠於總統者，蔣經國不應以此排除，尤其對黃埔老師」。何應欽坦白對王說，「蔣經國之所以弄你，就是為了你是一期同學，他指揮不便之故，所以他提用彭孟緝、王多年等，以便容易指揮之」。²⁰⁰ 還有很多記載與孫家麒書相呼應。王叔銘很早就與蔣經國談總統不宜與其老軍人幹部疏遠，而後起幹部不宜挑撥是非。²⁰¹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唐縱有類似看法，曾告王叔銘當國民黨改造時，總裁蔣中正曾對蔣經國說關於黃埔一、二兩期高級同學由總裁自行管理聯繫，蔣經國不必多與之聯絡。由此可見蔣中正對一、二兩期學生特別關心，他且擔心一、二期同學都是追隨自己出生入死打天下，萬一蔣經國聯絡不佳，恐出重大政治問題。²⁰² 此外，黃埔一期的蕭贊育亦曾透露他向總統當面說過，蔣經國對黃埔一期「不即不離，過於冷淡，且不願與之聯絡」。總統說：「哦哦？有此事嗎？好吧！我告訴他好了！」²⁰³ 這些事例，多少坐實蔣經國壓抑黃埔前期將領，另外培植其軍事

¹⁹⁸ 《蔣經國日記》，1961年10月28日、11月4日〈上星期反省錄〉、12月12日。

¹⁹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3冊）》（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1492。

²⁰⁰ 《王叔銘日記》，1962年7月9日。

²⁰¹ 《王叔銘日記》，1954年9月27日。

²⁰² 《王叔銘日記》，1963年2月11日。

²⁰³ 《王叔銘日記》，1963年2月11日。

人脈的狀況。被壓抑的王叔銘為此嘆息：「黃埔學生是一穩定國家之力量，總統賴之而成功，但今天有人排擠黃埔學生，處處的打擊黃埔學生，怕黃埔學生，尤其對前幾期的同學更加壓力」。²⁰⁴

1963 年底，陳誠辭去行政院長職，權力顯著衰退。²⁰⁵ 美方於 1964 年初觀察，蔣經國已經掌握政府主要職位，其支持者遍布，尤其是軍隊與國安部門。²⁰⁶ 3 月間，蔣經國兼任國防部副部長，王叔銘觀察「國防部副部長原訂由羅列接梁序昭，現又改為由蔣經國兼任，此顯明是老先生〔蔣中正〕要將全般國防事業交其子控制矣」；「之後俞大維〔國防部長〕更是傀儡一個，並且永久是蔣經國之護身符，可憐又可恥也」。²⁰⁷ 參謀次長羅英德告王叔銘「彭孟緝〔參謀總長〕亦無力控制人事，完全是蔣經國操縱」。²⁰⁸ 海軍總司令黎玉璽亦向王透露「許多的人事都由蔣經國作主，總統裝不知道」。²⁰⁹ 1965 年 1 月，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紐約時報》有社論述及蔣經國之為國防部長意涵「總統傳子」，社論並視蔣經國為臺灣第二號人物。3 月間，陳誠去世，蔣經國軍事權力已無競爭者。²¹⁰

相對蔣經國在國內權力的增長，王叔銘離任參謀總長後，擔任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復於 1962 年初外放紐約，擔任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這些都是閒職，王叔銘盛年亟欲施展抱負，心理備感受傷。某日其心臟感到不適，自

²⁰⁴ 王叔銘與何應欽討論的狀況，尚涉及心理因素。蔣中正對黃埔前期將領而言，是如師如父的服從，蔣經國雖然是蔣中正的兒子，對這些將領而言，難免會有聽了老的，為什麼還要聽小的心理存在（如前述桂永清的態度）。蔣經國應該也了解，除了壓抑，也有攏絡，所以在其掌權之後，晉升胡璉為陸軍一級上將，並且尊崇何應欽，親自頒授中華民國最高榮譽的軍職勳章：國光勳章，為第五位獲得該勳章者。參見《王叔銘日記》，1963 年 3 月 2 日〈上星期反省錄〉。

²⁰⁵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43-64: Prospect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1 Mar. 1964)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下載日期：2024 年 4 月 24 日，網址：<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062936/USDD?u=twncs183&sid=bookmark-USDD&xid=58a931d7&pg=15>。

²⁰⁶ Department of Stat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George Ball provides a short profile of Chiang Ching-kuo, Taiwanese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and son of Taiwanese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26 Jan. 1964)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下載日期：2024 年 4 月 24 日，網址：<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599359/USDD?u=twncs183&sid=bookmark-USDD&xid=0a851717&pg=1>。

²⁰⁷ 《王叔銘日記》，1964 年 3 月 13 日。

²⁰⁸ 《王叔銘日記》，1964 年 5 月 7 日。

²⁰⁹ 《王叔銘日記》，1964 年 10 月 19 日。

²¹⁰ 《總統府公報》1610（1965 年 1 月 15 日），頁 1；《王叔銘日記》，1965 年 1 月 14 日；〈陳副總統昨日逝世〉，《中央日報》，1965 年 3 月 6 日，第 1 版。

記：「我如果因心臟衰弱而死，實係我的朋友蔣經國因權力而殺我也」。²¹¹ 他雖對蔣經國十分不滿，仍希望透過舊的人脈與蔣經國親近，來爭取事業重獲發展，但是蔣經國對他評價低下，積怨殊深，絲毫不給機會。²¹²

1972年，王叔銘離開在紐約的職務，仍未回到臺灣工作，而是繼續外放約旦擔任大使。²¹³ 1974年，蔣64歲，王69歲，或是雙方都已步入老年，王於事業已無所求，雙方沒有利害關係，先前恩怨漸漸放下。²¹⁴ 蔣跟王交好時，於日記稱其為「叔銘」或「叔銘兄」，交惡後仍如此，有時直呼其名，此際復稱名或加兄。王於日記原稱蔣為「經國」或「經國兄」，交惡後直呼其名，此後復稱名或加兄。1975年4月蔣中正過世，王叔銘在約旦未能參加喪禮，未久王不再外放。²¹⁵ 此後，王叔銘對蔣經國多了一分崇敬，日記漸少稱其為兄，而稱院長、總統或先生。1978年2月，蔣經國拜訪王叔銘賀年後自記：「叔銘兄忠誠可感，當年彼為彭孟緝、李立柏所害，余未曾明察，反幫彭、李，思之後悔莫及。人際關係之複雜多變，可畏」。²¹⁶ 事實上，當年蔣經國即已發現王是被構陷，但為權力關係，仍牽連到他身上；此際的感想，是無利害關係的重新認識，不是歷史事實。1988年1月，78歲的蔣經國過世，83歲的王叔銘在電視中知此消息，驚慟交加，難過萬分，不敢相信，夜深不能成眠。²¹⁷

五、結論

黃埔一期出身的王叔銘是在臺國軍重要將領，其職位穩步上升，從空軍副總司令、空軍總司令，到參謀總長，位居要津。本文透過其與蔣經國的交往，梳理

²¹¹ 《王叔銘日記》，1960年7月7日。

²¹² 《蔣經國日記》，1962年2月28日〈上月反省錄〉，1963年1月29日、3月6日，1966年11月1、8日，1967年5月28日。

²¹³ 〈總統令〉，《總統府公報》2405（1972年4月19日），頁1。

²¹⁴ 蔣經國著、歐素瑛等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4）》（臺北：國史館，2023），1974年5月24日，頁144。

²¹⁵ 〈總統令〉，《總統府公報》2890（1975年5月26日），頁1。

²¹⁶ 〈上星期反省錄〉（1978年2月11日），收於蔣經國著、歐素瑛等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7-1978）》（臺北：國史館，2023），頁224-226。

²¹⁷ 《王叔銘日記》，1988年1月14日。

分析蔣經國如何建立其在臺軍事權力。

就如一般所認識，情治與政工是蔣經國掌握軍事權力的基礎，情治系統監控全軍，政工兼掌軍隊黨部，在軍隊自成系統。實際上蔣經國掌握軍事權力的方法不只如此，他曾多次親赴金馬前線撫慰軍民，並藉退輔會在退役軍人之間建立組織，累積聲望。掌握情治、政工或退輔會雖非軍事核心，但指揮系統是國軍資源所在，也是所有軍官升遷最重要的渠道。蔣經國深悉此中門道，雖於制度上沒有位居指揮系統的關鍵職位，仍持續於指揮系統布局，其手段主要為運作人事、培植派系。

運作人事有兩個基礎，一為蔣經國身為總統蔣中正之子的特殊身分且擔任總統對外聯繫人，造成總統代表的隱性影響力。他直接與高級將領接觸，促使將領與其合作。二是國軍建立了兩年任期制度，任滿是否留任，沒有一定標準，完全操之於蔣中正。蔣中正扶植其子，助其削除權力路障，蔣經國也揣摩或刻意影響蔣中正的判斷，使軍中人事朝其布局發展。同時，蔣經國也培植軍中親己將領，使之成自己的代理人，於指揮系統發揮影響力。在與王叔銘交往過程，可以看到蔣經國透過王推動軍中政策、布局人事，爾後王叔銘出任參謀總長，可說是蔣經國人事運作階段性的成功。由於參謀總長是指揮體系僅次於總統的重要職位，蔣經國透過王叔銘的職權，得以深度涉入指揮系統。

培植派系方面，一般已知曉蔣經國以政工幹校培養其幹部，形成政工系統；另以石碑訓練班統合過往的軍統系與中統系，形成自己在情治系統的人脈。在指揮系統，蔣經國亦著力培養其派系。同樣在臺北石碑的石碑訓練班，又稱實踐學社，以舊日本軍官「白團」為教官，傳授戰術與戰史，過往已知此訓練為蔣中正在臺建軍的重要方式，實際上蔣經國亦透過該訓練的負責人彭孟緝建立派系。由於石碑訓練班是國軍軍官升到師長以上職務的重要學歷，蔣經國得藉以迅速在指揮體系培植一批自己人。

蔣經國對軍權的掌握，有規劃，有手段，總的目標是瓦解舊黃埔系，也就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前幾期將領。他們戰爭經驗豐富，對沒有作戰經驗的蔣經國不是那麼看得起或順服。王叔銘亦是黃埔一期，支持蔣經國的事業，擔任參謀總長之後，與蔣經國工作交集增多，衝突也隨之增加。王不支持情治與政工，反對石碑

訓練班另造派系，在蔣經國與陳誠之間維持中立，種種作為直接挑戰了蔣經國建立軍事權力的企圖。兩人關係本為盟友而非長官部屬，王心態上與黃埔一期將領並無二致，一連串衝突導致王叔銘也成為蔣經國必須對付的舊黃埔系一員。就在王參謀總長任期屆滿之前，他捲入了匪諜案改任閒職，與蔣經國徹底決裂。

蔣經國與王叔銘關係的變化，不僅是個人層面的變遷，還反映了王叔銘與兩蔣在建軍思想及軍事專業化方面的歧異。國共內戰的慘敗促使兩蔣決心效仿中共，重建政工、情治、黨支部等組織，並透過石牌訓練培養一批忠於領袖的軍官。這些舉措深刻影響了軍隊的日常運作，並引發了不少軍中指揮系統的反對聲浪。美軍基於其專業軍事立場也強烈反對，反而肯定了王叔銘的專業軍事作為。因此，王叔銘的遭遇可以說是黨國政治與軍事專業化衝突的一個縮影。實際上，兩蔣的學習對象——中共的黨軍關係，亦曾經歷「紅」與「專」的矛盾衝突。毛澤東透過政治運動來處理這個問題，導致彭德懷等軍方高層的清洗，政局陷入極端動盪。相較之下，兩蔣雖然學習了中共的做法，卻同時從美國引入了軍方高層兩年任期制，這一相對制度化的處理方式大大增強了臺灣政局的穩定。近代中國軍事改革的核心目標之一，便是整合並清理各軍系勢力。兩蔣借鑒了中共與美國的方法，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營造穩定的軍事秩序。此舉同時鞏固了蔣經國的政治地位，使其掌握中華民國政權，擁有軍事上的憑藉。

附錄：中華民國在臺軍事首長變遷表（1950-1965）

總 統 蔣中正 1950.3-1975.4

副總統 陳 誠 1954.5-1965.3

參謀總長	陸軍總司令	海軍總司令	空軍總司令
周至柔(保定 8)AF 1950.3-1954.6	孫立人(美國) 1950.3-1954.6	桂永清(黃埔 1) 1948.8-1952.4 馬紀壯(青島) 1952.4-1954.7	周至柔(保定 8) 1946.6-1952.3 王叔銘(黃埔 1) 1952.3-1957.7
桂永清(黃埔 1)N 1954.7-1954.8	黃 杰(黃埔 1) 1954.6-1957.7	梁序昭(馬尾) 1954.7-1959.2	
彭孟緝(黃埔 5)A 1954.8-1957.6			
王叔銘(黃埔 1)AF 1957.7-1959.6	彭孟緝(黃埔 5) 1957.7-1959.6		陳嘉尚(黃埔 6) 1957.7-1963.7
彭孟緝(黃埔 5)A 1959.7-1965.6	羅 列(黃埔 4) 1959.6-1961.8 劉安祺(黃埔 3) 1961.8-1965.8	黎玉璽(電雷) 1959.2-1965.1	
			徐煥昇(黃埔 6) 1963.7-1967.7
黎玉璽(電雷)N 1965.7-1967.6	高魁元(黃埔 4) 1965.8-1967.6	劉廣凱(青島) 1965.1-1965.8	

說明：1、括號為畢業軍校及期別，軍隊向來重視學緣，畢業學校與期數影響很大。

2、黃埔為黃埔軍校，保定為保定軍校，美國是美國維吉尼亞軍校，馬尾係馬尾海軍學校，青島係青島海軍學校，海電係電雷學校。

3、AF：空軍 Air Force；N：海軍 Navy；A：陸軍 Army。

4、海軍四大派系為馬尾系（閩系）、黃埔系、青島系與電雷系。參見張力，〈從「四海」到「一家」：國民政府統一海軍的再嘗試，1937-194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26（1996年12月），頁267-316。

5、彭孟緝1954年8月代理參謀總長，1955年6月實任。

資料來源：《總統府公報》248（1952年3月31日），頁2；《總統府公報》338（1952年3月18日），頁1；《總統府公報》341（1952年4月8日），頁1；《總統府公報》342（1952年4月15日），頁2；《總統府公報》611（1955年6月21日），頁1；《總統府公報》821（1957年6月25日），頁1；《總統府公報》988（1959年1月30日），頁1；《總統府公報》1031（1959年6月30日），頁6；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pp. 470, 486, 488, 528-529.

引用書目

《中央日報》

《總統府公報》

《聯合報》

《聯合評論》

《王叔銘日記》，1947、1950-1965、1988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王昇日記》，檔號：2013C5，1951年。史丹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檔案，典藏號：11-07-02-10-23-03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吳順明國防部人事令〉（1952年6月3日），筆者自藏。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檔案，典藏號：129-210000-1990。臺北：國史館藏。

「孫立人」檔案，典藏號：105-01-11-00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黃杰日記》，檔號：2012C1，1954年。史丹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蔣經國日記》，1945-1947、1949、1951-1953、1955-1959、1961-1963、1966-1967、1978年。臺北：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2-00010-004、002-080102-00013-012、002-010400-00017-028、002-010400-00019-023。臺北：國史館藏。

「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100-00043-001、005-010208-00022-001、005-010403-00010-037。臺北：國史館藏。

王昇，《王昇回憶錄（手稿）》，王昇自藏影本。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urrent/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 Collection, (FOIA) /ESDN (CREST): 03153704.

Clark Special Collections, MS 18-Kuter, Laurence S., Box 26, 31. Colorado: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Foreign Office (FO) 371/127497; 371/110301; 371/141394; 371/133497; 371/127497.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China, Box 22, General 7/25/61-7/27/61. Boston: John F. Kennedy Library.

RG 319, Records of the Army Staff, Entry 57, Box 497, China 1951 (Taipei).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RG 330,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Entry 199, OSD CD (1953), Box 8, CD3.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RG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793.00/8-2659.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1 June 1960. U.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6 Jan. 1964.

〈孫郭案36年至45年底紀事總表〉，「監察院」，下載日期：2020年9月11日，網址：<https://cybsbox.cy.gov.tw/CYBSBoxSSL/edoc/download/5239>。

烏可力，〈塵封往事藏驚雷：回憶傅鍾前輩領導中國共產黨莫斯科中山大學支部局發展蔣經國入黨始末〉（2020年5月31日），「禁聞網」，下載日期：2024年6月3日，網址：<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baitai/20200531/1337126.html>。

- 雷 洵，〈雷洵（海軍官校 40 年班）：也為我那個時期的軍人說幾句話〉（2016 年 4 月 15 日），「神仙·老虎·狗」，下載日期：2024 年 4 月 25 日，網址：<https://chaoyisun.pixnet.net/blog/post/64252657>。
- “Biographic Sketch: Chiang Ching-Kuo 1963,” 「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下載日期：2024 年 6 月 3 日，網址：<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biographic-sketch-chiang-ching-kuo/docview/1679088019/se-2>。
- “Current Intelligence. Current Intelligence Review [Chinese Nationalist Political Department Impedes U.S. Efforts to Reorganize Armed Forces, and Other Topics] 1952,” 「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Office」，下載日期：2024 年 6 月 3 日，網址：<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current-intelligence-review-chinese-nationalist/docview/1679113397/se-2>。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43-64: Prospect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1 Mar. 1964),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下載日期：2024 年 4 月 24 日，網址：<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062936/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xid=58a931d7&pg=15>。
- Department of Stat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George Ball provides a short profile of Chiang Ching-kuo, Taiwanese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and son of Taiwanese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26 Jan. 1964),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下載日期：2024 年 4 月 24 日，網址：<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599359/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xid=0a851717&pg=1>。
- 小谷豪治郎
- 1990 《蔣經國傳：現代中国八十年史の証言》。東京：プレジデント社。
-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編）
- 1982 《綠旗飄揚三十年》。臺北：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
- 王國璋
- 2013 〈桂總長早故之因與彭孟緝躍升背景〉，《傳記文學》（臺北）103(5): 78-82。
- 王長河、彭群堂
- 2021 〈白團對國軍撤退來臺後的貢獻與戰略意涵〉，《中華軍史學會會刊》（臺北）26: 39-66。
- 王漢國等（著）
- 2021 《政戰風雲路：歷史、傳承、變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尼 洛
- 1995 《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
- 江 南
- 1997 《蔣經國傳》。臺北：前衛出版社。
- 李雲漢（校閱）、林泉（整編）
- 1993 《郭寄嶠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 汪士淳
- 2006 《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訢的戰爭紀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 沈懷玉（訪問）、周維朋（記錄）
- 2013 〈鄭敦浦先生訪問紀錄〉，收於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記錄，《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篇）》，頁 581-63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沈懷玉（訪問）、林東璟（記錄）

- 2013 〈張欣超先生訪問紀錄〉，收於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記錄，《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下篇）》，頁69-10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肖如平

- 2012 《蔣經國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谷正文（口述），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

- 1995 《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臺北：獨家出版社。

岳天

- 1996 〈國軍深造教育第三時期：對國軍聯參教育的回顧〉，《國防雜誌》（臺北）11(11): 21-27。

林桶法

- 2011 〈政府遷臺初期空軍人事的糾葛〉，收於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下冊）》，頁557-585。臺北：世界大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 2013 〈重起爐灶的落實：1950年代蔣中正在臺的軍事整頓〉，收於黃克武主編，《重起爐灶：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頁47-117。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 2020 〈從蔣介石、胡宗南、王叔銘日記析論1949年蔣、胡戰略紛歧〉，收於呂芳上主編，《日記中的蔣介石》，頁235-267。臺北：政大出版社。

林孝庭

- 2021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胡平生

- 2013 〈1948年傅作義與陳繼承的齟齬：由《王叔銘日記》等觀之〉，收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頁691-713。臺北：國史館。

胡為真（講述）、汪士淳（撰寫）

- 2018 《國運與天涯：我與父親胡宗南、母親葉霞翟的生命紀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胡為真

- 2020 《疾風勁草：胡宗南與國軍在大陸的最後戰役（1949-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香港：開源書局出版有限公司。

若林正丈

- 1992 《台灣：分裂國家と民主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唐柱國

- 1997 《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秘史》。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孫家麒

- 1961 《蔣經國竊國內幕》。香港：自力出版社。

徐好文、胡必林

- 1992 〈戴笠接班人毛人鳳升官圖〉，《傳記文學》（臺北）61(6): 64-72。

徐康良

- 1996 〈徐康良先生回憶錄〉，《口述歷史》（臺北）8: 173-236。

郝柏村

2019 《郝柏村回憶錄》。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國防部史政局（編）

1955 《國防部年鑑》。臺北：國防部史政局。

國軍政工史稿編纂委員會（編）

1960 《國軍政工史稿》。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

國史館（編）

199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20輯》。臺北：國史館。

張力

1996 〈從「四海」到「一家」：國民政府統一海軍的再嘗試，1937-194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26: 267-316。

2009 〈王叔銘將軍日記中的八二三戰役〉，《中華軍史學會會刊》（臺北）14: 45-63。

張力（訪問紀錄）

1991 《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力、曾金蘭（訪問紀錄）

2002 〈徐學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張力等訪問紀錄，《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2輯》，頁17-154。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玉法、陳存恭（訪問），黃銘明（紀錄）

1991 《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淑雅

2008 〈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收於許雪姬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頁123-16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三井（訪問）、李郁青（紀錄）

1998 《熊丸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寶川（口述），卓遵宏、歐素瑛（訪問）

1999 《陳寶川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陳鴻獻

2005 〈蔣中正先生與白團（1950-1969）〉，《近代中國》（臺北）160: 91-119。

陳存恭、吳美慧（訪問），吳美慧（紀錄）

2007 〈李獻琨女士訪問紀錄〉，收於陳存恭訪問、萬麗鵬等紀錄，《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頁61-6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存恭（訪問）、蔡惠如（紀錄）

2007 〈王霖先生訪問紀錄〉，收於陳存恭訪問、萬麗鵬等紀錄，《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頁39-5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

2013 〈周至柔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臺北）13: 153-186。

陳 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

2015 《陳誠先生日記（第3冊）》。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翠蓮

2021 《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臺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喬寶泰（主編）、劉維開（編輯）

2000 《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上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黃慶秋（編纂）

1968 《日本軍事顧問（教官）在華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

葉惠芬、林秋敏、周美華（編輯校訂）

2016 《賴名湯日記 I：民國五十二-五十五年》。臺北：國史館。

葉惠芬

2019 〈陳誠對反攻大陸計畫的參與及影響〉，《國史館館刊》（臺北）59: 27-76。

廖文碩、陳昶安、李仕寧（編輯校訂）

2022 《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第1冊）》。臺北：國史館。

輔導工作紀要編輯委員會（編）

1974 《輔導工作紀要（第1輯）民國43年11月至48年12月》。臺北：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齊茂吉

1987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兼論「彭德懷事件」之發展始末〉，《中央大學人文學報》（桃園）5: 119-158。

劉鳳翰（訪問）、劉海若（紀錄）

1993 《尹國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劉澤民（主編）

2015 《臺灣省政府主席年譜：周至柔》。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潘進章

2007 〈共軍共青團之探究〉，《國防雜誌》（臺北）22(3): 82-92。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

2023 《蔣中正日記（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

2023 《蔣中正日記（1952）》。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

2023 《蔣中正日記（1953）》。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

2024 《蔣中正日記（1958）》。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

2024 《蔣中正日記（195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

2024 《蔣中正日記（196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國史館。

蔣經國

1990 〈我在蘇聯的日子〉，收於 Ray S. Cline 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頁 211-24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蔣經國

1991 〈向危險的方向前進〉，收於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5冊）》，頁 319-323。臺北：行政院新聞局。

蔣經國（著）、歐素瑛等（編輯校訂）

2023 《蔣經國日記（1970）》。臺北：國史館。

2023 《蔣經國日記（1974）》。臺北：國史館。

2023 《蔣經國日記（1977-1978）》。臺北：國史館。

賴名湯（口述）、賴啓（訪錄）

2011 《賴名湯先生訪談錄（下冊）》。臺北：國史館。

魏秀梅

1990 《趙聚鈺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Davis, Benjamin O.

1991 *Benjamin O. Davis, Jr., American: An Autobiography*.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Jarman, Robert L. (ed.)

1997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1952-1960. Slough, U.K.: Archive Editions Ltd..

Joffe, Ellis.

1965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Schwar, Harriet Dashiell (ed.)

199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xix: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author), Hugh N. Ahmann and Tom Sturm (Interview) 1974 *Oral History of General Laurence S. Kuter*.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Establishment of Chiang Ching-kuo's Military Power in Taiwan: Chiang's Relationship with Wang Shu-ming (1950-1965)

Sheng-hsiung Su

ABSTRACT

Mao Zedong, the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sited that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thereby indicating that a leader’s acquisition of power must be backed by military force. While a substantial body of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Chiang Ching-kuo’s consolidation of power in Taiwan, particularly o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the roles of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work systems, systematic analysis of his establishment of military power remains relatively scarce. This paper tak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ang Ching-kuo and Wang Shu-ming as a framework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ang’s military authority as a focal point to examine the process of high-level military personnel changes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follow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s reloca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xamines Chiang’s role and strategies he employed in consolidating military power.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work systems constituted the basis of Chiang Ching-kuo’s military authority. The latter system operated independently within the military, controlling the military’s party committees and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telligence apparatus to monitor the entire armed forces. However, it would be erroneous to assume that Chiang’s methods for consolidating military power were limited to these systems. The command structure, which concentrated the National Army’s resources and served as the primary channel for officer promotions, was another area in which Chiang was deeply involved. His strategies encompassed personnel management and factional cultivation, with the overarching objective of dismantling the old Whampoa clique. The transition in Chiang’s relationship with Wang Shu-ming from allies to adversaries not only illustrates shifts in the dynamics of military leadership but also reflects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Wang and the Chiangs, as well as the tensions between party-state politics and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Keywords: Chiang Ching-kuo, Chiang Kai-shek, Wang Shu-ming, Chief of General Staff, Shipai Training

《臺灣史研究》

第三十一卷・總索引

第 31 卷第 1 期（2024 年 3 月）

研究論著	由商業習慣到國際法： 郊商在東亞貿易中的紛爭和因應（1860-1905） …	林玉茹	1-44
	Formosa is Ours”: Robert Hart’s Role in the 1874 Taiwan Crisis ……	Yorgos Moraitis	45-78
	自本土萌芽： 重新思考 1922 年大稻埕自由廢業事件 ……………	陳姁媛	79-119
	自主性的理想：臺陽美術協會 戰前創作活動（1934-1944）的再認識 ……………	蔡家丘	121-171

第 31 卷第 2 期（2024 年 6 月）

研究論著	清代「臺灣編查流寓」法規之歷史考察 ……………	李文良	1-34
	硝煙下的體悟： 戰爭時期葉盛吉跨境求學中的閱讀生活 ……………	莊勝全	35-86
	《吳鳳》：臺灣電影製片廠對「現代電影」的追尋 ……	劉以霖	87-133
	競賽與產業：以南投縣鹿谷鄉農會 「凍頂烏龍茶」比賽為例（1970-2020） ……………	黃仁姿	135-194

第31卷第3期（2024年9月）

研究論著	大清帝國統治下臺灣的唐人用語分析	陳宗仁	1-32
	19世紀林圯埔竹材流通與鹿港海岸變遷的關聯	楊朝傑	33-75
	Forgotten Imperial Culture: The Spread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Kazuhiro Iwama	77-130
	留日臺籍建築師徐迺欣與他的時代： 聚焦 1943 年〈朝日日記〉	郭聖傑	131-174

第31卷第4期（2024年12月）

研究論著	「臺灣鄭氏招諭呂宋」史事考訂與補充	方真真	1-40
	霧社事件後清流部落之土地取得與生計變遷： 兼論周遭族群關係（1931-1980）	陳慧先	41-90
	Left Behind: Untold Stories of Former Korean Sex Workers in Post-WWII Taiwan	Yoshihisa Amae	91-127
	蔣經國在臺軍事權力的建立： 以與王叔銘交往為中心的探討（1950-1965）	蘇聖雄	129-174

稿 約

- 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出版之《臺灣史研究》（以下簡稱「本刊」）為季刊，每年三、六、九、十二月各出版一期，刊登有關臺灣史研究之中、英文研究論著，以及研究討論、資料介紹與書評。
- 二、投稿格式請依本刊之撰稿體例。
- 三、投稿請附上論文 word 電子檔，並寄至本刊信箱：twahr@gate.sinica.edu.tw。
- 四、本刊審查完成後發投稿者修改之稿件，自發信日起，給予兩週修改期限，請投稿者務必在期限內寄回修訂稿；若超過一個月後仍未交回修訂稿，將視同退稿處理。
- 五、本刊已接受刊登之論文，論文作者須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同意不限地域、時間及方式將本論文之著作財產權以無償、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本所得自行或轉授權第三人以紙本或數位化方式重製、出版、發行並銷售，或進行數位化編輯後，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使用者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行為。每一期紙本出版後，電子全文將刊登於本所網頁。
- 六、本刊不再提供抽印本，作者可獲得當期《臺灣史研究》兩本。此外，會提供作者論文印製版之 word 與 pdf 檔案，和抽印本封面 pdf 檔案，供作者自行製作抽印本。
- 七、經《臺灣史研究》發表之論文，由作者自負文責。
- 八、來稿以未發表者為限；如發表於研討會中，以該研討會不出版論文集或不收錄於該研討會論文集者為限，並盡告知義務。

Guidelines for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s

1. The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HR)* is published quarterly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of each year. It publishes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announcements, documents and source materials, and book reviews on historical subjects of Taiwan.
2. Preparation of manuscript for submission should consult the style sheet of the *THR* as a guide to format.
3. Manuscripts must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in Microsoft Word (.doc/.docx) format to the journal's email at twhr@gate.sinica.edu.tw.
4. The contributor should submit the revised manuscript within 2 weeks as of the date the notification email is sent. Failure to submit within 4 weeks will result in rejection.
5. 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nuscript for publication, the Author must sign the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 to grant the *THR* an irrevocable non-exclusive license to publish the manuscript electronically or use it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unlimited by region, time, and means. The user license also permits a third party to carry out digitization, remake and other value-added processes before storage in the database, and to provide electronic retrieval, browsing downloading, transmission and printing through stand-alone computers, the internet, wireless networks, and other means of public transmission. Upon publication of the manuscript in print, the full text will also be published electronically on the *THR* website.
6. Contributor(s) of each published work will be entitled to 2 hard copies of the issue of the journal containing their work. The journal no longer provides offprints.
7. Published works in the *THR* represent neither the points of view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or those of the *THR* editors. The contributors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statements, whether of fact or of opinion.
8. No manuscript will be considered if it has been published or if it is currently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reprinting of the journal's article requires prior notice and permission from the *THR*.

《臺灣史研究》撰稿體例

一、本刊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出刊。本刊為一學術性刊物，刊行臺灣史研究之相關著作。凡屬此領域之學術論著（中文不超過四萬字，英文不超過30頁為原則），研究討論（以三萬字為原則），田野調查與資料介紹之相關論述（以一萬五千字為原則），書評（以一萬字為原則）等，均歡迎惠賜稿件。論著請用橫式寫作，並附中、英文摘要，以各五百字為限；請附關鍵詞。

二、英文稿件格式，請參照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三、中文格式部分

（一）本文部分

- 1.正文及註釋，平常引號請用「」標示，書名、期刊用《》，文章篇名和碩、博士論文用〈〉標示，未出版之專書、研究報告等用「」。臺灣之「臺」，書名或文章名，無論中、日文，均依照原書、原文之寫法，除此之外，內文中遇有臺灣之「臺」，一律採用繁體寫法。
- 2.中、日紀元（西元紀年）的情形，一律採用「咸豐2年（1852）」的形式，若單以西元紀年表記則不在此限。
- 3.括號一律採用全形括弧（）。
- 4.文中數字與西元紀年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 5.正文中引用外文文獻之「書名」、「引文」、「專有名詞」時，必須附中文翻譯；凡正文中使用特殊字型如明體改楷體、加粗或斜體等，強調特定語詞時，須加註說明，方便讀者閱讀。
- 6.獨立引文每行前空三格；遇多段之引文，則每段開頭多空二字。正文內之引文，請加「」；若引文內別有引文，則使用『』表明。引文原文有誤時，應以〔〕表示正確的字或附加（原誤）。引文有節略而必須表明時，不論長短，概以節略號六點……表示，如「×××……×××」；英文句中三點...，句末則為四點....。
- 7.註釋號碼，請用阿拉伯字數碼表示，並請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 8.所附之照片、圖表，需於縮版印刷後，仍然清晰可辨識。說明文字、數字及符號，須與內文一致，並以橫列為原則，由左至右書寫；如需直寫，則由右而左。表、圖均需編號，並加標題於表之上、圖之下；相關說明文字，則均置於圖、表之下。
- 9.文章或註釋當中，若出現作者「按」，無論係改正錯誤或僅為說明文字，均採取〔按：×××〕之形式表示。
- 10.內文中自製或引用之表、圖、附錄涉及統計數字者，應確實查核所列數字正確與否。

(二)註釋部分

- 1.註釋中，作者與譯者之表現方式，如各僅為一人時，二者間以頓號表示，如「××× 著、××× 譯，……」；若作者或譯者有二人以上時，以「×××、××× 著，××× 譯，……」或「××× 著，×××、××× 譯，……」之方式表示之。
- 2.正文及註釋，平常引號請用「」標示，書名、期刊用《》，文章篇名和碩、博士論文用〈〉標示，未出版之專書、研究報告等用「」。
- 3.論著註釋，請依下列格式加註：

第一次出現時：

- (1)專 著：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分），頁碼。
- (2)論文著作集：作者，〈論文名〉，收於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分），該文起迄頁碼。
- (3)期刊論文：作者，〈篇名〉，《刊物名》（出版地）卷：期（年月），頁碼。

再次出現時：

作者，篇名或書名，頁碼。

- 4.註釋中若遇合刊之期刊，以《期刊名》3: 3/4 的形式表示。
- 5.註釋或參考書目中之頁碼，以頁 1、2、3-4 的形式表示（採用頓號、以-取代~）。

6.文叢、研叢及原刊年的表現方式：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47種，1957；1852年原刊），頁11-12。

7.期刊卷期之後需附出版時間，或簡（只有年代）或繁（年月均有）皆可。

8.報紙的表現方式：

第一次出現時：

〈標題〉，《報紙名稱》，年月日，版次。

再次出現時：

〈標題〉。

9.引用電子資料時，請註明下列資料：

作者（年代），〈篇名〉，下載日期，網址。

（二）引用書目部分

- 1.全篇論文之後，需詳列引用之書目。不分期刊論文、論文著作集，或是專著，中、日、西文並列時，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中、日文書目，可按作者姓名筆劃，西文書目依字母次序排列，姓在前，名在後。
- 2.引用書目中，若有版本或原刊年等說明文字，皆於該書後加括號說明之。
- 3.書目範例：期刊論文、論文著作集、專著書目，依下列格式編排之。

（1）期刊論文：

王世慶

1985 〈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的關係〉，《臺灣文獻》（南投）36(2): 107-150。

Coe, Michael D.

- 1955 "Shamanism in the Bunun Tribe, Central Formosa." *Ethnos* (Stockholm) 20(4): 181-198.

(2)論文著作集：

松田吉郎

- 1992 〈臺灣の水利事業と一田兩主制〉，收於陳秋坤、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頁 105-13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Wang, Tay-sheng

- 2013 "Legal Modernization and Repeated 'Extension of Mainland': From Late Japanese Colonial to Early Postwar Taiwan." In Kuo-hsing Hsieh, ed., *Shaping Frontier History and Its Subjectivity*, pp. 89-155. Taipei: Academia Sinica.

(3)專著：

曹永和

- 1985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Shepherd, John R.

-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史研究

第 31 卷 第 4 期

編輯者	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2652-5350 傳真：(02)2788-1956
劃撥帳號	17308795
製版印刷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16 號 8 樓 電話：(02)8227-8766
定價	新臺幣 200 元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ISSN 1024-2805

著作權所有・請勿翻印